

内 容 简 介

本书著者约翰·谢伟思以当事人身份，通过揭露著名的“美亚杂志事件”的真相，论述了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演变、实施及其后果，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一些内幕；详尽地介绍了在延安、华北等根据地实地考察的情况，如实记录了他与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的谈话。史料翔实，论述较为客观，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均有参考价值。

译 者 的 话

在中美关系史上，抗日战争后期是一个关键性时期。美国政府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它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个迄今仍在争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后来中美关系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为何失败、美中为何对立等的不同看法。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就成了研究中美关系和中国现代史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众多论著中，本书是值得一读的著作之一。

本书作者约翰·谢伟思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人物，他是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出生于成都，青少年时代的16个春秋是在中国度过的。抗战时期，他是美国驻华外交官，历任领事馆、大使馆职员、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和赴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由于他谙熟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中国的情况有深刻了解，因此，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独立的见解，撰写了许多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建议。为此，他被赫尔利和麦卡锡等人视为嫌疑分子，遭到政治迫害。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1971年，谢伟思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加入了第一批来华访问者的行列，并两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部书是谢伟思回顾他所经历的中美关系史的第一部论著，其中引用了大量他本人保存的第一手史料，有些在这里是第一次发表；在这部书中，既有作者当时真切的实际感受，又有事后成熟的明智判断。

作者写这部书的直接动机是批驳达拉斯大学历史教授库比克博士的《美亚文件》一书。该书于1970年发表，是为适应美国反动势力企图阻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而抛出的。书中编辑发表了1945年麦卡锡时代查抄《美亚》杂志社时搜出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写的许多报告，其中许多出自谢伟思之手。库比克在该书中断言，1949年美国“丢失了中国”其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破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其中当然包括谢伟思。

谢伟思在本书中介绍了《美亚》杂志事件的始末，揭露了这是一场麦卡锡主义的阴谋，并详细阐述了1944年至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作者认为，该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不象赫尔利和库比克所理解的那样，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相反，一系列美国政策文件表明，美国政府当时奉行的是“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灵活政策”。赫尔利没有执行美国政策的这一对华政策，他应该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作者从新的角度所作的这种解释，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对我们有所启发。此外，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作为当事人所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很有裨益。书中关于“美亚杂志案件”的论述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著名事件提供比较详细的材料。

本书译文由马德麟、杨云若同志校订，张注洪、高望之、黄小玲同志对译文的修改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邵本兴

同志也给过一些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曾梅筠同志对本书译设的修改、编辑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致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可能有不妥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作者致谢.....	(7)
第一编 《美亚》杂志案件.....	(10)
第一章 何谓“美亚文件”？	(10)
选择靶子.....	(12)
文件是偷窃的吗？	(16)
文件具有外交意义吗？	(22)
第二章 何谓《美亚》杂志案件？	(26)
假定有罪.....	(30)
这是一个奇怪的案件吗？	(33)
挑选出的事实.....	(58)
第二编 1944至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62)
第二编 导言	(62)
第三章 通过美国的指挥权统一中国.....	(64)
失败之果.....	(73)
第四章 高斯大使提出中立性建议.....	(78)
华盛顿的推动	(80)

蒋介石的拒绝	(83)
更多的失败之果	(86)
第五章 赫尔利将军支持蒋介石	(89)
新大使	(91)
一个新姿态	(96)
掌握在斯大林手中	(104)
美国人“一致行动”	(109)
再次失败	(115)
第六章 华盛顿坚持灵活政策	(117)
对中国而不是对国民党承担义务	(121)
赫尔利陈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理解	(123)
重申灵活政策	(129)
不要对委员长发号施令	(133)
也不要承担义务	(146)
马歇尔继续奉行有条件支持的政策	(152)
第七章 来自现场的遭到否定的观点	(173)
在重庆发表的观点	(177)
在延安发表的观点	(185)
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中有地位吗?	(211)
在中国，回答是否定的	(243)
附录一 发自延安和重庆的报告的一览表	(255)
附录二 中国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1944年6月20日)	(265)
附录三 参考文献目录	(291)
附录四 译名对照表	(301)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远东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是由于美国政府在战争最后一年作出的某些决定（或者说，实际上是由于回避作出某些决定）造成的。1944年，日军成功地袭击了在蒋介石和克莱尔·陈纳德倡导下建立的那些未设防的中国机场，这使盟国看清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队未能保卫机场，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国民党虚弱腐败、内部互相倾轧，而共产党已掌握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些事实。人们发觉，对蒋介石一伙来说，国内的政治角逐远比保证继续坚持抗日战争更为重要。事实上，中国所有的主要派别都在为那场日本投降后必将爆发的内战作准备。美国不得不调整政策以对付——或者至少是使自己适应——已露端倪的局势。为此，它作了许多尝试。

美国首先试图把中国各派的武装力量置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指挥之下。这一企图由于蒋介石反对而告失败，结果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然后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试图调解国共之争，这一努力被证明是主观、愚蠢、不切实际的。它同样很快地失败了。赫尔利的调解努力建立在他曾不同程度地表示过的下列三点假设上，但这都是错误的假设：（一）蒋介石比共产党强大得多；（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三）即使未组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共产党或

国民党也可能单方或双方交出各自的某些军权。当调解的努力破产后，当时已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又做了两件造成灾难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错误的，另一件则是不光彩的。首先，他承诺美国只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唯一领袖；其次，他公开把自己发起的调停活动的失败归咎于美国驻华外交机构的全体中国问题专家，指责他们背叛美国，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准确地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他的调解为何不能成功。就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举行了，罗斯福逝世了，大战也结束了。而中国内战也就开始了。

巴拉·塔奇曼探讨了1944至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久前得出结论说：“中国是一个美国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维持现状的努力不能给一个衰败的政府提供力量和民众支持并帮助其巩固政权。它无法支撑一个徒具躯壳的政府，也不能长久地延缓天命的循环。好象美国人从未到来过一样，中国最终走了自己的路。”^① 尽管我非常钦佩巴拉·塔奇曼的著作，但我认为，美国人不能把25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推诿于不可避免的“天命”，中国人和美国人也并没有各走各的路。相反，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战争，并从此彼此怀有敌意。美国也许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肯定有一个比当时实际推行的更好的政策。

美国当时的驻华外交官，包括本书的作者，曾提出过这样的政策。它包括努力防止中国爆发内战（比如，运用美国的影响改变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如果不成功，也不使美国和苏联各自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后台卷入中国的内战。然而，当时实际执行的是赫尔利大使的政策，它加速了中国内

^① 《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1年版，第531页。

战的爆发（因为它取消了压蒋改革的政策），并驱使中共与苏联建立了十年之久的联盟，因为美国已与其敌人结盟。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且不说悲剧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就是赫尔利非但没有为他执行的政策承担责任，相反，却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他的下属——具有数十年担任美国驻华代表经验的人们——把事情搞糟了。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着手寻找替罪羊时，他就把这些外交人员中以为货真价实的卖国贼，何以认定这些外交官——他们都在1945年4月被赫尔利调离中国——负有“丢失中国”之罪，这始终是麦卡锡主义的一个谜。

我第一次遇到约翰·谢伟思是在1962年，当时他已由美国驻利物浦领事一职卸任而退出外交界，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的高级学位。我们初次相遇是在我教的美国远东政策课的课堂上，当时我刚提升为助理教授。在第一堂课上，我概述了要讨论的题目，并较为详细地谈到史迪威将军的赴华使命。课后，谢伟思走到我跟前作了自我介绍。当我得知他正是1944至1945年间“我国驻延安代表”约翰·谢伟思时，我只能喃喃而语：“很高兴认识你。我想回家准备关于史迪威的讲稿。”

约翰·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1933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担任驻昆明领事馆职员。由于他的汉语能说得象本国语言一样地道，他相继被委派在北平、上海、重庆任职，并于1943年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参谋。作为美国国务院派驻陆军的联络官，他在1944和1945年曾两次前往中共首都延安。1945年4月他被赫尔利调离中国，6月作为《美亚》杂志案件的嫌疑犯被捕。逮捕他显然是错误的，政府对《美亚》杂志最初的突然搜查发生在1945年3月11日。

而他是1945年4月12日才到达美国的。大陪审团以20：0票否决了对他的指控，这清楚证明谢伟思在这一事件中是无辜的。当我重读收在这部专著中的司法部关于这一轰动事件的报告时，产生了两点想法：（一）如果国务院聪明一些——它通常认为自己非常聪明，那么就该有某个官员对一位驻外多年刚刚回国的人作谎言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美亚》杂志的成员；（二）司法部在这个案件中的严酷行径本身就值得国会对它进行一次调查。当然，《美亚》杂志案件的要害在于麦卡锡参议员想利用它来恫吓美国政府的某些高级官员。

在大陪审团宣布他无罪之后，谢伟思重回国务院工作，先是在东京任国务院派给麦克瑟阿将军的顾问班子成员，接着在新西兰的惠灵顿担任美国外交使团副团长。1950年3月14日，麦卡锡参议员在参院指控谢伟思，一年半后，尽管国会的调查证明他无罪，国务院仍将他辞退。1952—1957年，谢伟思在纽约一家蒸汽机制造公司工作（他在那里居然改进了一种蒸汽阀），并同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57年6月，法院一致投票判他无罪，9月，他回到国务院任职。1962年5月，他从国务院驻外处退休。

但他事实上并没有退休。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抱怨在30年后还得初次阅读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书），然后到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他以自己对中国无与伦比的知识帮助把该中心建成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四、五个主要学术机构之一。他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努力将该中心图书馆建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收藏共产党中国资料的图书馆之一。

从1952—1970年整个这段时期中，谢伟思都克制着不在关于中国政治的公众讨论和学术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虽

然研究延安时期问题的学者们多次要求他这样做。他在1970年决定打破沉默，虽然这是由于官方对他再次进行攻击而不幸引起，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美国政府、国会和公民50年代初对待战时驻华官员们的那种行径，也许可以找到某些辩解之辞。如当时冷战正又一次进入高潮阶段，人们感到困惑和不安，在追究所发生的事情的缘故时，美国人重演了波斯将军杀害报忧信使的古老悲剧。

但是在1970年重演这些事件，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了。正如《纽约时报》1970年2月15日指出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出版《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一书，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内部和台湾方面的“院外授华集团”残余分子想阻扰中美关系改善的拙劣企图，在当时来说，就是要干扰刚刚恢复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华沙进行的大使级谈判。这次院外活动选择的人身攻击方式，与几年前由台湾发动的对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诽谤运动相类似。^① 达拉斯大学历史教授安东尼·库比克博士为《美亚文件》所写的113页的导言，不仅是一份不光彩的学术文章，而且明显地出于宣传动机，以至于他在台北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还得到蒋介石本人的赞赏（见1970年3月21日《纽约时报》）。美国的纳税人可以提出合理的询问：美国参议院怎么会为他这种活动充当了出版商？

但是，正如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在两卷本《美亚文件》的前言中指出的：“出版这部书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它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部有价值的基本史料书。”撇开库比克的导言不谈，我确信伊斯特兰参议员的这个判断是正确

^① 参看伦纳德·戈登和张树兴《费正清和中华民国批评他的人》，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1期，1970年11月，第137—143页。

的。今后许多年中，历史学家们将查阅美国外交官员的这些报告，它们中有许多是在这里初次发表的。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政治上至为关键的十年，在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种语言的资料中，这些文件可能是唯一最为重要的史料。对于想研究这些报告的历史学家，以及仅仅对它们怪异的标题和奇特的出版者感到好奇的学者来说，谢伟思的专著将成为阅读这些报告的必不可少的指南。不言而喻，这本专著的作者和来自重庆、延安的大部分报告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从他事前和事后的见解中得到教益。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查默斯·约翰逊
1971年4月于伯克利

作者致谢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大量帮助。我感谢中国战争年代的许多老伙伴，特别是约翰·K·埃默森、富尔顿·弗里曼、约翰·F·梅尔比和戴维·D·丘瑞德上校，他们欣然向我提供了有关的回忆和事实。我深深地感谢亲身经历过此书涉及之事的很多往日国务院的同僚们。他们包括O·埃德蒙·克拉布、约翰·P·戴维斯、雷蒙德·P·卢登、爱德华·E·赖斯、菲利普·D·斯普劳斯和约翰·卡特·文森特。他们审阅了第二编文稿，并提供了有见地的建议和重要指正。我特别有幸能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查默斯·A·约翰逊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莱曼·P·范斯莱克教授的类似帮助。他们作为学者而不是事件参加者阅读了文稿，提出了大量深思熟虑的评论，由于具有充分客观而透彻的见解，这些评论很有价值。然而，我必须强调指出，此处提到的人大概没有一个完全同意我在此书中所写的一切。书中的论述、结论和错误均由我本人负责。

埃德加·斯诺慷慨地允许我摘引他的《复始之旅》。我同样感谢邹谠教授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我摘引《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乔治亚娜·史蒂文斯允许我使用她已故丈夫哈利·史蒂文斯上校的珍贵文件。史蒂文斯上校1945年间任战略情报局驻重庆代表时是我的朋友。简·凯尼柯小

姐作为一个富有耐心、乐于效力的熟练打字员，她所作的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职责范围。因为没有一个作者能同时胜任自己著作的编辑工作，所以乔·皮尔逊夫人的帮助，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最后，我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没有它的帮助，此书不可能问世。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的退休生活提供了一个令人惬意和振奋的工作机会，使我在被迫长期脱离中国工作之后，又重新接触到这个具有永久吸引力和重要性的题目，尽管工作性质不同了。库比克博士对聘用我一事所作的批评（见《美亚文件》第70页）并不是这类批评中的第一个，它们都未能恐吓住该中心和它从属于的这所伟大的大学。

还应提及另一项帮助。虽然我厌恶库比克博士和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我的报告所做的编排和评论，我还是很高兴在25年之后又得到了至今才可寻及的我自己的报告。读者看本书第一编时将会注意到，在官方准许的情况下，我本人曾保存了一套报告的副本。司法部1945年把这套副本还给我后，因为我接着就被派往日本工作，我把它们交给了国务院中国科。1950年我在忠诚安全委员会和泰丁斯委员会受审时，我的律师和我本人都认为，反驳某些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使用我的报告原文。但是中国科那时已把我的报告的副本丢失，再也不可能重新收集起这样完整的一套文件。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为我辩护所需的“证据”一直还在那里，作为被扣留的我的私人文件由司法部锁着，以待最终异想天开地把它们作为“中国灾难的线索”加以公布。

1951年12月，华盛顿的所有报纸都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我因忠诚可疑被解除外交官职务的新闻。那天，我妻子和我建议我们上中学的两个大孩子不妨在一两天内不去上学。他们

拒绝了这个建议。一个孩子在几个月后当了她所在最高年级致毕业词的代表，并接受了美国军团品德优良荣誉奖。另一个选择了外交职业。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某些好的方面。此书是为他们，也是为我们那个出生于大陪审团作出对我有利的判决当天，而对此事未曾有所见闻的最小的孩子写的。

第一编

《美亚》杂志案件

第一章

何谓“美亚文件”？

1970年2月，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由安东尼·库比克博士负责编辑，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大部头的书，书名是：《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书名本身就为了解一个离今久远的论题提供了良好的线索。某些在寻找延安时期文件资料的学者注意到此书是一个便利的资料来源，正在到处寻找学期论文或硕士论文题目的研究生敏感地注意到了此书。台湾的宣传人员满怀希望，称它是“历史的转折点”，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著作”。颂扬之词无所不用。但总的看来，此书不大引人注意。

接着，1970年8月21日，政府印刷局在其通常稳重刻板的双周通讯《美国政府出版物选录》上，特载了下列这个浮夸和臆想达到惊人程度的通告。

《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这些文件读起来就象一本间谍小说，但比间谍小说更引人入胜，因为它们确有其事。本书收集有几百份官方文件，其中许多以前从未发表过，它们充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政府在远东政策上所犯的悲剧性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一段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许多长篇大论的历史著作论述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这些文件的作者所写的。本书导言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发生的事情。第二部分讨论了有争议的《美亚》杂志案件，此案又叫“六人案件”，因为1945年6个美国公民以共谋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突然逮捕时，当时的报纸都这样称呼此案。第三部分分析了本书全文发表的某些文件，它们是被捕的六人之一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在1943—1945年间写的官方报告，他当时是一名年青的驻华职业外交官。

第一卷，1970年出版，共1017页，价
4.00美元

第二卷，1970年出版，共944页，价
3.75美元

政府印刷局公告的发行范围显然很广，它声称发行了90万份。它出版之后，我开始收到来自各地的，友好的和不

那么友好的各种询问，人们不断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案有什么新材料吗？为什么25年之后又旧事重提？人们向我提出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是唯一被这则广告点名的人。

选 择 靶 子

政府印刷局的广告在选择靶子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它方面则不然）。此书看来的确是以我为主要靶子。库比克博士这样说：

谢伟思在这个偷窃政府文件的奇怪案件中扮演了主角，根据就在于，他是1945年在一个热诚的共产党同情分子的纽约办公室中发现的如此多文件的作者，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然而，这些文件的内容作为历史记录也许要比文件被窃这个事实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期待并赞成中国落入共产主义手中。（重点号是后加的。）①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是轻率而武断地作出了结论，在这里我简单谈谈库比克博士的所作所为。他仔细研究了由司法部移交给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923份“非私人”文件。他挑选了其中的315份（“1／3多”）作为意义重大而应该发表的。这315份中，有“100多”份（约占发表文件总数的1／3）是我写的。

①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下简称《美亚文件》），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0年版，第70页。

挑选每一份文件至少有一个特殊原因——它的来源、它为人知晓时的保密等级、它的内容本身具有的重要性、或是它的外交意义。最后一个原因当然是最重要的。因而，此处发表的315份不同的文件中，在《美亚》杂志办公室发现的出自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之手的100多份文件最为重要。^①

我当然不是个人单独从中国报告情况的唯一官员。驻华使馆的官员中还有几个同我一样被派到陆军中去；另有几个则由大使馆派遣到中国各地去观察和报告情况。从可获得的大量材料中，库比克博士作了下列挑选：

E·E·赖斯	8份
E·F·德鲁姆赖特	7份
R·M·谢伟思	5份
J·K·彭菲尔德	5份
R·S·沃德	5份
J·K·埃默森	3份
P·D·斯普劳斯	2份
R·P·卢登	2份
O·E·克拉布	2份
J·P·戴维斯	1份
A·R·林沃尔特	1份
J·S·谢伟思	101份

从上表可以看出，其他11位经验丰富颇有才能的驻华外交官的报告总共才选用了41份，而我一个人则达101份。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的提供报告的机构。它肯定是国务院获得有关中国情报的主要来源。而《美

^① 《美亚文件》，第71页。

亚文件》所收的大使馆的报告仅有30份，其中来自重要的昆明领事馆的报告仅6份，来自整个国务院的文件仅12份。故意把我视为写报告特别多的人，或是把我的报告视为具有更为“重要的内容”和“外交意义”，这是十分荒谬的。库比克博士为何牵强附会扩大我的文件总数将在后面论述。

为了引导读者按他的意思阅读他挑选的文件，库比克博士写了一个长达113页的导言。它分为三部分：对国共关系的历史考察，对《美亚》杂志案件的论述，对所发表的《美亚文件》的分析。长30页的历史考察部分涉及到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等人，但从第22页开始，“国共关系”就基本被避而不谈了。我和约翰·戴维斯受到下列评价：

……掌握控制权的是那少数几个年青的驻华外交人员。约翰·佩顿·戴维斯和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在其官方报告中所写的东西，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他们是以老练的观察员的身份在当地进行活动的。他们发自中国的函电中的意见，被国务院作为真理加以接受。因此，这些职业外交官带有偏见的言论起到了在这关键时刻逆转历史车轮和改变美国远东政策方向的作用。^①

约翰·戴维斯当然没有牵涉到《美亚》杂志案件中去，所以，在库比克博士长达40页的论述此案的文字中，把我明显地放在比他突出的地位。事实上，我甚至胜过表示服罪的贾菲和不服罪但又不申辩的拉森。有12页看来完全是写我的，此外，至少有8页主要是写我的。

接着，库比克博士转而把这一套《美亚文件》“作为整体”加以分析。他告诫读者说，我并不是《美亚》杂志“神秘情报网”唯一的文件来源。

^① 《美亚文件》，第30页。

虽已强调指出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所写的101份文件是这两卷书中发表的315份文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但读者不难认识到许多其他文件也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来源，而且还因为它们的内容。①

接着，库比克博士用了5页的篇幅来讨论没有归之于我的那214份文件，其中明确提到的文件只有17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库比克博士用了26页的篇幅讨论我的报告，并明确提到其中的68份文件。

实际上，这点并不需要用统计数字来说明，库比克博士自己就十分直截了当地一再坚持说：

……有一个人与本书关系最为重要。

此人就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②

……出自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之手的101份文件……是最为重要的。③

……出自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之手的101份文件是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④

他从共产党根据地发出的51份报告……在这两卷书所收文件中是最重要的。⑤

忙碌的读者是没有时间啃完一本难免很冗长的书的，因此，让我告诉你们，事实上，在库比克博士和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出版的这篇幅庞大的书中，除了我由当初同《美

① 《美亚文件》，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71页。

④ 同上书，第74页。

⑤ 同上书，第86页。

亚》杂志案件稍有瓜葛，而在事隔25年之后却奇迹般地变成了案件的“主角”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

文件是偷窃的吗？

库比克博士认为我在《美亚》杂志案件中扮演“主角”的根据，就在于我是被查获的《美亚》杂志社掌握的“如此多”的“被窃政府文件”的作者这一“不折不扣的事实”。库比克博士通过坚持不懈地向其读者灌输下列三点论断来奠定他此说的基础：

1. 他所议论的在《美亚文件》中发表的所有文件都是由联邦调查局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获的；
2. 它们全是窃自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
3. 这些“被偷窃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的一大部分——“101份”是我起草的。

书中写道：

库比克博士检查了联邦调查局1945年6月6日从《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获的大约1700份政府文件。^①

这些被窃的战时文件中的300多份，将全文刊印在下面的篇幅中。^②

因为此处发表的所有文件都是在那次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动中由联邦调查局查获的，所以，这两卷书题名为《美亚文件》。^③

1945年3月，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半夜突然搜查

① 《美亚文件》，第11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页。

了一家小杂志的总部。该处……确有数百份美国政府机密文件……其中几乎有100份都有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的签名……①

……它们是被偷窃的。②

因此，导言的前面一部分应该看成是为读者个人研究被查获的《美亚》文件而提供的背景材料。③

……这101份出自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之手的文件，是在《美亚》杂志社查获的。④

……《美亚》杂志的编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他们在联邦政府内部的秘密来源收到了大量种类繁多的材料。⑤

一份文件标注的日期当然不能表明恰好就是《美亚》杂志编辑人员首次看到它的日期，但是，大概可以正确地假设，日期最早的文件可能就是最先被窃的文件。⑥

《美亚文件》下面这些出自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之手的文件是他的现场调查报告……⑦

文件上的保密等级是该文件从《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获时所标注的……⑧

库比克博士承认，他在第315号文件上碰到了问题。

① 《美亚文件》，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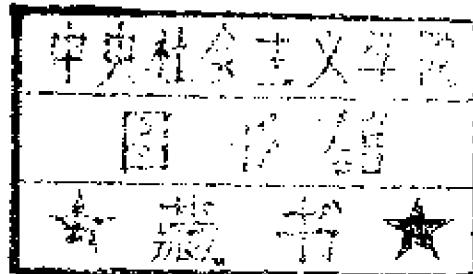
④ 同上书，第71页。

⑤ 同上书，第73页。

⑥ 同上书，第73页。

⑦ 同上书，第86页。

⑧ 同上书，第115页。



因为谢伟思在此处是对《纽约时报》前一天刊登的一篇文章进行评论，所以，他的备忘录几乎不可能写错或后填上日期。因此，这份文件可能从未被《美亚》杂志社所得，它所以最后落到司法部手中，不过是因为在谢伟思被捕时，联邦调查局从国务院他的办公桌中没收的文件中有这份文件。^①

他接着说，只有“怀疑论者”才会认为可能不止一份文件是如此。但是他为迷惑怀疑论者，又作了如下结论：“谢伟思究竟传递了多少文件——或是贾菲从其情报网收到了总共多少文件……，是无关紧要的”（这并不是库比克博士开始时要讨论的问题）。

实际情况则是，自1950年7月以来，其副本发现于《美亚》杂志社办公室的我的报告究竟是多少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泰丁斯小组委员会公布了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关于我的冗长听证会的全部记录稿。^②实际数字——一个已有20年的公开记录——是41，而不是“100多”。

虽然我是当事人，但是忠诚审查委员会和泰丁斯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证实了有关这些报告的如下事实：

1. 它们没有一份可能得之于我。
2. 其中若干份都有E·S·拉森（他被起诉，最后表示不服罪但不申辩）的指纹或笔迹。

① 《美亚文件》，第112页。

②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参议院231号决议举行的听证会》，（下简称《泰丁斯记录稿》），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0年版，共两卷2509页。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关于我的听证会的记录印在第2部分，附录，第1958—2509页。

- 3.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发送给拉森在国务院工作的那个部门的。
- 4.拉森承认给过贾菲某些报告，但关于其他文件，甚至明明是他给予贾菲的文件，他的说法则是前后不一变化无常的。

库比克博士(正确地)指出，我本人保存我在延安时期准备的备忘录的副本，是美国陆军驻重庆总部(我的报告是给它写的)正式按“惯例”批准的。但他没有指出，我个人还获得和收集了在当时的美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研究材料，其中包括出版物、报告、讲话和谈话记录等等。我企图寻找我所能得到的有关中共的一切材料，这当然不存在什么秘密或不妥当的地方。这是我长期被委派执行的主要官方任务。所有这些研究材料与我的备忘录的私人副本一起保存在我在国务院的办公桌里。我被捕后，我办公桌里的所有东西——备忘录的私人副本、研究材料、私人信件、通讯录、我为自己准备的备忘录——都被联邦调查局拿走了。然而，此后不久，司法部就承认，这些材料没有一份是政府财产或是从官方档案中拿来的，它们全是我的私人文件。因此，司法部手续十分完备地把它们全部还给了我本人。

幸运的是，司法部很有礼貌地提供给我一份这些被拿走又被还回来的私人文件的目录。另外，忠诚审查委员会提供了在《美亚》杂志社实际查获的我的报告副本的目录，以便就这些文件对我进行审问。将这两个目录同库比克博士所谓的“美亚文件”一比较，某些十分有趣的事 实就显而易见了。

他挑选发表的文件有69份从未到过《美亚》杂志社，它

们绝对（如果这个词正确的话）是从我的私人文件中偷去的。司法部将这些私人文件的原件退还给我时也许手续是妥善而完备的，但看来有人认为保存几套这些文件的副本可能迟早会有用处。

在导言中某一处，库比克博士声称《美亚》杂志的编辑获得了：

……许多中共基本原则性声明的译文……换句话说，《美亚》杂志的编辑获得了他们在纽约的磨房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谷物。^①

这是一个极为生动的描述。显然是为了有助于使这个论点为人们接受，库比克博士总共印了15份这种“原则性声明”——它们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战时写的一些文章。恰巧，这15份东西全包括在刚才提到的从未到过《美亚》杂志社的69份文件中。它们全来自我的私人文件，属于我收集的研究材料。

这里产生了几个问题。库比克博士反复告诉我们，他关心的是被窃的具有外交和安全意义的政府文件。那么，把这些文章收在这里意义何在？毛泽东著名的《农村调查》和刘少奇早期写的常备读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是密件，不是偷的，不是美国政府文件，也不是具有外交意义的报告。即使它们是在《美亚》杂志社查获的（事实上不是），那又怎样呢？《美亚》杂志是一份讨论远东事务，特别是中国事务的专门杂志。难道人们认为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不会将这些基本材料和诸如《毛泽东选集》的其他材料收藏到自己的书房去吗？难道库比克博士自己未藏有这些出版物或者不愿意

① 《美亚文件》，第71—72页。

随时可以拿到这些书吗？因此，除非是为了提供带倾向性的、有成见的背景，很难看出有什么理由将它们收进此书。这显然是想使读者看到一个共产党杂志的形象，它忙于从政府内部“亲共”阴谋分子组成的神秘情报网收集共产党出版物。我要指出，此处唯一神秘的东西是库比克博士的天真，或者说他竟然认为读者会如此轻信。

我下面谈谈库比克博士挑选的另外31份文件。书中所印的这31份文件都来自我的私人文件。但是，每一份中包含的材料实际上都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抄到了，只是两种文件在形式上略有不同。当然，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作出这种似乎不合逻辑的选择。既然一份报告的副本能从被合理地称为“美亚文件”的文件中获得，为什么还要使用保存在我私人档案中的同一报告的另一副本？我对此有些想法，但留在后面说更为合适。

其次，库比克博士最后还印了15份不是来自我自己私人文件的我的报告。而这15份文件实际上正是来自“美亚文件”。

总之，在《美亚文件》上发表的315份文件中，总共有115份同我有关系，要么是我写的，要么是我个人收集的研究材料的一部分。这115份文件中，有69份来自我的私人文件，与《美亚》杂志毫不相干；有31份是我的私人副本，尽管同样的材料以不同的形式见于《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有15份来自《美亚》杂志社办公室。因此，刊载的文件有100份来自我的私人文件。这使库比克博士消除“怀疑论者”疑虑的做法看来或许不大真诚，因为怀疑论者显然以100：15的比分赢了。我也无法同意库比克博士认为此事“无关紧要”的观点。

文件具有外交意义吗？

对库比克博士显然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增我的报告的数量，这使得他难于坚持他自己的选择标准：

挑选每一份〔发表的文件〕至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它的来源、它为人知晓时的保密等级、它的内容本身具有的重要性，或是它的外交意义。最后一个原因当然是最重要的。^①

就我写的报告而言，具有外交意义的显然包括：

一份就外出旅行请求给予指示的申请。

一份未完成的、废弃未用的备忘录草稿，

考虑写而从未写成的备忘录的极简短、粗略的提纲（5份）〔根本没写出的备忘录怎么能帮助实现了“中国的沦陷”？〕

简短的、例行传送新闻广播稿的函件（3份），

与以上类似的例行传送报纸的函件（至少3份）。

奇怪的是，我系统地收集和寄送延安报纸这件事，好象特别使库比克博士不安：

谢伟思使用了宣传武库中的每一种方法，……他最喜欢的方法之一，是递交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大量材料……^②

这类材料的研究和情报价值，对学者来说，是几乎不需要强调的。就个人来说，我十分高兴能够获得和寄送这份重

① 《美亚文件》，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要的并且在那以前无法得到的党报的完整合订本。而且，如我在第一份传送该报的备忘录中指出的：“《解放日报》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共产党的喉舌。”^①

看来，能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或是我的私人文件中找到的每一份我写的、或是归之于我的文件，确实都被库比克博士作为重要的、有外交意义的文件选入《美亚文件》一书（只有一份例外）。如果有人能无动于衷地接受这一评价，那么在此之前就没有一个现场报告员达到过如此之高的平均成功率。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拒绝接受这种表扬。

唯一的一个例外——没有被库比克博士选上的唯一备忘录——是我的第5号备忘录，这是我1945年2月在重庆写的，题目是“中国关于福摩萨的试探”。此备忘录报告说，重庆某些负责的非共产党中国人担心，国民政府没有适当地准备好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接管福摩萨（台湾）的行政权。鉴于国民政府在台湾实施行政权最初两年的情况，人们奇怪为什么这份报告没有被认为具有某些重要的内容和外交意义。^②

扩大我的文件总数的一个办法，是把我的两份备忘录重複排印两次，两处都是把原备忘录（来自我私人文件的）单独排印，然后，又把它作为一份转给陆军的报告的附件（来自《美亚》杂志社）印在另一处。然而，如此奇特的事情多半可能是出于编辑的疏忽而不是蓄谋，这样假定似乎合理一些。

① 《美亚文件》，第738页，重点号是原有的。

②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6年时期》（即《中国白皮书》，下均用此名），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斯坦福大学1967年重印时附有莱曼·P·范斯莱克写的导言，还附有索引），第307—310页和第923—938页。更为全面的论述请参看乔治·H·克尔《被出卖了的福摩萨》（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65年版）一书。

还有另一个使我的文件总数在表面上得以扩大的办法。这里有一个例子，在真正的“美亚文件”中，有一份转呈和评论我在延安准备的一份备忘录的大使馆文件的副本。在我办公桌的那些私人文件中，有我自己保存的这份备忘录的副本。不明白究竟什么原因，库比克博士先印了来自我私人档案的备忘录，然后，间隔了相当篇幅之后，又印了来自《美亚》杂志社办公室的那份转呈此备忘录的文件。既然两份文件的标题都显著提到“约翰·S·谢伟思的报告”，那就难怪粗心的读者感到谢伟思的报告多如潮水了。但是，至少编者没有象上一段所提到的那样，第二次重印备忘录。

综上所述，我已指出，库比克博士是通过多次重申下列三个论断，来为他所坚持的我是《美亚》杂志案件的主角这一说法奠定基础的：（1）他向读者提供的仅仅是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获的文件；（2）它们全 是窃自美国政府的文件；（3）有100多份被窃的官方文件是我起草的。现在完全清楚，第一个论断是虚妄的：就与我有关的文件而言，绝大多数与《美亚》杂志社从不相干。第二个论断同样是虚妄的：他谈论的大多数文件并不是官方文件，从未进过任何官方档案，也不是偷窃的，它们事实上是我的私人文件。据此，他的第三个论断也就站不住脚了。库比克博士通过艰苦努力，的确把我起草的100份文件收集到了一处；但是这些文件的大多数只不过是我的私人文件，它们从未出现在《美亚》杂志社，因此与《美亚》杂志案件毫无关系。

人们希望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库比克博士把我的私人文件和研究材料当作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获的材料对待时，不过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库比克博士显然知道档

案记载情况，他不会那么糊涂。恰恰相反，他早已准备和反复提到这些论断时，所采用的精心策划的方式清楚表明，《美亚文件》的出版是蓄意要蒙骗读者。

第二章

何谓《美亚》杂志案件？

人们看到《美亚文件》一书并没有包括多少“美亚文件”，可能就对此事不再感兴趣，但库比克博士却不这样。为了证实他的论断，即我在《美亚》杂志案件中扮演了主角，他不仅扬言“这些全是被偷窃的政府文件”，还运用了如下几种重要手段：

1. 对于我借给贾菲的备忘录的数目布下疑云；
2. 然后就暗示，我向贾菲“递交”了“许多”文件；
3. 最后，忽视和曲解档案记录，暗示在案件的诉讼中有某种并不存在的神秘和官方的疏忽。

当然，我始终承认，我曾允许贾菲阅读和暂借了8至10份我在中国写的报导性的备忘录的私人副本。

……我游览了我在延安写的备忘录的私人副本，选出了几份——我想大约是8至10份——它们纯粹是描述性的报告，其中并没有论及美国的军政政策。我认为允许贾菲——一位中国问题作家——看这些东西是恰当的……

我提到的这些，以及我挑选出来允许贾菲看的描述性、非政策性报告的私人副本，是我在华亲自写的备忘录的私人副本档案中的一部分，它们记录着我自己的

观察和我作为一个报告员曾进行的多次会谈。它们不代表、也不打算代表大使馆、陆军或是国务院的观点。我在写这些报告时，曾标注它们是机密，但这只是非官方性质的机密，这样的机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情报已为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美国新闻记者们广泛报道过。它们不是从任何官方档案中取出的；它们也从未归入任何官方档案。

允许作家们接触这类实际材料以便他们了解背景，并不是一件违反常规的事，因为从准确性来说，让他们阅读材料或是作些摘记，总要比仅仅依赖某人的记忆和口头复述更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①

如前所述，我得到官方允许保存这些私人副本，并把它们保存在国务院我的办公桌里。并不属于官方机密，从来不是国务院或任何其他政府档案的一部分，把它们借给一个新闻记者并不违反法律（虽然我承认——特别是事后来看——这是不聪明和不谨慎的）。再者，文件是借出的，而不是“提供的”、“递交的”或“传送的”。贾菲将它们全还给了我。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并没有找到它们的复制品或副本。听证会记录完全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情况：

希契科克先生：谢伟思承认借给贾菲的私人副本从来不是国务院档案的一部分。^②

泰丁斯参议员：那么，如果谢伟思把他的私人副本给了贾菲，他触犯有关国务院文件的任何保密禁令吗？

^① 《泰丁斯记录稿》，第1272—1273页。此段记录出自1950年6月22日在泰丁斯委员会作的证词。

^② 《泰丁斯记录稿》，第1003页。罗伯特·M·希契科克先生1945年是司法部长特别助理，直接负责《美亚》杂志案件的起诉工作。引文摘自他1950年5月26日在泰丁斯委员会作的证词。

希契科克先生：据我所知，他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或是国务院有关谢伟思私人副本可能有的禁令……①

在国务院他的办公桌中发现的所有文件，都是他（谢伟思）有权保存的他的报告的复写副本。如谢伟思先生所说，在他可以不触犯任何法律而自由出借复写副本时，他还会去拿已成为政府财产的他的报告的官方副本，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②

我们虽不宽恕这件事，但也承认，对国务院官员来说，透露某些类别的机密情报给作家们，以便为他们写文章提供一些背景材料，这是一种大家认可的作法。约翰·S·谢伟思在中国地位特殊，并且，根据史迪威将军的愿望，他同美国新闻界驻华代表们保持着联系，以便简要地向他们通报中国战区政治和军事事态的发展情况。他似乎曾获准可比华盛顿的同类官员更自由地接触新闻界。还应强调指出，谢伟思1945年春第一次碰到马克·盖恩和菲利普·贾菲时，他们两人都被公众认为是有名望的新闻记者和作家。③

可是，库比克博士的看法却与此有所不同：

根据谢伟思1957年对国务院安全官员奥托·奥蒂普卡所作的声明，他只传送了18份文件；拉森在其证词中承认给贾菲看过一些谢伟思写的文件，因此，不能肯定地说，谢伟思究竟传递过多少文件，或是贾菲究竟从其

① 《泰丁斯记录稿》，第1001页。

②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参议院第231号决议所作的报告，第81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3108号报告》（下简称《泰丁斯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0年版，第93页。

③ 《泰丁斯报告》，第93页。

情报网中总共收到多少文件。在这两种情况中，实际数字有争议但也无关紧要。^①

我认为这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传递”给贾菲的文件的实际数字对库比克博士的确无关紧要。正如我现在要指出的，他的下一个指控就是依赖于这一含糊不清的情况。

先指出几点。就我记忆所及，我没有在1957年向奥蒂普卡先生作过什么声明。我相信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是在1958年秋天，当时作为最终证明忠诚可靠的一个步骤，我正在接受（三人小组——不是库比克博士说的两人——对我进行的）冗长的“审问”。^②这个“审问”进行了很多天，开了很多次会，具体数字我已回忆不起。不幸的是，虽然有一个速记员在场，并在不停地记录，但我没有得到抄本，因为当时的联邦忠诚审查计划早已不再允许当事人得到诸如这种审讯记录的抄本了。我重申，我只记得与此案有关的我的备忘录私人副本的数字是8至10份。于是我受到提示（在以前的一些听证会中，这种提示甚至更为含糊），说是某人曾听到另一人说数字是18份，其言外之意——从未明说——是窃听了贾菲同《美亚》杂志案件有关的另一人的一次电话谈话，从未向我说明这些人是何许人，也从来没有录音、谈话稿、原文，或是关于到底说了些什么的明确声明。我只能回答，我过去相信（我现在仍然这样相信）数字是8至10。但是由于我的记忆不是绝对无误的，如果提出一清二楚的证据证明数字是18，我就难于提出反证。三人小组从未试图提出这样的证据，我也从未看到或听到可以认为足以证明我的记忆有误的证据。或许可以指出，三人小组是在《美亚》杂志事件——

① 《美亚文件》，第112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距今已25年多了——发生13年之后对我进行审讯的，我也应该在此指出，关于“谢伟思告诉奥蒂普卡，他把文件传给贾菲的唯一动机，是使赫尔利大使丢脸”的说法，① 同样是不真实的。我没有这样的动机，但即使我有，也很难想象怎么能通过这样的行动实现此种动机。没有一份备忘录提到赫尔利或涉及到他要使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的企图。

假定有罪

然而，库比克博士并不是真正对“十八”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数字感兴趣。他准备往前走得比它远得多。

因为缺乏相反的证据，可以推测，许多在《美亚》杂志社查获的谢伟思的文件，是由谢伟思本人在同贾菲及其一伙的那几次会见中递交的。②

我知道库比克博士不是律师，我也不是。尽管如此，我觉得，如果我不能提出完整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我清白无罪，那就证明我有罪，这种说法是极为令人吃惊的。清白无罪总是不易证明的，虽然我一直认为，就我的案子来说，有充分的直接证据证明我无罪。但是，如果查明其他人做了你被指控做了的事，难道这不就是一种“相反的证据”吗？同经受过充分调查的《美亚》杂志案件的其他方面一样，这方面的档案记录是很丰富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泰丁斯参议员：请允许我问你这个问题：就你所知，联邦调查局是否搜集到了任何证据证明，谢伟思不是象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你备忘录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而是

① 《美亚文件》，第112页注释262。

② 同上书，第111页。

以某种方式、方法或形式与从国务院拿走文件一事有牵连？

希契科克先生：不，先生，除了在贾菲的公文包中发现的8份经明确辨认属于国务院的用奥扎里德机器复印的副本以外，一直到拉森承认是他把文件给了贾菲时为止，我曾认为这些副本很可能得自谢伟思。

泰丁斯参议员：发现过他向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或任何局外人传递过文件吗？

希契科克先生：不，先生，据我记忆所及，没有。^①

希契科克先生：据我回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拉森能够提供这些文件。

摩根先生：（你是指）任何与此案有关的文件吗？

希契科克先生：哦，如我今天早晨所说，我记得，事实上所有这些文件，甚至还有那些不是源自国务院的，都发送到国务院了。所有这些文件，根据我所知道的反面的情况，一定得自拉森之手。^②

摩根先生：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从你掌握的情况来看，根据你能获得的文件和其他政府材料，你完全同意，那些正在被考虑要予以起诉的公民们正是参与了获取这些文件的人？

希契科克先生：对，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这样；没有其他人。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试图诡辩。根据提交给我们的证据，我认为除罗斯外，只有拉森能做到这一点。^③

① 《泰丁斯记录稿》，第1008页。

② 同上书，第1034页。

③ 同上书，第1035页。

在第一章里，我提到库比克博士刊印的31份一组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件是库比克博士从我的私人文件中挑选出来的。虽然这份文件的原件就在那些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实际查获的文件之中，这类事情如果只发生一、两次，也许可以认为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如果象《美亚文件》一书那样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是偶然的了。既然如此，如何解释这个看起来不合逻辑的作法呢？

《美亚》杂志社掌握的大多数我的报告的副本，都是以驻华大使馆、陆军或其他官方报告附件的形式转呈华盛顿的；或者是在国务院用奥扎里德机器复印的副本，因此，显然是国务院财产。档案记录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从未得到过上述这些种类的材料（因为我从未准备过转呈性的文件或报告）。一般我都不知道有这些文件，也从未占有过它们。另一方面，如果说——就象库比克博士反复说明的那样——《美亚》杂志社拥有的文件，不是驻华大使馆的文件，而是我私人文件中被允许保留的副本——这些副本库比克博士指出是我获准保留的，那么，读者就会更易于相信库比克博士的“假定”，即“许多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获的谢伟思的文件是由谢伟思本人递交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第275号文件是我在1945年3月15日发自延安的第13号报告，这是一份“中共关于新疆的看法”的事实概述。《美亚》杂志社确有这份报告的副本，它是一份用奥扎里德机器复印的署名原件的复制品。它的封面上印有国务院分发符号，这使它同E·S·拉森工作的办公室联系起来。它事实上是拉森承认交给贾菲的文件之一。收在我办公桌中的这份报告的私人副本是复写纸打字副本。它不可能很清晰，因为它是晚上在延安的窑洞

里用一台赫姆斯牌手提式打字机打的第四份副本。但是，在最后一页我的打印姓名上方，有我手写的我姓名的缩写字母。在当时的驻外使领馆中（或许今天也一样），报告的起草者可能在原件上签字，但对复印件，他只在存档的一份副本上签上缩写姓名。

当我们回头再看第275号文件，^①就可以从一个精心附加的脚注中看到：“这是一份复写打字副本，但是姓名的缩写字母JS写在打印的姓名上方。”这样，库比克博士选印的这份文件的来源就毫无疑问了。尽管在《美亚》杂志社的那份副本更为清晰易读，并带着证明它肯定是政府财产的标记，但他还是宁愿选用从未接近过《美亚》杂志社的我私人文件的副本。读者，特别是对国务院工院程序有所了解的人，由于被错误地告知这份副本是在《美亚》杂志社查获的，自然会假定，《美亚》杂志社只能直接从我得到这份副本。

这是一个奇怪的案件吗？

最后，库比克博士坚持说，《美亚》杂志案件有一些神秘之处，它被胡乱处置并掩盖住了。

……读起来象本间谍小说，但比间谍小说更引人入胜，因为它们确有其事。^②

……美国近期历史上最奇怪的故事之一。^③

《美亚》杂志案件，象许多虚构的间谍故事那样奇

^① 《美亚文件》，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

特……①

……奇怪的情况……②

……可能是它所有奇怪的特征中最为稀奇古怪的。③

……奇怪的“安排”……最后一个奇特的勾当。……④

……偷窃政府文件的奇怪案件……⑤

……联邦政府内部的秘密来源。⑥

……通过他们神秘的情报网……⑦

……谢伟思在整个奇怪事件中的作用。⑧

对《美亚》杂志案件没有进行过认真审理：仅仅是听取了证词而已。⑨

……美国法学史中很少有象此案这样滥用法律条文达到令人震惊程度的例子。⑩

……这个偷窃文件的奇特案件被悄悄地遮盖住了。⑪

司法部刑法司到底为什么以如此胆怯和怀着歉意的方式处理整个《美亚》杂志案件……？⑫

① 《美亚文件》，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④ 同上书，第51页。

⑤ 同上书，第70页。

⑥ 同上书，第73页。

⑦ 同上书，第74页。

⑧ 同上书，第111页。

⑨ 同上书，第51页。

⑩ 同上书，第52页。

⑪ 同上书，第55页。

⑫ 同上书，第59页。

……被相当有效地遮盖住了的“六人案件”迄今几乎已全被人们忘记了……①

假如象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对《美亚》杂志案件作了公正而有力的处理……②

库比克博士竭力想暗示，无论是此案本身的背景，还是处理它的方法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企图的一个令人惊异的方面是，库比克博士并不能提供泰丁斯委员会的记录和报告中所没有的任何有关此案的新材料。记录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负责调查和起诉此案的官员的证词，还包含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霍布斯委员会1946年的调查报告、纽约大陪审团1950年的了解罪行报告、E·S·拉森的证词、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关于我的听证会的完整记录、以及我在泰丁斯委员会三天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

如果说有某个案件曾受到彻底调查，并且其全部记录已完全公诸于众，那它一定就是《美亚》杂志案件。可惜，泰丁斯委员会20年前就完成了它的工作，它的记录和报告共达2850页左右，根据如此浩繁的记录（虽然泰丁斯委员会的记录并非完全致力于记载有关《美亚》杂志案件的材料），人们只能宽厚地形容库比克博士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此，在此处插进一份对此案事实的简要综述，对读者也许是有帮助的。这份综述是司法部1950年为泰丁斯委员会准备的，该委员会经过长期调查后，对它作了如下结论：

在司法部下列备忘录中提出的事实在各方面都前后一致，并符合本小组委员会得到的事实和证据。③

① 《美亚文件》，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③ 《泰丁斯报告》，第122页。

司法部关于《美亚》杂志案件的备忘录

导　　言

此报告是关于《美亚》杂志案件诉讼情况的综述。除主要事实外，它还提出了诉讼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在诉讼各阶段所作决定的理由。此报告所作法律结论，已为最高法院有关决定的分析所证明，最高法院的决定作为此报告的附录附后。

案件的背景

《美亚》杂志是一双月刊，为纽约市的菲利普·J·贾菲所有，并由他编辑、发行。凯特·米切尔是该杂志的副编辑。在其存在的八年里，该杂志发行量很小，不到2千份，其内容完全是有远东政治、经济事务的。它的编辑立场和文章内容都表现了亲共观点。它的主要读者是对泛太平洋问题、事件和发展的专门研究感兴趣的人。

由于远东和美国之间的许多通讯渠道在战争期间被关闭，这就切断了对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和其他发展感兴趣的人同正常的公共情报来源的联系，并使他们主要依赖于合法地或非法地从政府人士获得消息。此种需要的材料可以从受过检查的电讯、政府各部的公报和各单位的新闻处、与政府官员进行的允许引用的和不允许引用的谈话、监听广播、战争情报署等方面获得。看来，把一些机密文件告知作家和其他人是为了向他们提

供写作“背景”，并附有这样的谅解，即据此而写的文章、报道等应该提交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当然，这类材料也可通过非法接近真正的政府文件和报告而获得。

《美亚》杂志案件的调查工作是由于发生了一件后一种类型的事件而开始的。有一期《美亚》杂志被发现登载了未经授权发表的一份政府文件的内容。战略情报局准备的一篇题为《泰国情况》的文章，几乎是逐字全文重印在《美亚》杂志1945年1月26日这一期第23页上。

这篇1944年12月11日写的有关泰国的文章，是战略情报局一份机密文件的一部分。它主要指出了英美关于泰国看法的主要分歧，评论了泰国的政治前途。此文件是一份每两周定期出版的战略情报局的标准报告。这类报告主要是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雇员使用的。

战略情报局的首次查抄

1945年2月，战略情报局的一名官员在检查上述那期《美亚》杂志时，注意到了那篇有关泰国的文章。

因为未经授权就发表一份机密文件的行为是触犯安全规定的，这位战略情报局官员就将文件同《美亚》杂志的文章一起交给了战略情报局的安全官员阿奇博尔德·范布伦先生。范布伦先生又于1945年2月28日把它们交给了战略情报局在纽约的调查主任弗兰克·B·比拉斯基先生。范布伦先生要求比拉斯基先生监视华盛顿所有拿到过这份文件的人，以便弄清是谁在向《美亚》杂志的编辑提供秘密情报。比拉斯基获知很多人拿到过这份文件后，决定不对这些人进行监视，并主动决定，获

取有关此事的事实真相的办法应该是直接去《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搜查。

战略情报局把此事仅仅是作为战略情报局内部违反安全规定的一起事件来处理的。它忽略或是无视这一事实，即此事可能涉及到触犯联邦刑律的问题，而它对于刑事犯罪无论如何是没有调查权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战略情报局本应该但却没有把整个事情移交给联邦调查局处理，后者的基本权限是调查间谍案件和非法拿走或隐藏政府文件的案件。

1945年3月11日这个星期日午夜，在没有通知司法部或是获得其他批准的情况下，比拉斯基前往纽约市第五大街225号的《美亚》杂志社办公室，用玩弄花招和不通知《美亚》杂志唯一的拥有者和发行者菲利普·J·贾菲或获得其同意的方法，进入杂志社房内。在此后约两个半小时中，比拉斯基和五名助手彻底搜查了办公室的所有书信、记录和文件。在检查了大约3百份文件之后，比拉斯基决定将20几份文件作为证据带回华盛顿。拿了这些文件后，比拉斯基和其助手又将所有其他文件放回原处，以便不留下他们非法查抄的痕迹。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查抄文件后，比拉斯基立即带着查获的文件来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将军报告。此后，文件交给国务卿过目。后者立即要求由联邦调查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这些文件立即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得到这一情报后，联邦调查局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全面调查。此调查开始于3月中，一直持续到1945

年6月6日逮捕了有关人员为止。

因此，很清楚，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对《美亚》杂志社办公室的非法搜查和非法查获的文件，是引起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基本情报。联邦调查局在1945年3月收到这些文件前，并不知道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的活动，也并未对此事进行独立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主要是连续不断地进行人身监视。调查发现贾菲在1945年春季曾去过华盛顿几次，在那里，他同国务院雇员、中国问题专家伊曼纽尔·S·拉森进行接触。贾菲还同安德鲁·罗斯进行了接触，罗斯是海军情报局的一名中尉，远东问题专家，曾在《美亚》杂志工作过。国务院驻中国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大约在1945年4月15日返回美国，从这时到1945年6月6日他被捕之前，被观察到曾有几次同贾菲在一起。还观察到，有几次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或是互相传递文件。但是，因为贾菲和罗斯当时正在写书，还有所有这些人都对同一问题感兴趣，所以，如没有可靠证据能证明这些文件是官方文件，就不能从这样的行动看到什么重要的或犯罪的含义。不过，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些人互相传递的文件的内容和性质。

就刑事起诉来说，嫌疑犯在这方面已被仔细观察到的活动，既可以认为无罪，也可以认为有罪。后来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在此案作了艰苦审议后作出裁决：“虽然所有这些人都曾有一段时间受到连续不断的监视，但不曾看到他们互相传递政府文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第四小组委员会根据众议院430号决议所作的报告，79届国会第2次会议》）

贾菲在纽约市时，当然要同他的副手凯特·米切尔每日联系。他也同马克·盖恩频繁接触，盖恩也是一位专门研究远东问题的记者和杂志撰稿人。在调查期间，有一次盖恩在乘公共汽车时，被观察到好象是在阅读一份官方文件的副本。后来查明，这份报告说的是关于蒋介石委员长同其妻子之间婚姻关系的街谈巷议。总的来说，在纽约对这些人进行人身监视的结果，除了能证明他们有联系外，只具有中性或否定性的性质。监视未能证实被监视者中的任何人确实偷窃或是未经批准拿走了任何一份官方文件，也没有证据表明，嫌疑犯中有人曾将任何官方文件或是其他文件传递或递交给已知的或是被怀疑的间谍分子。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复查此案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出裁决：“虽然训练有素的专门调查员不断观察到有关人员常在一起，但从未看到他们有人把政府文件递交给另一人。”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除证实了各有关人员之间有联系外，还证实了在《美亚》杂志社、拉森家和盖恩家，有许多机密文件或是这种文件的副本。上述情况是通过未经授权和非法进入被监视者住所这种方法而证实的。这样获得的情报和证据当然不能合法地用于刑事诉讼中。事实上，如果在随后的审判，甚至是审前听证会上证据受到质疑，司法部就可能不得不承认非法侵入民宅和进行非法查抄的事实。

1945年3月20日、26日、27日、4月23日、24日以及5月14日，《美亚》杂志社办公室多次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搜查，对在那里发现的文件作了编目和拍照。

1945年4月2日和6日，菲利普·雅各布·贾非的公寓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搜查，在那里并未发现重要材料。

1945年4月6日，伊曼纽尔·西卡德·拉森的公寓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搜查，拍摄了在那里发现的文件。

1945年4月6日和27日，马克·朱利叶斯·盖恩的公寓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搜查。拍摄了在那里发现的文件。

1945年3月31日，凯特·路易斯·米切尔的公寓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搜查。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重要东西。

当然，在任何案件中，特别是在此案中，刑事诉讼是制止犯罪的最有力的因素。但即使缺乏胜诉的可能（因为获得此案证据的必要方法是非法的），联邦调查局采取的步骤也是正当的，采取这些步骤不仅为了制止随便处理政府文件的行为，而且也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内安全。

案件提交到刑事司

直到1945年5月29日，司法部刑事司才获知上文所列事实，以及战略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所进行的调查。这天，刑事司第一助理刚从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份日期为1945年5月29日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简要概述了联邦调查局调查到的一些主要事实。第一助理奉命研究此备忘录，并立即作出关于起诉的决定。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本身就要求在24小时内作出逮捕受监视者的决定。

第一助理研究了备忘录，然后同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进行了商谈。他在此次会谈和审阅了1945年5月29日的备忘录之后，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司法部当时还没有获得能证明此案涉嫌人员有罪的必要的合法证据。1945年5月29日备忘录附有一份题为“证据”的附件，提出了下列警告：“上述大多数关于各个主犯进行接触和交换文件的情报，是通过高度机密的手段和不能用作证据的情报来源获得的。”〔重点号是泰丁斯委员会加的。〕

刑事司当然认识到此案所固有的障碍。尽管如此，还是得出结论，即随着逮捕联邦法律触犯者时常出现的“好运气”，可能会得到使案件成立的充分证据。这个结论的根据有二：一、80%以上的联邦法律触犯者在被捕后供认了他们的罪行；二、把可望在逮捕嫌疑犯时发现的证明犯罪活动的文件向他们出示，可能会获得一些对犯人极为不利的重要供认。

于是，决定以下列三个理由提出控告：

第一，我们处于战争时期，情况表明嫌疑犯在从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间谍活动。逮捕他们至少会制止这些活动和挖出他们的分支机构。联邦调查局“预计”在逮捕他们之后，“当然还会找到相当多的其他证据”，用以对付同各个被告有联系的人和他们的共犯。

第二，希望通过他们被捕时所作的招供和其他途径获得充分的合法证据。

第三，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在逮捕嫌疑犯时，能查获他们来不及销毁的文件。

1945年6月5日，刑事司同意按照联邦调查局的建议

对菲利普·J·贾菲、伊曼纽尔·西卡德·拉森、安德鲁·罗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提出控告，另外，刑事司批准逮捕凯特·路易斯·米切尔和马克·朱利叶斯·盖恩。指控这6人合谋触犯了关于未经同意拿走和占有有关国防文件的间谍法第31条第50款。

1945年6月6日，所有被告在纽约或是华盛顿被捕。当某一被告在其住宅被捕时，其住所受到彻底搜查，发现的文件均被前去执行逮捕任务的官员拿走了。没有任何被告给予“同意搜查”的许可。

逮捕、搜查和审讯的结果总的来说是令人失望的，除拉森和贾菲的情况外，并没有为起诉提供出原来希望会获得的关于被告们何时、何地、怎样、由谁拿走和接到官方文件的证据。在罗斯或是谢伟思的住所没有发现文件。贾菲、米切尔和罗斯拒绝在供述上签字。联邦调查局查获的文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国防有关。

逮捕之后，此案的起诉任务于1945年6月13日委派给司法部长特别助理罗伯特·M·希契科克，他是司法部最能干、最有经验和最认真的审判官之一。派给他作助手的是唐纳德·B·安德森，他曾担任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州法官和检察官。

所有被告都分别请了律师，一切迹象表明此案将得到有力的辩护。辩护律师们请求同刑事司的代表会谈，要求早日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听证会。在一名美国检察官面前举行预备性听证会可能会对政府不利——这样就会过早地公布起诉证据，所以要求立即提出起诉，以便使此种听证会无需举行。提出起诉将剥夺被告要求举行预备性听证会的权利，而在这种听证会上，将不得不就起

诉的可能理由提出证据。另有一个原因特别重要，即需要相当的时间在联邦调查局实验室里检查查获的数百份文件的指纹、笔迹和打字术，以便查清文件的官方来源等等。

从一开始，某些被告的律师就建议，要求指责这种逮捕和查获文件的方式，并向法院申请查禁如此获得的证据。

事实上，早在1945年6月11日，拉森就从管楼人那里弄清了他允许特工人员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进入了拉森的房间。直到1945年9月28日，拉森提出了查禁的申请时，检查官们才与闻其事。

鉴于政府知道查获的文件是通过事先非法进入和搜查民宅获得的，所以不可避免，法院将查禁在逮捕时查获的所有证据，结果将使政府没有可资证明的证据。因为最高法院坚持认为，在证据是政府通过事先违反宪法的查抄而获得的这种情况下，“这样得到的证据不仅不能用于法庭，而且不能用于任何场合”（锡尔弗桑木材公司对美国政府诉讼案，251U.S.385，389）。在所引这段话中，最高法院不仅把非法获得的证据，而且把来自诱供和暗示的所有证据都解释为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是“毒树之果”（纳尔东对美国政府诉讼案，308 U.S.338，340—341）。

在此指出下列情况是适当的：同非法查抄问题有些类似，刑事司掌握着某种情报，这是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并附有如下的告诫：上述“关于各个主犯互相接触和互相交换文件的情报，是通过显然不能使用的高度秘密的手段及情报来源获得的”。〔重点号是泰丁斯委员

会加的。] 这个情报是联邦调查局通过技术监视手段——包括对某些被告的谈话进行录音——获得的。

1945年5月8日，贾菲和谢伟思在华盛顿斯泰特勒旅馆贾菲的房间里进行的一次谈话，就被作过这样的录音。由于这次谈话的一句话，载于参议院委员会一次内部会议的记录，所以这次谈话最近已被广泛地宣扬。为了从上下文而不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这句话，司法部于1950年6月26日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供了同这句话有关的那次谈话记录的全文。

这类情报当然不能对诉讼问题起什么作用。联邦调查局提供它时，明确告诫说它是通过高度秘密的手段和不能用作证据的情报来源获得的。再者，通过窃听或是诱供和暗示获得的证据是法庭不能接受的（纳尔东对美国政府诉讼案，302 U.S. 379，纳尔东对美国政府诉讼案，308 U.S. 338，威斯对美国政府诉讼案 308 U.S. 321），通过非法进入被告住所安装窃听器获得的证据也不能使用（参看戈德曼对美国政府诉讼案，316 U.S. 129；参阅美国政府对科普隆的诉讼案，88 F. 附录。921 (SDNY)）。因此，在估量此案胜诉的可能性时，不能把这种情报考虑进去。

提交大陪审团

前已指出，在预备性听证会期间，被告可保持沉默，而政府的证据却将不必要地泄露出来，因此，为了阻止举行预备性听证会，决定将案件早日提交给大陪审团。尽管早日提交案子的工作还没有预备好，分析文件和追查其来源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但仍然准备这样做。

在此事正在提交给大陪审团时，某些被告请求同分管刑事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进行一次会谈。这些请求是在1945年6月21日——案子提交大陪审团的当天——及以后几天收到的。政府方面向被告的律师提出，如果他们同意推迟预备性听证会，政府愿意给被告们提供一个同刑事司会谈的机会。辩护律师同意推迟预备性听证会，但要求提供一个进一步讨论案件的机会。

这样就消除了早日起诉的必要性，因为政府不再面临在预备性听证会上公开其证据的局面。联邦调查局当然仍旧在进行处理查获的数百份文件的艰苦工作。

1945年6月27日举行了一次会议。被告米切尓和盖恩的律师声称，他们的委托人并没有触犯刑律，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纽约和华盛顿的每一个新闻记者、专栏作家、通讯员和作家都在做的。

在这次会议期间，谈到现任大陪审团的任期几天之后就要满了，所以，讨论了关于政府是否应向法院申请延长当时正在开庭的现任大陪审团的任期，或是把此案重新提交给新的大陪审团的问题。刑事司的代表们声称，他们倾向于同意把大陪审团的任期延长一个月，但是他们要在会后立即把整个案子重新考虑一下。

会议刚一结束，凯特·米切尓的律师就主动提出让她出庭接受大陪审团审讯，放弃豁免权，并回答向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个提议对政府特别有利。因为，这种作法除了可以使政府比用其他方法更为有力地说明对被告起诉的理由之外，还能获得被告的辩护证据，并且使证人在对大陪审团宣誓后，处于一旦在他所作的证词中说了假话就犯伪证罪的境地。

此后，贾菲、盖恩和谢伟思的律师也书面提出了同样非同寻常的提议，然而贾菲后来没有出庭作证。政府同意被告们到大陪审团出庭，条件是要求这些被告们在出庭接受大陪审团审讯之前，也让政府检察官审查，政府强加的另一个条件是，纽约的被告们一旦被控告，不能拒绝把他们从纽约转移到华盛顿。被告们同意了这些条件。

由于案件处于上述状况，所以，决定征求大陪审团陪审员们的同意，将此案从才开过一天听证会的即将满期的大陪审团撤回，把证据重新提交给新的大陪审团。这个决定仅仅是根据下列考虑作出的：

1. 证据，特别是查获的数百份文件，还没有准备好提交给大陪审团。

2. 被告们表示愿意接受政府律师的审查，以及在没有豁免权和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出庭由大陪审团审讯，这就需要对案件进行更为审慎和费时的研究与准备，然后将案件向大陪审团提出。

在1945年6月21日听了一天证词，到1945年7月2日就要满期的大陪审团被告知了上述考虑。它还被告知，它如果想继续保持对此案的审理权，政府就需要得到延长它的任期一个月或6个星期的命令。大陪审团的成员们一致同意将此案从他们那里撤回。

1945年7月间，继续深入细致地进行案件的准备工作。从1945年7月23日开始，政府检察官开始在陪审团审理前先审查那些主动放弃豁免权的被告。对他们进行了盘问，并向他们出示了文件，竭力要证实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同谋关系。随着案件准备工作发展和真相的

逐步暴露，日益清楚表明，贾菲和拉森是主犯。贾菲、拉森和罗斯没有接受政府检察官的审查，也没有出庭让大陪审团审问。

1945年7月30日，开始向大陪审团提交此案。1945年7月30日、31日、8月1日、3日、6日和7日，大陪审团开庭审理案件。3名被告（谢伟恩、米切尔和盖恩）以及包括1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内的24名政府证人到大陪审团作了证。必须强调指出，曾于1945年6月21日到前任大陪审团出庭作证的所有证人又被传到新的一届大陪审团作证；提供给刑事司的所有有关证据、文件或其他材料都提交给了大陪审团，或是使大陪审团能够获得它们，供它考虑。

1945年8月10日正式宣布，对贾菲、拉森和罗斯起诉，主要是控告他们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盗窃和拿走了官方文件。大陪审团在听了谢伟恩、盖恩和米切尔自己的证词、政府的证词和有关他们的证据后，拒绝对他们三人起诉。

大陪审团就赞成或是反对起诉投票如下：

	赞成起诉票数	反对起诉票数
贾菲	14	6
拉森	14	6
罗斯	13	7
盖恩	5	15
米切尔	2	18
谢伟恩	0	20

宣布对一个人起诉要有12个大陪审员同意才有效。大陪审团这次表决的票数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审讯的程

序是片面的，除了被告们在没有律师帮助下作证时所作的解释外，提交给大陪审团的仅仅是政府的证据。

在听了证词之后，许多投票赞成不予起诉的陪审员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活动方式，基本上是由管理、归档、控制和发布官方文件的办法不严格引起的。他们还认为，除了这些被告外，许多其他新闻记者和作家也有为了了解背景而取得机密材料的机会，补救的方法在于各部和各机构内部，而不在于检察机关。

大陪审员们的态度不仅预示了小陪审员们的态度，而且表明，在考虑处理此案的问题时，应该记住，剩下的被告在受审时将由律师代表，他们将有自己的证人和为自己作证的机会。还值得指出，在长达三、四个月的审判之后，鉴于大陪审团的投票情况，仅需要一名小陪审员就可以阻止宣判被告有罪。

最后，只要表明可能有理由相信被告犯了罪，大陪审团就可以据此提出起诉，而小陪审团却只有完全确信被告有罪，而不只是合理地怀疑，才能宣判被告有罪。

在这类案件中，重要的是政府的证据要清楚和令人信服。输掉这样一场诉讼不仅对检察机关不利，而且会影响公众舆论对这种性质的案件所包含的真正危险的看法。换句话说，全国将倾向于贬低这一案件以及这一阴谋的严重性。与此有关，指出下列事实是饶有兴趣的：司法部在以共产党活动为其特征的诉讼中，除了一个案例外，其它还未再输过。

此外，当前还有一个悬案，因为获得的证据不允许用于此案的审判，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对它提出起诉。

如前所述，正式宣布对贾菲、拉森和罗斯起诉，主要是指控他们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共谋盗窃和拿走官方文件。政府放弃了那个可疑的前提，即文件的相当一部分与国防有关。在评价检察官们那时作出的这个决定时，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检察官们当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得到战略情报局查获的任何文件。

那些似乎与国防有关的具体文件成了司法部律师们和联邦调查局代表们专门研究的目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搞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材料来指控被告中的一个或更多的人犯了间谍罪。然而，这项研究在各方面表明，某些重要因素的证据尚付阙如。另外，还准备以指控拉森和贾菲有贿赂行为而对他们起诉，但是，对已到手的事实所作的分析证实这样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贾菲付给拉森妻子的钱，显然是因为她打印了拉森私人档案的副本，而不是为了对拉森的官方工作和活动施加影响。

起诉书的行文并不要求政府证明这些文件与国防有关，只要证明是官方文件即可。同控告时一样，正式宣布起诉是以刑法共谋罪条款为根据的，这样，就清楚表明，根据任何一种理论，被告们均可受到同样的惩罚。把控告书所提出的指责改变为起诉书所提出的指责的唯一结果，是减轻政府提供证据的责任。

与此相关，指出下列情况是颇有意思的：后来复查此案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在检查了所有文件后声称，“涉及到此案的可确认的机密文件，几乎没有几份对我们的国防或战争努力有真正的重要性”。

另外，小组委员会还就涉及到的文件的性质和内容

发表了下列意见：

- (1) 许多文件已被广泛传布。
- (2) 许多可以确认的文件或许曾有证据价值，但这种价值由于法院支持被告指责逮捕不合理的申请而完全被抵销了。
- (3) 提到的大多数“机密”文件是副本。原件即使有，也非常少。
- (4) 大部分文件不是近期的。有的早至1936年，有的内容无关紧要，对那些对这些文件所包含的情报感兴趣的任何人来说，它们已经是或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事。
- (5) 在贾菲办公室查获的大多数文件是打字机打的副本。某些这样的副本被证实是在政府某个部门打的，可以公正地推断，这种副本的原件从未被拿走，但副本是在原件所在的部门或机构制成的。
- (6) 大多数文件讨论的是远东国家的人物或政治情况。
- (7)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文件或副本的任何一件曾被用于损害我国的战争努力。
- (8) 发现很多政府“机密”文件或副本掌握在某些被告手中，它们绝大多数是关于日本、中国、印度和亚洲的政治事务的。

正式宣布起诉后，贾菲、罗斯和拉森不服罪。拉森和罗斯的律师表示，他们将积极为此案申辩，他们的委托人不会服罪。另一方面，贾菲的律师表示，如果不判处监禁，他的委托人就可能服罪。

由于贾菲、罗斯和拉森是以同案犯在同一起诉书中

被指控的，所以正常和合理的程序就是同时审判三人。由于这一原因，政府最初并不赞同这些提议。

抨击政府的证据

在1945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案件处于此种状况时，发生了几件可能要破坏政府方面的起诉根据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拉森交保释放出狱后不久。拉森获释后，找到他所住公寓楼的管理人E·R·塞杰尔，告诉塞杰尔，他知道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看来塞杰尔承认他曾把拉森房间的钥匙给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

此后，1945年9月24日，拉森打电话给塞杰尔说：“你可记得你曾告我你让那些人进入了我的房间。”塞杰尔对此回答说：“记得。”拉森就此通知塞杰尔先生，他的律师想要塞杰尔提供一份陈述此事真相的宣誓书。

事实是，特工人员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曾两次进入拉森间房。一次是在1945年4月6日，特工人员登记和影印了房间里的文件，并取了打字机字样。一次是在1945年6月1日，特工人员在拉森准备搬去住的同一公寓楼的一房间里安了录音话筒。

1945年9月28日，刑事司被告知，拉森的律师就要提出抗辩，要求撤销起诉，并申请查禁从拉森房间里查获的证据。

1945年9月28日上午，刑事司的代表们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进行了商谈，一致认为案件处于危险境地。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又将其全否定了。他们讨论了

下列可能性，即主动提出愿意查禁在逮捕拉森时从他住处查获的所有文件，然后，试图以在贾菲处发现的文件为基础来确立对拉森立案起诉的理由。然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贾菲会获悉拉森的申请，并提出同样的申请，果真如此，整个诉讼就将失败。而且，如果贾菲的申请获准，那么，被查禁的证据不仅不能用来反对贾菲，也不能在同时审判三人时用来反对拉森和罗斯（参见戈尔德斯坦对美国政府诉讼案，316 U.S. 114, 119—120；麦克唐纳对美国政府诉讼案，335 U.S. 451, 456, 457, 461）。鉴于拉森就要提出申请，时间是极为宝贵的，如果要维持对贾菲的起诉，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第一助理为此召见了贾菲的律师，同他讨论了他先前关于表示服罪的建议，还安排在当天——1945年9月28日下午一开始举行一次会议。

在等候贾菲的华盛顿律师到来时，拉森要求撤销起诉和查禁证据的申请送到了司法部。

申请文件刚一送到，贾菲的律师就出现在会场。在他进来之前，司法部方面先向地方法院的职员询问，拉森先生的律师是否已提出了要求撤销起诉的申请。职员说，申请刚刚提出，报界已经对其作了评论。

申请简要地宣称，政府获得的证据是通过非法查抄、窃听和非法扣留被告而得到的。拉森在一篇长达13页的详细宣誓书中宣称，他在其住所被捕时，特工人员暴露出他们事先就知晓和熟悉他的个人财物，而这些情况他们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拉森还提出，公寓管理人承认，在他被捕前不在家时，该管理人曾允许特工人员进入拉森的房间。

贾菲服罪

当时已认识到，贾菲的律师在他同司法部的会谈结束之后，将从报纸报道中获知拉森的申请，此后将完全可能为他的委托人提出同样的申请。大家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保住对贾菲的起诉。为此目的，当即采取措施争取立即从贾菲的律师处获得贾菲会服罪的肯定的承诺。

讨论期间，参加会谈的双方估计了法院可能会作的判决的性质。刑事司告诉贾菲的律师说，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官们在判决时一般不征求或请求提什么建议，我们无法就有关判决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贾菲服罪，而政府将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建议判处贾菲大笔罚款，罚款最高额是一万美元。双方并达成谅解，假如照此判决，贾菲将付这笔罚款。可是，贾菲的律师是以下列条件为前提作出承诺的，即法院会同意听取政府的建议。在贾菲的律师肯定地保证其委托人会服罪之后，向他询问了关于宣布服罪的最早时间。贾菲的律师声称，一旦政府为此作出安排，就宣布服罪。

这次会谈是于9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举行的。

刑事司急于在贾菲重新考虑此事（象他以前所做那样），或是提出要求查禁从他住所获得的证据的申请之前，处理他的案件。经查询获悉普罗克特法官将在1945年9月29日开庭。于是，请求普罗克特法官接受贾菲的服罪声明，他同意如此办理。普罗克特法官还通知说，他将同意听取政府和辩护律师关于贾菲宣布服罪后的判决

问题的建议。

1945年9月29日（星期六）上午，贾菲承认犯了重罪。普罗克特法官听取了贾菲的律师和政府律师的意见。政府的律师建议判处大笔罚款。在听取双方律师的意见后，普罗克特法官判处2,500美元的罚款，此款随即缴纳。在贾菲声明服罪和法官作出判决之前，没有同法院举行过任何种类的判决前会谈或协商。

对其他被告的处理

虽然贾菲的案件以当时情况下令人满意的方式妥善地处理了，但司法部仍然面临着必须处理拉森提出的查禁证据的申请这一难题。司法部同拉森和罗斯的律师举行了多次会谈，争取拉森和罗斯表示服罪，但未成功。拉森的律师最初采取的立场是，在对他要求查禁证据的申请做出决定之前，他不考虑服罪的问题。

政府对查禁证据的申请作出答复的时间推迟了。为了答复这个申请，政府可能不得不承认查抄是不合法的。然而，拉森的律师最后表示，如果他能得到只会判以数额较小罚款的某种保证，他的委托人就会采取声明不服罪但不申辩的立场，这就避免了不得不作出上述承认的局面。拉森的律师指出，拉森受了贾菲的骗，他失去了他在政府中干了十年的工作，他失业了，并且一无所有，但他还得养活妻子和家庭。

政府注意到了这些情况，最后同意如果法院征求意见，政府就建议罚款500美元。所以采取这种立场，主要是因为上述因素，但也因我们认为贾菲是主犯，他腐蚀了拉森，应为拉森的困境负责，对拉森来说，受到比

贾菲所受的更重或即使是同样的判决，是极为不公平的。1945年11月2日，拉森正式向法院声明不服罪但不申辩，他被判处政府所建议的500美元的罚款。

现在只剩下对罗斯的起诉案了。此案根据极不充分，它依赖的是几页似乎是官方文件的（被证实是罗斯的）手写稿和打字稿。

……鉴于上述罗斯一案证据的情况，政府认为此案不能胜诉。政府应罗斯的律师的请求多次推迟了听证会，并极力想把此案作为暂不审理的悬案挂起来，然而这种努力未获成功。于是，政府被迫在1945年2月15日撤回了对罗斯的起诉。

此报告不想减轻这个案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联邦调查局对存在非法行为的事态所采取的迅速而有力的行动对我国是极为宝贵的贡献。此报告只是讨论了胜诉的困难和作出的决定所依赖的根据。^①

• • • •

在《美亚》杂志案件的各种调查中，我提到了纽约的联邦大陪审团。这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大陪审团。在麦卡锡参议员提出他那些被大肆宣扬的指责后，这个大陪审团“根据它自己的权力行事”，利用它的传票权，进行了一次独立的调查。如果库比克博士想表明民主党占多数的泰丁斯委员会（参议员泰丁斯、麦克马洪和格林）有偏见，那么他很难对

^① 《泰丁斯报告》，第122—133页。此备忘录除了在倒数第二段前省略了指控罗斯的证据和撤销对他的指控的详情外，其余部分全部付印。此备忘录后的附录是根据第1和第5修正案对以前的判例和最高法院的决定所作的法律方面的技术讨论。司法部相信它控制着对这些判例和决定的解释权，限于篇幅，此处未抄录该附录，它可在《泰丁斯报告》第133—136页找到。

这个大陪审团提出同样的指责。因此，留意一下该大陪审团1950年6月15日提出包括下列结论的报告是颇有意思的：

大陪审团也未发现有迹象表明司法部对此案的起诉工作是疏忽懈怠的。

大陪审团认为，在这个案件和类似的案件中，通过散布似是而非、互相矛盾的言论等作法，加剧了是非不清的状况，从而给美国人民帮了倒忙。^①

这就表明，关于处理这一案件的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最初那种不正当的搜查方式，败坏了随后的整个调查过程。”由于非法进入民宅一事为被告人之一（拉森）获悉，检察当局就迅速采取行动，同意贾菲提出的由他声明服罪，只由法院对他判以适当罚款而不判处监禁的要求，以便尽可能挽救此案。与此相类似，同意了拉森不服罪但不申辩的要求，并处以500美元的罚款。泰丁斯委员会得出了下列结论：

某些被告未受到我们今天觉得他们应受的、或是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受到的惩罚，是由于迄今已讨论过的案件中的某些事件，而不是由于检察官们的玩忽职守造成的。纵观此案全部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司法部能争取到对某些被告判处已经给予的惩罚，还是幸运的。^②

我们的调查是彻底的，旨在找到能够获得与此案有关的情报的每一个合乎逻辑的来源。

此案现已受过三次审理：一、众议院霍布斯委员会1946年作的调查；二、纽约特别大陪审团1950年作的审查处理；三、本小组委员会的调查。每次的结论都相同，

① 《泰丁斯报告》，第136—137页。

② 同上书，第140页。

而且这个相同的结论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唯一结论，即在处理《美亚》杂志案件中，绝没有一个我们的政府机构是玩忽职守的。①

附带说一句，在大陪审团研究我的案件和决定不予起诉时，并未考虑非法进入住所和查抄之事，而且此事也不可能影响它的决定。无论如何，没有非法进入过我的临时住所，我也未据有政府文件。

挑选出的事实

由于库比克博士有44个注释提到泰丁斯委员会的记录稿，人们一定以为他熟悉这份记录。如果他不熟悉，那他当然应该去熟悉。但他努力使读者确信我在这个“奇怪”的案件中扮演了“主角”时，却有意遗漏了许多事实。例如，他指出大陪审团以20：0票决定不对我起诉（人们似乎觉得这本身就意味着表明此案有一些奇怪之处；事实上，至少有一个台湾作家已这样认为），但他不提我放弃了豁免权并自愿出庭大陪审团。他（毫无根据地）重弹（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关于）联邦调查局保证证据是“无懈可击的”的老调，但却避而不谈收在记录中的司法部否认联邦调查局作过这种保证的信件。②他（毫无根据地）重复（又是来自麦卡锡参议员的）关于副国务卿格鲁是我被宣布无罪而辞职的这种指责，但却看不见包括格鲁先生一封信在内的、表明这不是事实的明白无误的证据。③

① 《泰丁斯报告》，第144页。

② 《泰丁斯记录稿》，第2310页。

③ 同上书，第1277页。

他提到了战略情报局1945年3月11日对《美亚》杂志社办公室的突然搜查和在那里发现的“数百份”政府机密文件，但却不指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在我1945年4月12日到达美国之前，《美亚》杂志社获取政府文件的渠道已经充分建立起来了。^①同样地，他没有指出一个记录在案的情况，即联邦调查局已于4月18日——在我结识贾菲、拉森、米切尔和盖恩之前——向国务院和海军部表示，它准备对此案提出起诉。^②换句话说，甚至在《美亚》杂志这批人第一次找我之前，联邦调查局就满意地认为，《美亚》杂志社获取政府文件的渠道已经查明，案子已破了。

库比克博士还故意忽略了某些能直接驳斥他关于我在《美亚》杂志案件中起了主要作用的论断的材料：

麦金纳尼先生：关于谢伟思的证据比较简单。我记得他们说，贾菲办公室里有他的机密报告的副本。在我们逮捕或是进行搜查时，我们发现了他的报告的副本。我们审问了拉森，拉森承认是他把谢伟思的报告副本给了贾菲，不是谢伟思给的。谢伟思对贾菲有那份报告感到非常惊奇。我们是根据这种无力的指控作出有关谢伟思的决定的……^③

摩根先生：我估计你看过所有能够获得的与约翰·谢伟思有关的证据。

麦金纳尼先生：对，先生。你指——

摩根先生：在当时。

① 《泰丁斯报告》，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③ 《泰丁斯记录稿》，第2289页。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詹姆斯·麦金纳尼先生1946年在霍布斯委员会作的证词。

麦金纳尼先生：我个人吗？

摩根先生：我的意思是，在起诉时，你知道和熟悉指控谢伟思先生有罪的证据吗？

麦金纳尼先生：是的，先生。

摩根先生：根据你知道的那些证据，你认为对他起诉正当吗？

麦金纳尼先生：不，先生，我不这样认为。^①

总之，库比克博士在给他关于我写的100多份被偷的政府文件发现于《美亚》杂志社这一论断奠定了基础之后，接着“假定”，这些文件中有许多是我递交给贾菲的，我在一个奇怪的案件中扮演了主角，这个奇怪的案件没有被诚实有力地起诉，而是被有效地掩盖了。我认为，无论从何意义上说，这都显然是恶意的诽谤。

《美亚》杂志案件毕竟涉及“合谋盗窃美国政府的财产、档案和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刑事指控，对这个指控，一个人表示服罪，另一个表示不服罪但不申辩。因此，显然是犯了反对美国和在战争期间应受惩罚的罪行。所以，库比克博士说我在这样一个案件中扮演了“主角”，只能是说我也有罪。

换句话说，库比克博士在不能提供丝毫新证据或是新情报的情况下，就随便否定了多年来由下列如此之多的部门、大陪审团、委员会和个人根据全部材料认真作出的整个一系列决定的合法性（他这样做难道能叫忠诚？或是诚实？），

(1) 大陪审团，它一致投票决定不对我起诉；

(2) 贝尔纳斯国务卿任内的国务院，在1945年3月证明

^① 《泰丁斯记录稿》，第998页。麦金纳尼先生1950年5月4日在泰丁斯委员会作的证词。

我无罪，并让我重返外交岗位；

(3) 斯诺将军领导的忠诚安全委员会和马歇尔国务卿以及艾奇逊国务卿任内的国务院负责安全和人事的官员们，他们在1946年至1951年期间的大约7次调查和听证会中证明我无罪；

(4) 泰丁斯小组委员会，包括洛奇参议员在内，确定麦卡锡参议员的指控——类似库比克博士在这里重提的那些指控——毫无根据；

(5) 杜勒斯国务卿任内的国务院（在最高法院一致作出将我解雇是非法的这一裁决之后）同意我重返外交岗位；赫特国务卿任内的国务院在另一次全面调查之后，于1959年恢复了我的忠诚审查合格的地位。

关于库比克博士重写《美亚》杂志案件一事，还有很多可说但不必说的东西。他的论著的缺点不仅在于颠倒是非，还在于有大量十分明显的事实在错误。我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指出在《美亚》杂志社办公室发现了100多份我的报告这种提法的欺骗性，以及指出关于我向贾菲递交很多文件并在《美亚》杂志案件中扮演了主角这种说法的诽谤性。至于我个人为何成了库比克博士巨著的主要靶子，我只能转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来回答：我发现此事非常“奇怪”。

第二编

1944至1945年的美国 对华政策

第二编 导言

极为重要的是两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华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官方政策遭到了几个美国驻华低级职业外交官的积极反对和暗中破坏，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是其中惹人注目的一个。①

为了能够理智地讨论库比克博士这个“无可争议”的主要结论，有必要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一番较库比克博士所作的稍微详细一些的考察。十分清楚，库比克博士的注意力集中在赫尔利在华时期和赫尔利自己对美国对华政策所作的说明上。导致赫尔利使华的局势产生于1944年初夏，他辞去大使职务是在1945年11月。我个人的那些被库比克博士（和赫尔利）认为有极大“破坏作用的”报告大体上也是在同一时期写的。因此，在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概括讨论的以下五章中，讨论的重点将是1944和1945两年。

在提供美国对华政策的细节方面，库比克博士没有提供

① 《美亚文件》，第112页。

多大帮助。看来常常是这样，每当没有充分的根据时，库比克博士依靠的就是不断重复同样的辞句。

大使〔赫尔利〕从美国总统那里接到了明确指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把中国所有武装力量统一到委员长统率之下。^①

美国的战时基本对华政策，象总统和国务卿反复表明以及华盛顿和全国上下所清楚了解的那样，是尽一切可能支持蒋介石委员长的中央政府，并支持他的抗日军队。^②

大使指责谢伟思致力于破坏总统规定的美国使命的首要目标，即支持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中央政府。^③

〔到1945年底〕美国政策改变了……它早先单方面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立场。^④

把美国对华政策极狭隘地理解为支持蒋介石个人，这种概念是逐渐在赫尔利头脑中形成的。当赫尔利发现他陷入了中国政治的严酷现实时，这种概念被强化了，并在他愤怒的辞职和战后关于谁“失去中国”的辩论中具体化了。^⑤这样，这种概念成了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主要神话，也就可以令人理解了。然而，库比克博士为什么不试图用文件证实这些主张呢？这是有充足理由的：即能证实这些主张的文件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则有大量与此相反的文件。

① 《美亚文件》，第104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③ 同上书，第103页。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④ 同上书，第25页。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我假定，库比克博士所说的“单方面支持”，意指只支持蒋介石政权，这与需考虑互惠或对方行动的更为通常意义上的支持是不同的。

⑤ 参看唐·洛贝克，《帕特里克·J·赫尔利传》（芝加哥，雷格纳利公司1956年版，下简称《赫尔利传》），第279—281页及整本书。

第三章

通过美国的指挥权统一中国

科德尔·赫尔（他从1933年到将近1944年底任国务卿）在写回忆录时，回顾了美国战时对华政策。

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①

从珍珠港事件到整个1942年，是一段遭受失败和令人灰心丧气的时期。到1943年，中缅印战区虽然远不如欧洲甚至太平洋战区优先，但同盟国的资源已开始发挥作用。虽然困难重重，但飞越“驼峰”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吨位在慢慢地增加。几个师的中国部队被空运到印度，在那里受到训练，并开始投入一个进展缓慢、极其费力和“小规模”的战役，使自己在其中经受考验。该战役的目的是打通从阿萨姆经过北缅最后到达中国的道路，它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史迪威将军推动的。另外在中国云南省境内，有30个师的中国军队

^① 科德尔·赫尔：《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3页。

逐步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并装备以美国新式武器，以便为向西推进和配合北缅战役作好准备（中国方面对此事延误甚多）。①

史迪威和在华盛顿的陆军部确信，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对于使中国在战争中发挥有效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样一条道路，就不可能武装一支经过改革的中国军队和向它提供物资。没有这样一支军队，就不可能使中国成为攻击日本的基地，甚至不可能保卫已经在中国修建的美国空军机场。② 陈纳德和蒋介石认为有一个更简易的办法，即只使用空军力量。凭着由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12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的一支薄弱的空军力量，陈纳德坚持认为，他将“在大约六个月至多一年之内摧毁日本空军的战斗力”，从而“使日本垮台”。③

罗斯福否决了他的全体军事顾问的一致意见并在1943年春决定支持委员长和陈纳德。总统在对马歇尔的解释中，断然否定了采取讨价还价或有交换条件的方式和中国人合作。

① 查尔斯·F·罗曼纳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使华》（华盛顿，陆军部1953年版），第6、7章。此书是陆军部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三卷本官方历史的第一卷。库比克博士没有使用这本极有价值的权威史料，仅仅是他在引用史料方面存在的惊人的疏忽之一。

② 《史迪威使华》第259页概述了美国军方1943年初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坚定支持采取军事行动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于是，在缅甸发动一场进攻就被提到了下一次英美高级会议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上。这次会议就是1943年1月14日至23日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为准备参加此次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列举了1943年应采取的作战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在缅甸重新打通通往中国的交通线，以便获得‘最后进攻日本本土所必需的基地’。这份文件中说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华北地区设置集结待运基地和机场。”

③ 同上书，第252—253页。

我们必须记住，委员长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是经历了艰难的道路的。他必须在一批形形色色的领袖人物中间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这些人中间有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医务卫生界人士、工程师等，他们都在为夺取地方或全国的统治权而斗争。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工作。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建立了我们花了两个世纪才实现的东西。

此外，委员长认为必须维持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同样情况下，你和我也会这样作。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不能对这样的人严厉说话，或者以我们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坚持要求他作出承诺。^①

在政治方面，使中国被承认为大国的努力似乎在1943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1月，中国与美英两国签署了结束长达一世纪的治外法权的条约。10月，莫斯科宣言正式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② 11月，蒋介石及其军事顾问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盟国会议。会后发布的开罗宣言庄严地保证把1895年以来被日本夺去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台湾在内）归还中国。12月，美国国会还废除了排华法案。看来罗斯福总统在其圣诞节前夕致全国人民书中这样说是恰当的：“今天，我们同中华民国在深厚的友谊上和统一的目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③

罗斯福的话当时也许有某些道理，但是它们的意义已经开始消失。开罗会议是罗斯福所作的这样一种努力的高峰，即避免对蒋使用压力，并把中国当作一个平等大国。会议后

① 《史迪威使华》，第279页。

② 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第39页指出：“莫斯科宣言生动地表明，美国相信那些以含糊词句表达的一般原则能消除各国之间的冲突……”

③ 《中国白皮书》，第37页。

形势迅速发展。铁的事实很快开始冲击这些幻想。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急剧地、明白无误地转向史迪威和马歇尔所持的有条件支持中国的态度。^①此后的一个问题是，当美国最终从对中国的幻想中醒悟过来时，不会自动解除在充满幻想时期与中国形成的关系。

毫无疑问，罗斯福改变态度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之一肯定是蒋介石对美国采取的策略所造成的累积影响。这些策略是：“向美国提出过高的要求和对美国的要求提出苛刻的反要求；对美国的建议提出抵销性条件和要他们付出极大补偿；作出暗示威胁要同美国分离。”^②在开罗，盟国虽然在政治上作了很大的让步，但仍费了很大力气才使蒋介石同意盟国提出的重新夺取北缅的建议。开罗会议之后，盟国撤销了在孟加拉湾发动一次大规模两栖作战行动的承诺，蒋介石就提出“补偿”10亿美元的要求（还要求将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增加一倍，以及立即将通过驼峰运送的物资吨位增加3倍）。这在华盛顿看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

可以认为，第二个因素是，大约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美国军事计划的制定者们对如何以最好最快的方式去进攻日本，正在修改他们的设想。史迪威抵达开罗的当天，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地登上了吉尔伯特群岛。局势迅速表明，对日本的主要攻击将通过太平洋进行。中国的军事重要性迅速减弱。

另一个因素肯定是斯大林作出的令人鼓舞的表示。在德黑兰，斯大林重申了他早在10月就对赫尔作的声明，即俄国

^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把他们所写的关于开罗会议的那一章（《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2章）题为“六分仪，分水岭”。

^②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09页。

将在打败德国之后参加对日作战。巴巴拉·塔奇曼极妙地总结了此事：“由于同中国人打交道被搞得灰心丧气，斯大林的许诺就提出了以俄国代替中国作为美国的战时和战后伙伴的可能性。……在一次历史性会议的热忱友好的气氛中，他（罗斯福）得出结论，斯大林是‘可以接近的’，并能在战后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进行合作。”^①

最后，事实是：陈纳德尽管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充分的支持，但他在中国进行的空战根本没有达到他所保证获得的效果。相反，史迪威的北缅战役正在缓慢地进展。

罗斯福采取有条件的政策在1944年很快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蒋介石提出的给予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它对中国的战争能力不能起明显有益的作用。中国人坚持美国在华军事活动的资金要按20元法币比1美元的官方兑换率来支付，对此，美国采取的对策是，声明美国在华军事费用将限制在每月2500万美元。通货膨胀已达到这样的地步，自由市场上公开的兑换率达230元法币比1美元，并且还在不断上升；2500万美元如限予以官价兑换法币，将最终迫使美国撤出中国。这样，中国人只好放弃了上述要求。^②

紧接着出现的问题是，中国人拒绝让Y部队（在云南由美国训练装备的30个中国师）越过萨尔温江向西进攻，而它正是为此目的而创建的。随之到来的危机是，不仅史迪威的北缅战役，连盟国在阿萨姆和印度的整个阵地都遭受到日本人向英帕尔拼命进攻的严重威胁。在互通了几次电报之后，罗斯福在4月3日给委员长的一封电报中坦率地说：

在萨尔温江地区同你军作战的只是一个兵员不足的

①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3年版），第407页。

② 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298—301页。

师。你向西推进必获成功。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在装备和训练你的约克（YOK）部队。如果不把它们用于共同的事业，那就证明我们为空运装备和提供教练人员所作的极为艰苦和巨大的努力是毫无道理的。^①

由于中国人没有接着采取行动，马歇尔于4月10日指示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如果Y部队不出动，就应该停止向它运送租借物资。4月14日，中国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发布了横渡萨尔温江的命令。委员长从未回复罗斯福4月3日的电报，而是由何将军向马歇尔发了一封包括下列声明的电报：“出动部分Y部队越过萨尔温江是中国人自己主动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没有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它建立在认识到中国必须在共同的战争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考虑之上。”^②中国人终于出动了部队；赫恩将军也恢复了对Y部队的物资分配。正是以这种含有交换条件的有效政策为背景，赫尔利被派往中国。

1944年春季，另一个重要的军事危机正在中国内部发展着。日本已很虚弱的军队在没有重大战斗的情况下，正在打通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线，扫除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队的前沿作战基地，使人们担心他们也许会推进到远达重庆，甚至推进到更严重地威胁到美国援助的“驼峰”终点站昆明。面对中国的这个潜在的灾难，蒋介石却不愿意把他自己

①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0页。这份电报是由赫恩将军在重庆递交给蒋夫人的（因为委员长生病）。蒋夫人随后向赫恩将军发表了如下评论：电报的话讲可能危害而不是改善出动Y部队的机会。这使人得出了电报还没有递给蒋介石的结论。“总统立即命令，他今后给委员长的电报一定得由在重庆的美国最高级军官递交给委员长本人。”

② 同上书，第312—314页。

的“黄埔”部队投入战斗；不愿意撤走和使用被用来封锁华北共产党人的约30万至50万人的大批国民党军队（这当然意味着共产党也不得不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力量用来保护自己）；不愿让美国人向在日本进攻下首当其冲的国民党军队司令官们（如薛岳）^①提供急需的物资，甚至拒绝向Y部队提供为完成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这一战役最后阶段任务所急需的、相对来说很少的补充人员。

在华盛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种情况要求采取新的措施：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时刻已经到来，即必须把中国剩存的所有军事力量和资源委托给某个能以富有成效的办法指挥对日作战的人。在中国政府或武装部队中，没有一个人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协调中国的军队以共同对付日本的威胁。在这次战争期间，只有一个人能使中国军队以有效的方式对日作战。此人就是史迪威将军。^②

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这导致了他1944年7月6日致委员长的电报，该电也许值得全文引用：

日本人在华中的进攻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局势，这种局势不仅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国军队在中国建立的一切，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要挽救局势，就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我认为，目前的严重局势要求委派一人，授以协调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盟国在华全部军事力量的权力。

① 科恩对这次涉及到薛岳将军的事件作过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参看沃伦·科恩：《谁在湖南对日作战？对中国战争努力的若干看法》，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

②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82页。

我认为我完全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尽管如此，我认为他现在已清楚地证明了他具备富于远见的判断力和组织、训练、特别是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才能。我所知道的人中间，只有他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克服现在威胁着中国和我们战胜日本的全盘计划的灾难。我即将提升史迪威为上将，我建议你迅速考虑将他从缅甸召回，让他在你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中美军队，授他以全权协调和指挥遏止敌军进攻势头所必需的作战行动。我觉得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适当的补救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遭受灾难性的挫折。

我真诚地相信，你不会怪罪我的坦率，我向你保证，我无意在有关中国的事情上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你，然而这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前途和美国在那个地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因此我有理由对此事表示极大的关切。

请记住，在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发生的情况都清楚地证明，仅靠空军不可能阻止锐意进攻的敌人。

事实上，虽然我们在空中占有绝对优势，但德国人还是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和发动了坚决的反攻。

如果你同意授予史迪威我现在建议的这项职务，我将推荐他的助手、十分出色的军官萨尔坦将军来指挥在缅甸的中美部队，当然，是在史迪威领导之下。^①

这确实象总统所说的，是一个“根本的”补救方法。附带说明，这不是史迪威将军倡议的；我当时也还未访问延安，或提出任何使用共产党军队的建议。这可以看作是“单方面支持”，虽然其意义大概不是库比克博士所解释的那

①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83—384页。

样。无论如何，蒋介石接受这封电报时态度极为冷淡。^①

委员长为了拖延时间，请求总统派一位特使赴华讨论安排史迪威指挥权的细节问题。赫尔利将军被选择执行这项特别使命。总统给他的命令，象他当时通告国务院的那样，是简明扼要的：

任命你为我在蒋介石将军处的私人代表。你将直接向我报告工作。你的任务是，促进蒋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利后者对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还将委派你担任另外的特殊任务。（赫尔利将军对此的解释是，另外的任务将同物资供应有关，因此陆军部将发出指示。）

你在执行任务时，要同驻重庆的高斯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②

总统给赫尔利的指示的范围和性质随后成了一个十分混乱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赫尔利在他的行动和政策受到批评时，发表一系列含糊不清、互相矛盾和日益强烈地出于利己动机的言论。因此，值得指出，赫尔利本人接到训令时的言论表明，罗斯福的训令是有限度的和具体的，即改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和“便利”史迪威指挥中国

^① 因为按照命令，要把这样的电报亲自送给委员长，我被召去作为递交此电的费里斯将军的译员。就我将来的职业来说，这大概是一项不幸的任务（但不是此时期中唯一的一项不幸任务）。尽管似乎中国人（和美国人）一直不断地推測我与此电的内容有关联，但我事实上同此电的接受者一样感到出乎意外。

^②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50—251页。库比克博士莫名其妙地（我基于有清楚的档案记载才这样说）声称（《美亚文件》第24页），蒋介石建议，总统“派一名私人代表到中国充当重庆中央政府和延安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此建议得到华莱士副总统的支持并由他转达总统，赫尔利被派往中国就是对此建议的采纳。

军队。

失 败 之 果

关于那些最后导致召回史迪威将军的谈判的详情，其他人已作了详尽的研究。^①这方面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行动是否就是放弃了有条件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政策。答案并不十分清楚。邹谠的结论是：“召回史迪威一事主要表明，美国在实行压力策略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判断失误和意志不强，而不是出于客观上政治地位的软弱。”^②美国政策在这一特殊事例中遭到失败，这当然是明白无疑的。看来同样清楚的是，在这次教训之后，罗斯福没有再试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压蒋介石。然而我认为，这件事的经过和随后的发展表明，有条件支持的基本政策继续得到执行。而且，随着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减弱，美国对蒋介石和中国的支持也更有限度了。

在赫尔利离开华盛顿之前，蒋介石于8月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必须控制租借物资，美国必须给予大量的财政援助。^③罗斯福没有理睬这些条件。赫尔利于9月6日到达重庆。美国人和中国人在理解史迪威作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所应有的责任和权力方面存在的分歧，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赫尔利觉得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正在取

^① 对此论述最充分的是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一书的第6、7章，此书还附有大多数有关电报的原文。综合性概述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第103—124页。

^②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22页。

^③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14页。

得进展，而其他更为客观的人士却没有发现这种迹象。^①

另一个问题的出现打破了僵局。9月15日，为日本人在广西的挺进所震惊的委员长建议从缅甸边界撤回Y部队（它在中缅边界刚刚占领了腾冲，只需要再占领龙陵就可控制滇缅公路全线），以保卫昆明。史迪威所写的关于这个惊人的消息的报告被转给了在魁北克的马歇尔、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那里同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举行会议。美英两国的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在那里第一次取得了一致意见。显然，日本人在缅甸正在被击溃；一个为完全收复缅甸而对仰光发动全面两栖进攻的计划刚在9月14日获得批准。中国人威胁要撤走支援部队，就将破坏这个计划。参谋人员迅速准备了一封给蒋介石的措词尖锐的回电，罗斯福同意并签署了此电，电报由陆军部发给史迪威，让他递交给蒋介石。^②

蒋介石一直想抵赖他早先许下的给史迪威指挥权的诺言，这封电报以及它由史迪威本人递交这件事（这样做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是失策，但它是奉命行事）被蒋介石利用为达到此目的的借口。他的第一个也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是，“由史迪威本人递交这份电报，使他成了史迪威的下级”。^③蒋介石（还有赫尔利）显然确信这份电报是史迪威自己起草的。蒋接着（在很快就泄露出来的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① 例如，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13页写道：“……同赫尔利后来的说法相反，关于史迪威权力问题的谈判始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② 此电原文见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45—446页。虽然也许值不得象通常描述的那样把此电说成是一个“最后通牒”，但它毫无疑问是直率和严厉的。在档案记载中，看不出为什么由史迪威而不是由总统特使赫尔利递交此电。

③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14页。

的一次“秘密”讲话中）威胁说，如果必要，就在没有美援的情况下继续对日作战。赫尔利支持蒋介石。他说：“除史迪威外，在你（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将可能因此同时失去中国。”^① 罗斯福熟知史迪威尖刻暴躁的脾气，这种脾气使别人——不仅仅是蒋介石——常常抱怨史迪威。这也对罗斯福作出决定产生了某些无形的影响。但主要的因素是，这个问题演变成了蒋介石坚持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的特权的问题，这是罗斯福觉得难于拒绝蒋介石要求的根据。^②

于是，史迪威被召回了，在这点上，蒋介石取得了胜利。但这不是一次彻底的胜利。中缅印战区分成了几部分，魏德迈将军被任命领导新的中国战区。租借物资的分配权——曾经是发生争论的原因——保留在魏德迈手里。Y部队没有调回，它继续向龙陵推进，不久同在北缅打通滇缅公路的部队会师。虽然蒋特别表示愿意授与史迪威的继任者以指挥中国部队的权力，但这遭到了断然拒绝：“如我在10月6日电报中所说，我感到，在目前情况下，不应由一个美国人担负指挥在华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的职责。”^③ 魏德迈作为战区司令所得到的命令表明，他的使命比史迪威的使命有更多的限制。^④ 他没有接到“增强美国援助的效用……和帮助改善中

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17页。

② 例如，参见罗斯福1943年3月对马歇尔说的话，见《史迪威使华》第279页。

③ 罗斯福10月18日致蒋介石电，见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68—469页。

④ 给史迪威的命令见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使华》第74页。给魏德迈的命令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78—179页。

国军队战斗力”的命令。然而，却有一个新的、对将来意义更大的限制性条件：“除非到了必须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的地步，你不得利用美国资源镇压中国的内部冲突。”

召回史迪威的政策的意义或许可以讨论。但此事标志着美中关系又倒退了一步，则是毫无疑问的。诚然，并不是所有的当事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委员长通过此事明显地、毫不足怪地“坚定了下述信念：美国如此需要依赖他来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在推行其政策中又十分缺乏坚定的目的，以致不管他做什么或拒绝做什么，美国都将最终对他所坚持的要求让步和接受他的意见。”^①看来，赫尔利也得出了下列结论，即施加压力的策略是不明智的，并正在被放弃（虽然档案证明总统来电中毫无可以得出此种见解的根据）。无论如何，赫尔利对于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他的使命的失败之处，并没有表现出灰心丧气。

在美国方面，此事留下了一种沮丧和辛酸的情绪。但它将是委员长多年内的最后一次外交胜利。“而且”，象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所指出的，“总统给委员长的回电变得逐渐冷淡和不那么随和，表明罗斯福先生对委员长和中国的态度发生了相应的改变。”^②看来很清楚，美国之所以接受这次失败，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华盛顿此时已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从军事角度而论，已不再计划或期望中国会在对日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菲律宾登陆发动在即。从政治角度而论，罗斯福长期热情地希望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

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22页。

②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06页。

大国，现在这被看作是一个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他更积极地转向研究这样的可能性，即以战时和战后同苏联合作来作为保持远东稳定的基础。

第四章

高斯大使提出中立性建议

1944年7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采取把国共双方的武装力量置于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的办法来一举解决中国的棘手问题。^①恰巧在同一天，驻重庆的高斯大使开始了另一次更为友好地利用美国影响解决中国僵局的尝试（但他显然不知道华盛顿的事态发展）。由于这位职业外交家在中国有长期经验，可以料想这是一个合理的、深思熟虑的建议。建议提出之前先进行了一次试探，这是在大使馆参赞乔治·艾奇逊和孙科间的一次长时间私人会谈中进行的：

接着，艾奇逊通过表示“想知道”委员长是否认为下列作法会有助于事，提出了我在我们大使馆的讨论中提到的想法：是否可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呼吁他们和他共同承担责任，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以拯救国家尚存地区，并向他们充分保证他不再希图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矛盾，号召他们和他共同制定并执行一项联合作战的计划，同时呼吁人民恢复抵抗，重建统一战线。艾奇逊说，他认为，对委员长来说，这将是

^①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82页。

一个有政治家气度的步骤，肯定会提高他作为中国领袖在国内外的威信。孙科显然热心地听取了这个建议。^①

可以看出，这项建议承认并尊重委员长的领导地位，它完全没有威胁或是暗示美国有权给予或是停止支持。它被批评为是含糊不清和词义不明的。^②但这正好是它的优点之一和用意所在。它不期望不切实际地一举解决多年的积怨和争斗。^③相反，它所期望的是寻求一项最低限度的灵活方法（其细节将由中国有关各方制定），以着手弥合正在使国家分裂的巨大分歧。它如果成功，本来可以给中国毫无进展的对日战争带来某些新的起色。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所有人都已预见到，如果中国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还未统一，它将面临一场危机，如果日本投降时中国仍未统一，这场危机将更为严重，而高斯的建议可能会在应付这一危机方面提供一个取得进展的基础。^④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必须指出，这项建议，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个建议一样，也是在我抵达延安，并首次发出那

① 高斯1944年7月4日致国务卿的1159号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116—117页）。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当时任立法院长。乔治·艾奇逊是美国驻华外交官中非常干练的高级官员，他后来（象其他很多人一样）遭到赫尔利将军的极度厌恶。

② 例如，参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纷乱》（普林西顿，普林西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74页：“我读到的这一建议的各种版本都沒有清楚地阐明这个委员会将如何行使职权，或如何调解分歧。”

③ 当然，此计划打算不仅使共产党，而且使中国其他对政府不满的重要团体——各省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被排斥在委员长狭小权力集团之外的人们——参与政府。可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联合政府”。

④ 例如，参见高斯1944年9月4日致国务卿的2932号电报（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45页）。

些库比克博士认为破坏性如此之大的报告的几个星期之前提出的。

华盛顿的推动

通常慢条斯理的国务院对这个谨慎的建议欣喜而热心地作出了反应。^① 它鼓励高斯坚持这一建议，并采取进一步行动。同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的两次会谈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委员长最亲密的老朋友之一”考试院长戴季陶也被认为卷入了此事（他当时同宋子文住在一起）。^② 同时高斯把罗斯福总统7月14日的一份新电报转给了蒋介石，作为力求促进中国各党派之间合作的一个步骤。该电虽然提到蒋介石最近同华莱士副总统的会谈，而没有特别提到高斯有关组织“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但它敦促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达成一项“有益的安排”，特别是以此作为蒋希望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前奏。^③ 最后大使馆方面又探询了孙科的看法，因这件事最初是同他谈起的。这时他不抱什么希望了。高斯报告说：

“孙博士表示坚决赞同，但又无可奈何地说：‘政府的军政大权都集中于一人之手。’”^④

直到8月31日，大使才得到一个同蒋介石面谈的机会。

① 国务院1944年7月8日致高斯的931号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20页）。

② 高斯1944年7月12日致国务卿的1205号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24—126页）；高斯1944年7月25日致国务卿的1283号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32页）。

③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45页。

④ 高斯1944年8月9日致国务卿的1373号电报（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39—140页）。

会谈结果不是令人鼓舞的：“委员长虽然说此事也许至少是值得研究，但除了礼貌性的响应外，他并没有对建议作更多的表示。”^①然而华盛顿不愿意就此罢休。它的反应是以国务卿赫尔的名义给驻重庆大使去了一份电报。

总统和我已仔细地考虑了你的1159号、1205号和1480号电报，〔见本书79页注^②、80页注^③、81页注^④〕。

我们同意你的意见，此时，需就中国的政府和有关军事情况的问题向蒋作一积极、坦率和友好的商谈。

……请你通知蒋，总统和我觉得，你的建议是切实可行和及时的，值得认真考虑；我们不仅关切同中共之间未解决的问题，也关切关于中国其他地方非共产党人中间存在不满和不同政见的报道；我们对中共或其他持不同政见分子本身并无兴趣，但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和联合国的利益，也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为此目的，党派分歧能够也应该通过明智的和解与合作得到弥合和解决。我们认为，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集团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团体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机构……另外，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以我们的名义提出在上面提到的你的电报中表达的某些无可辩驳的论点，以及艾奇逊在8月9日同孙科会谈中详细表述过的观点。

① 大使用无线电发的报告概要第1480号，电报见《中国白皮书》第561—563页；他邮寄的更为详细的报告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61—551页。

(见你的1373号电)……^①

既然艾奇逊在第二次同孙科谈话中所作的声明，现在被特别地提高到可以作为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观点的地位，就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考察：

……艾奇逊接着说，在他看来，中国政府现在遇到了近百年来同西方密切联系的最好机会。这个机会可以使中国成为它理应成为的世界民主大国之一，其方法是通过把所有集团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牢固的对敌统一战线，为中国将来在和平中的作用奠定坚实基础。他说，美国不仅想要中国强大统一——这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正如孙博士意识到的，美国政府为了中国的利益一直在积极努力地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使中国以这样的身分能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大国，并在远东为争取和平、战后稳定以及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合作而施加自己有效的影响，以造福于所有期待开辟一个经济和政治安定新纪元的国家，这个新纪元将以合作和相互友好的开明原则为基础。艾奇逊说，美国不可能单独完成此项工作。这不仅仅是给中国军事援助和在世界组织和世界事务中给予中国外交支持的问题，中国必须积极自助。他指出，中国现在非但没有这样做，看来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国内政治方面，以及国际政治的某些方面听任形势不断恶化，从而使自己国家的远大

① 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此电全面准确的大意见《中国白皮书》第563—564页；原文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67—569页。二者之间的微小差别几乎全是词序方面的。据我所知，《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的编辑们认为有必要或值得重载已在早先出版的《中国白皮书》中全文发表过的材料仅此一例。

前途和未来的国际地位遭受损害。①

蒋介石的拒绝

委员长在9月15日接见了高斯大使，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友好会谈”，艾奇逊称赞参加了会谈，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长时间的会谈，即使考虑到高斯是一个很少说废话的人，他汇报情况的电报也是异乎寻常的简短。大使的确碰了钉子，他并不想掩盖他极度的懊丧。

……关于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安排的问题。

蒋说他已在考虑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但他立即把话题转到正在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上。我刚指出国民参政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他就立即说，他设想我们的建议并不意味着在政府结构上做改变，这是目前不应该试图做的事。我回答说，我认为少数党参加政府是可取的；在发生危机的时刻，组成全民政府是常常采用的办法；但我的建议并未设想立即改组政府，而是打算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军事委员会，参与解决目前局势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担责任。我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逐渐消除目前明显存在于国共之间的不信任，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统一能继续发展，以致到在适当的时候获得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的基础。但在我看来，军事委员会应该有责有权，责任是在为对付危机而成立的由各党派组成的委员会中能使各方头脑清醒的因素。蒋再一次说他正在“考虑采取步骤”，并表示希望国民党以外

① 参见本书第80页注④。孙博士正是对这些声明表示“完全赞同”，读者会记得这是一份电报，因此，一些文句和不必要的单词均经删节。

的其他政党的代表能参加政府的“时刻将会到来”……①
在这一时刻，华盛顿让步了。科德尔·赫尔给总统的备忘录最后一部分说：

……蒋介石对我们的建议的反应，高斯大使得到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然而，相信提出这项建议是值得的。它使蒋明白了我们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看法。同时，它可能有助于促使蒋做出某些按照他自己的信念决不会做的改变，然而作为应付我们的建议的权宜之计，他也许会这样做，……坚定不移地对蒋施加影响，至少在促进改善中国令人沮丧的状况方面可能是有效的。尽管无法指望会出现早日的全面改善，但或许可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并为中国给予美国将来的在华作战行动以更有效的合作，以及苏联对日作战时的中苏合作做好准备。②

赫尔国务卿的备忘录说，蒋从来不会“出于信念”做出改变，这一结论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备忘录又说：“然而作为应付我们的建议的权宜之计，他也许会这样做”，这种推理似乎只是以局外人看来是合理的东西为基础的。我们感谢邹谠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时期（1944年8月）蒋介石的一则有关日记：

只要我活着并且健康，国家就前途在望。虽然共产党有国际背景和阴谋诡计，但它的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

① 高斯1944年9月16日致“国务卿和总统”的1567号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73—574页）。按照大使多年不变的谨慎细致的习惯，毫无疑问他会通过外交信袋送去一份详细得多的报告，但在《外交关系》一书中没有见到此项文件。

② 赫尔1944年9月23日致罗斯福的备忘录（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34页）。

只要我能忍辱负重、坐待良机，就不需要过分担忧。如果到了毫无余地之时，对付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此刻，即使有国破家亡的危险，也将任何牺牲在所不惜。^①

另外做些说明也许并不多余。邹谠教授好象暗示，共产党知道美国对蒋提出的这一建议，这促使他们提高了为达成一项解决方法而需要的政治代价，特别是促使他们于10月13日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我认为情况不会这样。高斯大使深信美国由来已久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他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微妙、严肃（中国发展着的严重局势证明这是对的），并将它作为最高机密加以处理。高斯在他与委员长会谈期间和同国务院的电文交往中，曾经考虑过由他向共产党方面提出大体类似的建议。高斯奉命可以表达“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需要统一的总的看法”——这就是说，他不要使自己处于支持蒋介石政治目标的地位上。另一方面，蒋希望大使“让林（当时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林祖涵）知道，中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在委员长领导下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原则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监督”。^②但当蒋介石知道大使所受的限制时，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因此，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就没有与共产党就此问题进行接触。至于我，虽然这个建议首次提出时正在重庆，但直到10月23日我从延安返回（高斯大使本人悄悄地告诉我此事时）才与闻其事。共产党可能在国民政府内部有情

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73页。邹谠是转引自蒋经国《我的父亲》第3章，第4—5页。邹教授指出：“快刀斩乱麻”意同“用断然的方法解决难题”。显然，蒋经国这本关于他著名的父亲的书没有英译本。（这则日记译者直接采用了《我的父亲》一书中的中文原文—译者）

② 参见本书第31页注①、第32页注①、第34页注①涉及的文件。

报人员，但估计知道此事的人仅仅是孙科、戴季陶、宋子文和蒋介石本人。关于共产党提高他们的赌注一事，有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正如高斯大使和邹教授指出的那样，由于共产党巩固了他们在华北的农村根据地，以及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危机继续加深，时间是有利于共产党的。

更多的失败之果

我所以详细地描述美中关系中这一没有成果的插曲是有几个原因的。其一因为它的意义被忽视和缩小了。也许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由一个谨慎的、几乎不抛头露面的外交官故意以“不加声张”和“照顾面子”的方式提出来的。另外，它为下列与它同时或紧接着发生的高度戏剧性的事件所淹没：史迪威被召回、赫尔利同共产党谈判。但是，因为许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大量关于美国试图“以我们提供援助为代价，强迫蒋介石让中共参加他的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的议论，^①回顾下列情况或许是有益的，即这是一次以友好方式作出的认真尝试，丝毫没有威胁之意，也没有提出交换条件，旨在劝说蒋介石明白：无论是从眼前进行的战争考虑，还是从中国将来在和平中的作用考虑，中国的统一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提出严格而不容变通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②

^① 例如《美亚文件》第27和29页(第29页援引了约翰·F·肯尼迪(后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任众议员——译者注)1948年说的话)。

^② 可特别参考高斯大使第一次与蒋介石会谈的报告(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48页)。还应记住，华莱士副总统在不久前(1944年6月)访问重庆期间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试图使蒋意识到中国急需统一。参见《外

最后，虽然在当时它似乎没有结果，但它不可避免地为以后几幕戏布置了舞台。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冷淡地拒绝了美国试图进行的另一次“干预”——虽然是温和和善意的干预。在美国方面，对已露端倪的、战争结束时会出现的危机，日益感到沮丧和惊恐。美国陆军实际上已经勾销了中国战区。罗斯福总统对中国能在战后扮演重要角色一事变得灰心丧气。当时，国务院（我们在后面将更为详细地看到）对蒋介石政权前景的看法确实更为悲观了，更想极力避免美国对那个政权作无条件的承诺。

新舞台形成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演员变更了。史迪威将军已经走了，仅仅几天之后，高斯大使突然于11月1日辞职。他辞职的正式理由是太疲劳，身体不好。的确，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当了三年半的大使，然而，疲劳主要是精神上的。他耐心地接待了人数超过合理限度的总统特使：白宫助理劳克林·柯里（好几次）、温德尔·威尔基和华莱士副总统，这里只列举较有名气的人。但在赫尔利突然到达重庆之前（9月6日），似乎还没有人如此积极地试图向他被派驻国家的政府证明美国大使是多余的。赫尔利首先公然违反了总统给他的训令的第三段：“你在执行任务时，要同驻重庆的高斯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①然而，高斯有士兵的责任感，而且毫不骄傲自负。他于10月23日晚（我刚从延安回到重庆，启程前往华盛顿的前夕）同我进

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34页，和《中国白皮本》第549、552—554、555—556、559和560页。

^① 例如，完全没有向高斯大使通报导致召回史迪威的那些会谈的情况。高斯在1944年9月28日致国务卿的信中对此事作了清楚的说明（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56—258页）。

行了长时间的私下谈话。他主要谈到，他经过深思熟虑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但却被蒋介石生硬地立即驳回，他对此十分失望，并对这一事态可能给中国的前途和美国在华利益产生的影响深感沮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请我向国务院负责官员转达他的私人口信：他将在今后几天之内正式提出辞职，他们应明白，这不是通常在总统任期届满时提出的形式上的辞职，而是他认真希望被接受的辞职。^①

^①当时罗斯福的第三任任期正好就要结束。我于10月30日向助理国务卿格鲁转达了大使的口信。于是，白宫在他正式提出辞呈之前就宣布了他的辞职（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85—186, 188—189页）。

第五章

赫尔利将军支持蒋介石

中国——虽然也许不是蒋介石——失去了两个真诚而经验丰富的朋友。它获得了一个新朋友，这位新朋友的热情和雄心是否能弥补他所缺乏的知识和经验，尚待观察。华盛顿对任命一名新大使犹豫了很短一段时间。赫尔利已在中国，并且显然急于想获得这一职位。^①而且，委员长在史迪威被召回（根据赫尔利最初得到的指示，此事应结束他的赴华使命）后一个星期之内，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个人署名的电报中，已请求“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对赫尔利的任命。

在你10月6日的电报中，你善意地表示，尽管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应由一名美国军官统率中国国内地面部队，但你愿意继续让赫尔利将军作为你的有关军事事务的驻华私人代表。虽然你8月18日给赫尔利将军的最初指示似乎对他被授权与我合作的范围有所限制。

我的确希望你能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赫尔利将军担任你的代表，给他以更广泛的指示，使他能够同我在涉及

^① 赫尔利极力想表示：他对外交职务和任何与国务院有关的事都不屑一顾（参见洛贝克《赫尔利传》第278—279、308—309页）；然而，事实上，当8月份人们第一次就他作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一事对他进行询问时，他就想谋求大使职位了（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47—248页）。

我们同美国军事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在与中共谈判方面，我正在依靠他的帮助，他已经同他们进行协商。我的目的是要在国军正规部队中增加共产党部队的数量，现在这是对我们对日作战中最紧迫的需要之一。我完全信任赫尔利将军。由于他特别富有人情味，同时由于他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比较恰当，他似乎同共产党领导人相处得很好。作为你的私人代表，又获得我的完全信任，那么，他在解决这个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上的贡献，对我们的战事将会有极大的价值。

因为此电涉及到赫尔利将军本人，所以我通过现在使用的这条渠道发此电报。^①

如果国务院知道这份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拍发的电报，它

① 全文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70页，并附有下列说明（见该书注释87）：“宋子文致哈里·L·霍普金斯的没有注明日期的电报附有如下介绍：‘委员长要我请你转交下面这封致总统的亲启电报。’该电副本得自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该电的一部分电文（基本是第二段全部）见洛贝尔《赫尔利传》第308—309页。在该书中，电报拍发时间标为1944年10月25日，这看来与内容相符。既然海德公园副本未注明日期，洛贝克书中也未提到利用了罗斯福的文件，那么，我们假定赫尔利当时从蒋或宋那里收到了一份副本，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两种版本有一处不一致的地方，它刚好位于第二段中间稍前面的部分。海德公园本为：“我的目的是要在国军正规部队中增加共产党部队的数量。”洛贝克的《赫尔利传》为：“我的目的是把共产党部队收编为正规部队。”有几句话看来有点令人惊讶。例如，“现在这是我们对日作战中最紧迫的需要之一，”这是赫尔利的一贯论点。但直到6月22日，委员长还对华莱士副总统坚持说：“请明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是无用的。”（见《中国白皮书》第554页）。又如：“他（赫尔利）似乎同共产党领导人相处得很好。”这是蒋几乎无法直接知道的事情（而且赫尔利当时还未到过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住地延安）。可以推断，即使赫尔利没有参与起草此电，他对此也不是毫无所知。

也许会注意到这份电报说明了几个问题^①。第一，该电几乎毫不掩饰地要求由赫尔利取代正式任命的大使（高斯），因为如果不是由赫尔利出任大使，那么蒋介石期望由赫尔利以特使身份担任的那种内容广泛的任务就将使大使一职徒有虚名。第二，该电表明蒋介石——我认为还有赫尔利——明确认识到，赫尔利最初得到的指示，事实上是谈判关于史迪威指挥中国部队的问题。第三，它表明，在没有被授权或是同华盛顿磋商的情况下，赫尔利已经开始同中共谈判。但更重要的是，他几乎已经是以委员长发言人的身份在进行调解工作，至少在蒋介石心中是这样认为的（“在与中共谈判方面，我正在依靠他的帮助”）。这同赫尔国务卿（在他9月9日发的“总统和我”的训令中）授权高斯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有限制的严格中立的建议是极为不同的。当时，委员长一经获悉这一建议仅限于向共产党表示美国的关切，而不是向他们提出国民党的条件，就立即不再讨论这个问题。^②

新大使

不管华盛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什么样的范围内考虑了这些问题，赫尔利于11月17日被罗斯福任命为驻华大使。^③可

① 当然不能指责中国人谋求开辟和利用任何通向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渠道一事，这些渠道看来最容易使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他们极善于并喜欢利用这些间接的和不完全是官方的渠道。如档案记载大量表明的那样，赫尔利自己也认为他很少受正式外交渠道的束缚。

② 赫尔的指示见本书第82页注①。高斯关于委员长显然对他奉命提出的那种建议不感兴趣的报告，见本书第84页注①。

③ 鉴于库比克博士作了那个关于我对政策很有影响的著名推断（“掌握控制权的是那少数几个年青人……约翰·佩顿·戴维斯和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见《美亚文件》第30页），或许我可以作一点个人回忆。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并曾被哈里·霍普金斯召去讨论中国局势。讨论结束时，霍普金斯先生问我是否认为赫尔利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大使人选。我列举了几个理由，回答说那将是“一个灾难”。几天以后，我看到了赫尔利被任命为大使的报道，历史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以这样说，试图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的确成了赫尔利在下一年大多数时间中首要的和全神贯注的问题。唐·洛贝克在他写的赫尔利传记中宣称，“由于蒋介石的要求”，赫尔利接到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新指示”。^①然而，不论是洛贝克还是其他学者，都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指示的原文，这样的指示也不可能出自总统口授，因为赫尔利在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之间不在华盛顿。洛贝克援引的，是赫尔利自己“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的阐述。赫尔利的这一阐述，是时隔很久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当国务院开始对他似乎正在作出的某些承诺的含意提出疑问时，他拼凑起来的。^②

赫尔利最初卷入国共谈判的方式，看来在下列这份神秘的文件中得到了说明。这份文件是通过有些神秘的渠道发送的，所以，直到几年后的1949年才为国务院所知：

① 《赫尔利传》，第310页。此处显然指的是蒋介石10月26日致罗斯福的信，它似乎极不寻常地表明，给美国大使的指示不是以美国的利益，而是以接受国的愿望为基础。在已发表的资料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罗斯福答复过蒋的这封信。但是，正如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指出的（见《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09页），这是罗斯福同委员长的通信变得“逐渐冷淡和不那么随和，表明罗斯福先生的态度发生了相应改变”的时期。如我们将看到的，罗斯福的电报也不太频繁了。

②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45页。国务院直到此时还未正式得到大使正在进行什么工作的报告。赫尔利喜好只向总统报告，但即使在这方面，报告也是混乱而零星的，而且仅仅是通过非国务院（陆军或海军）的渠道来进行报告。斯退丁纽斯国务卿曾要求赫尔利作一报告，这一语气相当委婉的要求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44页。赫尔利对自己接到的“命令”、“指示”、“任务”或“政策理解”，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其他说明（参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07—114, 172—177, 555—557和722—726页），但他从未引用过具体文件加以证明，并常常回避使用“指示”这样明确的词。

建 议

1. 我们建议赫尔利将军同目前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中共参议员林祖涵，董必武两先生举行一次会谈，这样的会谈当然属于私人和秘密性质。应该让林、董明白，没有赫尔利将军的同意，他们不能将此会谈公之于众。

2. 希望在上述会谈举行时，赫尔利将军将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可以向林、董询问，共产党是否愿意由赫尔利将军进行斡旋，从而与政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也可以向他们表明，如果延安愿意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斡旋，而且赫尔利将军又能事先从中国政府得到不反对他采取这一行动的保证，他将提出一项解决问题的建议。

延安的报纸和电台正在进行十分激烈的反政府宣传，这种宣传仅仅有利于我们的敌人和南京的汉奸政府，它严重妨碍我们的谈判。如果赫尔利将军能说服共产党停止这种宣传，那将十分有益。

要迅速而切实地解决国共问题，就有必要为委员长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先生两人亲自进行接触作出某种安排。我们希望赫尔利将军就此向林、董作出暗示。

3. 如果延安同意赫尔利将军的建议，我们认为，他就应着手起草一份关于解决国共争端的建议，递交国共双方。在起草建议之前，我们愿意向赫尔利将军充分说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政府已经在哪些方面和还可能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我们希望，赫尔利将军的建议将不会

超越我们可能说服政府接受的界限。^①

1944年10月17日

因为不知道这份没有署名、又查不出作者的文件的来源，困惑不解的《外交关系，1944年》的编者们就将它含糊地标为：“在驻华大使馆中准备的文件”。我认为，不需要作太多设想，甚至也不需要仔细阅读这份文件，就可意识到，准备这份文件的“我们”根本不是美国人，他们只能是同共产党有争执的国民党一方的代表。因为赫尔利将军从未提起过这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50—651页。此处有一注释（注释33）说：“档案号893.00/1—1049卷内的所有文件，都来源于国务院1949年1月收自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一简缩微胶卷。”约翰·F·梅尔比教授曾在南京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后来又是国务院从事整理和编辑《中国白皮书》的小组成员之一，我感谢他对此事提供了其他的补充材料（该材料见于下列这封1971年1月19日写的私人信件）：

1949年8月，在《中国白皮书》发表后大约几个星期，我偶尔碰到了曾在南京美国大使馆任首席行政官的哈里·欣德拉。他告诉我，1948年晚秋，大使馆为了避免档案文件在随后的混乱时期被人掠走，匆忙将大使馆档案运出了中国。在此之后，他发现了插在放档案的抽屉后面的一卷文件，所有文件都是重庆时期的。由于不愿冒险把这些文件交付航运，也不愿把它们托付给那些由于携带大量内战留下来的破烂而早已超载的人们，他把这些文件拍摄成缩微胶卷，烧毁了原件，把胶卷带回美国。

粗略地检查《外交关系》1944年和1945年有关中国的两卷后，就会发现至少有48份文件是以这种奇特而又迟到的方式被保存和递交，才为国务院（和历史学家）所知。《外交示系》的编辑们认为这些文件意义重大，把它们收进该书。所有这些文件都与1944年底的国共关系和赫尔利将军的调停有关，然而它们直到1949年才被送到华盛顿。所以应该这样理解：在谈判进行期间（1944—1945年），除了赫尔利将军自己的简短而且通常不全面的报告外，国务院和华盛顿其他有关部门（包括白宫）基本上是不了解情况的。

份文件，所以无从知道他对这份文件的态度。但是，就在这份文件所标日期之后的四天之内，他同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林祖涵和董必武）有过两次会谈。10月23日，他又会见了他们^①。11月7日，他带着一份“（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和张治中将军修改过”的协定草案飞往延安。虽然对普通的调解者来说，这似乎对他的“斡旋”规定了某些限制，但看来它确实反映了赫尔利从事其雄心勃勃的努力时所持有的设想和态度。

① 赫尔利见过共产党代表两次这一事实，可以从他们1945年10月21日致赫尔利的一封信得到证实，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55页。此信的发表和本书第94页注①提到的文件，揭开了使我至少困惑了多年的一个小小的问题。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他们那本以当代人身份叙述这一时期情况的极有价值的书《中国暴风雨》第250页，详细描写了下面这个事件：

甚至早在史迪威被解职前，赫尔利就向本书作者之一透露过，他一直在同石及在重庆的两位共产党领导人谈判。这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它意味着美国介首次采取积极步骤，阻止中国发生内战。作者向赫尔利大使追问有关情况，但身材他说不出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名字。他仔细听了作者对中共代表容貌的描述之后，承认说同他进行过谈判的是这两个人。他对圆满解决问题充满了希望。于是本书两名作者急忙去找共产党人士证实此事，并想获悉他们对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可能性有何看法，以及他们对赫尔利先生的看法如何。共产党方面断然否认他们曾会见过大使。他们声称，他们曾邀请他吃饭，但他从未予以答复；同时他们不知道何时可能请他们参加谈判。于是两个记者又去找赫尔利，把共产党方面的说法告诉了他，要求他澄清此事。但大使除了重复他一直在主持谈判外，不能澄清这一混乱情况。

从未确切搞清赫尔利当作共产党使者的那两个人到底是谁。赫尔利曾在一次例行公事的会议上遇见过他们，但仅仅如此而已。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他们不是延安政府派驻重庆的正式代表。

赫尔利遵照“建议”第一段的严格禁令，很成功地封住了共产党代表的嘴。但他却未能抑制住自己好说的性格，向记者透露了他在“拯救中国”方面取得的进展。如果要弄清该“建议”为何如此强调坚守秘密，可以参考蒋介石9月15日同高斯大使第二次会谈的情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73页）：

“委员长后来提出了下列疑问：如果举行所建议的同林（伯渠）的会谈，共产党是否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其公开，以借此表明，美国政府在赞同或支持他们，或者至少是在他们和国民政府之间进行调解。”

一个新姿态

赴尔利的设想之一是不打算“压”蒋介石。人们只能认为赫尔利健忘。要求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特别是包括共产党部队的建议，毕竟是试图强有力地直接“压”委员长。^①正是为了在现场并以个人的方式（即使是劝说式的）施加压力，罗斯福总统才在仅仅几星期前派遣赫尔利赴华。压的办法的确失败了。但是，在罗斯福总统10月5日和18日给蒋介石的两份回电的语气和措辞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或暗示他已改变了他的基本态度。^②

第二个主要的设想，赫尔利的主要使命是“支持”蒋介石。当然，中国是我们的盟国，我们承认国民政府，蒋介石是这个政府的首脑。我们也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但外交关系通常存在于互相承认的政府之间，而不是与某些特定的领导人相联系。^③例如，以英国为例，如果坚持要我们在战争期间保证支持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地位，那就显得奇怪了；当权力转移到工党和克莱门特·艾德礼一边时，我们与英国的关系和对英国的支持并没有发生改变。换一个例子来说，不知道赫尔利是否会提出这样的论点：因为苏联是我们的盟国，我们也就承担了支持俄国共产党，特别是维护

①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83—384页。

②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59、468—469页。

③ 然而，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同非西方或是不发达国家打交道时，有支持那种很有希望成功的“铁腕人物”一类的领袖的历史传统。以中国为例，西方国家曾支持袁世凯和其后的各类军阀人物。而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其他政治力量。从赫尔利狭隘地固执于“支持”委员长这点看来，他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这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就属于受这种传统思想支配的人。

斯大林的领导地位的义务。^① 换句话说，“支持中国”未必等于“支持委员长”。但赫尔利将军好象从未能对此有所区别。

在赫尔利的心目中，至少在开始进行谈判时，似乎还有第三个笼统的考虑：显然，赫尔利认为蒋介石口头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要作某些（大概赫尔利认为是重大的）让步。赫尔利在当时的谈话中提到过这个协议，但在他的报告中除了含糊地提了一下外，似乎什么也不愿说。我没有发现有关这个协议已被详细说明或写成文字的记载。例如，他在11月13日与约翰·戴维斯的谈话中提到过这件事。戴维斯如此记载：“赫尔利宣称，关于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他和委员长谈妥的条件之一是，委员长承诺与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②

① 人们也许不应过于相信赫尔利对事物的看法，就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也是如此。1942年有很长一个时期，赫尔利任美国驻新西兰首席外交代表，1940年至1948年我在这个国家工作时，他给人们留下的回忆仍旧十分鲜明。人们经常回忆的一件事是同新西兰全国大选有关的。当时新西兰的总理是工党的精明领袖彼得·弗雷泽，他在争取重新当选。他同赫尔利很快成了好朋友。弗雷泽发现赫尔利有讲演的嗜好，于是经常在竞选期间邀请赫尔利陪他参加各种竞选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美国公使常被作为贵宾加以介绍，并被邀请发表一些看法。每当这种时候，赫尔利总是先庄后谐，充满沙文主义情结地大谈一通战争（当时战争处于低潮，特别是就新西兰而言），并且总是以热烈赞扬他的“老朋友、坚定的同盟者和新西兰的伟大领袖”——弗雷泽总理而结束讲演。虽然大家都同意赫尔利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外交家，但由于叙述者所属的党派不同，不同的人对美国共和党人支持新西兰的社会主义者一事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新西兰大选中，弗雷泽（和赫尔利）胜利了。

② 约翰·戴维斯1944年11月14日的备忘录：“同赫尔利将军的会谈”（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戴维斯先生是一位隶属于魏德迈将军参谋班子的外交官，他在这以前一直在史迪威将军的参谋班子里工作。赫尔利在与委员长达成“谅解”这件事上表面上保持沉默，其原因只能作一些推测。在赫尔利认为他已取得这种谅解时，他对在华美国人批评他“出卖”了史迪威一事十分敏感。到事实证明蒋不象赫尔利设想的那样愿意作出让步时，赫尔利已完全倒向蒋一边，此时再把协议公诸于众，丝毫不会提高赫尔利作为谈判者的形象。

不需要详细重述赫尔利将军进行谈判的情况。这已由赫尔利自己、国务院、菲斯教授和邹谠教授叙述过。如果有人有意搜寻散见于各处的有关文件，就能在《外交关系》1944年和1945年各卷中查到。^①简而言之，赫尔利带着十分温和的一揽子五点协议前往延安。这是由他起草并得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的。^②共产党领导人准备了他们自己的五点协议，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当时赫尔利热情地帮助修改和改进了共产党的协议（并同毛泽东一起签署了这份文件）。^③赫尔利对于他能使共产党同意他认为极为合理的解决办法一事感到兴高采烈。但当他回到重庆，发现这项协议完全不能为蒋介石所接受时，这种高兴情绪也就消失了。^④之后，国民党方面准

① 洛贝克：《赫尔利传》，第307—387页；《中国白皮书》，第73—116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08—225、255—303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288—345页。

② 赫尔利最初的草案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59页，国民党代表修改过的草案见同书第666页。

③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87—688页。共产党对协议的主要补充是：“现国民政府应立即改组为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组成之……军事委员会亦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组成之。”赫尔利的主要补充是一个完整的权利法案，包括人身保护权以及“免除恐惧之自由和免除匮乏之自由两项权利”这样的具体细节。戴维·D·包瑞德在《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版）第56—76页提供了有关这一事件的颇有意思的具体细节。包瑞德上校叙述的情况的价值之一是，在进行那些冗长的谈判期间，赫尔利由一位不是担任翻译或速记员的美国人陪同参加谈判，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中国方面的记载尚未发表，包瑞德上校的目击报告就是仅有的、并非出自赫尔利本人之手的叙述，虽然这一记述仅限于这一事件。

④ 赫尔利显然一直深信共产党的“五点协议”是公平合理的，他坦率承认这主要归功于他参与了起草工作。参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96、699和734页。

备了三点反建议的几种草案，其中完全不提联合政府一事，这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① 尽管赫尔利竭力使谈判继续进行，但谈判还是停顿了。到1945年2月中，谈判显然陷入了僵局。这时，赫尔利前往华盛顿。他在4月经苏联返回中国后，试图恢复谈判，但未获成功。直到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和签订了中苏条约后，真正的谈判才随着毛泽东访问重庆而重新开始。这些会谈再次失败。赫尔利在9月底返回美国，并于1945年11月26日辞职，把谈判失败归咎于“职业外交官……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② 马歇尔使团接着试图收拾残局。

这一系列徒劳无功的行动的一个可悲之处是，没有迹象表明赫尔利对于所卷入的问题的难处和性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起初这肯定不是他的过错。他没有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他被匆匆派出，只听到最粗略的情况介绍，也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③ 但他到达中国后，由于某些不需在此阐述的原因——其中有些是属于个人性格方面的，他顽固地坚持几点根本错误的见解。而且，由于困难不断出现，成功仍不可见。他发展了一个新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理论来支持这些错误见解。在1971年的今天，读者完全可以说，分析历史并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97—698、703—704和706—707页。关于国民党所使用的策略，有一个很有趣的旁证材料，即宋子文企图以赫尔利本人建议的形式提出国民党的反建议——它同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协议草案毫不相容。赫尔利拒绝这样做。

②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722—726页。

③ 赫尔利曾在1943年11月就有关中国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对重庆作了三天访问。赫尔利1944年8月使华之前只同罗斯福总统进行了一次谈话，同国务院人员进行了一次会谈以简要了解任务。他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作为助理人员的陆军军官（爱德华·J·麦克纳利上校）和一名中士速记员。华盛顿曾（错误地）设想他在重庆会同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密切合作。

参考最近出版的有关文件，当然1944年和1945年的事情在今天看来要比在当时更为清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我认为，档案记载（包括库比克博士选的文件集，特别是内容非常广泛和有代表性的《外交关系》1944和1945年两集中有关中国的两卷）将表明，相当多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在国务院和驻外机构的）当时就已看到这些问题，并确曾试图让人们注意它们。^①

赫尔利的第一个错误见解是，争取实现中国统一的首要内容是加强对日作战的军事能力。迟至1945年1月31日，赫尔利还坚持说：

我们是在同残酷无情的敌人作战，在我看来，这就证明我们试图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帮助我们打败敌人的行动是正确的。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统一，至少将获得相当于美国全副武装的一个军的战斗力。中国军事力量统一的效果值得美国给予它比以往更多的重视。^②

的确，在1944年8月赫尔利被派往中国时，日本人正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它有使中国的战争努力遭到削弱或完全被摧毁的危险。但是，这次进攻——日本在中国所作的军事上的最后挣扎——在12月到达了顶点。到赫尔利作上述报告时，日本人正在后撤；并且如我们已看到的，德黑兰会议的结果表明，不再需要中国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任何重要

① 库比克博士那个概述历史的导言在参考和引用文件方面有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他仅在一处引用了《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见《美亚文件》第24页注释39），而全然没有提及《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该书于1969年出版）。

② 赫尔利1945年1月31日致国务卿的第141号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92页）。

作用。国共两党(以及除赫尔利之外的大多数美国观察家)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是日本失败后中国将出现的局势。

此处应该承认，这一点已被下列事实搞得不那么清楚了：即在这个时期，除赫尔利外，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其他人也认为加强作为短期目标(即更有效地进行战争)的军事能力是可取的，因为这是实现重要的却是很不相同的长期政治目标(即阻止内战发生、避免使中共依附苏联、并在战后实现统一和稳定)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完全(正确地或错误地)相信，美国在战争期间的政策主要是建立在军事考虑之上的。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除非能表明与战争直接相关，否则就将被置之不理，很少能传到华盛顿制定政策的人们耳朵里。

赫尔利的第二个错误见解是，两党的政治解决不难实现，因为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没有根本的不同。这是赫尔利极为喜爱的论点，他多次论述过它。举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有两个基本事实正在显示出来：(1)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斗争；……(2)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人专政的政府，实际上不是法西斯，它也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斗争。^①

在此需要再次说明，这不是刚刚抵华的赫尔利的报告：他到中国已经整整五个月，他花了其中四个月的大部分时间

① 赫尔利1945年2月7日致国务卿的140号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11页)。这是一份分为四部分的电报的第二部分。此电是赫尔利在谈判开始了三个半月之后，第一次给华盛顿作的一个关于谈判的大事记性质的综合性报告。这份报告事实上是在重庆大使馆人员经过长期努力，使他确信这种报告是必要的之后，才由他作出的(同上，第732—734页)。

同国共两党谈判。^①作为一个美国律师和政界人士，赫尔利饱受法律保护、宪政、民主这些美国政治传统的熏陶，所以自然认为中国的问题能够用采纳美国的法律公式和政治原则的办法来解决，比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实施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权等等。这一点在他于延安开始起草五点协议（他一直认为该协议是解决国共问题的“公正”的基础）时已经表现出来了。赫尔利必须具备的但很不幸恰恰又是他所缺乏的是，他对自己已陷入的那个沼泽地的地理情况应该有个基本了解。更为具体地说，如果他了解了下列起码的情况，对他是会有帮助的：

1. 过去四、五十年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

2.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训政”理论，它是国民党声称有权垄断政权的理论基础；

3. 蒋介石虚弱政权的性质及其构成，以及蒋介石为维持这一政权而操纵控制各政治派别、军事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的危险而高超的手段。

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熟悉的唯一意味深长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教训可用一句老话加以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蒋介石心目中的首要

① 赫尔利既不读文件也不好好听人讲话。他眼睛不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任务之一是给他朗读电报或其他冗长的报告。同他谈话总是听他滔滔不绝地独自，例如，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当时是众议员）1944年11月访问了中国。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提到：“我见到了帕特·赫尔利少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谈了2小时47分钟，我谈了13分钟……”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8页）。如果国会议员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一个小小的二秘能有多少机会。

问题是控制共产党军队。这在9月15日蒋介石与高斯大使的会谈中已经表现出来。高斯大使在关于此次会谈的报告中说，蒋介石要求“最重要的是，我(即高斯——译者)要使林(即林祖涵——译者)明白，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服从在委员长领导下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原则……”。^①这正是11月7日赫尔利带往延安的那份曾得到国民党同意的五点协议中的第二点。^②共产党凭借1944年底已获得的实力，哪怕仅在原则上也决不会同意这种要求，除非他们在预定将控制这些统一的军队的政府中占有重要席位。这就意味着名符其实地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局面。蒋介石根本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确实，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招来灾难。^③所以，兴高采烈地从延安返回的赫尔利被宋子文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共产党欺骗了你，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提出的要求。”^④虽然赫尔利不断提出要求、起草信件、派代表往返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但谈判实际上从未打破这个一开始就出现的僵局。

赫尔利好象从未明白他试图拉到一起的两个党从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以前确曾成功地充当过调解人，例如曾设法使墨西哥政府为它将美国在墨西哥的石油企业国有化一事而向美国赔偿损失。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每一方都期望最终获得最高权力，它们仅仅对有助于达到这个目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73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666页。

③ 包括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的过程和今日的台湾情形在内的历史，都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极不愿意接受赫尔利的下列建议，即国民党同其他党派分享政权，或是实施法律保护和政治权利。

④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95页。

的政治解决方案感兴趣。国民党的立场实质上是：“你们投到我们一边来，然后我们按自己的条件实行改革。”对此，共产党回答说：“答应按我们的条件实行改革，我们才会考虑参加你们的政府。”问题的关键是对军队和共产党统治区的控制权。这一点双方都不能让步。

掌握在斯大林手中

赫尔利第三个错误见解是，苏联全心全意地同意并答应支持赫尔利所解释的美国对华政策。赫尔利这一信念是以他1944年8月同莫洛托夫的会谈为基础的，当时他正在赴华途中。这一信念在他1945年4月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第二次会谈中得到了加强：①

……请把他们〔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区别开来，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如我昨天已陈述过的，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委员反复告诉我，俄国……根本不承认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据我所知，在我们所经历的整个变化多端的时期中，他们对我是说话算数的。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俄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俄国不希望中国分裂和建立两个政府。俄国希望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和协调的关系。

自从我与莫洛托夫先生和斯大林元帅会晤以来，俄

① 1944年的访问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153—259页。1945年的访问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38—340页。再参见哈里曼大使和乔治·M·凯南所作的谨慎的评论（分别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41—342页和342—344页）。

国同中国缔结了中苏条约，并互换了正式承认中苏条约所有协议的证书。

我看到一些报道，说苏联做了某些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的事情，但坦率地说，我没有发现使我相信这是事实的证据。我相信，美国和苏联在对华政策上仍然是一致的。^①

赫尔利对其观点所作的这个特别声明饶有趣味的特征之一是，它表明，他直到1945年12月6日还在坚持这一观点，而此时，他已经辞职，结束了他的谈判，苏联则正在占领和劫掠满洲，大规模内战已在中国进行。或许，在努力使国共两党走到一块时碰到的始料不及的困难使他更加确信：苏联的影响是关键所在，苏联采取友善和支持的态度将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于国民党的条件。这导致他陷入矛盾之中，他违背华盛顿关于优先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观点，放弃了他自己关于共产党力量强大的看法，最后竟然要求——但没有效果——美国公开发表支持其立场的政策声明。

首先，赫尔利显然从未看到他下列两个信念之间存在的逻辑矛盾：他既相信中共“根本不是共产党”，也完全没有得到苏联任何形式的支持、承认和鼓励；同时又坚定地相信中共肯定会顺从地接受苏联领导人的提示、告戒和指挥。

我们确信，苏联的影响将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共不相信斯大林已经同意或将要同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没有苏联的公开承诺，中共将不会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②

① 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的证词，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政策调查》（油印稿，1945年12月5、6、7、10日）第130—131页。

② 赫尔利1945年7月10日致国务卿的1139号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431页）。

这必然使赫尔利认为，在中苏条约上写明苏联不支持中共之前，中共是不会领悟现实的：

中共仍然认为苏联支持他们，在苏中之间签订一个表明苏联同意支持国民政府的条约之前，没有任何东西会改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共产党的领导是聪明的。当不祥之兆出现时，他们不会视而不见。再多的争辩也改变不了他们的立场。只有事物本身不可抗拒的发展才会使他们改变态度。①

另一方面，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始终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先同中共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要求就更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一点正是赫尔利从罗斯福那里得到的有关他谈判的唯一一份电报的主要内容。

我希望你以我的名义秘密告诉委员长，我认为，在委员长和华北军队之间作一富有成效的安排，将会极大地加速实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目标。这也是俄国人的意见。我此时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但他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对他强调“俄国人”这个词。②

不知是为了作到言行一致，还是因为他日益不同意美国关于中国事态的官方报告，并由于愈加接近蒋和宋子文这样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432页。

② 罗斯福1944年11月18日致赫尔利的123号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03页）。可以推測雅尔塔会议的准备工作当时已在进行之中。有很多更为明确的声明表明，华盛顿认为国共协议应在中苏条约前达成。例如：

再者，总统致委员长的一份电报中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先同中共达成一项有益的安排，这将极为有利于中国代表和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此电是作为国务院7月14日第955号电发给驻华大使馆，并由大使馆转给委员长的…（格鲁1945年2月6日致赫尔利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852页；总统致委员长电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45页）。

的国民党人士，赫尔利逐渐改变了他自己早先关于共产党的实力和重要性的观点。当然，这种变化并没有得到来自延安美国观察组的报告的支持。在中国实地工作的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有时还发表意见认为，共产党正在稳步地增强力量和扩大领土，换句话说，时间有利于他们。赫尔利从认为国共军队统一会增加相当于“美国全副武装的一个军的战斗力……值得美国给予它比以往更多的重视”，^①改变为贬低共产党的力量：

中共武装部队的力量被夸大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被夸大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人数被夸大了。国务院官员、陆军军官、报纸和广播电台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说法。^②

中共的力量并不会因赫尔利的愿望和报告而改变。在这种执意把同苏联先达成协议作为使中共就范的手段的作法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它把选择时机的主动权交到斯大林手中。但斯大林并不着急，他不愿意在重庆政府知道有关中国的雅尔塔协议前同它谈判。但是，由于雅尔塔协议也使苏联承担了参加对日作战的义务，所以斯大林坚持，要到德国被最后打败，苏联能够调动足够的兵力到满洲前线之后，才可将雅尔塔协议告知蒋介石，理由是害怕重庆泄密，使日本人对西伯利亚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所以，他直到1945年7月1日才接待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中苏条约直到8月14日才

① 见本书第100页注②。

② 赫尔利1945年7月10日致国务卿的1139号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432—433页）。

签字，8月27日才公布。赫尔利3月份就获悉了雅尔塔协议，所以他也知道有关推迟告诉蒋的原因。尽管他认为国共协定首先是为有助于抗日战争，但他（和蒋介石）实际坚持推行的行动方针，使国共谈判在日本战败和内战爆发之前实际上无法进行。^①

赫尔利采取的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集中于向被“过分夸大”了力量的中共施加压力。此处我所关心的，不是要证明这种战略是不是现实（虽然它确实不现实），而是要指出赫尔利使自己陷入了很多很少有其他选择的困境。赫尔利首先采取的步骤是，拒绝任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和公开向所有的人宣布他的使命是“支持”蒋介石。他接着采取的步骤是，以特别的方式开始谈判，以及继续反复重申他采取的每一行动都“得到了委员长及其内阁成员们的同意、启发和指导。”^②这些愚蠢和多余行动，在赫尔利同蒋打交道中，牢牢地束缚了赫尔利的手脚。1944年11月，赫尔利表示：“如果谈判失败，那将是政府的过错，而不是共产党的。”^③1945年5月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私人报告中仍然表示，他认为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合乎情理地”克制着自己。^④但在倒向蒋介石一边之后，他就只能亦步亦趋了。

① 然而，应该承认，当时无人知道原子弹及其成功的使用将戏剧性地摧毁预计日本会采取的最后抵抗。

② 赫尔利1944年12月24日致国务院的报告（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47页）。这句话以一定形式出现在赫尔利的大多数报告中。“内阁”也许是一个美国式的词汇，而不是对蒋政府情形的真实描述。

③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93页。

④ 赫尔利1945年5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07—114页）。

美国人“一致行动”

要使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中共产生有效的压力，那么美国方面必须配合，采取同样坚定和一致的行动，这在逻辑上是至关重要的。于是，赫尔利日益强调下列论点：美国的政策是只援助和支持委员长和国民政府；不能承认或支持中共或其他集团，除非它们承认国民政府的执政地位；没有委员长的事先同意，不能与这样的集团进行军事合作，不能向他们提供武器、援助或其他支援，连讨论这些问题也不许可。

由于在华美国人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致，所以采取了有力的、激烈的措施以求实现一致。虽然魏德迈将军在使国民党军事组织活跃起来并同它合作的问题上，不久就得出了某些同史迪威观点差别不大的看法，但他很快决定，把“政治”问题留给赫尔利将军处理将是明智的。^①曾在史迪威将军下面工作过的参谋官员有些被调出中国战区，其余的则被调去训练部队和做其他非政策性的工作。^②严禁美国陆军人员讨论任何中国政治事务。^③在陆军工作的外交官被调

① 可是，魏德迈将军似乎并不同意赫尔利的观点，他不象赫尔利那样相信通过挑拨（以及同俄国订立一项条约）的作法会成功。在1945年7月9日致马歇尔将军的一封信中，他说：

如果山姆大叔、俄国和英国紧密团结，通过同迫国共双方作出实际进一步来努力实现这两个政党的联合，就可以消除严重的战后动乱，就可以实现及时有效地使用全中国的军事力量来抗击日本人。我之所以经过考虑使用胁迫一词，是因为我相信，以礼貌的外交辞令来继续向双方呼吁，将不能实现统一。三大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见罗曼纳斯和森德兰，《中国战区形势危急》第383页。）

我认为，可以推测魏德迈将军考虑的是联合政府而不是“这两个政党的联合”。魏德迈关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的某些观点可参看上书第52—53页。

② 例如包瑞德上校。参看《迪克西使团》第78页。

③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33页，要求每个美国官员签署一份声明，说他已读过并理解了此项政策。

离（不久前魏德迈还紧急请求让他们继续在军队工作），将由赫尔利提供所有的政治咨询。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地位被降低到收集日常敌情和气象报告。^① 随着德寇占领国家的解放，在欧洲敌后同游击队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合作过的美国老兵大批闲暇下来。但是关于在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和华东广大重要游击区如何发挥他们作用的问题，则全然不受置理。^②

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此时经历了可能是最大的动荡。首先，大使馆主要配备的是身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官员。他们不仅在中国呆了多年，而且还在纳尔逊·詹森和高斯大使这样的职业外交官领导下接受过训练，詹森和高斯坚信需要全面的、畅所欲言的和客观的外交报告。最近几年，国民党为掩饰自己的缺点，逐渐认为任何长期呆在中国、能说和能看中文的美国官方人员都是可疑的。赫尔利现在持同一看法，没有在中国服务过、或至少最近没有在那里服务过，已成为一种有利条件。这被叫作“引进新颖的、没有偏见的观点”。根据赫尔利的要求，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和大多数负责草拟报告的人被召回美国。^③ 新的最高下属是一个在拉丁美洲工作

① 观察组指挥官包瑞德上校的一位后任获悉，陕北山区盛产野鸡（共产党大概是为了其它目的保存弹药而不打它们），打野鸡成了一项比同毛泽东这样的危险人物谈话更为安全得多的工作。

② 战略情报局曾讨论过在中国共产党区域里使用这些敌后小组的可能性问题，但所得结果十分令人遗憾。包瑞德上校对此事有所描述，请参看《追克西使团》第76—77页。

③ 从赫尔利的观点来看，这些官员大多数都犯有不服从命令、搞破坏活动和对上级不忠诚的罪过。因为在赫尔利回华盛顿述职、乔治·艾奇逊任代办时，他们联名给国务院发了一份电报，此电建议采取新的、较强有力的办法，打破国共僵局，因此可以推知，它批评了赫尔利一直在实行的策略和政策（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42—246页）。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对此电作进一步的评述。

过的老外交官，和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有绅士派头的(能干的)银行家，后者自愿在战争期间为政府服务。大使馆的报告变得比较拘谨和范围狭窄了。报告坏消息的官员们认识到，他们的机密报告可能会由赫尔利转给宋子文一类的中国官员看，这样就会危及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中国人士。有些人被大使召去，当着宋子文的面遭到粗俗语言的严厉训斥。^①在远东司给副国务卿格鲁和国务院行政首脑助理国务卿霍姆斯的一份备忘录里，表达了华盛顿对此种情况的看法：

……在赫尔利将军访问华盛顿期间(1945年3月和4月初)，他的议论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极为怀疑和讨厌在华的外交官员。这种厌恶感已为从重庆回来的官员们所证实。这些官员表示，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了他们和驻重庆及其他地方的外交官员的士气。结果，越来越难于劝说在赫尔利将军手下工作过的外交官员返回中国。赫尔利将军对驻华官员的政治报告强施严厉限制，性质同样严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赫尔利将军已经下令，只有有利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报告才可以转送国务院。这意味着，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国务院收到的情报将是受限制的和不完全的。显然，我们不能再指望收到关于局势所有方面的确切和客观的报告，而国务院

① 有一类报告好象特别易于激怒赫尔利，这是关于1945年夏季国共武装冲突到处蔓延的报告，其中包括共产党数次声称缴获了美国提供的武器。也许是由于魏德迈将军下了“美国物资”不应用于中国内战的命令，使问题更为敏感。可参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406—410页。其他扣压报告，或者威胁写报告的官员的事件，是这个时期在重庆工作的官员们众所周知的。

如果要明智和成功地处理对外关系，则非有这种报告不可。无庸赘言，这些限制极大地挫伤了士气，并在有中国事务经验的外交官员中间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当前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严重失当。^①

新闻界也没有被放过。当时在中国的是一批经验相当丰富和颇有能力的新闻记者，其中有白修德、贾安娜、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理查德·瓦茨、伊罗生、A·T·斯蒂尔、约翰·赫西、达雷尔·贝里根和杰克·贝尔登这样一些著名记者。赫尔利很快发现，这些记者大多数也怀疑“我（赫尔利）所负使命”成功的可能性。^②由于无法将他们撤换（虽然他们中许多人自愿离开了中国，去写在国民党的严格新闻检查下不可能发表的著述），赫尔利便调来了一个经过他亲自挑选的新闻官（他没有做过外交工作，也没有在华工作的经验），并在幕后活动以使友好的记者得到访问和派驻中国的机会，这些记者因被邀请同大使住在一起而受宠若惊。^③同时，中国首席新闻检查员（他实际上是受国民党而不是国民政府领导）对他遵循的政策做了如下的官方说明：

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机构不允许发出任何破坏（美中）两国政府友好关系的消息。赫尔利大使代表美国总统

① 《外交关系 1945年》，第7卷，第349—350页（重点号是原有的）。起草者是次德温·F·斯坦顿，他从1946年到1953年任美国驻泰国大使，此后便脱离了泡漫长的外交生涯。

② 参见赫尔利泡尼白修德的备忘录（没有解释为何这样做）（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5卷，第673—674页）。

③ 亨利·J·泰勒是访问者之一。关于赫尔利未能成功地为亨利·卢斯——他“一惯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政策”——安排一次访问之事，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42—143、147—148页。赫尔利大献殷勤的另一个次要目的，是想尽量减少访问者与记者招待所的常驻新闻团体相接触。

统和政府，因此，任何美国人在在中国境内对他进行攻击的言论也不允许发出。①

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封锁有关共产党和他们活动地区（华北的大部分）局势的消息。它采取的措施包括严禁到共产党地区旅行。由于先允许一个新闻代表团，其后又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这个旅行禁令在1944年春夏最终被打破了。为了向观察组供应物品和提供邮政及其他服务，一架美军总部的飞机开始基本定期地飞往延安，并在那里停留一夜。在飞机内有空位时（经常如此），总部就很慷慨地允许记者、高级官员和其他美国在华机构的代表，利用这个工具对延安作短期访问，有时甚至让他们呆在延安直到下一班飞机到来。赫尔利在1945年春又加强了封锁：从而使封锁不仅是中国方面的事，也成了美国方面的事。陆军答应，没有赫尔利的明确同意，不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赫尔利还亲自审查那些他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② 然而，赫尔利的封锁有双重目的。他同国民党一样，想防止对共产党“有利”的消息从那里传出来。而且，他还疑虑日增，担心共产党通过同美国人接触，可能会看出，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按赫尔利自己那种铁板一块的观点看待美国政策。这种封锁组成了一个极为严密的防疫圈。

于是压力增大了，美国方面某种形式的一致行动实现了。但已存在了好几个月的僵局仍在延续。也许因为意识到自己处境孤立而不自在，赫尔利开始希望华盛顿发表一项声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暴风雨》，策249页。

② 战略情报局曾企图派一名经验丰富的代表到共产党游击区从事心理战方面的工作，但未获成功。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格雷厄姆·佩克《两种机会》第一版未删节本（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年版）第638—642页。

明坚决支持他的政策。^① 华盛顿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华盛顿并未同他站在一起。与此同时，赫尔利查阅档案，希望能从有关政策声明中获得安慰和支持。他能找到的最好东西是赫尔国务卿在1941年11月26日与日本驻华盛顿代表谈判时提出的一项条件：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支持除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的中国任何政府或政权。^②

赫尔利不管这个声明与1945年的中国局势是否有关，便抓住这根稻草不放。^③ 此后，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宣称这是“最近一次公开宣布的美国对华政策”。^④

① 赫尔利1945年12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多次提到他曾希望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支持他的政策声明（参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政策调查》，特别是该材料的7、8、14、40款和注40）。可是，赫尔利于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要求作此种声明，档案记载得不清楚。

② 见洛贝克《赫尔利传》，第423页。赫尔利从未注意以下事实：（1）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政策声明；（2）所以具体说明“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为了区别于日本人扶持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政府以南京为首都。

③ 参见他1945年5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电（此电竟以长辈口气说话，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10页）。

④ 当然，从1941年11月到1945年年中这段时期，有大量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赫尔利如果要这样选择，他甚至可以从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1942年10月12日对厄尔·白劳德作的时间更近的声明中找到支持：

……本政府希望中国统一，反对中国内战；本政府平等对待中国政府；它不支配中国政府；它不把美国的友谊作为交换条件；它认为中国内部的团结，美国内部的团结，盟国每一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盟国之间的团结，对于有效地进行反轴心国的战争，对于盟国在获得必将属于它们的胜利时创造和维持公正与和平的环境，是完全必要的（见《外交关系，1942年，中国》，第248—249页）。

再 次 失 败

经过长期等待同苏联达成一项条约之后，结局终于到来了，共产党令人惊讶地拒绝正视“不祥之兆”。^①事实上，整个局面是不可收拾了。显然，这深深触及了赫尔利的自尊心，但反省似乎不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点。他一直确信国共两党有相似的目标，实际上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②而且赫尔利已经得出共产党弱小而非强大的结论，那么，共产党决心向国民党挑战（除了赫尔利以外的所有人都说共产党会这样做），并且宁可战斗而不屈服，看来就不合情理了。最后，他还有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亲自保证。共产党这种违反常情的特殊作法一定有某些其他解释。没有什么人受到指责，除非是那些外交官和国务院，特别是那些被赫尔利挤出中国的人员——他们在很久以前曾同赫尔利一样希望中国实现统一，但又曾徒劳地试图指出使赫尔利碰壁的某些很实在的障碍。^③

赫尔利企图在国共之间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多半是他自找的工作。关于这并没有越出他所接到的命令或指示的明确范围的说法，看来是不可信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赫尔利。他正确地认识到国共问题是主要问题。但是，要靠他采取的僵硬的方法和立场，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① 见本书第106页注①。

② 赫尔利在几乎每一次会谈中，总是自信地坚持他已使两党达成协议的距离缩短为“这么近了”（伸出拇指和食指划出大约一英寸的距离）。关于毛泽东熟知这一结论和对这一结论的看法，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73页。

③ 大使馆参赞乔治·艾奇逊曾向赫尔利保证：“据我所知，使馆全体人员没有一个不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你谈判成功的……”（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91页）。他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无疑的。

在赫尔利视而不见的、但已在中国蓬勃开展的革命面前，他的能力、耐心和决心全都无济于事。结果，就使赫尔利漫长的社会活动生涯以辛酸、挫折和失败而告终。

院外援华集团把赫尔利使华时期看作是中美关系的高潮，库比克博士和台湾政府显然今天仍然这样看。而对于学者来说，从美国是否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处理其外交事务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个低潮。讨论“谁丢失了中国”毫无用处。中国从来不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也无从丢失（库比克博士一类的美国人说中国是我们的。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就会对他们这种说法感到气愤）。但是，赫尔利的愚蠢和顽固使我们和中国失去了时间和机会。失去的时间是，战争的最后也是最关键时期处于僵局的那十个月。失去的机会是，寻求更现实的方法防止或缓和内战，并保持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即使不能象我们曾希望的那样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至少也不成为死敌。

第六章

华盛顿坚持灵活政策

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传统始终贯穿于美国对华政策，它显然起源于海约翰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自我夸耀）的一件事。但是，1945年与1900年的情况极为不同。

赫尔利在开始为其政策辩护时争辩说，海约翰“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实体”这句话的含意，只能意味着美国必须支持和维护蒋介石——他是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的首脑；因此，除非得到蒋介石本人的同意，不能同中国国内其他各派力量进行军事合作或给它们以军事援助。^①

国务院对此并不象赫尔利那样肯定。美国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寻求租界和势力范围，从而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帮助中国应付这一外来威胁。美国的意图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是，这些门户开放照会坚持实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它们实际上说的是其他国家不得以实际上危害或可能会危害美国在华公民利益的方式干涉中国。可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门户开放政策逐渐具有了美国保持在华均势政策的某种性质。然而，

^① 参看洛贝克《赫尔利传》，第247—248页。赫尔利竟然认为此项美国政策“是我们对日作战的直接原因”（同书，第423页）。

这并不是赫尔利试图援引它的那种意义。他援引它是为了论证美国在有关中国内政方面的方针应有局限性。对美国政策来说，日益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革命。中国政府作为我们对日战争的盟友正在（十分正当地）得到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军事援助。但是迟早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坚持认为，这种仅给予一党的援助，确实达到如我们所希望的不干涉和不介入中国内政的效果。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变得明朗化。

例如，1942年10月，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引用了一份文件，想借此文件指导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准备答复厄尔·白劳德提出的一项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质询，这份文件正是海约翰1900年作的政策声明。远东司从此文件中得出了如下结论：“不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本政府的作法。”^①

1943年1月，我临时被召到国务院磋商问题时，给远东司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它可能是想引起注意这一问题的最初尝试之一：

国 共 局 势

在过去十八个月里，我在重庆或是到中国的西南和西北旅行，从这段经历中，我得到了一个突出的印象，即应该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之间正在扩大的分歧进行极为仔细的研究。

“统一战线”现在确已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了。只

^① 《外交关系，1942年》，第250—251页；还可参看本书第114页注②。可以指出，韦尔斯先生在其给白劳德先生的答复中还有点创新。他没有援引门户开放政策中关于在华外国人享有均等贸易权这一次要意义，而是强调各国应该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中国。

要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只要国民党现有军政领导人继续掌权，就不可能看到任何恢复统一战线的乐观前景。局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正在恶化。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各地，国民党对军民的政治灌输，以及秘密警察和宪兵的活动，都把反对共产主义当作全力以赴的当务之急。国民党不仅严厉查禁其含义日益扩大的“共产主义”的事物，而且似乎有连政府的民主外壳也要抛弃的趋向。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内战能否避免，而是它能否至少推迟到战胜日本之后。

这一分裂的危险及其牵涉到的问题是显而易见和影响深远的。从军事上看，目前的局势对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除了同战争直接有关的方面外，这一局势牵涉到的政治问题也相当严重。即便能暂时防止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但日本的最后战败和撤退，仍将使国民党面临着同牢固盘踞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甘肃东部、陕北、察南、河北、山东、苏北和皖北）的共产党相对抗的局面。此外，共产党还能填补因日本人撤出绥远、热河和满洲而造成的真空地带，在所有这些地区已有共产党人在那里进行活动。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共产党将获得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同情。在中国，这些人数量难以确定，但影响很大。国民党害怕他们的力量，害怕共产党在国统区成功地坚持斗争的地下组织的力量，这一事实已从国民党各类特务组织的规模和活动中表现出来。

但是很可能，共产党拥有的最大潜力，在于他们控制着日本人后方的华北农村地区，这也是何以反对他们

的军事行动在目前不会完全有效的原因之一……

我熟悉的非共产党中国人（例如已故《大公报》著名主笔的侄子）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能发生内战。他们指出，共产党现在比过去在华中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十年内战时强大多了：如果他们确实已在游击区成功地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他们将会变得更为强大。他们举了最近发生的大量事例说明，共产党成功地渗入与其对立的中国军队（诸如阎锡山的军队），并成功地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思想。他们担心这种情况会导致国共斗争的延长，并使国民党、或使国共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毫无疑问，无党派的普通中国人对重开内战极为反感。国民党对其所征募来的士兵的忠诚和战斗力也的确难于保证。

最终肯定会爆发内战的信念使这类中国人提出疑问：美国是否对中国将来的民主前途作了充分现实的考虑？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过去的经验判断，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大量军事物资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用于抗日战争，而会用于内战，以达到用武力强行“统一”中国的目的。这种情况对中国是否有利，还是对美国自身的利益有利？这些中国人还推測，如果内战果真爆发了，可能布署在中国（支持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军队会采取何种立场？他们还想知道，俄国会是什么态度，特别是如果它在中国内战爆发时已成为盟国战胜日本的伙伴；它将采取什么态度……①

1943年1月23日

在发生了后来的一些事件后，再去回忆该备忘录所引起

① 《外交关系，1943年》，第93—109页。

的惊愕和反对的浪潮几乎是可笑的（该备忘录还鲁莽地提出了某些建议，包括建议美国政府应明智地派遣一些观察官员去延安的，以试图弄清中国的那一部分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大概是第一个有关派观察员去延安的书面建议）。当时主持远东司的首脑人物（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特别是在远东司长期任职、独断专行的斯坦利·K·霍恩贝克）已有很多年没有去过中国。在他们的头脑里，仍旧充满着令人激动的关于中国英勇而单枪匹马地抵抗日本、以及关于带来希望但却短命的1937年至1938年间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我在备忘录中提出的观点被看成是轻率、夸张和“不成熟的”，因而被置之一旁。^①

对中国而不是对国民党承担义务

到了1944年5月，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势发展和动向已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在总统决定采取断然步骤，要求任命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之前约六个星期，以及在赫尔利将军被派往中国以实施此决定之前三个月的5月19日，国务院中国科准备了一份美国政策概要，这份文件特别与中苏关系有关。远东司（那时已换了新领导人）批准了这份政策概要，并将它提交给国务卿。该文件中有一部分是值得注意的：

美国承担着与中国并肩对日作战和在反侵略战争中

① 对我的备忘录的某些（但不是所有的）不满情绪，由于印在《外交关系，1943年》（第199、201、203—208页）之中，仍然能够看到。霍恩贝克先生（在上书第201页的备忘录中）对我的备忘录所作的评论，比起他在我的备忘录原件上作的评语要温和得多。《外交关系》的编辑们明智地略去了这些评语。霍恩贝克先生说，我们应该“对强调中国‘共产党’军队力量的报告持明智的怀疑态度”。在我的备忘录中，肯定没有任何内容表露出共产党人一词加上引号是恰当的。

扩大对华援助的义务。尽管如此，它并不承担在任何和一切情况下支持国民政府的义务，并且一般地说，不赞同联合国某些成员国之间的互相猜忌，或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全体成员国共同利益的企图。对于中国的内部问题，可以说美国并不关心中国敌对集团之间的主义问题。总的说来，它希望看到能增进中国人民普遍利益的计划取得成效，而不考虑实现这个计划的那个中国团体的政治色彩。美国政府坚定地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中得到更多的公正待遇和利益并更充分地参与他们的政府。①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国务院积极地关注着华莱士副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并支持前面已叙述的高斯大使关于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建议。随后，赫尔利到达重庆，他在安排史迪威指挥权的使命遭到失败后，便立即开始独立活动，以图通过谈判促使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协议。赫尔利很快当了大使，而国务院却在以后的一段时期的中国事务中仅仅充当了旁观者。如果说旁观者起码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着什么，那么，这里用“旁观者”一词的就很难说是恰当的。赫尔利认为他只有向总统汇报的义务。并且，正如已经指出的，他是断断续续、杂乱无章地提出报告的。②实际上国务院基本上不了解谈判的细节以及赫尔利参与并指导谈判的含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92页。文件的副本被送往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和在重庆的高斯作为行动指导。这一事实表明，此文件代表了国务院当时的思想（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42页）。

② 赫尔利也很喜欢轻声笑着说他非常了解总统，知道他“喜欢”收到国务院没有的情报，以便他能“使他们显出无能相”。

混不清的根据。①

1944年12月，赫尔利曾希望回美国做短期逗留，于是安排了一架专机（虽然他的前任总觉得乘坐空运司令部的定期班机旅行是方便可行的）。飞机到达时，赫尔利又以若干理由（包括他的大使委任状未到、“共产党军队领导人”与国民政府之间未达成协议，以及毫无道理地担心“由于我的离去将可能产生出许多谣言”）决定取消这次旅行。他给斯退丁纽斯发了一封私人电报——斯退丁纽斯最近刚从副国务卿升为国务卿，赫尔利同他是老关系，可以称他为“亲爱的爱德”——解释了他的决定，并作了如下声明：“我渴望去华盛顿向总统、你和陆军部汇报……”②

国务院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并很快采取行动加以利用。它以斯退丁纽斯的名义迅速发出复电：

我理解你推迟华盛顿之行的理由，虽然我很遗憾这将使我不能及早从你那里得到第一手情报，我还是同意你的决定。同时，如果你能机密简要地电告你原打算当面陈述的有关形势的报告，我将不胜感激。③

赫尔利陈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理解

国务卿的电报显然击中了要害。赫尔利终于“承认”了

① 大使馆11月13日和24日的电报（分别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90—691页和715页）表明，国务院通过正式渠道获得的情报极为贫乏，并且大多是二手材料。已发表的档案材料似乎表明，白宫实际上也没有获悉更多情况，但至少它有机会能偶尔直接从赫尔利那里听到情况。

②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10页。关于“亲爱的爱德”，见同书第200—202页。

③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44页。

国务院，寄去了说明他试图在中国要完成的使命的第一份报告。这份电报在后来有重要意义，因为赫尔利在电报中陈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

在我的全部谈判中，我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

- (1) 防止国民政府崩溃。
- (2) 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
- (3) 协调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 (4) 促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 (5) 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

这就是我的使命的概要。^①

中国科向国务卿提交了它对此电的评论，现摘录如下：

附呈的赫尔利大使12月24日电除了重要的背景材料之外，还包括了新的情报。

大使概述的他的五点使命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就对待中国政治局势的态度而言，我们应保持充分的灵活性，以免一旦蒋介石及其政府被推翻时我们将陷入困境，同时使我们在出现此种情况时能立即采取步骤支持最可能继续进行抵抗的分子……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45页。洛贝克（在《赫尔利传》第310页）就是引证赫尔利的这一理解作为华盛顿任命赫尔利为大使时给他的“新指示”。可是，对第一点，他加上了：“并使中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他还增加了一个第六点：“支持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的愿望。”洛贝克声称（见同书第497页注释3）。赫尔利“要求国务卿把应对此指示作的任何改动通知他”。发表在《外交关系》上的文本并不包含这样的询问和要求，《外交关系》也根本没有说此文件是不完全的。

……我们在考虑和规划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重庆的统治可能进一步崩溃这一因素。^①

国务院决定用平淡而含糊的语气答复赫尔利将军的第一份报告：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感激的心情读了你12月24日电报和12月6日信中对中国当前形势的报告和分析。你提供给我的情报以及你对之所作的评论，就你所面临的、并正以你特有的饱满精力和敏锐为之寻找解决办法的问题，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见解。中国在目前和战后时期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你会不断为我提供充分的情报，……祝新年好。^②

我之所以详细地叙述这个插曲，因为正是这些往来电报——赫尔利12月24日的报告和斯退丁纽斯国务卿1月2日的复电——多年来一直是包括库比克在内的某些人所坚持的下述论断的根据，即国务卿和总统未对赫尔利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概念“提出质疑和进行修正”。赫尔利以及同意他关于这个时期的解释的人们，把华盛顿没有对赫尔利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作出反应一事，看作是华盛顿对赫尔利的这一理解的明确批准和同意。^③赫伯特·菲斯恰当地把国务卿对赫尔利电报的评论归纳为“软弱的”。他说，国务卿的评论表明，国务院和白宫对于“在这一关头”采取什么态度才是处理中国内部争吵的上策，“没有把握和犹豫不决”。然而，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50—751页。

②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15页。此处提到的赫尔利12月6日的信是祝贺斯退丁纽斯担任国务卿的，它只是极简略地提到中国的情况，完全没有涉及国共谈判问题（同书，第200—202页）。

③ 可参见洛贝克《赫尔利传》第310页及第497页注释3。

他似乎使人得出这样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因此就很难责怪赫尔利继续推行他的政策。^① 菲斯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自然影响到许多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其他作者，他们过去没有接触到一般人只是在最近才能获得的那些文件。^② 最后，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如同菲斯也在以后指出的），^③ 赫尔利被告知华盛顿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关于无保留地承诺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事业这一点。既然这个插曲在有关文献中有着这样广泛的影响，就应把它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首先，国务院试图与新任驻华大使建立某种工作关系，否则它很难指望有一个有效地行使职责的大使馆。每位大使名义上都是为国务院工作，但他是由总统任命的，并且是总统的个人代表。这种混淆不清的责任界限，使国务院（常常）难于控制任意行事的大使。如果大使是因政治（而非职业）因素被任命的，则尤其如此。如果在职的总统喜欢抛开国务院来处理国家的对外关系，情况就更加严重。赫尔利出任大使这一事例使所有这些问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是一个极有魄力、妄自尊大的人，他对其使命设想得极为广泛，声称拥有总统直接授予的最彻底的全权，并在那一极为微妙和对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中，撇开国务院而完

① 《中国的纷乱》，第179、213、219页。

② 例如厄尔·莱瑟姆在《华盛顿有关共产主义的争论：从新政到麦卡锡》（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57页写道：

赫尔利没有得到他应如何与中共打交道的明确指示，甚至也没有得到任何说美国的政策是要使蒋介石继续控制中国政府的指示。虽然赫尔利对共使的解释是对美国政策的重大修改，但他的设想从来没有被反驳过。

③ 《中国的纷乱》，第292—293页。

全独立行事。○

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处理这样的情况有两种方法。其一是总统亲自提出问题并采取行动。但是总统现在的注意力

① 举一个例证也许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赫尔利于1944年11月前往延安之前，与高斯大使有过一次谈话。高斯大使在听了赫尔利的计划后，把他9月9日从国务院收到的关于与共产党人士作接触的指示（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67—569页）告诉了赫尔利。在此基础上，高斯建议赫尔利不要过于直接卷入试图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活动。赫尔利声称，他与总统之间有一项谅解，他可以做任何他认为有利于增强中国的作战能力的事情。他以此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高斯提出的建议。高斯11月13日的电报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到这次谈话（《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90—691页），但是11月24日高斯就已回到华盛顿。所以可以设想，到12月下旬，尽管没有赫尔利本人的报告，国务院已经对这位新大使的行动方式略有所知了。

这一事件后来还引起了一次反响。1945年2月，赫尔利报告说，中国人希望与苏联举行谈判，而且似乎还表示他也许能帮上忙（《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851—852页）。国务院的婉转的评论（同书，第852—853页）是：

“尽管我们一直渴望帮助中国政府，但我们不应让中国政府获得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准备在它与苏联的关系上承担作为它的‘顾问’的责任。”这份文件还提到了前面已叙述过的美国的观点：“如果中国政府先同中共达成一项工作协议，那么将极大地便利中苏代表之间举行会谈。”与此相关，它引用了1944年9月9日给高斯的“关于达成这样一个‘工作协议’的重要性”的电报。9月9日的电报对美国大使奉命在国共谈判中进行的调停活动的范围曾加以限制。虽然国务院未提到该电报中与此有关的那部分，但仅仅提及这份电报好象就触及了赫尔利的一根敏感的神经。他立即得出如下结论，即国务院意在批评他在目前谈判中起了突出作用：

在你的电报中，似乎把我在我这些谈判中的作用降低到仅仅是提出建议而不是贯彻建议的地位。这正是高斯大使向我转达总统和国务卿9月9日电报时采用的方法。如你现在所知，那份电报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是因为它未规定可以被积极贯彻……我认为，由于没有积极贯彻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地位被削弱了，我们的目标被推迟实现了。（《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29—230页。）

在其他地方。战争在欧洲和全世界进入了高潮，此外还将在马耳他和雅尔塔举行会谈，这类事情就已使总统应接不暇了。中国从史迪威被召回之后，就已被置于次要位置。第二个可能的办法是国务院在与总统协商之后采取主动。这样做需要有一条通向总统的有效的渠道，即某个相当熟悉世界事务，很能体察国务院的利益和它所关心的事，可以随意接近白宫，并且享有总统的友谊和信任的人。当然，萨姆纳·韦尔斯在他1943年底辞去副国务卿一职之前同总统有这样的关系。斯退丁纽斯不是一个完全能胜任这一工作的接替者。当赫尔利通过呈递他12月24日的报告表示了他将与国务院合作的倾向时，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头脑中肯定有这些想法。所以，尽管中国科的确提出要慎重，但国务院致赫尔利的复电的起草者显然断定，安抚性的（尽管是“软弱的”）复电是增强赫尔利目前想与国务院建立联系的愿望的适当策略。在这些起草者看来，他们的电报中关键的话无疑是：“我相信你将会不断为我提供充分的情报。”

然而，国务院1月2日电报所以不使用非难语气还有另一个考虑。这就是对华政策的争论还没有表面化这一简单的事实。赫尔利以笼统的措辞表述了他对美国政策的“理解”，直到一、两个月以后，当赫尔利由于其谈判陷入僵局，而开始在言行上清楚说明他自己对这样的措辞的最终解释和理解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和“支持蒋介石”时，华盛顿和赫尔利之间的政策分歧的轮廓才清楚地勾划出来了。关于国务院在这个早期插曲中未能“批驳”赫尔利的对华政策的思想，就谈到这里。

重申灵活政策

此后不久（显然是在1945年1月16日），陆军部长史汀生要求国务院就对华政策为他的部下和魏德迈将军提供指导。中国科在一月29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一份备忘录回答了这一要求。备忘录除提到与此无关的香港问题外，其它的要点如下：

美国政府的短期目标是帮助动员中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继续进行对日战争。我们正在运用我们的影响促成中国更大程度的政治和军事统一，并更有效、更大量地生产战争物资。我们正在向中国提供直接的军用物资和用于发展军工生产的物资。

我们在中国的长期目标是帮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与我们合作的国家，使它将来能为远东的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我们在华军事当局的任务目前应集中于实现上述短期目标。毫无疑问，与中国人合作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将导致中国军队在一定程度上重整军备，但是，我们认为，为了使中国可能成为亚洲强国而在此刻采取重新武装中国的措施并非切实可行。

在切实可行的程度内，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所有愿意抗日的部队能重整军备，但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所以采取给中共提供武器的措施是不明智的，尽管人们普遍承认他们能够有效地使用大量轻武器和爆破器材。然而，如果对日作战在中国沿海地带进行，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军事当局准备武装他们

认为能够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人的任何中国军队，而且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将此通知中国军事当局。

如上所述，我们的意图是运用我们的影响，既作为短期的、又作为长期的目标，促使中国实现统一。这未必就是说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然而就短期目标来说，蒋介石看来是目前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唯一领导人。改变支持蒋介石以完成我们的近期目标的政策，也许会造成混乱。就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我们能够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中国领导人合作。这方面的发展将关系到任何在和平时期帮助中国重整军备的计划。^①

国务院批准了这项政策声明，并于2月1日左右将它送交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②史汀生部长认为这项政策声明“很好”，把它寄给了魏德迈将军并附带说明这是供他“遵循”的。^③这里提出的政策意见在5月的另一项政策声明中被详加阐述，但没作重要改动（这项声明下面还会提到）。所以无庸置疑，它是陈述美国对华政策的权威文件。

可以指出，1945年1月12日为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准备的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的通报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一部分说到：

1. 政治上：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以及一个能代表中国人民愿望的政府。

(1) 我们应寻求一切适当的方法促使建立一个有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7—39页，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②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7页注释52。

^③ 罗曼纳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形势危急》，第336—337页。

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它将导致内部团结，包括调解国共分歧……我们虽然不偏向任何政治派别，但继续支持现在的中国政府作为中国的中央政权，并寻求在它的机构内建立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团结和有效率的政府。

(2) 如果这些愿望不能实现，现政府的权力崩溃，我们就会根据中国人民明白表示的愿望，重新检查我们的立场，并同情中国任何可能能实现统一、并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政府或运动。①

赫尔利随后对1月29日的这份政策声明作出的反应，是愤怒地否认他曾获悉这一声明，或是收到过其副本。②然而我们可以指出下列几件事实：“代理国务卿在〔1945年〕2月9日第40号指示中转给驻华大使”一份此项声明的副本。③如上所说，陆军部长也给在重庆的魏德迈将军送去了…份此项声明的副本，而赫尔利同魏德迈将军有着密切和经常的联系。赫尔利1945年12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他很熟悉这个声明的内容。④再者，既然正是赫尔利1951年向麦克阿瑟听证会提出了该政策声明的原文，那么，看来赫尔利实际上拥有一份副本。⑤他在这次证词中表示，他认为这个政策

① 《美国对外关系：马耳他和雅尔塔的会谈，1945年》，第356页。

② 例如，见洛贝克《赫尔利传》第340页。

③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7页，注释51。

④ 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12月5日的证词，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政策调查》（油印本，1945年12月5日、6日、7日、和10日）第33—34页。

⑤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远东军事形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第82届国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1年版），第四部分，第2929—2930页。这个文件以前没有发表过，当时仍归保密的。这被下列事实证实：国务院和陆军部的审查员在这些听证会的记录稿发表前曾将其浏览了一遍，对文件作了部分的删节。然而该文件的全文现在可以在《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中看到。

声明的某些部分是可以接受的；但关于其他部分，他仍然坚持：“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这不符合（美国的）政策……”。这就似乎产生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无需争辩的问题，即对外政策的最后决策者是华盛顿政府，还是驻外大使。

还要附带指出：那些翻阅1945和1951年召开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听证会记录稿（见《远东政策调查》和《远东军事形势》）的读者，也许会奇怪地发现，赫尔利试图使1月29日政策声明记录在案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讨论它的政策含义，不如说是用它作为他非常喜爱而且最为坚持的论断之一的根据。这一论断就是，当我在1945年3月作第二次延安之行时，亲自把这份美国政策声明的副本交给了毛泽东。有什么证据呢？就是他发现1945年春天共产党军队沿中国东海岸向南推进，可能是在我提供情报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恰恰是1944年8月陈毅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就告诉我他们想要做的事。我当时提交的关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意图的报告，肯定存在于赫尔利任大使时的大使馆档案里。^① 事实很明白，这个指责毫无根据。1951年我才非常惊奇地从麦克阿瑟听证会记录稿中看到1月29日的政策声明，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读过和拥有这一政策声明的副本，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一文件，更不知道它的内容。因此，我没有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士递交其副本或泄露其内容。我还想补充

^① 见我1944年8月31日发自延安的第19号报告（见《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527—532页，又见《美亚文件》，第817—821页，142号文件）。国务院的法律顾问格林·H·哈克沃思写了一份备忘录讨论赫尔利将军的这一指控及其他指控，此备忘录可以在《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740—744页找到。

指出，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这样做。赫尔利对我的指责，是他多疑的性格和急于进行报复的心理的令人惊异的产物。但是，对于这位非凡的人物来说，这并不是没有代表性的。

不要对委员长发号施令

1945年2月，国共谈判显然已陷入僵局。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决定去华盛顿进行磋商。重庆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国务院远东司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对中国局势重新进行估计的时候了。双方碰巧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政策建议。

就国务院方面而言，在这类大量的报告和文件中，第一份是3月1日中国科的负责人起草的。文件中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在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以促成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的同时，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能得到中共军队的合作，我们应该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弹药。

在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并撤回对蒋的支持的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出于军事需要而行使我们的特权，以利用所有在对日作战中能与我们合作的中国军队，同样也不应该存在问题。既然蒋介石实行军事统一的企图已告失败，就应该告诉他，他已没有资格要求只支持他。

蒋介石最初的反应很可能是不同意，但这不会有实际效果，因为他是否会积极采取行动反对援助中共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可能，蒋介石面对我们明确阐明的立场和意图，也许真会被迫在军事方面实行我们一直在争取的

军队统一。^①

第二天（3月2日），中国科和远东司的一些高级官员完成了一份更为详细的声明，即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书。它的结论与3月1日的备忘录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它再一次提出了高斯关于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并强调需要灵活性：

1. 如果蒋介石真诚地愿意（1）接受美国的忠告，
（2）为了打败日本而竭诚与美国合作，（3）采取措施实现内部改革和促进国家统一，那么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很明显，在这方面对蒋保持一项灵活政策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有下列两项理由：第一，美国也许希望在一旦蒋的政府和行政机构恶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时，处于可以撤回对其支持的地位；第二，美国似乎可通过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给予或拒绝给予蒋介石支持和援助，作为一种促使蒋实行合作、改革他的政府机构、并以最大努力继续进行战争的手段。^②

与此同时，国务院恰巧收到了乔治·艾奇逊2月28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乔治·艾奇逊是驻重庆大使馆的参赞，作为当时在那里的最高官员，当大使不在时他担任代办，如上所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47—249页。约翰·卡特·文森特写的这份备忘录最后附有以下说明：“准备了上述文件之后，我读了艾奇逊2月28日的324号电，并感到应给予此电最认真的考虑。”

②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49—253页，尽管它没有注明它所参考的电报，但这份文件可能是在收到重庆2月28日的电报后起草的（见本节第141页注①）。准备当作政策文件而起草的文件，省略其参考的电报和其他信件是正常的。

述，这份电报提出的建议与国务院内部已经提出的建议相似，尽管如此，看来正是这份电报成了在华盛顿进行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的主要焦点。这一辩论是在赫尔利回华盛顿后的几周里发生的。3月2日，代理国务卿格鲁将艾奇逊的电报送给罗斯福总统，并附上一份备忘录，说中国的事态发展“使我们的政策在实行时更加需要强调灵活性”。^①因此，也许值得把艾奇逊电报的全文收录如下：

中国的局势看来正向某些方面发展，这些发展既不利于有效地继续进行战争，也不利于中国将来的和平与统一。

1. 最近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和说服的方法努力帮助中国各党派实现和解，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必要开端。统一不仅被正确地看成是使中国最有效地进行战争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被正确地看成是迅速而和平地出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

但是，日本攻势的停止、通往中国道路的开辟、我们陆军重建蒋介石军队计划的迅速进展、其他援助的增加——如战时生产局的援助——中央政府将在旧金山会议上参与作出重要决定的期望、我们决意限定仅支持和加强中央政府并唯有经过它才有可能援助其他集团的信念，所有这些情况结合起来，已大大增加了蒋介石自以为强大的感觉，并使蒋介石方面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而不愿作任何妥协（见我馆2月16日下午4时第301号电报）。

这种态度反映在一些事情上。其中之一就是在前些时候，企图在不解决同中共的各项分歧的情况下，先同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54页。

苏联达成协议，除了建议设立一个在政府中无职无权、仅供咨询用的各党派联合的委员会外，最后什么也没有提出。在最近的军政任命上，又将极端的反共分子安置到战略要地的各战区去，指派反动分子任高级行政职务，如任命海军上将陈策（戴笠的下属）为广州市长，贺国光将军（前宪兵司令）为台湾省主席。

2. 在共产党方面，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明确承诺只支持蒋，并且我们将不会为了能够援助共产党或与其合作而对蒋施加压力。因此，出于自卫的考虑，他们正在按这样一种行动路线行事（去年夏天共产党领导人曾预先声明，如果仍然不把他们考虑在内，他们就将这样做），即积极增加他们的军队，并不顾国民党名义上的控制权，放手向中国东南地区扩大地盘，在2月24日上午9点第284号电中，我们曾报告国务院，共产党已大规模地调动部队并与中央军队发生冲突。共产党的意图是抓住时机，乘日本攻占粤汉铁路使华东陷于孤立之机控制那一地区，以使他们能在蒋介石驻云南的新军组建完毕之前尽可能地立于不败之地，并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困境，即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沿海任何地点登陆，就不得不要么拒绝、要么接受他们的援助。接近领导层的共产党人现在正在谈论需要寻求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在广播里要求该党和其他非国民党党派能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并积极考虑成立一个由许多独立游击区政府参加的联合委员会。

3. 结论看来很清楚，尽管我们的意图始终是好的，而且我们拒绝援助中央政府以外的任何一个集团并且不与它交往的作法在外交上也始终是正确的，但如果这种

局势继续下去，而我们对它的分析又不错的话，中国国内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可能爆发的灾难性的内部冲突将会加速到来。显然，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这种局势即使在目前也是不能令人满意和有害的，在这种局势下，我们不能与共产党区域里人数众多、富有进取精神、并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军队和有组织的民众合作，也不能与中国东南的势力，如李济深、蔡廷锴集团合作。从长远观点来看，如上所述，这种局势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有危害的。

由于中国与整个远东的战争步调加速，以及解决中国内部不可避免的冲突一事变得愈益紧迫，这种局势如果不加制止，就会以加倍的速度发展。时间是紧迫的，听任其自流将是危险的。

4. 如果我国政府的高级军事当局承认与共产党及其他已经证明愿意并能够对日作战的集团进行某种合作是必要的或可取的，我们认为，先直接考虑军事需要应成为美国下一步政策的基础。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提供了商讨这个问题的有利机会。

假定的确存在军事上的需要，那么，我们建议考虑的第一步是，总统明确地通知委员长：由于军事需要，我们必须向共产党及其他能帮助对日作战的适当的集团（在当前情况下不包括实际上不能打击敌人的四川军阀那样的势力）提供物资并与它们合作；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可以向委员长保证，我们并不打算减少对中央政府的援助（由于运输上的困难，我们给予共产党或其他集团的任何援助在开始时肯定是小规模的，并且它大概将低于源源不断地向中

国供应物资的自然增长量）。我们必须同时说明，我们将不断向中央政府提供有关此种援助的数量和种类的情报。我们还可以告诉委员长，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合作和供应作为手段，限制他们那方面采取独立的和扩张性的行动，并将他们约束在现有的区域之内。我们还可以指出，让共产党接受美国的援助比让他们寻求苏联的帮助或导致苏联直接和间接的干涉更为有利。

如果有必要，在向委员长做此声明时，还可以告诉他：虽然我们说服各集团认识统一的必要性的努力遭到了失败，并且我们为最有效地进行战争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但是我们认为，把我们给予所有集团的军事援助置于统一和军事指挥权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显然是可取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在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时，我们准备继续为这个目的进行斡旋；我们愿意支持下述建议，尽管我们认为它们应该由委员长提出：（1）组成具有最高作战会议或战时内阁性质的某种机构，共产党和其他集团在其中拥有有效的代表地位，并在制定执行联合作战方案中负一部分责任，（2）在所有党派就这些军队仅能在他们现有的区域或被指定的扩大区域内进行活动一事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名义上将共产党军队和其他挑选出的军队编入中央政府军，由委员长任命魏德迈将军推荐的美国军官担任作战指挥。但应清楚说明，我们同任何能够协助作战的部队进行合作的决定，不会拖到中国方面完成上述内部安排之后，我们也不以完成上述安排为进行合作的条件。

我们相信，这样的办法将有助于克服目前中国的僵局，并成为彻底解决最后全面统一问题的开端，国共最近

的谈判已使双方主要的争执之点得以明确。委员长及其政府此时此刻不会主动采取任何意味着使自己丧失面子、个人威望或权力的进一步行动，共产党如果得不到可信的保证，也不会采取任何会导致解散和最后消灭他们自己的军队的步骤，因为他们现在的实力和将来的政治地位就依赖于这些军队。我们建议采取的步骤将对两党施以必要的压力，以打破这个僵局。上述两项建议所说的办法，应先实现具体的军事合作，而以政治合作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也就为将来逐步达到统一奠定了基础。

这些建议没有排除政治协商委员会的计划，这个政治协商委员会如果被采纳，就可以和军事委员会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事实上，可以指望这个委员会会得到大力加强。

当然，这些话应私下对委员长讲，但是人们会清楚地了解，如果他拒绝接受这些建议，美国就可能采取符合逻辑的、激烈得多的步骤，即发表公开的政策声明，就象丘吉尔对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过的那种声明。

但是，我们帮助共产党和其他军队这一事实即使不~~予~~公布，不久也会在整个中国变得众所周知。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而良好的政治影响。中国内部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压力，要求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合理的和解并使现在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得到一个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然而这些自由主义者集团——甚至诸如国民党内的孙科集团——和各小党派，在最近的谈判里都被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所忽视（他们等于与共产党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他们由于认

为美国许诺支持现在的国民党反动领导，而感到幻想破灭、灰心丧气。通过采取我们所建议的步骤，就将证明我们没有做过这种许诺，我们就会极大地提高这些自由主义者集团的士气和声望，并借助这些内部力量发挥尽可能大的影响，迫使蒋介石整顿自己的内部事务，并为统一作出必要的让步。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政策将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尽管极少数国民党的反动当权人物不欢迎），并将提高美国的威信。

孙科本人曾向一位负责的美国人声称，如果将美国援助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事情通知蒋介石，而不是征求他同意，这样将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使蒋介石与他们达成协议。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内部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国民党自身改造的问题而不是相互让步的问题。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布，美国对中国的“不干涉”，事实上只能是对现有的保守领导有利的干涉。

此外，通过这样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实事求是地接受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指望在战争中得到所有中国军队的合作：使共产党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否则，如果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使国民党明白，它目前明显的准备最终进行内战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并能指望在中国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当前并不完整，也可以为将来和平地发展到充分的民主奠定基础。

5.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一致同意本电内容，电报是在他们协助下起草的，并已送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格罗

斯将军过目。①

可以指出，这份电报同华盛顿制定的灵活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国务院曾含糊地说过在短期内要支持蒋（除了在沿海登陆遇到非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外），并且似乎把灵活政策作为一种长远的考虑。而大使馆却认为，中国内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地走向危机，以至于需要在目前就实行灵活政策，目前实行这种政策还有可能产生效果，同时我们还有正当的军事理由要求实行这种政策，如果拖到渺茫的将来，那时就为时太晚了。该电报设想，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将会认为可以使自己适应这项政策，成为一个有广泛基础的统一战线或联合政府的领袖。但毫无疑问，美国首先关心的是出现一个友好、统一的中国，这种关心应该甚于对蒋介石个人的支持。

电报中写有如下一句话（电报第四部分第一段）：“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提供了商讨这个问题的有利机会。”这些讨论，在情绪颇为激动的赫尔利参加下，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42—246页；《中国白皮书》第87—92页收载了电文的详细内容（《外交关系》删掉的一处已根据《白皮书》补全了）。电文的最后一段，在驻外外交人员的这类电报中是罕见（也许没有先例）的，它是由所有那些参与此事的人们自发作出的决定。虽然分派我在陆军工作，但我名义上还是大使馆的一名成员，我高兴地参加了这份电报的起草工作。在通常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建议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被认为是大使馆应尽的责任。但在赫尔利手下，情况是不正常的，我们当时已经清醒地预料到他对此事的反应是既不冷静又不通情达理。因为我们想努力证明责任不是艾奇逊先生一个人的，也因为我们希望明确表示我们意见一致的作法会给我们的观点增加些份量，于是我们（在艾奇逊最初反对的情况下）都坚持在电报的原件上签了名，坚持把这一声明包括在电报中。因为是我把电报的副本带给格罗斯参谋长的，所以我可以说明他也极为赞同此电。所有在这份电报上签名的人，包括艾奇逊，都在赫尔利的要求下很快被调离中国（见本书第110页注③）。

现在开始了。赫尔利于3月5日（亲自），3月6日（通过电话）以及3月7日（又是亲自）同远东司和中国科的高级官员进行了长时间会谈。^①在说服对方方面，双方看来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之后，赫尔利把这些讨论带到了白宫一级。没有提到有国务院的代表参加过赫尔利与罗斯福总统的那些会谈（看来起码有两次，可能更多）。赫尔利没有提供过会谈记录，研究这段历史的众多历史学家和政府人士也未发现任何记录。所以，人们只能认为，没有保存记录，讨论的全部细节将永远无从知道。只有一件事实是清楚的：赫尔利继续担任大使。在1949年的官方报告中，国务院只能提出如下简短叙述：

赫尔利强烈反对上述（发自重庆的2月28日的电报中）建议的行动方针，因此美国的政策仍旧是只向得到承认的中国国民政府提供军事物资和财政支持。^②

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怀着能够查明真相的信心对这些隐晦不清的史实进行彻底的调查。尽管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赫尔利仍对成功持乐观态度（人们或许会说，他本性倾向乐观，尤其在关系到他作为一个谈判者的声望和说服能力的时候）。但是，这个时期的几个事态发展可能会使不直接接触中国情况的人认为，这种乐观情绪似乎颇有道理。

一个是，在赫尔利极力要求和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支持赫尔利的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同意中共派代表参加即将出席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60—264页。

② 《中国白皮书》，第92页。

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① 这看来是一个让步，可能至少预示着紧张局势会稍有缓和。

第二个明显有利的发展是最近刚在雅尔塔达成的有关中国的协议。^② 毫无疑问，赫尔利一定认为，此协定完全符合他在重庆形成的信念，即这是唯一能够使共产党就范的战略。1月14日，他绕过国务院，直接给总统发了一个包括以下明确保证的长电：

你在参加已宣布即将召开的会议时，请争取使邱吉尔和斯大林赞同你的如下计划：（1）立即统一所有的中国军队，（2）使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国家。在你获致此项协议之后，我们就能提交给你完整的计划，包括统一中国所有军队，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使中国各党派均有代表参加中国政府行政机构，促进民主进程，建立基本人权和重建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③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68—269、278—279、283—284、293、307页。例如，洛贝克说共产党的这一要求“可能是一个使中国各政党派向统一前进一步的机会，并且，赫尔利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这种想法”（《赫尔利传》，第379页）。

^② 我发现这一解释与赫尔利自己后来所作的各种“回忆性的”叙述要为不同，特别是当社会上十分盛行全面指责雅尔塔会议时，他在1952年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的大量证词（《远东军事形势》，第2883—2893页）与此极为不同。这还可参见洛贝克《赫尔利传》第358—377页。赫伯特·菲斯详尽地指出了赫尔利后来作的这些声明和当时的证据之间的差异。这些证据是：赫尔利自己当时所作的声明，他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谈后立即发给杜鲁门总统的汇报情况的电报，以及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等其他参与者的声明（见《中国的纷乱》，第278—280、283—288页）。

^③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76—177页。

根据零星的证据，在雅尔塔讨论的问题，是赫尔利和当时身体已经衰弱的总统之间会谈的主题。赫尔利被允许阅读这个协议并记下一份“铅笔写的副本”，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能向委员长作简要介绍。此外，还对外国在中国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以及赫尔利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政策的疑虑作了某些讨论。^① 并决定赫尔利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中国，以便“获得英苏两国政府同意对美国下列政策予以合作：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便迅速结束战争；以及支持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而作的一切正当努力”。^②

在这个充满安乐感的背景下（罗斯福本人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是满怀希望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国务院关于在中国采取更积极行动以结束那里的僵局的建议似乎很少得到考虑。然而，有一种相当奇怪的调子帮助支撑了赫尔利的一直在发展的理论。

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中将、梅乐斯海军准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中国军事问题。他们都认为，只

① 罗斯福希望能够说服英国放弃香港，并反对帮助法国重新得到印度支那。赫尔利有些含糊，但坚定地确信，英国属于“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它反对赫尔利的政策，并希望“中国保持分裂，自我削弱”。他也许注意到了毛泽东1944年12月8日在延安与包瑞德上校情绪激动地争辩时的一段评论：“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同日本战斗了七年，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将继续同他们战斗。如果美国不支持我们，那么还有英国和苏联。”（《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30页。）

② 赫尔利1945年4月14日致国务卿电（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29—332页）。邱吉尔十分愿意表示支持美国对华政策，但坚持“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香港脱离大英帝国”。

要给蒋的中央政府以相对少量的援助，就能够把中国的
判乱平息下去。^①

看来，没有对这次在不同部门之间和不同级别上进行的
互不联系的会谈中所做出的决定进行概括。唯一参与了所有
这些会谈的人是赫尔利。他仅仅告诉我们：“总统支持我的立
场，他说这符合美国传统对华政策。”^② 稍微具体一点说来，
赫尔利通过使总统相信他能够在“4月底以前”交出一份国共
协议，成功地把大使馆的建议撇在一边。^③ 赫尔利指望在他即
将开始的旅程中获得丘吉尔和斯大林支持美国政策的保证。
他把上述信心建立在期望共产党会由于这种保证而迅速发生
转变的基础之上。^④ 国务院方面同意，如果中国的僵局能在
近期打破——如赫尔利如此坚信的那样——“就不存在采用

① 海军上将威廉·F·李海《现场目击记》（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50年版）第337页。海军准将米尔顿·E·梅乐斯指挥的美国海军驻华小组是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这个组织由蒋介石的主要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将军任所长，梅乐斯准将任副所长（见米尔顿·E·梅乐斯海军中将《另外一种战争》（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67年版）第108—111页）。

② 《赫尔利传》，第383页。

③ 远东司3月7日的备忘录（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62—
264页）。

④ 看来赫尔利认为转引斯大林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会对共产党人产生深刻影响，尽管他早些时候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再者，看
来他曾指望共产党会立即屈服。赫尔利4月3日离开华盛顿，4月16日会见斯大
林，直到这个月快结束时才到达重庆。在发表的档案记录中没有东西表明他是否一到达重庆就同共产党人进行了直接接触。但他到达以后很快就在4月28日
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英国和苏联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见《外交关系，1945年》，
第7卷，第374—378页）。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延安仍表示不愿接受国民党的
条件。赫尔利，被迫转而指望在预料中的、但何时签订仍不可知的中苏条约缔结
时达成国共协议。

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计划、包括艾奇逊先生提出的供选择的计划的问题了”。^①所以暂时决定不对蒋介石发号施令。在本章后面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决定的背景。

也不要承担义务

赫尔利带回重庆去的关于对华政策的决定所具有的局限性很快就显而易见了。赫尔利达到了他的目的，即除非蒋介石同意，美国不应同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尽管他承认这也许不适用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时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美国军队“有权武装会援助美国登陆部队的所有中国军队”。^②但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美国不是不可改变地承担支持蒋介石的义务和美国应该保持一定灵活性——仍然不变。事实上，这一基本政策很快得到了明确的重申。

就在赫尔利离开华盛顿那天（4月3日），国务院完成了一份美国战后对华军事政策声明。这一声明是针对下述问题制定的，即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诺诸如“美国援助中国建立一支有效的空军力量”这样的长期计划。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它当时的作用基本上与现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相似）审议了这一文件，并且未作任何改动地批准了它。协调委员会5月29日的 SWNCC 83／1号文件正式作出了此项批准，现摘录如下：

……美国对华政治政策如附件（4月3日国务院文件）中阐明的那样：

① 见本书第145页注③。

② 见本书第131页注④。

1. 只有在同美国政府有关各部进行商讨，并在它们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实现了特定需要的政治、经济条件后，美国才能承诺实行援助中国政府在战后建立和维持一支现代化陆军和空军的军事政策……

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通知委员会，从军事观点出发他们不反对这些结论。^①

国务院4月3日的文件提出了这项现已获得一致赞同的政策，这份文件使用了国务院1月29日那份更早的文件中的语言，并以那份文件作为附件。^② 它同样也借用了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通报文件中的语言。^③ 然而，在某些方面，它在限制美国支持委员长政府的问题上超过了这些早些时候的政策声明。

3. ……毫无疑问，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中国国家（非政治的）军队，在现代化空军支持下，将大大有助于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国。然而，国务院认为，实现国内统一和建立一个人民支持的稳固政府是达到这一步的先决条件。

4. 在实行旨在实现第二段中阐述的目标而制定的措施时，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要求我们采取最为谨慎和灵活的态度。

（1）美国政府承认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国民党一党严格控制的现政府毫无代表性；它的政府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以及中国陆军和空军中，目前普遍存在着腐败无能的现象；中国缺乏对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116—117页。

② 见本书第130页注①。

③ 见本书第131页注①。

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些因素已造成对现国民政府的普遍不满情绪……

在国务院看来，最重要的似乎是，我们对国民党控制的现国民政府给予支持时，应对这些政治因素保持现实主义的警觉，这些因素预计可能会导致现政府的倒台或爆发内战……

8. 关于战后时期，特别是关于现提交考虑的指示中提到的问题，国务院感到，在具备下列条件之前，我们以任何方式承诺帮助现在的中国国民政府发展并保持一支现代化的战后中国空军，将是不明智的，这些条件是：

(1) 中国实现了国内的^① 政治统一与稳定。

(2) 中国政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②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以前看不到情况汇报材料，甚至对副总统职务也仍缺乏经验的杜鲁门总统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欧洲战争的结束、波茨坦会议、以及随后导致日本投降的一系列事件迅速压到他身上。8月，贝尔纳斯接替始终不胜任的斯退丁纽斯任国务卿。没有人预料到远东的战争会突然结束，因此中国的局势没有受到重视。赫尔利因为他

① 原文为international，但根据上下文，似文字有误，疑应为internal。
译者注

②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74—79页，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国民党把武装部队作为党军这一事实（见F·P·刘：《中国现代军事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6，第19—20，274—275页），是赫尔利似乎从未看清楚的。国民党在军队中实行的党部制于1947年（在美国的督促下）中断，但后来又重建了（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第87页）。

与邱吉尔和斯大林的谈话没能动摇中共而感到失望，把希望寄托在中苏缔结条约的幻想上，继续坚持他的僵硬方针。国务院已彻底觉察到它的驻华大使执行着一种与它自己的政策完全不同的政策，因此作了若干努力以图使他就范。显然，这些努力没有得到政府最高人士的有力支持，这种支持对于使这些努力产生效果可能是必需的，因为赫尔利现在在重庆牢牢地掌着权。

4月27日，代理国务卿（格鲁）递交杜鲁门总统一份远东司4月18日准备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大概是打算给国务卿和新总统提供一份简要但全面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概述。它基本上是已经提到的几个以前的政策文件（雅尔塔通报文件和1月29日、4月3日的那些文件）的摘要。序言部分可以充分表明它的调子：

为了实现击败日本这一当前目标以及实现和平与安全这一长期目标，我们力求促进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将实现国内统一，包括协调国共分歧，并将有效地履行它的国际国内责任。

我们虽然不偏袒任何党派，但继续支持现在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认为它仍然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央政权，仍然是统一和避免中国抗战工作陷于混乱的最大希望。然而，考虑到我们的长远目标并为防备可能出现政府的权威土崩瓦解的局面，我们的宗旨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同任何更有可能实现统一和促进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中国其他领导合作。^①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93—95页。代理国务卿在转送这一文件的备忘录中说：“它是应国务卿的要求，为旧金山会议的有关用途”而准备的。

据菲斯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国务院再次考虑采取某种措施以解决中国的僵局。

5月2日，暂时在国务院工作的威廉·菲利普斯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给赫尔利的新指示，这一指示可能对促成或影响中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实现政治统一这一问题，表示更为积极的态度（见文森特5月2日备忘录）。会议明确决定，4月18日备忘录的提要足可作为给赫尔利的新指示。^①

不知是何原因，《外交关系，1945年》中没有收入有关这次会议的材料，也没有收入菲斯提到的文森特5月2日备忘录。^②《外交关系，1945年》的编者话，远东司4月18日的备忘录“由代理国务卿于5月15日在133号指示中传达给驻华大使，该指示未付印”。^③这样的指示也许是通过邮政（外交信使邮袋）发出的。菲斯提到的“4月18日备忘录的提要”显然是代理国务卿5月7日致赫尔利电。可惜，这份电报也没有收入《外交关系，1945年》。但是从菲斯的叙述看来，这份电报所包括的内容，显然不仅仅是远东司备忘录的提要。

赫尔利被告知，国务院认为，就实现我们目的的手段来说，保持充分的灵活性是极为重要的。他还被告知，一

① 《中国的纷乱》，第292页注释3。威廉·菲利普斯是一个在驻外大使馆和国务院工作过多年，据有很多威望和资历的老手。他1903年开始工作，其经历包括：曾在北京工作过，并担任过远东司司长，任过6年助理国务卿，作过两任副国务卿，在五个国家任过大使，1942年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驻伦敦的代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治顾问，后又担任驻新德里的美国外交代表。1944年底退休后，他又被召回服役，担任国务卿特别助理。

② 约翰·卡特·文森特是这个时期中国科科长。

③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93页注释28。

定要让蒋介石及其政府完全明了我们的支持不是一张自由取用的空白支票，他们必须交出一部分权力并改过自新，以实现下列目的：尽可能快地实现国内统一与安定、顺利地进行战争、以及为与俄国建立巩固与友好的关系奠定一个良好基础。①

国务院想通过上层人士约束赫尔利的企图，有一部分也许还反映在远东司4月28日给格鲁和霍姆斯的备忘录中。关于国务院如何不同意“赫尔利将军的‘政策’”，很难见到有比该备忘录说得更清楚和直率的了：

一些时候以来，我们已经关切地注意到赫尔利以毫不妥协的固执态度对待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们曾经希望赫尔利回到华盛顿后，可以就政策问题与他进行自由坦率的交谈，并使他明了国务院官员们认为，对这些问题采取充分灵活和现实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与赫尔利进行的很少几次会谈是不可能令人满意和毫无结果的。最近刚从重庆归来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负责官员，与我们同样关切赫尔利将军所阐明的一项政策声明，这项声明被关心中国政治形势的明智的观察家们形容为是支持委员长和他的一党（国民党）政府的“空白支票”。我们认为，赫尔利的“政策”正在增强蒋介石委员长在处理内部统一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在不明智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军事支持限制为只给予委员长的军队，从而使我们不能利用可能被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的其他中国军队。我们认为，他的政策正在使我们所拥有的能促使委员长进行军事、经济和政府改革的影响和手段失去作用，而这些改革是实现中国内部的统

① 《中国的纷乱》，第232—293页。

一与稳定所必需的。简而言之，赫尔利大使在本政府对华关系问题上正在沿着一条我们并不同意的路线滑行，我们担心按照他的作法会使中国趋向内部动乱和严重的外部纠纷的结局。^①

马歇尔继续奉行有条件的政策

华盛顿政府有一种政策，而它的驻华大使却有着另一种极不相同的政策，这种异乎寻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11月赫尔利戏剧性的辞职为止。这一事件，以及公开的内战正在中国蔓延这一背景，标志着赫尔利强行实施直到绝境的策略和政策的最后失败。^②这也迫使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第一次认真注意并研究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马歇尔将军开始执行其赴华使命时接到的那份综合性指示，就是这一为时已晚、但很深入的研究的成果。这份指示的有关部分如下：

美国承认并将继续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消除日本在华影响上与之合作。美国确信，迅速设法停止敌对行动，对于有效实现这一目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尽可能避免由于美国援助中国的任何持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49页，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这是已在本书第112页注①引用过的同一备忘录的一部分。

^② 当然，赫尔利从不承认这一失败，他宁愿寻找替罪羊。但是，他当然阅读过刊载着国共谈判破裂、公开的内战在中国蔓延这一类令人沮丧的消息的报纸和电报。在中国的事态无疑正日益不可收拾时，他长期远离中国（从9月22日到他11月26日辞职），对于这件事，很难找到其他解释。如果他认为形势还有希望挽救，人们可以预料，他是会回去的。

不同政见者而难免产生的影响。除了这些附带的影响以外，美国的支持将不扩大到用军事干涉影响中国的任何内部冲突。

美国知道，现在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为包括中国的其他政治集团，那将会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坚决主张，召开由全国主要政治集团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并由该会议作出安排，使这些集团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拥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人们认识到，这就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博士确立的、作为国家实现民主的过渡性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

在中国沿着上述路线向和平、统一迈进的时候，美国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复兴国家、改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建立一个能使中国履行其国内国际责任以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军事组织……①

库比克博士告诉我们，指导马歇尔在中国行动的政策是一个全新的政策。

因此，职业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的带倾向性的话起到了在这一关键时刻扭转历史车轮并改变美国远东政策方向的作用。②

……1945年，美国的反国民党集团正在制造其由美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770—773页。此前的25页（第745—770页）提供了一系列讨论、文件和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草案的详尽细节。它们最终导致了这项一致同意的政策声明。除了文森特（远东司负责人）外，始终参加这些讨论和起草工作的人士还包括赫尔将军、汉迪将军、李海海军五星上将、迪安·艾奇逊副国务卿、贝尔纳斯国务卿、杜鲁门总统以及马歇尔将军本人。但是，库比克博士断言（见《美亚文件》第27页），“所有给马歇尔的指示都是由约翰·卡特·文森特起草的”。

② 《通牒文件》，第30页。

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灾难性政策。据斯利·K·霍恩贝克博士说，这是严重的关头：“当时，正是1945年，而不是在那以前，美国政府由于已首次采取了与对华政策的传统和义务相违背的行动，开始实行一项已经构成对中国内部冲突进行干涉的方针……”^①

美国既然无意中支持错误的一方以争取获得对中国本部的控制，那么它卷入朝鲜和越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美国已不得不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责任。历史将直言不讳地记下这一点。然而，需要对记录作的补充是编年史中的这一细节：在1945年美亚事件成为报纸头条新闻的时刻，美国政府改变了它的对华政策，铸成了悲剧性的大错。^②

……悲剧性的转折……^③

……引起灾祸的政策改变……^④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给马歇尔的指示基本上是美国政府有条件援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这一政策的继续，而这一政策可以通过数量很大的一系列政策声明至少追溯到1944年5月19日的政策文件。^⑤这时完成的，不是一项新的政策，而是把长

① 《美亚文件》，第26—27页。霍恩贝克博士1944年离开国务院去担任驻荷兰大使。

② 同上书，第113页。可能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将直言不讳地记下这一点”。

③ 同上书，第30页。

④ 同上书，第113页。

⑤ 本书第122页注①。“美国……并不承担在任何和一切情况下支持国民政府的义务。”如在第三章指出的，在国务院这一政策文件提出之前几个月，有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已开始执行了。这一点反映在总统对蒋1944年1月提出的要求给予十亿美元的贷款这一事实上的最后通牒所作的强烈反应中；反映在陆军部当蒋介石（在3月和4月）拒绝在萨尔温江前线出动Y部队时，威胁要中断供应租借物资一事上。

期存在的政策有效地固定下来并加以实施。它是在一个紧急事件的推动下产生的，并显然排除了赫尔利关于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独出心裁、自相矛盾的论调。可以附带指出，马歇尔将军长期提倡并力求贯彻有条件的政策。^①

我认为，库比克博士不能用实际的政策文件——在《美亚文件》中找不到这些文件——来论证他关于对华政策的观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诚然，美国1944年和1945年的对华政策并非总是清楚、明确和毫无矛盾的。这毕竟是赫伯特·菲斯为其研究成果取名为《中国的纷乱》的一个原因。但这个政策也确实不是如库比克博士想让他的读者理解的那样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②如果说美国曾接近于同意无条件支持蒋介石，那是发生在下列这样两个事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比克博士也许不愿意这样看待这个事例。

其中的第一事例是罗斯福总统要求由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这一要求可能涉及到的应由美国承担的义务从未被确切阐明过，但是，它将会增加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责任，并涉及对蒋作出某些承诺，这一点看来是毫无问题的。在蒋介石拒绝接受史迪威时，罗斯福总统的答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承担由于任命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你在全中国的地面部队而带来的责任。”^③如在第三章已经指出的，魏德迈将军未被授权接受中国军队

① 马歇尔一贯提倡对中国采取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所称的交换条件政策，这起码可以追溯到1941年11月（《史迪威使华》，第41页，以及本卷和其后各卷的索引中在“马歇尔”和“交换条件政策”条目下所标注页码上的有关引文）。

② 见本书第62页注①，第63页注①、②、③、④。

③ 罗斯福1944年10月5日致蒋介石电。（见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59页）。

的指挥权。美国对中国的“责任”感的确降低了。

第二个例子实际上是给马歇尔将军本人的、秘密的、没有发表的指示。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将军与杜鲁门总统作了他去中国前的倒数第二次会晤。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海军上将李海也在座。正是马歇尔将军本人，以他特有的一丝不苟的作风，准备了一份这次会谈的备忘录。其中我们看到：

总统说，对于我将在什么基础上代表他在中国进行活动，他希望在我们之间有一个明确而全面的理解……

最后马歇尔将军说，在他（马歇尔将军）看来，如果委员长不作出合理的让步，因而使争取政治统一的努力破产，并且美国不再继续支持委员长，就会随之出现中国分裂和苏联可能重新控制满洲这种悲惨后果。这一情况总的后果是使我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遭受挫折或是完全失败。马歇尔将军询问道，既然如此，在遇到这种不幸的结局时，是否要他继续干下去，并帮助委员长把军队运往华北。这样做将意味着本政府将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自尊心，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以前的政策。

总统和贝尔纳斯先生同意关于此问题的这种观点，即我们将不得不支持委员长，帮助他把军队运往华北，以便造反日本人的工作得以完成……①

关于我对1944年至194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描述，人们可能会提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赫尔利没有准确地代表美国的政策，为什么他能够作为大使留在重庆？第二，如果这个时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767—769页。如果赫尔利象马歇尔将军和更早时的高斯大使（见第四章）那样，把重要的会谈记录下来，那么这段时期的历史就会清楚得多。

期实际的对华政策是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为什么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迄今不清楚这一事实？

可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主要依靠推测。对于罗斯福任总统期间（直到1945年4月）的情况，有许多可能性必须考虑到。按步就班地进行行政管理显然不是罗斯福十分关心的问题。他倾向于以一种极端个人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经常把国务院撇在一边。他在战争期间已经多次委派赫尔利完成其他使命，并已对他有了一定信任。^①关于罗斯福在这个时期体力和脑力已衰退的一些报告大概不必全信。^②但与此同时，人们也许想知道，向总统所作的情况汇报究竟深入到什么程度，对于赫尔利所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他又清楚了解到什么程度。例如，1945年3月在白宫会谈中提出这些问题时，国务院没有人发表过意见。^③似乎有线索表明，罗斯福没有真正认识到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的焦点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支持究竟应该是有条件的呢？还是如赫尔利所坚持的那样，应该是无条件的。例如，罗斯福在1944年11月15日给他的老朋友埃文斯·卡尔森的信中说：“我希望并祈求与所谓的‘共产党人’真正达成一项解决局势的办法。”^④ 12

① 其例可见李海《现场目击记》第227页。

② 见魏德迈对他1945年3月与罗斯福的一次谈话的描述：“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过总统，对他的外表极为震惊。他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下巴搭拉下去。我很难向他报告情况，因为他看起来精神恍惚。有好几次我反复叙述同样的意思，因为他好象没有记住我的话……”（艾伯特·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58年版〕第340页）。赫尔利和威廉·B·布利特的同样说法见洛贝克《赫尔利传》第353、366、367、368页。

③ 如已经提到的，从1943年萨姆纳·韦尔斯辞职后，国务院就失去了与白宫的有效联系。斯退丁纽斯似乎对中国没有多少兴趣。

④ 罗斯福1944年11月5日致美国海军陆战队埃文斯·F·卡尔森中校的信，转引自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1年版），第486页注释。

月，毛泽东以罗斯福写给他的一封信（该信没有收入《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责备赫尔利。罗斯福在信中说，他“希望同中国所有的抗日部队合作”。^①迟至1945年3月中旬（此时赫尔利正在华盛顿），罗斯福与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私人谈话。斯诺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报告的某些部分是很有意思的。

罗斯福好谈轶事，我喜欢听轶事，因而我们的谈话杂乱无章。然而，如果说有一个反复谈到而又稍有连贯性的题目，那就是中国。他对那里发生的复杂情况感到困惑但又怀有强烈的兴趣，没有任何人对那里的情况的解释使他感到满意，包括我在内。他明白我们的战时援助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种政治干涉，而且，我认为，他真诚希望美国的战时援助既能使中国继续作战，又能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到1945年，罗斯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对作为一般人的蒋介石和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感到迷惑不解。当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刚刚听到帕特·赫尔利正在延安和重庆之间主持的谈判已告失败的消息。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早些时候的报告曾说已经制定出了一项解决问题的方案。总统说，蒋介石对共产党要求的某些类似人权法案的保证“提出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而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现在，他认识到中共作为游击区的实际政府正在日益增长的力量。他正在考虑直接帮助他们抗击日本，作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740—741页。

为军事上的一种权宜之计……

总统问了几个关于八路军（共军）在我们援助下能在华北具体做些什么的问题。然后他说，在我们更加接近日本本土时，我们打算将物资和联络官员运送到华北沿海地区。所有这些话当然是不许引用的。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给过共产党军队任何军事援助。我设想在任何这样的突袭行动中，我们将试图找到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并同他们合作。我不知道赤色分子——他们控制着除日本人驻防的公路、铁道及城市以外的华北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将对此作何反应。

“我设想，我们的立场是，只要我们承认蒋政府是唯一政府，我们就必须只通过他来向中国供应所有的物资，对吗？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是吧？”我问。

“嗯，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总统把头朝后一仰，明确果断地说，“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双方联合起来”。

这最后一次谈话反映出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出现了某种新的冷淡，罗斯福对蒋介石固执地反对进行对蒋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改革这一点变得日益不耐烦了……

当时对雅尔塔会议有关满洲和中国的秘密条款记忆犹新的罗斯福，究竟是怎样预见我们与中共未来的关系呢？他那天说“我一直（在中国）同两个政府打交道，并打算继续这样做……”时，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①

①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纽约：兰登书屋，1958年版）第347—349页。这一段文字经作者同意重印在此处。除了表现罗斯福的态度与赫尔利不同之外，这些段落也有趣地反映了罗斯福起码与一个记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应该记住，罗斯福这番话正是在赫尔利正在华盛顿反驳驻华使馆关于应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这一时刻说的。他向斯诺询问共产党军队的能力，说他期望美国向华北沿海地区（在那里共产党军队是唯一的中国军队）运送“物资和联络官员”上岸，然后，他明确表示这种与共产党的合作将是直接的，并不考虑蒋介石的反对（“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这表明罗斯福没有完全接受大使馆的建议，但是正好同国务院1月29日的指导文件相一致，并且，它与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相去甚远。

赫尔利本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事实上，他对于指控他赞成无限制或空白支票式的支持是非常敏感的。例如，在关于1945年6月他与他的重庆大使馆成员争论的报告中，他说：“林沃尔特和史密斯报告说，有人谣传美国的政策是给予‘国民党无限制的支持’，但他们两人都知道这是〔原文如此〕不真实的。”^①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并承认仅是一种推测的那样，我自己相信，在没有澄清这些对华政策分歧的情况下，使赫尔利留任大使并被派回中国的主要因素，正是雅尔塔会议。一则雅尔塔会议显得那样重要，以致于把这些麻烦而困难的争论推到后面去了。而且，赫尔利因雅尔塔会议接受了一个新的、扩大的使命：获取英国和苏联对他进行的谈判的支持，以便在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中苏条约最后达成之前，能利用这种支持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帮助蒋准备与俄国人结缔条约；并在适当的时候，把雅尔塔协定的条款和背景情况通报蒋介石。

在这一连串的考虑中，罗斯福必然已经对下面这种情况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409—410页。

造成的困境有所察觉；即唯独他本人，在丘吉尔的嘲弄和斯大林的轻蔑下，坚持把蒋和中国抬到四强的地位。尽管罗斯福自令人不快的开罗会议和会议后发生的争吵以来，日益变得对蒋感到困惑和失望，尽管中国对于战争和不久的将来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尽管总统似乎对与苏联建立令人满意的工作关系抱乐观态度，但过去幻想的余烬可能还有足够的力量使他不能心安理得地对委员长采取严厉粗鲁的态度。如果罗斯福对已经在雅尔塔达成协议的、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基础的、仍然对蒋保密的让步感到有些不自在的话，这种迟疑还会有所增长。

还有一个因素毫无疑问也促使这一问题成为罗斯福不愿去尽力解决的棘手问题。当时冷战还没有开始。事实上，在罗斯福和赫尔利看来，雅尔塔协议似乎可望使苏联在许多有关地区同美国进行合作。虽然如此，罗斯福是一个相当精明的政治家，他敏锐地觉察到对华政策是一个敏感问题，蒋介石在美国有一群狂热的支持者，并且“共产主义”对美国一部分重要的舆论来说是一个讨厌的词汇。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罗斯福以置之不理的态度把这个争端往后推。可能在罗斯福看来，雅尔塔协定提供了使中国统一的机会。同时，赫尔利相信他的谈判将在下一个月内成功。果真如此，就不需要自寻麻烦采取某种其他积极的但肯定是一不愉快的行动来结束中国的僵局。因此，驻华使馆和国务院提出的直接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就被置之一旁。赫尔利被派回中国，以继续进行他一直在做的工作。

如果中国的情况继续恶化，如果雅尔塔协定（或在这之前英国和苏联对我们政策的支持）不能使共产党接受蒋提出的条件，如果战争突然结束时中国毫无希望地陷于分裂，如

果内战大规模展开，美国的政策将会是什么呢？人们可以推测，在1945年3月，这些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看起来十分遥远。罗斯福可能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到必要时再加以处理。无论如何，在白宫的这些会谈中，似乎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的范围、性质以及期限就仍未被确切阐明。

人们难免会提出两点看法。尽管赫尔利本人承认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是“无限制”的，但看来很明显，他所理解的这种支持的范围要比罗斯福想的广阔得多。例如，赫尔利想以声称美国支持蒋介石作为他所操纵的、为在中国达成一项协议而进行的赌博中的重要筹码。但是，罗斯福未阐明这种支持的含义一事——象早些时候华盛顿未澄清赫尔利12月24日声明中对美国政策的“理解”一样，似乎证明赫尔利关于只有他一个人代表美国政策的说法是真实的。

第二点是一个明显的事，即试图区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常常是幻想。国务院面对赫尔利返回中国以及它提出的应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被撇在一边的事实，继续强调灵活的长期政策。但是，今天做的事情必然影响到未来，短期行动也会决定长期政策。

杜鲁门成为总统之后，肯定要有一个捉摸不定的时期。然而在华盛顿，人们普遍预计到，既然新政府业已组成并开始正常工作，象赫尔利这样的共和党人的任期可能就不长了，因为人们强烈地感到好的位置应给予好的民主党人。^①然而，又是

^① 例如，我1945年4月16日由华盛顿寄给在重庆的白修德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过这一点（《泰丁斯记录稿》，第一部分，第1357页）。该信被收入泰丁斯委员会的听证会记录，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少数派顾问，以后来库比克博士使用我的私人文件的同样方式，获得并采用了在我被捕时从我的桌子里得到

关于中国的雅尔塔协定发挥作用，再一次使赫尔利成为看起来好象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一个最为重要和微妙的美国外交承诺，实际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赫尔利是知道有这一承诺的极少几个人之一。再者，他还被告知了它的所有细节，并为保证它的贯彻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毫不奇怪，赫尔利很快就把这些情况通知了杜鲁门总统。这一报告见赫尔利5月10日（绕过国务院）致杜鲁门的一封私人电报。

我知道你的工作一定极其紧张，我对于拿我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打扰你深感不安。在我最后一次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中，他在我的驻华大使任务之外委托给我两项特殊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使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美国在中国一贯推行的政策……

在与罗斯福总统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委托给我的第二个使命与在雅尔塔达成的、影响到中国的一项协定有关。在我最近一次返回华盛顿之前，在我从总统那里得知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的决定，特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序言之前，委员长已经同我讨论过中国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立场，并告诉了我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都告诉我，他们一致同意，在斯

的我私人件信的副本（以后还给了我）。由于这封信是在战时检查制度下写的，所以没有提到赫尔利的名字，并用“好党员”代替了“好的民主党人”。不幸的是，在1950年的气氛下，这个可疑的词引起了一些解释——尽管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看出我开始写了“共和党官员”，然后又把它涂掉（同书，第1137—1139页）。

大林给我信号以前，不要向蒋介石谈雅尔塔决定的问题。但斯大林又说，他将给我全权，让我自己斟酌行事，决定在何时、以何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然而哈里曼和我两个都认为最好推迟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泄露出去，并随之带来麻烦的后果。我就此向斯大林作了解释，最后决定，在我们通知斯大林我们认为时机已到并收到他的信号之后，再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向你强调，在我最近返回华盛顿之前，在我们尚不知道雅尔塔协定的内容的情况下，我已经与蒋介石讨论了中苏问题的所有方面。返回重庆后，我们又在不涉及最重要问题的情况下彻底讨论了同样的题目。因此我们能够在被授权向委员长传达雅尔塔协定细节的时候顺利完成这一项任务……^①

当然，雅尔塔的一揽子交易涉及的东西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协定。5月期间，在华盛顿政府最高一级的官员中（由格鲁倡议）热烈地讨论了是否重新考虑雅尔塔决议的问题。菲斯对此事作了下述令人信服的概述：

全部磋商以得出这样一个温和的结论而结束：我们将不去试图修改雅尔塔协定的条款。但是在要求蒋介石同意之前，我们应设法让斯大林重新保证遵守保护性原则。我们应重新考察苏联政府是否真诚打算让中国政

① 《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865—868页。杜鲁门总统在5月12日再一次不通过国务院的渠道迅速复电赫尔利：“请继续努力实现罗斯福总统向您概述的目标……我们将通过你在尽早日期，即透露出去也不会对总的前景发生危险的时刻，尽量让蒋介石知道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情况”（同书，第868—869页）。

府在全中国和满洲行使充分的主权，并且是否会赞成我们有关统一中国的努力。……霍普金斯前去与斯大林会谈……杜鲁门正在设法弄清他是否可以同苏联合作（这件工作消磨了罗斯福一生最后几个星期），他已经要求霍普金斯冒险出访。人们认为，只有霍普金斯能够一方面使斯大林确信美国将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另一方面，促使斯大林与杜鲁门一起忠实地履行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的协议。这个使命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努力，旨在恢复罗斯福与霍普金斯认为的美苏在雅尔塔已建立的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特别要弄清斯大林是否会对波兰采取公正行动，以及对于远东问题曾作出的安排，是否同意美国的见解。^①

这无疑就是尽管有威廉·菲利普斯令人印象深刻的赞助，国务院5月初解决“赫尔利问题”的尝试仍徒劳无益的原因。由于这一尝试未获成功，国务院不得不把（又一次“软弱的”）行动局限于寄给赫尔利一份4月18日政策备忘录的副本，并告诫他让蒋介石及其政府真正弄清，我们的支持不是一张“空白支票”。^②问题在于，在国务院执行具体事务的一层官员里甚至没有人知道存在着关于中国的雅尔塔协定——这一定使赫尔利感到极大的乐趣。国务院在协定达成过程中，可能除了斯退丁纽斯之外，没有受到咨询，也没有熟悉远东事务的国务院代表出席雅尔塔会议。直到1945年7月（五个月以后），远东司司长在他随美国代表团去波茨坦会议的

① 《中国的纷乱》，第308—309页。

② 见本书第150页注①，第151页注①。

途中，才知道这个协定。①

我再来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美国1944和1945年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这一事实至今还不太清楚？我认为，答案不在政策文件和政策讨论之中，因为，这些文件和讨论表明，给马歇尔指示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②相反，答案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冲突之中。因为，正是那些政治攻击造成的高压，明显地使民主党政府在沉默中寻求避难所。顺便说一句，人们也许还注意到，赫伯特·菲斯说过这样一句饶有意味的话：“就政治手腕而言，很少有比既支持一个外国政府，又同时要违反它的意愿来改变它更

① 但是很奇怪，在赫尔利需要找合适的替罪羊时，这些事实并未能阻止住他提出下列说法：

现在有一种就雅尔塔秘密协定指责罗斯福的倾向。罗斯福总统死了，但是我可以说，他是无罪的。他在雅尔塔会议时是一个十分衰弱的人，在秘密协定中把中国交给共产党一事，是由年轻的美国人阿尔杰·希斯出色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们策划的。（赫尔利1950年9月28日给《大西洋月刊》的信，转引自洛贝克《赫尔利传》第368页。）

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希斯在雅尔塔的作用超过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秘书处职员的作用。

② 直接考察过档案记录的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了连续性这一要素，但是一般说来，没有给予重视。也许最清楚的陈述是在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298—299页中。邹谠也指出（该书第142页）“杜鲁门—马歇尔政策……只不过是战时政策的延伸……”。但是，他在这里似乎只是较狭窄地指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统一，菲斯更多地是从个人关系方面来看待“国务院持不同意见者”与赫尔利之间的分歧。他指出“远东问题专家继续提倡采用‘灵活和现实的作法’，但他似乎缩小了他们的主张已被定为官方政策的这一事实（参见《中国的纷乱》第273—274页）。

难的了。”①

不言而喻，对华政策起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当作出了集中美国国力首先打败德国的决定时，就在美国成为一个党派间尖锐争论的题目。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此事激起了激烈争论的风暴，人们纷纷指责对蒋发号施令的作法。罗斯福试图平息它，把它说成不过是“一场个性冲突”。②赫尔利1945年11月的辞职又掀起了一场风暴。国务院保护性的反应是再一次否认有政策分歧。③作为试图平息赫尔利的愤怒指责的办法，这样做也许是合理的，但其结果之一当然是使马歇尔的使命比实际显得更象一个新的政策冒险。

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垮台已经是不可逆转和接近于完成了。但是，对政府对华政策所进行的党派斗争

① 《中国的纷乱》，第272页。

② 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第505页。

当被迫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事作评论时，罗斯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语气温和。整个这件事情不过是一场个性冲突。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一些争吵一噢，很久以前了，它终于在几天前结束了。”它没有涉及政治、甚至中国政治。罗斯福对接连不断的提问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此事与战略问题无关，与政策无关，与租借法案无关，与运过驼峰的物资吨位，与赫尔利—纳尔逊使华，与高斯的辞职，与“所谓的共产党”也都毫无关系。它只是“个性”问题。

③ 最明显的例子是，贝尔纳斯国务卿1945年12月7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调查赫尔利的指控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的最接近于承认国务院和赫尔利之间存在分歧的话是：“赫尔利大使对那项政策最为重视的一个方面是，我们支持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远东政策调查》，第189—200页，特别是第191页）。

性质的攻击却没有表现出减少的迹象，相反，它们确实更加频繁和更加激烈了。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决定公布过去五年来美国在华活动和对华政策的档案。这次公布的文件集就是为人熟知的《中国白皮书》，它出版于1949年8月。它一直是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有价值的权威资料集。但它难免要受到编写它时的环境影响。

在新版《中国白皮书》的序言中，莱曼·范斯莱克指出：

决定发表白皮书的旨外之意反映了这样一种感情：既然我们不能再有效地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我们就应该被它纠缠住……政府坦率地希望这一档案记录，将显示出我们已经作了所能做的一切，我们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就要完全落入共产党之手一事绝不能归咎于美国的政策。发表白皮书是为了反击共和党的大量批评……①

到目前还增加了一种新的调子——共产党人在国务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问题。……以赫尔利1945年的辞职信为开端，出现了对某些职业中国问题专家的零星指责，到1949年气氛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因而白皮书是在就美国对华政策、在国际遏制共产主义、以及担心国内受到颠覆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的情况下发表的。②

不知是何原因，《白皮书》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着一系列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国务院准备的，但也得到

① 莱曼·D·范斯莱克为《中国白皮书》写的“序言”，见《中国白皮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没编页码的书页第5页。

② 《中国白皮书》，没编页码的书页第4页。

到陆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批准和认可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说明，1944年和1945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灵活的、有条件支持蒋的政策^①。毫不奇怪，这些文件的存在为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学者们所知晓。所有这些文件都或详或略地要么被菲斯、罗曼纳斯和森德兰，要么被邹谠提到过。但是，要分别等到《中国白皮书》问世18年和20年以后，当《外交关系，1944年》和《外交关系，1945年》有关中国各卷出版时，这些文件的原文才被正式公布。

国务院方面的这种沉默，已经造成了几个明显的后果。艾奇逊国务卿在他那封作为《中国白皮书》前言的致杜鲁

① 为了读者方便，以下是我已经注明出处的政策文件、备忘录和电报（并附上它们在本节第一次被引用时所附的脚注号码）：

1944年5月19日（国务院文件）第122页注①。

1945年1月12日（雅尔塔通报文件）第131页注①。

1945年1月29日（国务院文件）第130页注①。

1945年4月3日（国务院文件）第148页注②。

1945年4月18日（国务院备忘录）第149页注①。

1945年4月28日（远东司备忘录）第152页注①。

1945年5月7日（国务院致赫尔利电）第150页注①、第151页注①。

1945年5月29日（SWNCC 83/1号档案文件）第147页注①。

应该指出，这里所列举的，尽管包括了我所认为的主要文件，但没有包括讨论灵活政策的某些方面——如准备一旦在中国沿海登陆，就给非国民党军队提供物资——的文件和电报。例如，中国科“1月12日左右”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并“由国务院转发给驻华大使……‘因为它说明了对华政策的方针和国务院关于中国的想法，所以对大使馆是有用的’”（《外交关系，1945年》，第169—172页和注释27）。

门总统的信中指出：

当和平到来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面临着三种选择：

(1) 完全摆脱一切牵连；(2) 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以援助国民党摧毁共产党；(3) 援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多的中国领土上确立其权利，同时促使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来努力避免内战。①

事实上，还有第四个没有提到的选择：通过促使国共妥协来寻求避免内战，但使美国保持灵活地位，即基本上不对国民党或其他中国势力的扩张承担责任，并准备为使自己适应那个国家的进一步演变而调整自己的政策。②实际上，这种做法正是国务院于1944年和1945年关键年代中曾经采取而后又被遗忘的办法。

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把《白皮书》作为他们群众性反美运动攻击的焦点。这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对长远的将来却不是没有影响的。范斯莱克对此作出下述总结：

过去已经有许多共产党鼓动的对美国的批评。但在
中国仍存在着相当深厚的对美国的好感，特别是在城市
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间。作为在中国根除西方影响
的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中共现在开始消除这种好
感。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五篇文章中，全面地谴责了美国，特别谴责了白皮书。毛选的编辑们说，
这些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

① 《中国白皮书》，第X页。

② 其例见劳伦斯·K·罗辛格《白皮书提要》，载于《远东概览》1949年9月7日（第18卷，第18期，第205—208页）。

并“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这些话描绘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中共并不认为翻译白皮书有必要或可取。^①相反，他们几乎完全集中抨击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信中的下列内容：关于美国给予国民党援助的数量；关于美国已经做了所有能够支持蒋介石的事情的论断；关于“共产党领导人断然背弃了中国的传统”，并且屈从于俄国的说法；尤其是关于美国应鼓励中国向“摆脱外国枷锁”发展的声明。^②

现在谈一点不那么震撼世界的事情。《白皮书》这部美国政策史书中所作的省略，使美国某些官员在随后那些年的争论里处于多少有些易受攻击的地位。例如，（1945年）2月28日重庆大使馆全体成员的电报非常适当地包括在《白皮书》中，作为此电的共同作者之一，我认为，它作为政策建议，是值得受到如此注意的。但是在《白皮书》里，它被割裂开来，没有提供它的来龙去脉。读者无法知道国务院的负责官员也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看法，并且国务院本身曾强烈主张采取那份电报所建议的政策。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对于一个被围攻的政府来说，在就“失去中国”进行尖锐争论的时候，试图发表一个令人信服的客观描述来开脱自己，这样做大概是毫无希望的。然而，那

① 此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范斯莱克这番话发表于1967年，而《中国白皮书》早在1957年就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全文译出，并收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出版。——译者

② 《中国白皮书》“序言”，未编页码的第6、第7页。

时我也相信它将减少争论并因此产生有益的效果。^① 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预见到随后麦卡锡时代的恶毒攻击和公众的歇斯底里。^② 这项工作做得很认真，但是从卷帙浩繁的档案记录中选择材料势必将按切题的原则严格精选。到1949年，1944年至1945年的政策文件已经失去作用了。再者，这些文件反映的一项灵活政策被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人弄得模糊不清，并被赫尔利的言行有力地取消了。对《中国白皮书》的大多数批评来自对国民党友好的人士。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是，《白皮书》提供的不完整的图象使美国自己的官员吃了苦头，这些官员为了得到在《外交关系》一书中公布的完整记录，不得不等了二十多年。

① 例如，我欣然同意把我的报告的摘要收入《白皮书》附录之一（附录47“驻华外交官的备忘录，1943—1945年”，见《白皮书》第564—576页）。赫尔利的指责和我的报告选段的出版（它们是由诸如亲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这样的人士出版的），已经对我的观点造成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在我看来，公布这些报告的全文，只能是一件好事。

② 这里有一种反常现象，即不论提出多少合理的论点和客观事实都不可能使那些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们的怒气平息下来。例如，我们发现洛贝克——他在他的全书中似乎都在为赫尔利说话——用这样的叙述来否定《中国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书准确地遵循了史迪威将军、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乔治·艾奇逊在中国推行的政策……”（《赫尔利传》，第456页）。

就这样，黑白颠倒，事非混淆，合理的论述成为不可能。

第七章

来自现场的遭到否定的观点

前面四章已试图弄清到底什么是1944年和1945年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既然库比克博士说我“积极反对并暗中破坏”美国的政策，那么从逻辑上说，下一步就应该看一看我的报告和建议的内容是什么。我现在打算做这项工作，尽管按库比克博士采用的论战规则，这很可能是白费力气。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库比克博士把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说成是无限制地支持蒋介石。因而，在库比克头脑里，如同赫尔利将军一样，认为不利于蒋政权的实事求是的情况报告，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都是暗中破坏美国的政策。而且，预见到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被库比克博士机械地看作是“拥护”这个失败，这种心理活动所依据的逻辑有点令人费解。显然，它是以库比克博士下列信念为基础的，即导致“中国垮台”的直接原因，仅仅就是因为送上了这些批评性的报告。但是，库比克博士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说：“正因为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提供了几年后降临中国的悲剧的线索，所以，可以认为，目前美国远东政策的混乱状况无可否认地是与美亚文件有关的。”^①可以说，还从未有人声称驻外使馆人员的报告有这样大的能量。

^① 《美亚文件》，第113页。

库比克博士的推理方式为他提供了某些便利。既然库比克博士真正关心的是他所谓的这些报告的作用，那么，凡报告中含有他认为是贬低国民党、称赞共产党的内容，他就认为是重要的，而其他即便是报告的真正内容，在他看来也是无关紧要的。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论证这些报告提供的情报的真假虚实问题。可以指出，这种论证显然是没有的。^① 同样，对于那些分散在中国辽阔疆土上的、彼此互相隔绝的美国现场观察员对中国局势持有一致看法，某些学者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意义重大，但库比克博士并不认为这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些美国外交官的报告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对库比克博士来说，这只是表明可能存在合谋。

我怀疑是否有必要浪费时间去同库比克博士辩论他关于驻外使领馆人员报告的作用和驻外使领馆官员的责任的古怪概念。贝尔纳斯国务卿在驳斥赫尔利将军辞职之际提出的指控时，比较详细地就这几点提出了他的证词：

当然，遵守和执行其政府宣布的政策，是每一个美国官员的责任。但是，在各区政府的事务中情况不断变化，而且经常变化很快。当一个官员真诚地相信变化了的情况需要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

① 关于这点只要对库比克著述的脚注来源作一番检查就可明了。现有共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性质的大量西方学术著作都被完全撇开。卡尔·A·魁特夫的《中国共产主义简史》是一个唯一的例外，该书是根据人类关系地区档案为美国陆军准备的。载于《中国综合手册》(1956)第二卷，尽管库比克博士的兴趣集中在战争年代，却没有提到过如被称为《皮博迪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1945年7月的一份报告》这样权威的同时代的资料。这个报告最初作为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1951年听证会记录的《太平洋关系协会》一书的附录被发表，但1966年由莱曼·D·范斯莱克编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予以重印。

向他的上级阐述他的观点。

我十分不愿意看到一个国务院官员，不论是不是驻外人员，为了害怕触犯我或国务院其他什么人，觉得一定要抑制自己而不通过正当的渠道来提交一个忠实的报告或建议。如果到了那一天，我就会失去为了胜任我责任重大的职务所需要的实质性的帮助和指导。^①

讨论我的报告时所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报告的数量太多。它们作为对不断变化并经常迅速发展的中国形势的反映，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因此，在这里仅以一种概括的方式处理这些文件，在看来需要把事情说清楚时撇开严格的编年史次序进行论述，似乎比较切实可行。我认为，如果总的观点前后一致，这是可以允许的。尽管我将试图指明——并引述——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报告，我还是希望那些对更详尽的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去看这些报告的原文。^②

首先，有一件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即我完全明白我所预言的事情并不是都发生了，而且，许多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所预料的那个样子。再者，对于写报告，时间因素是重要的。我的情报并不总是正确的，报告经常是仓促写成的。它们经常是直接就当时的一个特定问题，或总的形势的某个方面

^①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政策调查》，第199页。贝尔纳斯国务卿这个声明的前后文特别提到了赫尔利对乔治·艾奇逊和我自己的有关报告所作的武断指责。

^② 附录一列出了（并标明了可以从哪些已出版的书中获得）所有我在延安写的报告，以及大量其他由我起草或参加起草的文件，这些文件可以说明我的观点的发展线索。人们将会注意到，《美亚文件》是获得我的延安报告的一个很好的来源（如我已指出的，这是因为库比克博士大量使用了我的私人文件），但它缺少大部分其他文件。《外交关系》有关各卷有一些从大多数极为重要的报告中得到的材料，但是大概由于篇幅原因，它们往往只包括摘要和结论，省略了事实叙述和论据。然而，要想把所有文件都汇编起来，有时是不可能的。许多备忘录从未发表过，我也没有副本。文件中谈到的我的一些详细想法仅仅是那些年里经常热烈地进行的讨论、辩论和争论的一部分内容。

写的，因此很少是综合性的。我毕竟是一个现场报告员，华盛顿研究分析情报的专家和制定政策的人们可以把零散的情报综合成一个全面的情况。同样明显的是，在写这些报告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它们有一天可能会发表。这些报告都是直接寄给国务院处理中国事务的人和华盛顿的其他人的，他们对中国形势的背景已经有所了解，并熟悉与讨论中国事务有关的词语。所以，这些报告并不是作为政治论文的权威著述而写的。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不足，在这些报告写成后的这些年中，我没有感到必须修改这些报告的观点或是因写了这些报告而内疚。当然，如果我今天来写它们，我相信，尽管在总的建议内容上不会有很大区别，但在形式和细节上将会有所不同。然而，如果要重写，我就会是以一个61岁而不是35岁的人来写，由于事后（也许）变得较为聪明了，并远离了那些震撼世界的事变，因而可能倾向于采用一种较为稳重的陈述方式。历史毕竟将撇开事后的看法和解释来判断这些报告是对是错。就我自己来说，这些报告是我所作的一项认真的努力，即要把我当时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以及我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如实报告给国务院，并提出我认为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最有利的建议。^①

① 读者可能对于过多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用法从个人角度上讲是不适宜的，使用起来也常感不方便，有时还会被人误解，但选择“我”而不是“我们”还是经过审慎考虑的。这不是企图给库比克过度地夸张我所扮演的角色以任何表面上相符的证据，远非如此。读者如果稍微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稍微熟悉象《外交关系》文件集这样的基本资料书，或者甚至是库比克博士自己选的文件，也将会认识到，一般来说，我这种观点和建议不只是我个人的。然而，我的讨论虽是26年前或更早以前的事，但其后果却严重影响到美国当事人以后的生活和经历。所以我认为，除了涉及到当时共同签署的文件时，我应当只以我个人的名义讲话。

在重庆发表的观点

中国的内部形势对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到1943年初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斗争既不利于把预计要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抗击日本的长期战争进行到底，也不利于实现我们希望中国在战后能实现的和平统一和稳定。既然共产党——他们显然在华北日军后方变得强大起来——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美国就应该明智地去了解关于他们的第一手情况。我此时所持观点的最完整说明表现在我临时在国务院受到咨询时，于1943年1月23日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在第六章一开头已经提到过它）。^①

我在4月回到中国后，被派回西北，我曾在那度过1942年的夏天和秋天。^②在兰州呆了两个月后，我被召回重庆就职于史迪威将军的参谋部。这使我处于一个对文官和驻外使领馆官员来说是少有的地位。具体规定给我的工作比较少，我也很少被临时分派任务。我一直担任驻华陆军总部与大使馆之间的联络员，还充当驻华陆军总部与中共驻重庆代表之间的联络员（为了从华北获得情报）。这项工作的自由性和一些被分派的任务给我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旅行机会：成都、西安、阿萨姆、昆明之行和一次靠吉普车、帆船、骑马和步行穿过了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的长途旅行（我是作

① 见本书第120页注①。可以得到的原文见附录一，第3部分（a）。

② 在这第二次西北之行前，大使馆以“私下的”和“非正式的”形式告诉我，如果我发现有可能溜过或绕过国民党的封锁（例如，沿黄河旅行，从警戒薄弱的北部进去）进入陕西的共产党根据地，我就应该这样做。我发现，封锁太严密了，而且在这些战略地区，外国人太引人注目了，因此很难有成功的希望，甚至连要求去宁夏参观的请求都被中国当局断然拒绝了。

为一位技术官员的向导作此旅行的。这位官员的任务是检查公路，也包括那些为阻止日本人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而已使其“不能通行”的公路）。

到1944年春，战争在中国进行得很不顺利。日本人在华东的挺进正在造成威胁。史迪威在缅甸北部的艰苦战役中缓慢前进，但是蒋介石却迟迟不肯答应派美国训练的Y部队参加越过萨尔温江向西挺进的战斗。由于开罗会议的严重后果和修改了在那里达成的盟国计划，我们在重庆卷入了下列各种问题的争论：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财政援助、在成都建立B-29飞机基地，以及常常提到的越过“驼峰”运送的物资的吨位及分配。^①

这时我在重庆定居下来了。作为一名顾问，我从侧面卷入许多在美国和中国官员间进行的谈判，并设法在陆军和战略情报局、陆军情报局等其他机构之间促成更好的协作。我偶尔被指派担任机密会议的译员或机密文件的起草工作。^②但是我的经常任务逐渐成了向参谋长和助理参谋长（负责情报工作）提供政治背景情况和参考意见。在有关各方面的同意下，我开始编写个人署名的非正式的备忘录。具体要求我写的是关于某些题目和人物的报告。但我也被鼓励提交任何看来是及时的、有意义的或对驻华陆军总部有用的问题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原件当然是交给总部本身。第二份提供给大使馆，它随后决定是否收入它自己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第三份给约翰·戴维斯，他在任职于史迪威参谋部的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可参看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8章。

② 其例可见本第72页注①。

外交官员中地位最高，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印度。①

3月20日，由于缅甸战役胜负未卜，蒋介石又顽固地不许Y部队驰援。美军驻华总部中出现了一种危机感，我在报告中说了下面一段一般性议论的话，涉及联盟中的问题以及认为实行有交换条件的政策也许可取等等，便是这种危机感的反映。

〔蒋介石期待美国替他打败日本，同时，他还期待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给他外交支持，增强他的国际地位，并依靠美国向他提供财政援助和帮助他改善并装备军队来增强他的国内地位。蒋介石和国民党现在主要考虑的不是抗日战争，而是继续争夺内部权力、消灭共产党，以及打好几乎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内战。〕

蒋介石相信，利用我们的软弱和我们在对付他的时的步调不一，加上欺骗，他就可以逃避美国迫使他改变这种方针的压力。他相信我们对他承担了如此多的义务，以致他可以“鱼与熊掌兼得”。〕

……蒋介石是依附于美国的，如果美国真决定要蒋介石做什么，然后对此采取强硬态度，蒋介石将同我们合作。除非总统对我们的政策、要求作出决定，并让蒋介石明白无误地知道它们，否则，他将继续照旧行事……

这可能意味着积极参与中国事务。但不这样做中国就不能发挥一个盟友应发挥的作用。并且，我们这样做可

① 戴维斯和我以一种松散的方式合作，我们就准备考察的领域和题目进行商量，一般避免重复劳动。这种合作的结果之一是，我自己的报告是不完全的，其原因在于，我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的最好表达也许常常就是戴维斯已经写成的某些东西。还应该记住，我们的报告与大使馆的报告并不是互相配合的，我们没有接触大使馆的文件，并经常不知道大使馆的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和表示的看法。

以拯救中国。^①

在这方面，如我们从第三章所了解到的，罗斯福的信采取了“强硬”态度，而我的备忘录直到他4月3日给委员长的电报发出十天以后才到达华盛顿。^②

5月，重庆得知华莱士副总统将在6月底身负罗斯福总统交给的同委员长会谈的特殊使命访问重庆。^③我们未获悉这次访问的详细目的。看来好象有这样几个问题要讨论：正在恶化的中国形势和我们在谋求蒋介石合作方面遇到的困难；中国和苏联之间最近的紧张局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持续封锁；以及蒋介石拒绝罗斯福（在2月提出的）派美国观察员到延安的要求。由于缅甸战役仍然处于危急状况，看来史迪威将军不可能到重庆来。^④我们不能肯定，在将军不在的情况下，

① 附录一，第3部分，(b)。《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省略了括号中的段落和另外一些批评蒋介石的话。这大概是根据这样的编辑原则做的：“……对文件的某些省略是可以允许的……以避免不必要地触犯其他民族和个人。”（同书，第4页）库比克博士印了全文。

② 见本书第69页注①。说到鼓吹执行交换条件政策，邹谠引用了一个权威性的相同事例。1949年4月21日（南京未经激烈抵抗就落入共产党手里的前一天），保守的国民党CC集团的头子陈立夫在广东与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进行了一次会谈：

……〔陈〕乐观地相信，国民党凭着上下团结一致，将能聚集足够的支持以坚持斗争，直到美国再一次被说服介入中国内战。如果有那样一天，他希望我们坦率地在桌上摊牌，明确地提出我们对自己给予的一切所要求的交换条件。他说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的一道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18—119页和《中国白皮书》第309页。）

附带地说一下，库比克博士以为“CC集团”指的是“国民党政治中的中共集团”（《美亚文件》，第527页），然而，它实际上是指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极端对立面，即陈立夫、陈果夫二陈兄弟集团，二陈代表了国民党极右翼。

③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227—230页。

④ 我们的预料是正确的。华莱士和史迪威没有见面，“委员长在重庆，陈纳德在昆明占去了华莱士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史迪威的参谋部很难找到机会提供战区司令的观点，华莱士也不认为他能安排时间去访问在缅甸的史迪威将军”（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75页）。

华莱士是否会同总部磋商，或希望从总部得到什么情况简介。为了防备万一出现这种需要和机会，我开始准备一份一般的情况简介（当然，略去我没有资格谈的纯属军事方面的情况）。

我一着手起草文件就大大超出正常的情况简介的篇幅。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即将出现危机。例如，长沙于6月13日落入日本人手中，我们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显然已无法保住（如第三章已经指出的，这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7月初建议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背景），局势的紧迫要求努力分析中国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美国政府如何应付这种局势的建议。这实际上是试图全面考虑和搞清楚我在三个月以前，即3月20日的备忘录中简要提到的问题。我起草的备忘录在各单位传阅。大使馆、财政部、陆军情报局和陆军的很多人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建议。这样，最后完成的定稿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产物，尽管我同意它包含的所有内容。它是在6月20日，华莱士到达重庆的那天完成的。这个报告给了他一份，但是他紧张的日程安排可能意味着他从未读过这份文件。当然，大使馆也收到了一份副本，他们把这份副本转给了国务院。

该文件在许多人对中国危急的形势明显感到担忧时（7月初）到达华盛顿。远东司批上赞成的评语后把它转呈给国务卿。我后来获知这个文件送了几份给白宫。这个文件好象还被复制了一些副本，在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几个部门中相当广泛地流传。^①几个月后，我甚至在一些杂志的文章中发现了类似

① 不知什么原因，在华盛顿复制的大多数副本既不准确又不完全。备忘录的复印件日期不一致，一些段落在一个副本里有，在另一个副本里却没有。一些副本带上了“机密”的分类号，并省略了我的名字（有一个副本匿名地署以“一个密切注意中国情况的观察家”）。然而，我还见到另一个省略了所有密级分类号的带有我的名字的副本。总之，我是此文件的作者以及我的基本观点，在当时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尽管我自己在四个月后

的调子。^①最后，9月13日，国务院指示驻重庆大使馆通知我，备忘录受到了表扬。^②（在赫尔利听到为他去中国而向他简要介绍的美国政策之后几乎一个月作的）这一表扬清楚表明，华盛顿并不认为这个备忘录是暗中破坏或反对美国的政策。

备忘录中不到一半的内容是分析1944年国民党的缺点和弊病，其余的部分谈到中国的积极的政治因素，并且建议美国实行一项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实现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的目标。然而，正是批评性的分析那一部分看来吸引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并且经常被引用。^③

才到达华盛顿）。由于在华盛顿的中国情报机构已被证实是有效率的，也由于传阅这个备忘录的方式有些不同寻常，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设想，驻华盛顿的国民党代表也获知了这份文件，并可能得到了它的副本。

① 例如1945年1月的《科利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泰丁斯记述稿》，第2328—2329页）。这是我同盖恩认识以前四、五个月他所写的。但是，我看我没有理由担心会受到牵连。至少是从1943年初开始，白宫、国务院和陆军情报局就已看到需要使美国舆论对中国持较为明智和现实的态度，而向美国作家提供背景情况是一个公认可行的作法。在这个备忘录中，我自己就极力主张定期地，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这样做。（见附录二，第三部分，D/2/d）

② 国务院1944年9月13日致重庆大使馆的第807号非机密指示（我有其副本）中说，“谢伟思先生的非常及时而又精辟的分析，他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大使馆在转呈备忘录的函件中提供的认真评价和表达的深思熟虑的观点对于国务院考察目前中国的危急形势、这一形势与对日战争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总利益和总政策等，有着特殊的价值。”我从未见到上面提到的大使馆的评语。

③ 例如，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64页和注释9；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95—196页和注释66；哈里德·M·维纳克：《美国和远东：1944—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26页；张君励《中国的第三势力》（纽约，布克曼合营公司，1952年版），第98—100页（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创始人和主席张先生评论道：“我认为，蒋介石的大多数狂热支持者都不能不同意对这个时期的中国病态政治形势所做的这一精辟分析。”）；鲁珀特·埃默森：《从帝国到国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64页；陆培浦：《国民党1949年的垮台：是征服还是崩溃？》（波士顿，D·C·希思公司，1965年版），第27—32页（尽管陆先生从“（二）”开始长段摘录，他却没有告诉读者，他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长得多的报告的一个摘录，也没有说明就是在在他摘录的那部分文件中也仍有删节。）

这个备忘录尽管（或者说正因为）尽人皆知，却未被收入《外交关系，1944年》，书中也未提及它。零散的摘录（总共大约有全文的四分之一）在此之前被分成几段收入《中国白皮书》附录之一“驻华外交官员的备忘录”。^①此备忘录的两种版本已由其他地方而不是国务院发表，但都不是原件。它们显然是根据华盛顿政府有关机构复制的副本付印的，既不完全又有许多错误（例如把“颠倒”印成“新闻短片”，把“社会”印成“安全”）。^②备忘录很长；但由于没有完全和准确的本子可供参考，我把它收入此书作为附录二，概述整个备忘录是不容易的，但从下面这几段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的形势正迅速地变得危急起来，日本人曾打赌说，国民党宁愿接受慢性自杀，而不愿冒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进行战争所可能造成的政治风险。他们赢了。中国存在着日趋严重的内部崩溃。国民党表现出无力阻止这一崩溃：它的内政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政策以及外交政策，实际上正在加速这一危机的到来。造成这种日趋

① 附录47，《中国白皮书》，第564—576页。

② 此备忘录的各种来源见附录一，第三部分，(d)。其中一种版本是由库比克印的，据说是《美亚》杂志社里发现的。他指出（见《美亚文件》第587页注释7）这个文本有一处是不全的，但是没有指出还有其他几处也不完全。第二种版本略有不同，它是我在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由我自己提出的，因此，它就出现在《泰丁斯记录稿》（第2035—2046页）上。当时，国务院在自己档案中找不到这份备忘录（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提到大使馆转呈该备忘录的那份函件）。而我能得到的唯一一份副本显然是由战略情报局复制并在其内部传阅的本子。《泰丁斯记录稿》的本子后来被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重印在它1951年听证会的记录《太平洋关系学会》（第826—827页）上。这两个断章取义、不完全的版本于是就被印在三个地方：其中两个是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印的。

灭亡形势的基本原因是，日益丧失了民众支持（民众由于实际经历了战争，变得更有政治觉悟）的国民党，竭尽全力地保存它缩小了的实力，并将这件事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

这些政策，如果不能被它们激起的国内反对和外国施加的积极影响所制止，肯定将导致一场崩溃，这一崩溃将损害对日作战和我们在远东的长远利益。我们不能牺牲这些利益并撤离中国。但是如果按照国民党提出的条件支持它，我们将只能得到总清算之前的短暂喘息。所以，继续以过去那种杂乱无章的方式提供美国的支援是毫无益处的。

中国所有重要的军事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的核心是民主改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支持放在执行一项积极促进这种民主改革的政策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必须依靠中国内部重要的但目前尚隐而未现的力量来实现。因此，要贯彻我们的政策，就要依靠我们密切协调在中国的行动，适当地向国民党暗中施加压力和谨慎地鼓励那些民主势力。

这个要求采取积极政治干预的建议在1944年看来可能比今天看来更加背离通常的、旧式的、不干涉的外交方针。但是它比起谋求得到美国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我的文件到达华盛顿之前，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并由罗斯福批准的——肯定是一个不太直接的干涉方式。除了以积极而不是被动的方式来叙述外，我的建议与国务院自己在1944和1945年起草的关于长期政策的满怀希望的声明在实质上没有多少差别。也许主要差别在于我主张把长期政策变为短期政策。

在延安发表的观点

华莱士的访华完成了一项工作，即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国派一个观察组到华北共产党地区去，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对此一直持拒绝态度。^①在3月初陆军部就已经同意国务院关于让我参加这个小组以提供政治报告的建议。^②于是，我作为第一支小分队的成员，7月22日飞抵延安。^③在8月7日飞抵延安的第二支小分队中，有雷蒙德·P·卢登，他和我同是隶属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外交官，他一直在第20轰炸机队司令部工作，该队的B-29远程轰炸机执行从成都附近的新建机场飞越华北到日本和满洲进行轰炸的任务。

首要的，也是基本的问题，是对共产党的实力作一个实事求是的估价。估价的一个标志应该是他们控制地区的范围。过去在重庆的三年里，我与几个从日本占领城市逃出来、经过共产党地区到达重庆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作过广泛深入的交谈，而到了延安，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共产党所声称的他们取得的成就。观察组用了几周的时间，每天与共产党某个部队的司令员或来自共产党某根据地的代表举行讨论会。然而，任何方式都不能如实际观察那样真正令人信服。几个小组被派到游击区去。由于是步行，这个工作极为耗费时间。一个小组在晋绥边区呆了七周，卢登是与另一个小组一起走的。该组用了四个月参观访问了晋察冀边区，行程约1200英

①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460—463页。

② 同上书，第345、346、355、357、373、374页。

③ 关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一般情况，尼包瑞德：《迪克西使团》。

里。^①事实上一个偶然的因素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这就是由于美国空军作战活动不断增加，中共控制区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发生营救美国空军人员的事情。随着情报的积累，我提交了许多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范围的报告。这些报告的最后一份，也是在最完整的情报基础上写成的一份，是在1945年3月17日准备的：

甚至在美国观察组到达延安与共产党军队司令部建立了直接联系之后，对于共产党声称他们有效地控制着名义上由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中的农村地区的说法，观察组还一直迟迟不敢相信。在我们亲眼目睹之前，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共产党宣布的占领区域甚至使那些努力收集了过去得到的所有关于他们活动的情报的人们感到惊讶。

由于缺乏人员，又没有空军援助这样的便利条件，而且是靠步行，因长途跋涉，致使观察小组在日占区后方调查众多的共产党根据地这件工作上，进展比较缓慢。然而，观察小组的官员们已经调查了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冀西（包括对北平、保定地区的访问）。

美国其他组织的官员访问了汉口地区和浙江北部。

但是，对我们核查共产党区域范围帮助最大的，是许多在这个地区安全降落的美国飞行员（现在大约有70名）。

所附地图上标注了奉命执行任务的美国观察员和获

^① 关于卢登写的有关这次旅行的报告，见《美亚文件》第1329—1342页。（另见《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00页和212页。）他写的另一个报告《八路军正规部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发展》好象未被刊印。

救的飞行员走过的大致路线。（一些飞行员在广东附近的东江共产党地区遇救，但他们的旅行路线没有画上，因为这个地区比较小，也为人们所熟悉。）

人们会注意到，走过的路线除了山东半岛（这里显然还不是空军活动的场所）外，包括了所有主要的共产党根据地。从他们被救的地点算起，某些飞行员在共产党控制区旅行达1000英里。

某些飞行员在共产党的保护下，从山海关（位于满洲边界的正南面）附近的沿海地区，绕过北平，到达延安。另外一些在苏北沿海着陆，他们的旅行横越了苏皖两省。另外一组飞行员正好落在与南京隔江相对的地区并被带到山西。

共产党在邻近上海、汉口、广东、南京和太原的地区都营救过飞行员。这些地方都是日本在中国的重要基地。而飞行员在距日本飞机场或碉堡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安全降落并得救。

美国人安全地穿越日本人控制的铁路有一百多次。

显然，要使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穿越中国旅行而不暴露是困难的。但是除了在穿越铁路或在非常靠近日本人的地区，实际上所有的旅行都可在白天进行，而不用做任何隐蔽。美国人在沿途经常受到公众的欢迎，并参加群众大会和发表演说。根据地出的报纸也提到美国来客的旅行。一些小分队甚至继续穿着他们的美国军服而未换上中国服装。

穿过没有被日本军队占领，而由中国人牢固控制的地区的旅行，有时要化一周或更多时间。

我有机会与之谈话的遇救的飞行员们和观察小组官

员们一样，对他们所接触到的共产党军队印象良好。这些人获得了迄今少有的机会，对共产党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观察，这使收集和汇编他们的报告成为关于中共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情报来源。

以下结论现已证明是正确的：

(1) 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2) 我们过去对“日本占领区”的看法应该修改。日本人仅仅掌握了一付没有肉的骨架，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是由我们一边的军队控制的。

① 可以找到的已发表的原文见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7号报告。提到的地图已找不到。但是，一份共产党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综合性地图（我们认为一般来说是可信的）见于哈里森·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年版）第122页前的插页，不幸的是，在复制时版面大大缩小了。根据同样来源的一个清楚得多的译本，可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重印的《皮博迪报告》的卷首插图中找到。

共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我准备于1944年10月离开延安去华盛顿的时候，曾给我一份同样地图的副本（手绘的，大约 3×5 英尺）。当我收到它时，我问叶将军是否应该把它作为保密材料。叶笑着回答：“完全不必要；日本人很清楚我们在那里。”但是这份地图的比例尺是1:2,000,000（大约一英寸代表32英里），没有标明部队所在地，并且几乎没有进行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地形标志和其他细目。我到华盛顿以后不久，应邀参加了陆军部军事情报局的“汇报会”。这份地图引起了很大注意，因为它比军事情报局当时已有的所有地图更为完整而具体。我欣然同意了陆军部借用这份地图以进行复印和领导的要求，当我在几天后再到五角大楼拿回这份地图时，我惊异的发现，它被盖上大量说明它是正式机密的密级印戳。我的抗议和解释毫无作用，聚集在一起的上校们严用地坚持，由于它“标有盟军的位置”，所以需要这样分类（尽管所涉及的“盟军”并不要求这样的分类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然而，我获准保管叶将军给我的地图，并大概还获准根据我自己的良心斟酌决定谁可以看它。当然，事实上任何能买到或借到福尔曼的书的人，都能立刻心满意足地看到同样的地图，而不会冒违犯安全禁令的风险。

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很分散，各个地区之间相互差别很大，从贫瘠的、人口稀少的山区到富庶的、人口稠密的华北和华东平原都有。中国的人口统计一般来说是不可信的，即使是可信的，精确地划出游击区的范围仍然是个难题。这些游击区双方都没有充分控制住。共产党宣布的他们的人口的估计数字从1944年8月的8,500万稳步增长为1945年3月的一亿。^① 我们当然认为这些数字是最乐观的数字，但是，它们还是说明一定的问题，不能随意置之不顾。它大约是30年代江西苏维埃时期宣布的各个共产党地区全部人口最高数字的十倍。^②

在中日战争之前，共产党仅掌握着比较小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座落于其中），并拥有一支大概9万人的武装部队。^③ 这种领土和人口的增长是在战争条件下，在日本侵占区后方实现的。它是共产党在没有外部人力、物力来源的条件下，粉碎了日伪军和零星国民党军队试图占领、控制、管理

① 据证实，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地区扩大得相当多。其例见附录一，第二部分，第8号报告：1945年2月7日卢登的备忘录（《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12—215页）；以及爱德华·E·赖斯1945年5月30日发自西安的第24号函件（同书，第397—398页）。

②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伦敦，维克托·高兰公司，1937年版）第82页。所有苏区的人口有9百万，这一数字是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毛泽东说，江西苏维埃本身人口的最高数字是3百万。斯诺指出，这些数字比已发表的一些估计要低得多。“当我向他引证有‘3千万’人民生活在中共苏维埃政权之下这一数字时，他笑了，并说‘当我们有这样大的地区时，革命实际上就已胜利了。’”参见查尔斯·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权力》（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页注释1。)

③ 《西行漫记》，第271页。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在1937年的力量的数字是2.6万（何应钦将军1944年9月向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提供的日期标为1943年8月的备忘录，见《美亚文件》第911页）。

这些地区的军事活动而成功地取得的。显然，这首先需要一支有效的军队——比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所拥有的大得多的军队。这样，军队就成了现在要接着研究的另一个题目。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问题一样，我们在延安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得到了那些有机会直接观察共产党军队的美国人的证实。这些美国人在实际战斗和行军中，在广泛分散的地区进行现场观察，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报告；这样，情况就逐步变得更加清晰了。这些报告的结论与同样是根据直接军事观察而写的、关于大多数国民党军队的体质、士气、一般作战能力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①我自己只是偶尔报告过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但有关这方面的报告很多。《皮博迪报告》“中共军队”一章的结论也许就足以说明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了：

美国观察员们的一致意见是，中共正规军是一支年轻力壮、营养良好、服装整齐、饱经战斗锻炼的志愿部队，它有良好的体质、很高的智力水平和非常高昂的士气。尽管这些部队的训练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差得可怜，但考虑他们现有的能力，训练还是相当好的。军事情报机构就其效果而言也是好的。共产党军队最为缺乏的是装备。

共产党军队突出的弱点是：缺乏足够的小型武器弹药，缺乏大炮，缺乏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普遍缺乏通讯设备，特别是在团级以下单位缺乏无线电通讯联

^① 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观察员写的报告中，从未对共产党的体质、士气、领导或一般战斗素质发表过批评性意见。大多数的批评来自从未见过他们的人（象赫尔利和戴德迈），这些批评是针对中共军队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武器、装备）。他们怀疑共产党由于装备和训练不足，是否能够或愿意对装备好得多的日本人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络，组织复杂而不正规，军官伤亡严重，因而下层领导薄弱……

然而共产党军队的这些缺点，由于某些组织上的优势而部分地得到了弥补。共产党军队的小部队，由于携带着尽可能轻的装备，有高度的机动性，非常适应游击战争。这些小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是着眼于独立作战的。它们在农村活动，显然是因为它们得到当地居民的充分支持。这有利于迅速分散和运动。军队的组织方式使共产党可以通过一个中心指挥部，在现有的通讯设备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内，调动这些独立的小部队协同作战。这个指挥部不仅指挥着该地区的正规军，还指挥着地方部队、其他民兵队伍和全体参加了人民自卫队的居民。共产党宣称：贯彻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军队的高昂士气和良好纪律，以及人民群众对军队全心全意的支持与合作。

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可以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看。第一，共产党能够在慢慢地发展他们的实力和补给的同时，无限制地继续实行现在的骚扰日本人的计划。第二，他们不能独立进行把日本人驱逐出华北或华东的决定性战斗，除非日本人的地位已严重恶化或接近崩溃边缘。^①共产党在领土、人口和军队方面已获得显著扩大这一事

① 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1945年7月的一份报告》（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05—207页。到准备这份内容丰富的报告时，已可以从许多在其他共产党地区活动的美国观察员那里得到报告。这些地区是以延安地区为根据地的观察组没有到过的。其例可见一个在新四军活动的空军观察员写给战略情报局的很有意思的报告，它大体上证实了延安观察组所报告的大部分情报（《美亚文件》，第1312—1322页）。

实越是清楚，搞清这种扩大是怎样实现的，在政治力量上它意味着什么，群众心甘情愿继续追随并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未来预示着什么，就越加重要。

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日本的侵略。^①与共产党人在江西时期未能取胜的内战相对照，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抵御一个可恨的外国入侵者的民族战争。这使他们得到许多支持，特别是来自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毛泽东仍很有远见地选择了日本人的后方作为他的战场。首先，这可以保证直接打击敌人。日本人和他们后来的傀儡军起码需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和从农村获得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共产党开展的组织和控制农村的活动，使日本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随着战争一年一年展开，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未受到袭击、劫掠和破坏——在很多地区，大多数村庄多次遇到这些暴行。在游击区，战争确实进入了每个农民的家里。日本人残酷无情的手段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起到了加强共产党号召力的作用。相比之下，对一个国民党后方的农民（例如象在没有遇到入侵的四川）来说，战争几乎只意味着经常担心如同被判死刑的征兵、有增无减的捐税、以及饿得半死的军队进行的无休止的勒索。其次，在日本人后方进行的战争只能是运动游击战，这是毛和共产党最熟悉和精通的战争方式。最后，这使共产党有一个避开国民党干扰的比较自由的活动地区。

显然，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尽管十分重要，但它不能完全解答为何共产党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一问题。考虑有两种因素似乎与此有关。第一个因素是，长期苦难深重的中

^①日本的侵略使共产党能以民族主义进行号召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确实是十分明显的事。因此我在报告中，往往只是顺带提到这个问题。如读者将要看到的，我将集中更多的精力讨论共产党获得民众支持的其他因素，我相信这些因素在对日战争结束后还可能会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

国农民常常被排除于政府之外，他们不关心政治，没有奋起保卫祖国的传统。第二，在某些时期——战争初期，以及后来国民党徒劳无功地试图重新控制日占区后方某些地区时，农民可在支持政府还是支持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但农民总是支持共产党。我在一份试图分析新四军取得引人注目发展的原因的一份备忘录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新四军在华中、华东活动，在那里，国民党进行竞争的因素比在华北八路军地区作用要大一些。

(1) 例如，也许有人认为，人民决心与外国侵略者战斗的爱国愿望是共产党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对中国农民（它是我们所涉及范围内唯一重要的阶级，因为它的数量在中国人口中占压倒优势，而且共产党必须完全离开城市进行活动）来说，积极的个人抵抗这一思想是全新的东西。过去，农民认为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一种他们要忍受的事物；至于他自己，归哪个政府管理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即使有哪一个比另一个稍好一点或稍坏一点，都与他无关，他对其也无可奈何。

所以，在他们愿意拿起武器之前，农民需要大量的教育和思想灌输，以及某种能证明这一行动会有利于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确切证据。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而国民党则不能，这一事实表明，共产党接近普通人民，并能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去号召他们……

(2) 此外，如果人民愿意战斗，他们几乎常常——当然是在战争初期——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和国民党一起战斗，或者是和共产党一起战斗。对他们来说，

转向国民党可能更为自然，因为它代表政府。但正好相反，他们转向了共产党——它越来越被政府当作叛乱者对待。看来，这证明农民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较好的理解和待遇……

(3)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它的“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直接的号召，他们传播一种具有煽动叛乱性质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给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暴动以动力的那种相同热情。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种说法，甚至国民党都不屑于提出。如果他们这样说了，每一个在共产党游击区旅行过的外国观察者都会用实例加以驳斥。共产党甚至没有积极地鼓吹共产主义，尽管不能否认他们有时使用不太高明的手段，试图建立对共产党的支持。

(4) 还可以说，这种民众支持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善于宣传。共产党人是这门艺术的行家，但这只是部分原因，而且仅仅是较小的一部分原因。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年多，没有实际结果的纯粹的宣传不能那样长久地掌握住不易激动、讲求实际的中国农民。此外，共产党吸引他们的支持者参加的游击战争对农民来说，是所有战争形式中最艰苦的一种，因为整个地区始终都是战场。

(5) 另外一种意见，是说共产党强迫人民支持他们并参加他们的军队。这种说法由于明显地站不住脚，因而很少有人提起。共产党军队在战争开始时人数不多，他们没有强迫人民就范所必需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军队目前仍然不多。相比之下，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大后

方的国民党统治区，任何一块面积相当于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的卫戍部队数量都要大得多。显然，共产党军队不需要把大批军队用于维持自己的后方，但是如果它实行国民党那样的征兵征税政策，并同样受到由此导致的土匪和内部动乱问题烦扰的话，它就可能会需要那样做。不言而喻，只有得到大批非正规的辅助部队的积极支援和参加，这些较小的正规部队才能成功地打退日本人，并控制住这些地区。而这些非正规部队的性质，只能是志愿部队。共产党宣布拥有2百万以上的地方志愿兵，即民兵，他们是抵抗和骚扰敌人的一支活跃力量。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不过目前我们所能搜集到的证据表明，共产党的这类统计数字不是浮夸的数字。这种类型的组织靠军队的胁迫是建立不起来的，也无法使它有战斗力的。而国民党连说也没有说过他们有这样的组织。

3. 因此，下列结论看来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农民支持、参加并和共产党军队一起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是因为共产党通过给农民一些明显的好处而使农民确立了这种信念。

这些利益势必表现为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获得改善。无论这些改善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它都必定是一——从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个术语的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趋向民主的。①

我说民族主义并不是共产党获得成功的全部原因，

①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22号报告，此处引用的部分（《美亚文件》第837—838页）没有包括在发表于《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的这一报告的摘要里。

其意思不是说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真诚的。毛坚持说：“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民。”^①我不认为我们当中任何认识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或在游击区旅行过的人，会怀疑这种感情的真诚。共产党喜爱用鱼水关系来比喻游击战争需要群众的动员和民众的支持。而群众的动员显然能导致比击败日本这一直接目标更远大的结果。我在1945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里试图对此加以概括：

他们〔共产党人〕坚持认为，有效地进行战争要充分动员人民，这就要求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给予他们政治权力，并进行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经济改革。……这个论点的基本原理是，共产党认为，作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战争必须同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向前发展的阶段，才能获得胜利。本性保守的国民党害怕战争的这种“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它意味着必须实行民主和经济改革作为动员民众进行抵抗的基础。^②

我听到过许多共产党争取民众支持的纲领，其重点和细节各不相同。我从与当时的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的几次长时间谈话中总结出一个可能是比较清楚、简明、系统的说法：

(1) 首先，必须在军事上赢得人民的信赖。值得庆幸的是，早期的干部都是有丰富经验的老游击战士。在第一次交战时，日本人不习惯他们的战术，没有准备，并由于曾经轻易地打败了中国其他军队而过于自信。第

^①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15号报告。这是叙述与毛的一次长时间重要会见的报告，此处引文见《美亚文件》第202页和《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08页。

^②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1号报告。

一年，他们每战必胜。此后，他们有了新的、训练有素的、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共产党经常使用下列策略，即在重要战役中使用最好的部队，而让新的部队充当后备队或者在敌人后撤时再投入战斗，以使他们得到锻炼。

(2) 进入一个地区后，第一步就是进行深入宣传，解释战争的意义，以获取民众的支持。

(3) 随之建立人民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包括农民、青年、妇女、民兵等等组织。建立所有这些组织是为了在抵抗敌人的斗争中发挥某些作用。但也鼓励他们关心自己的问题。例如，告诉农民，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

(4) 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并以它们为基础，建立民主选举的政府。最初建立在村一级。到某一地区已获得巩固时，这一制度就扩大到县政府，最后是根据地政府都由人民选举。提名和选举都在全体村民会议上进行。

(5) 某种形式的政府统治一经建立起来，就立即进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幅度合理。地租率的最低额是37.5%。但是在第一阶段，地租的减少一般不超过1/4。这样做是为了不致把地主推到日本人一边去。在新四军进入的许多地区，地主的力量很大；他们能够维持住他们的统治，在一些地区甚至控制了地方政府。在这样的地区，共产党稳步地加强群众组织，直到他们通过民主的方法获得了控制权。

(6) 由于新四军从不搜刮百姓，并通过群众选举干部消除了贪污现象，税收也减少了。

(7) 适当地实行累进税制。目前，占农民人口近20%的最贫穷阶层不纳税。富裕地主的最高税率一般不超过35%。

(8) 积极打击土匪活动，维持安定的秩序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在消灭土匪这一老大难问题上，除了武装剿灭之外，共产党的其他政策也是行之有效的。

(9) 与这些同样重要的是，事实证明军队和人民是团结一致的。军队把保护人民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到了经常以此决定它的军事行动的程度）。它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敌人干扰播种和收获。它尽量帮助农民干活。在可能的情况下，部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产品。它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任意向人民索取东西。它实行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要赔的纪律。它帮助人民战胜堤坝决口一类的灾害。当遇到欠收时，它把自己的口粮缩减到和人民一样的勉强糊口的水平。它还反复讲解军队和人民是“一家人”的道理。

(10) 不进行任何强制性的征兵。除了鼓励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民兵这样的组织外，它避免在刚刚控制一个地区时就开始征兵。

(11) 在军队内部采取了照顾军属的专门措施：强调关心伤员；禁止殴打士兵一类的行为；官兵之间除了纯军事问题外，建立了一种民主关系。

(12) 这个纲领的其他方面包括保护妇女权利、大力促进民众教育、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等等。^①一方面因为陈毅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尽管在共产党领导

① 见本书第195页注①。

人中政治和军事任务从未截然分开），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谈话集中在新四军的历史与成长上，所以他主要从军事观点谈问题。他着重谈到获取农民支持的措施，农民的支持为军队提供了人力，并使它有可能存在和发展。然而，在这个方程式中还存在另外的因素。因为虽然农民占压倒多数，但在游击区里还有其他在经济上必不可少的居民成份。与江西苏维埃时期不同，共产党正在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实行缓和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这些政策明显地得到了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的支持，并使他们的根据地有可能自给自足。此外，他们吸引了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且看来能够赢得并利用这部分人的支持，而这部分人是中国比较有威信、有政治觉悟和有影响的阶层。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都是可以产生重大政治作用的因素。由于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料，也由于我有机会同来自各个根据地的各类领导人进行长时间谈话，我写了题为《共产党对游击区根据地政治控制的发展》的报告，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分析。既然《外交关系，1944年》只发了此分析报告的极为简略的缩写件，把主要部分摘录在这里可能是适当的：

1. 在各个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具有占压倒优势的政治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相当于控制。尽管这些根据地的政府名义上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的组织形式、政策和施政纲领都是类似的。而且，这些政策都与共产党的政策相一致……

战争初期日本人向华北进攻时，华北大多数省一级和地方一级的政府崩溃了。当地的官吏和国民党领导人——常常是同一批人——同中央军一起逃往南方。许多富裕的地主也逃往南方，或在有外国租界的、甚至在已

被日本占领但仍然比较安静的大城市避难……

共产党军队在1937年和1938年向东挺进中迅速占领了这片从山西一直伸延到沿海的地区……

占领之后，需要建立组织严密的政府，以管理这些地区并使之能够成为支援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八路军政治部（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尽快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对农民作深入细致的宣传和教育以便得到农民对八路军政府的支持。但它不能立即产生出领导者。过去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领导人大部分已经逃跑了。有影响的当地居民（地主和绅士）有的逃走了（共产党的名称吓得他们甚至在日本人的直接威胁消除后还不敢回来），就是留下来的那些人也怀疑共产党的许诺，并且怀疑抵抗日本人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所以这些人谨慎地留在幕后。

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唯一重要的、有政治觉悟和经验的并且也愿意同共产党联合的集团，是大量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来自重要的教育中心北平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从1935年12月学生们在北平的示威游行开始，他们就一直要求抗日。他们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已经在抗战热情的第一次高潮中离开北平和其他城市，到农村去组织民众抗日。这些集团的大多数人在政府及其战败了的军队逃往南方后留下来。但是他们没有组织，只是个人进行活动，或者是和他们的宣传所能吸引到的追随者组成小团体一起行动。

这些人中有少数是共产党人，大量名义上是国民党员，还有很多是无党派人士。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赞成共产党在民主基础上进行人民游击战

争的计划。事实上，这正是他们已在积极试图着手进行的工作。显然，他们需要协作并组织起政府作为根据地。因此，这些集团的大多数人由于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形势的推动，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和他们联合在一起。

这样，最初的政府主要就由这两种成分组成，共产党和这些无组织的自由主义者，并加上为数很少的、留在这些地区并能被说服参加合作的有影响的当地人士。这些参加合作的当地人士也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为如下事实所证明：他们没有逃走，并且不是失败主义者，相信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不稳定的时期里可以抵抗住日本的侵略。

这些最初政权的“民主”性质，得到了共产党军队和这些自由主义集团的追随者的确认，也得到他们组织的大量群众大会的确认。这些群众大会经常通过（鼓掌）投票的方式赞成已经建立的政府。

在这个最初阶段，自由主义者是很有用的，大批急需的行政官员和县长都来自他们中间。由于民主机构还未建立，他们被政府委派到这些岗位，在最新占领的地区则是由军队的政治官员（他们除了许多其他职责外还履行我们军队中民政官员的职能）所委派。

聚集在自由主义者周围的大多数游击队也被吸收进共产党军队。这是中共军队在战争初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共产党不仅是建立这些政府的领导者，他们也是唯一的准备了一个完整的、考虑周密的纲领的集团。他们准备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决定采用游击战术在敌后作

战。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

(关于共产党采取这些策略的动机，以及他们为何选择一个可以独立于国民党而发动民众进行战争的战场等其它更为广泛的问题，不在这讨论范围之内。)

简言之，共产党的计划如下：必须唤醒冷漠的农民，使他们相信他们有某些直接和具体的东西值得为之而战斗。需要建立一个百业齐备、积极生产和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要能够在与城市隔离的情况下维持生存。这就需要所有阶级的支持，需要地主、当地资本家、手工业者、商人来进行合作。这些情况决定了必须实行温和政策。即使没有对中央政府作出实行统一战线的保证，实行偏激政策也会吓跑现有的数量很少的当地资本，使根据地经济崩溃，从而无法支持军队。实行温和政策，在政治上也是可取的，它可以使所有阶级共同抗日并防止日本人可能进行的分化活动。对于农民，最有效的措施是减租减息。但这种减少是适当的和有限制的，政府并通过保证农民交纳已减低了的租息来保护地主的利益。保证不干涉私人企业并帮助它增加生产。这样，就会消除地主、商人集团的恐惧。最后将建立起民主制度。这些措施将通过民主的方法吸引各阶层都参与政府，以便保护和增进他们在诸如减租减息和税收等方面的利益。

共产党领导人强调以下措施的特殊重要性：首要的和基本的措施是，有限度地减租减息，以赢得农民的积极支持，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第二，建立民主、自治的政府，使所有的阶级，特别是地主和商人，积极参加和支持政府。把民主作为争取资本家集团参加和支持

政府的一种手段，这一重要的思想在研究共产党目前的和将来可能实行的政策时，是耐人寻味而又意义重大的。他们并不幻想中国在近期内有希望建立一个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

共产党的纲领符合实际情况，并且，从当时情况客观地看，是对各阶层都公平合理的。就非强制性的减租而言，本来可能遭到地主和保守分子集团（甚至是正统的国民党）的反对。不过这些人由于以上提到的原因，此时并不是政府中的重要成份。自由主义者由于自己没有强大的组织，也提不出可供选择的纲领，因而追随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当临时的联合政府建立起来后（先是在晋察冀边区，后来在其他地方），就正式通过了共产党首先提出的纲领。

共产党的纲领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当政权牢固地建立起来，并表明有能力经受住日本的进攻时，当农民经过关于他们自己的新的民主权力的教育（由共产党进行的），开始对更激进的减租减息和累进税制表现出兴趣时，地主—资本家集团被迫积极参加政府，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一年之内，大多数村庄建立了民选政府。1939年到1940年普及了县一级民主选举。到1942年大多数根据地都由民众选出的参议会管理了。

各级政府中都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劳工两个集团的代表，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很重要。地主—资本家集团参加政府得到了报偿。在共产党支持下，政府降低了早期实行的对高额收入的高税率，政府还对私人生产性企业给予广泛的援助。

虽然建立了政治民主，但政治形势并没有按照明确的党派形式向前发展。

地主—资本家分子形成了压力集团，然而他们没有统一的政党组织和领导。他们的主要目标仅仅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这些地区，国民党还未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因为：

(1) 它在这些地区没有强有力的基础；(2) 国民党中央当局（重庆）一般认为这些地区及其政府是“叛变地区”和“非法”政府，当国民党确已试图重返这些地区的某些地方时，他们就依靠军事力量和政府的命令，宣布取消这些已经建立并在行使职权的政府……

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农民往往倾向于共产党。这可以说是很自然的。首先，他们认为是共产党建立了根据地，并实际改善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次，没有任何其他政党给农民提供任何东西或积极地寻求他们的支持。即使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积极活动，它也拿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来吸引农民。

当然，应当承认，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教育和宣传机构，而且并不阻止农民把他们当做恩人的倾向。此外，共产党在他们新赢得的地区积极地扩大党组织，并已把党支部建到了村一级。中共现在有大约一百万党员，据称其中一半以上是农民。有理由认为，他们大部分在华北。

其他阶层中唯一重要的一个集团，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集团，也没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他们仍然积极支持共产党，并与它们密切合作。某些人实际上加入了共产党，但是，看来这种倾向在目前并未受到鼓

励，因为共产党占压倒优势这一情况，由于以下要说到的政治原因，是共产党希望避免的。再则，许多党外人士就其思想来说，也可视为共产党员。

这个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集团虽然没有政党组织或自己的追随者，但作为选举产生的官员仍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原因可能是：（1）这些地区缺乏受过教育和有经验的人；（2）在他们最初任职期间，他们的爱国热情、民主倾向和正直品质在人民中普遍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样，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留任县长和高级行政职务。

因此，在共产党地区事实上并未产生强大的反对派，共产党仍旧是无可争辩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由于这种优势常常十分明显，以至于共产党于1940年决定，作为党纯粹自愿采取的措施，在任何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中，把他们自己的党员限制在 $1/3$ ，并倡议由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分配其他 $2/3$ 的席位。对共产党的 $1/3$ 的限额是一个最高数字，而不是最低数字。共产党希望这样做能够提高政府的各方面代表性，从而有助于保持人数不多的地主—资本家集团的支持，并反驳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垄断、破坏统一战线的指责。

共产党的这种自我限制并没有影响它的领导作用。它总是选出它的稳定的 $1/3$ （在个别地区共产党实际上继续在参议会上占据略多于这一比例的席位）。国民党的代表由那些以前的官吏或国民党员以个人身分出任，他们现在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并通常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在这类人中，要找到足够能量的具有合适资格并愿意参加政府的人员常常是很困难的；因为，处于目前两党关系的状况下，一个“正式”的国民党员知道，如果他参

加了“非法的”共产党政府，就会危害他的党员地位，并被重庆指责为是“共产党员”，结果，国民党（更确切地说是“名义上的国民党”）的代表在大多数政府中低于所寻求的 $1/3$ 的数额，政府的其余部分由地主—商人集团（他们也可以在国民党员中找到一些代表）的少数代表和大量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构成。

这样，典型的结构是： $1/3$ 共产党员，加上少数几个自由主义的国民党员（或前国民党员），大量的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最后是人数较少的地主—商人集团的代表。

因为共产党在政府中占有强有力的代表席位，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又在政府中占多数，共产党员成为根据地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主要倡议者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共产党在各地政府中占据着同样的支配地位，而且是联系这些分散的政府的唯一纽带，也就保证了所有这些政府都采用它的纲领。

更详细的研究将留待以后的报告来进行，此处，关于共产党在各游击根据地发挥支配作用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还应该提到如下一些因素：

(1) 共产党坚持实行温和的纲领，并以参加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员集团和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集团能够继续支持它为限度。这促进了团结，也扩大了对共产党的支持。还可以说它使任何重要的潜在的反对派都提不出异议。

(2) 共产党的纲领使各游击区根据地实行了民主制度，并且改善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状况。人民第一次享有这些好处，他们的政治经验使他们还停留在感
经过两个半月深入细致的观察、访问，并研究了其他观

激的阶段。没有人反对圣诞老人。

(3) 共产党有时起到的是平衡作用。在一些地方，地主利用农民对他们的畏惧，或通过他们对佃户的影响十分成功地控制了当地政府，共产党就用民主宣传和积极支持群众组织的办法大力加强对人民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农民“扬眉吐气”地行使他们新的政治权力来垄断当地政府的地方，党利用它的影响使地主的代表当选。无论在哪里使用这个政策，都使他们交上了感恩不尽的朋友。共产党承认，如果他们运用其影响帮助一个地主当选，他一定是一个“开明的”地主，换句话说，他是又一个支持他们政策的人。

(4) 共产党在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听取并采纳了其他集团提出的一些建议。一个例子是“精兵简政”（一般英译为“合理化”的政策）。它最初是由一个地主代表向陕甘宁参议会提出来的。共产党把这种愿意接受其他集团建议的例子作为他们实行民主的标志大加宣扬。他们把在他们自己的纲领中采纳其他集团的建议这一作法，解释为是使这些改进措施最迅速地得以普遍实行的有力保证，因为只有他们一个党在所有根据地政府中都拥有影响。这些论点很正确。但是也必须承认，共产党正是以这种非常明智和实际的政治手段从这些改进措施中赢得了声誉。因为最初的提议者并不广为人知，而且很快就被忘掉，这样，该建议就被认为是党的纲领的又一项内容。

(5) 共产党对宣传的控制已经提到过了。这种宣传，除了在特殊情况下，一般不攻击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但它往往把其他党派放在一个不利的地位。它并且总是

尽力提高共产党的声望。

(6) 最后，军队是共产党的军队。这一点很重 要，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很大。这种直接影响有若干方式。政治部的任务是教育人民、特别是新占领区的人民。它组织严密，经验丰富，并（与军队其他部门相反）完全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但比这种影响更大的是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它的志愿性质，它的军民一致的特点，它的高昂士气以及它英勇作战的事实。

6. 以上我试图说明的是，共产党由于在建立和巩固这些根据地中起到了领导作用、由于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由于采用了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温和的民主政策、以及由于实行了把控制宣传和运用军队影响结合在一起的高明策略，它在游击根据地的政治统治得到了发展。共产党的政策是民主的，并且他们的作法在当前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是不民主的内容。

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共产党遇到强烈的反对，他们的作法是否还会这样民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共产党地区从来没有过愿意在民主的基础上同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强大反对派。在唯一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国民党被允许出版它的报纸，并享有其他民主权利。但是这个反对派是弱小的，在国民党企图以武力进攻撵走共产党的地区，共产党由于拥有人民的普遍支持，总是获胜。而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这种支持。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战争造成的困难，使国民党被迫撤退。^①

^①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26号报告，讨论同一主题而且可能颇有意思的另一个报告是附录一，第一部分，第27号报告：《共产党成功地消灭了土匪》。

察者在共产党地区的调查结果和意见之后，我认为已有足够材料来提出一份结论和预测，

两位美国官员、若干记者、20多名外国旅行者关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地区形势的报告，存在着惊人的一致。这种在实际观察基础上得出的一致看法意义重大。它迫使我们接受某些现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日本人遭到积极的抵抗——尽管这使人民遭到不断的战祸和残酷的报复。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加强。日本人能在有限的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把这种反抗暂时压下去，但不可能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大地区都做到这一点。

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全体人民积极进行全面的游击战。在这种总动员下，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尽管是领导者和组织者，但已从属于人民本身这支人数大得多的队伍。它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人民赞同它、支持它，并全心全意和它一起作战。军队和人民完全团结一致。

这种全民总动员是建筑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并由此而决定了这种动员是可能的。这个革命是温和和民主的。它通过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廉洁的政府，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它帮助农民建立了自治政府，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它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自尊自立的精神和强烈的集体利益的观念。老百姓第一次树立了某些应为之战斗的目标。

现在同日本人打仗，不仅因为他们是外国入侵者。

也因为他们不准进行这场革命。人民将继续与任何限制或剥夺他们新赢得的这些利益的政府作战。

正如日本军队现在不能征服这些富有战斗性的人民一样，国民党军队在将来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有了新的武器和组织，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决心保卫他们一直为之而战的东西，这些人——现在约9千万，而在国民党到达那里前肯定会更多——将反抗压迫。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想分裂或独立。但现在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国民党是压迫者，共产党是他们的领导人和恩人。

由于有了这样广大的民众基础，共产党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国民党试图以武力消灭它，只能意味着完全否定民主。这样做将加强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共产党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要是象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国民党转向民主，这种已经建立的民众支持将保证共产党人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大影响。如果国民党继续执行他们现在的隔离政策而自己不去建立彻底的民主，那么共产党地区老百姓日子比较好过这件事，就将始终是有利于共产党的一种宣传。

共产党已经得到了使他们不可能被消灭的广泛牢固的民众支持。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还要提出进一步的结论，除非国民党进行共产党那样的政治、经济改革，或者证实它能争得对人民的领导权（但它现在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还未表现出愿意和能够这样做的迹象），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

统治力量。①

一个月后，约翰·戴维斯在延安接替了我的职位，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使用了更好的语言：“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注定不是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②

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中有地位吗？

人们可能给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下一个不同的定义。但是可以肯定，对一个失去了它的人民的支持因而无疑要垮台的外国政党作过分的（和不必要的）承诺，睁着眼睛走一条明显通向灾难的道路，这决不是现实主义。1945年初，在中国和华盛顿，大多数关心中国事务的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形势发展中的这个危险。这当然就是1944年和1945年在华盛顿起草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在第六章里已对其进行了考察）的理论根据。这些文件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偏袒任何党派”，它意识到了“国民党现政府崩溃的可能性，并寻求‘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同任何更有可能实现统一和促进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中国其他领导合作。’”③

这是审慎的外交语言。在现场的讨论可能是更为自由的。我所记得的有关高斯大使——他很少对中国人或其他人抱有幻想——的最早的事是他的一篇谈话，其大意是，除了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美国的政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而且他“极

①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39号报告。

② 《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第670—671页。

③ 引自1945年4月18日国务院致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93—95页）。大致相同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声明见本书第169页注①。（译者注：一原书有误，可能为原书第六章注84。）

为讨厌让外国人告诉我们这些利益是什么”。高斯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他也许喜欢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史迪威更是一个实证论者。他说：“在摆脱蒋介石以前，我们在中国什么也干不成。”显而易见，这句话意味着某些事情本来是可以做的。^①我似乎爱用陈词滥调，用我的话说就是：我们应该把决策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受蒋介石支配就是“让尾巴牵动了狗”。^②而赛马场上更为流行的语言则是：如果我们坚持维护国民党，我们就是“把赌注押在正要输掉的马上”，或者发现我们自己“骑错了马”。甚至有很多人还谈到，如果我们继续承诺支持蒋介石，就会“丢失中国”。这起码证明，这句话并不是参议员麦卡锡和院外授华集团最先提出来的。

这里可以清楚看到美国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国务院主张需要灵活性的文件是现实的，但是谈得不甚明确。除了在1945年1月到3月期间起草的文件外，它们一般地是作为一种长期的、战后时期的政策谈到灵活的。这样，看来就忽略了需要在战争结束前的这段时间里采取建设性行动。但恰恰是在近期内，在战争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最为关键。1945年初，国共双方都积极、公开地准备内战。^③并且，除赫尔利

^① 1944年12月13日的史汀生日记，引自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第511页。

^② 附录一，第三部分，(C)。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在他们调查太平洋关系协会时，使用过这个备忘录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是说明他们调查技术的一个例子。由于仅就三个独立的、互不联系的句子询问一个不知情的证人（魏德迈将军），备忘录的意思被弄得似乎面目全非了（参见我的文章《恰当的背景》，载于《外交事务杂志》1951年10月，第22页）。

^③ 其列见附录一，第二部分，第8号和第22号报告。

以外，显然所有人都认为内战公开爆发的信号大概就是日本被打败这件事本身。^①然而，可以预料，对日战争的结束将减少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同时，它将结束战时的那种用美国军事政策影响中国事态的可能性。这样，一项“灵活”的政策可能就意味着保持值得赞赏的中立，但实际上差不多等于被动地站在一旁，等待把美国的承认奖赏给最后得胜的一方，尽管到那时得胜者可能并不在乎我们的承认。

由于许多原因，内战——在我看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共产党将最终在内战中获胜——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除了中国将付出可怕的人力、物力消耗外，它还将使这个国家长期陷于分裂，影响它的战后恢复，使东亚的和平与安定不能早日实现。将会有极大的压力迫使我们给予正在失败的一方

（国民党）以支持和援助。而战争开始时占领着华北和满洲的共产党，将被迫转向苏联。而且，可以预料，由于内战的激烈性和可能的持久性，将导致这两个敌对的政党都（同时在其内部与外部）清除温和分子，从而使共产党放弃正在推行的统一战线的开明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并最终加强与苏联密切联系而对美国强烈敌视的更加正统的共产党政权。因此，美国政策最为紧迫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可能找到防止内战爆发的办法。这意味着我们应赶快提出我们的建议。

① 例如附录一，第一部分，第3号报告（“〔内战的〕最大的危险将在与日本人的敌对状态结束后迅速到来”）；第20号报告（“危机将在日本人接近战败时增长”）。爱德华·E·赖斯在西安就国民党方面写的一个报告说：“……可以预料，全面内战将随着日本人的战败而到来……”（《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397页）。邹谠总结说，蒋介石“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军事行动的成功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70页）。

1945年初我们不知道对日战争将会这样快结束。但是中国的紧张局势在持续加剧。对于我们这些在现场的人来说，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就象一颗定时炸弹向着爆炸的时刻滴哒滴哒地走着。^①

我们想要制止使中国加速走向灾难的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障碍：赫尔利、美国固执地把蒋介石当作是中国的化身。

① 菲斯的《中国的纷乱》第90—91页似乎暗示，这种担心发生内战的心情起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务院及其驻华代表”的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错觉。

他们还被这样一种渴望所推动，他们认为中国是他们的事业，既然是他们的事业，就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事业。他们并没有仅仅象希望赢得战争而不关心中国人民困境的美国官员那样进行思考和写作。

我们对中国感情上的眷恋程度最好还是让外界来判断。当然，客观是事实，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这首先是因为（一个经常令人表示惊异的原因）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但许多在内战问题上与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并没有我们这样的背景，这也是事实。我只能提出“中国人民的困境”确实是美国对华政策应关心的现实问题。这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找到了一个利用这一点建立政治权力的非常有效的公式，而蒋介石对此却仍视而不见。关于蒋介石对“造成共产党影响蔓延的因素所作的根本错误的估价”，很难设想还有其他东西能比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69页）引用的蒋介石（1944年10月21日）的日记（这则日记亦载于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此处系按该书台北中央日报社译本抄录。——译者）更能生动地说明这一问题的了：

共党之组织要素：一、暴力（即压迫）残杀；二、特务（即控制监视）束缚。共党之训练宗旨：一、消灭民族性，发展国际性（毁灭本国历史与伦理）；二、消灭人性，发展兽性（强分阶级使怨恨斗争）……

以及共产党是唯一可能的其他选择这一事实。①关于赫尔利，我已经说得不少了。美国对蒋介石的情感超出了我在这里讨论的题目。那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用现在流行的诸如“所谓的共产党”或“土地改革者”一类提法把问题搞乱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毛泽东和他手下的人坚定地坚持，他们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我曾几次努力试图概括他们在中国如何实行马克思主义。下面就摘引当时记录下来的博古（秦邦宪）在谈话中所作的某些声明：

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指南。我们接受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思想方法。它给我们提供了结论和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无阶级社会。换一句话说，就是既造福于个人，也造福于全体人民。

但是试图把马克思对他所处社会（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的描述和他认为人民摆脱这些状况所需要采取的步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全部搬到中国，不仅是荒谬的，也违背了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避免理论上的教

① 我已经提到过1944年11月我与哈里·霍普金斯的谈话（本书第91页注③），是他邀请我去的。他已经看过我在延安写的一些报告（其例可见菲斯所著《中国的纷乱》第258页注4）。他提议我整理我的印象，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我记得，他的白宫办公室是一间朴素的，比堆满了东西的桌子大不了多少的小屋，在地板上，两个椅子之间的空地刚够铺开那张延安地图（见本书第188页注①）。在持续了差不多45分钟的谈话之后，他最后的评论是简短的，并且实际上否定了我的建议。“很有意思，我毫不怀疑你告诉我的情况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听说过的唯一中国人，而且他们（指中共——译者）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关心的是另一个不同的然而也是重要的现实情况：美国舆论的现实。

条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目前甚至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经济仍是半封建的。我们不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事实上，由于我们起码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二百年，也许只有在世界上这些国家到达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能指望进入那个阶段。

首先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半封建状态。然后，我们必须通过一个长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营阶段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

我们共产党人所希望做的是使中国一直顺利地、稳步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通过有秩序的、渐进的和逐步的发展，我们将避免产生这种情况，即迫使马克思得出（在他所处的社会里）需要阶级斗争的结论的情况。我们将通过一个和平的、有计划的革命来避免暴力革命。

还不能预言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但是可以肯定，它将不少于三十年或四十年，也许要超过一百年。

当然，华盛顿有共产主义问题专家分析和评价这样的声明还有我和其他人收集、转送的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和出版物。我1944年和1945年先后两次在华盛顿时，曾与一些专家进行过讨论。讨论中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经历不一致。我确信我看到了中国的一种现实：他们的深入研究和长期经验仅仅限于苏联共产党以及它对欧洲和美国共产党的操纵。当我提出中国的情况可能同那些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时，人们往往报之以理解的——在我看来还是略带些恩赐的——微笑。

①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34号报告。

但却不同意我的意见。①

人们常常批评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及其文明是独特的这一论点。当然，我没有沿着这个论点的逻辑走到极端，即认为中国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我们毕竟目睹了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场革命。但在我看来，下列情况极为明显，根本不用我费神为其争辩：中国将既不会是苏联的翻版（如果中国转向共产主义），也不会是美国的翻版（如果中国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在国民党领导下转向自由民主）。②革命不能够完全脱离一个国家的历史，脱离它的人民长期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以及那里现存的政治、经济的社会背景。同样，其他因素也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其中之一是它的领导集团的性质。这个领导集团给我的印象是强有力的、独立的和注重实效的，它团结在一个有非凡才智、超人魅力和强烈民粹主义信仰的领导人周围。③他们的民族主义信仰也同样重要，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他们曾十分成功地把它运用于与国民党的竞争之中。

① 一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我不提他的名字）坚持说，我关于毛泽东“不喜欢俄国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莫斯科受过训练，而且无论如何他决不可能反对俄国人。可惜，他没有证据。我承认克里姆林宫学是一门有用的科学，但它之所以需要，主要是因为需要探索一个封闭的社会。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象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几乎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② 我的传教士父亲也曾设想（并欢迎这种前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将会发展得不同于（即使仅仅没有宗派主义）西方的新教教会。

③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21号报告。

另一个如果不是影响了，至少也是反映了中共政权特征的因素，是他们在对外关系中采取的态度。在这里有迹象表明他们寻求美国的合作，既期待战时给予援助，也期待在终将到来的战后时期给予援助，他们希望那时自己已成为执政党。在毛泽东与我的数次长谈中，这是一个不断提到的主题。第一次这样的谈话是在1944年8月23日。因为是他的第一次声明，我作了比以后各次谈话更详细的记录。在此记录中，说话人是毛泽东，我少量的补充都放在括号里。

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仅是美国人自己关心的问题，也是民主的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中国人民关心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美国是否有回到孤立主义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的可能？美国人是否准备对外国问题不闻不问，让中国“自作自受”？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

（关于美国的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都是直接向我提出来的，因此我用最清楚的词句说明，我无权正式回答这些问题，我的回答仅仅是纯粹个人的和完全非官方的意见。

对以上几点，我提到美国在中国的长远的、特殊的利益；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所以不会有重建家园的问题；相反，我们极大发展了的经济和我们更加面向世界的观点将迫使我们到国外寻求贸易和投资场所；因此我们不大可能变成孤立主义者或不关心中国；我认为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对华政策）。

第二，美国政府真的关心民主，关心世界上民主的前途吗？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

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国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它是否对它所承认的中国现政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并且一点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而感到担心？蒋介石是由单一的政党，仅仅90个国民党党员选为总统的，他们自己都不能合法地声称它代表哪怕是这个党的有限的党员。连希特勒都比国民党更有根据宣称自己实行的是民主权力。他是由人民选举的，并且他有德意志国会。美国是否了解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一明显的事？然而，重要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了解这一事实，而是它是否愿意通过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来改善这种局面。

（我提及了许多关于中国统一以及我们希望在所有国家发展民主的美国官方声明。我提到最近在美国报纸上出现的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指出这起码表明了美国舆论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明显倾向。）

显然，国民党必须改革，并改组它的政府。在现在的基础上，不能指望它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即使美国为它打赢了战争，随之而来的也肯定是动乱。

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以容纳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我们并不是要求实行充分的、直接的代议制民主，这并不切实可行。而且在国民党的主持和控制下，它将是一场无聊的骗局。但能够而且应该立即做的，是召集一个临时的（或过渡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邀请所有党派派代表参加这一机构，这些代表一定不能象过去那样由国民党挑选和指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代表——最有资格的领袖。他们应该包括共产党、所有少数派党、知识分子团体、新闻界、学生、职业团体、合作社的中央

机构、劳工和其他群众组织。

分配代表名额的切实可行的折衷方案是，国民党占一半席位，所有其他党派共占另一半席位。鉴于实际的政治原因，应由各方事先达成一致意见，确认委员长为临时主席。

这个临时代表大会必须拥有改组政府和制定新法律的充分权力，这些法律将实施到宪法通过为止，政府应该直接对代表大会负责。它的作用和权力类似英国的下议院。

这个临时代表大会还将全面负责实行完全的民主和进行建立立宪政体的准备工作；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集国民大会。之后，它将移交权力并不复存在。

美国政府愿意运用它的影响迫使国民党采纳这一建议吗？美国政府愿意提出这个建议并积极支持它吗？

（毛主席建议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值得我去一趟重庆，向大使转达。我说，大使会得到全面报告的。我还表示，我们已在重庆从其他方面人士那里听到过这个全面的建议。）

此后，我于8月26日在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获悉，鉴于国民党在目前的谈判中曾以“过于抽象”为理由拒绝讨论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共产党政治局正在考虑向国民党提出这一建议。）

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它承认共产党是一支积极战斗的抗日武装吗？它承认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一个有影响的力量吗？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美国正

在采取何种措施来保证国民党将不用它的美国新式武器打内战？

（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中提出的各点构成了我们进一步交谈的主要内容。为了进一步详谈和讨论，我对其中若干要点作了回答。）

关于“支持”共产党的问题，我指出，由于共产党自己公开支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这一问题是令人费解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到提这一问题的时候。）

我们共产党在1936—1937年接受了国民党提出的组织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日本侵略这一外来威胁危及到了国家的生存。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民。为了打日本，必须停止毫无结果的、互相残杀的十年内战。尽管内战不是我们发动的，但我们带头停止了它。还有，外国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它们不支持我们。但是统一战线并非全是单方面的：国民党也承诺要进行政治改革，只是至今尚未付诸行动。

我们支持蒋并不意味着支持专制，我们是支持打日本。

我们以前不能提出要求美国承认我们的问题。从合法的意义上说，提这一问题现在也为时过早。我们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设法促使国民党自我改革，这将是第一步，也许是唯一必不可少的一步；如果此事成功，就将不存在内战的威胁。

但是假如国民党不改革呢？美国就必须有第二阶段的政策。这时，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问题就必须提出来。我们不能冒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

我们现在可以撇开美国武器的供应问题不管，这些

武器是可以被国民党用于将来的内战的。但是还要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重演吗？在民国初期，列强只承认北京政府。在只有广州政府有资格说自己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政府这一事实已经明朗化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它们还一直这样做。直到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才得到列强的承认。现在中国内部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情况还不十分明朗，但可能会发展成某种类似的局面。美国是否会继续承认和支持一个只能与旧北京政府相提并论、毫无效率、缺乏人民支持的政府？

（我提出，外交上不可能撤回对一个没有直接作出不友好行动的政府的承认，背着自己承认的政府支持反对党显然是不可取的，最后，也还有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这一微妙的问题。）

美国已经介入了它的军队和物资到达的每一个国家。这种介入也许不是有意的，也许不是直接的，但是仅仅由于美国影响的存在，它就的确是干涉。如果美国坚持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提供武器，这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给国民党武器，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这将使国民党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能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反对用这个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毫无意义），就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

我们不要求停止给国民党军队的一切援助。这样做的结果对战争不利。国民党将会因此垮台，美国在中国的登陆也将更为困难。

（我提出了怎样才能有效地运用美国影响的问题，

表示我对向蒋介石“发号施令”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毛激烈地驳斥了我的说法。）

蒋介石正处在非听命于美国不可的地位。看看已在河南发生过的事情，它现在正要在湖南发生，并且各种迹象表明也要在广西发生！也许下一个就轮到了云南。看看经济状况：蒋介石已经走投无路了。

蒋介石是顽固的。但从根本上说，他是个流氓。要对付他必须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从经验中懂得的。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毫不留情。一定不能让他的威胁和恫吓得逞，不要让他认为你害怕他，否则他就会得寸进尺。美国对付蒋的办法非常糟糕，他们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蒋介石通过说什么不能坚持抵抗啦，不得不讲和啦，从美国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现在孔祥熙赴美国去请求得到布匹，也是使用这种手法。要布匹！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日本？难到布匹比子弹更重要？我们边区没有棉花，国民党的封锁使我们无法从中国其他有棉花的地方得到任何棉花。但我们自己干了起来，很快就会自给自足。这事对国民党来说要容易一百倍，如果他们的政府有一项正确的经济政策，他们或许早就自己做到这一点了。

对待蒋介石，你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条件才能和他友好相处。一定要对他施加经常的、强有力的、一致的压力，使他屈服。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他。

美国现在的地位与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时完全不同了。再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去讨好、娇惯和安抚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该做些什么。美国可以在蒋介石顺从美国的要求时才援助他。运用

美国影响的另一个方式是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华莱士的访问就是很好的机会。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不应错过孔祥熙目前在美国这一机会。

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军官应该向中国军官谈论民主。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

（我表示，把军队当作一个政治宣传队使用不符合美国的传统。并且，我们没有相当于共产党军队政治部的任何机构去教育部队和指导这样的工作。）

但是，即使美国士兵不积极宣传，仅仅是他们的存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就会产生好影响。为此，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并不这样。它想隔离他们，不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现在你们在前线有多少美国观察员？我们乐于带你们的人去任何地方。国民党很担心在中国的大量美国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美国人的存在从另一个消极意义上说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将对国民党起到抑制的作用。国民党挑起事端就会更加困难。昆明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因为国民党在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注视下不敢逮捕学生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相比之下，在西安的美国人很少，秘密警察就肆无忌惮。

在美国刊物上批评国民党是有益的。它的效果也许不会立即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可能暂时看起来有坏的反

映，但如果它是公正的（果真如此，国民党就会知道），就会使国民党犹豫与思考，因为他们需要美国的支持。

最后，你们美国人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有益的。我们当然很高兴观察组在这里，因为它将帮助我们击败日本。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你们到这里来这件事的首要意义在于它对国民党产生的政治影响，对此无需加以掩饰。

（我指出，他强调美国应在中国登陆，但我认为战争也许能以其他方式赢得，登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美国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这要取决于日本的力量和战争的进展。而日本的主要力量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这对中国来说将极为不幸。国民党将继续作为政府而存在，尽管它不具备作为政府的能力。

如果进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我们的军队现在包围了汉口、长沙、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在内层包围圈，国民党却远在外围。

如果美国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合作，重要的是让我们分别在各自的防区活动。国民党太害怕同我们一起共事了。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要打垮我们。当我们在不同的防区作战时，美国军队就可以看到我们与国民党的差异：我们有民众支持，并能战斗。

（我问，如果国民党未受到制止或是未被说服进行改革，内战的爆发是否象他指出过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说：内战是“必然的，但并非一定要发生”。

主观上，现任国民党领导人决心消灭共产党。他们害怕我们正象他们由于同样的原因害怕人民一样。客观上，有一些因素——在谈话开始时提到的五点——遏制了国民党。这里面最有力的因素——日本人——将会消失。另一个因素是外国舆论，它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外国的，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但这个因素现在是无法预言的。国民党仍然希望外国势力会站在它一边。

国民党已经忙于为内战准备借口。你们对我们和我们控制区的情况了解得越多，这些借口的价值就越小。

所以国民党可能会采取间接的进攻方式。人们很难准确地说它将会采取何种方式对我们进行侵犯。

但是，如果国民党取消已在我们的地区里取得的进步，如果他们夺走人民新的民主权利，人民将进行抵抗并要求我们帮助。

国民党进攻我们的另一种方式将是通过汉奸行事。汉奸将转到国民党一边，声称自己一直是“爱国的”。然后国民党将利用汉奸占领日本人撤出的城市和地区。他们将鼓励汉奸向我们进攻、制造磨擦。

(周恩来进一步表示，这也许是日本人向蒋投降时可能玩弄的骗局之一：日本人把武器交给汉奸〔或国民党〕，条件是他们将消灭共产党。

乍一看，这种说法似乎有点牵强。唯一的解释是：卷入这一局势的各种势力是这样复杂，他们之间的仇恨是这样强烈，以至于几乎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甚至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政治是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我们坚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和民主的文献。孙中

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有效。它将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垮台了，我们仍将坚持这一文件，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是适合于中国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纲领的每一条都建立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之上。

当然，我们并不自以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还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化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并且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是其他任何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在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和修正我们的政策，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懂得民主，并且需要民主。民主并不需要很长的经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很精明，并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与国民党地区的不同之处：人民生气勃勃、关心国家大事、态度友好。他们有抒发人类感情的机会。他们从令人窒息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苏联，提出疑问。）

无论是苏联参加远东战争还是它参加中国的战后重建，都完全要取决于苏联自身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

再者，国民党出于反共恐惧心理，也是反苏的。所以国民党与苏联不可能合作。由我们来寻求苏联的合作只能使中国局势更加恶化。中国已经够不统一的了！无论如何，即使国民党愿意，苏联也不大可能帮助。

但是，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如果这些利

益是建设性的和民主的。不会有什么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俄国只是希望中国友好民主。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这个名称可能会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了起来，并说，他们考虑过改变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是不会害怕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我们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减到合法的(根据未付实施的国民党法律)37.5%。即使这样，我们也只是试图逐步地完成，因为我们不想赶走地主。我们利率限制为每年10%。虽然它比过去低得多，但这种限制也并不过分。

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的帮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互关联和相同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互相适应的。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容易合作。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将欢迎它。我们没有只采用西方机械技术的愚蠢想法。我们也不会对阻碍国家经济发展、只能使官吏富裕的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将关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按照促进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使国家得到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看看我们在这里靠有限的资源所做出的成绩)。在这以后，我们才能建设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谈论的“国防工业”。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

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采取合作态度。我们必须合作，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因此，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冒反对你们的风险——不能冒与你们发生任何冲突的风险。^①当我1945年重返延安后，毛泽东在我们3月13日的第一次谈话中再次谈起美国和共产党的长期关系这一问题。

毛泽东一开始对我最近的美国之行提了许多问题。他很关心美国官方和舆论对远东战争、对中国的总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① 附录一，第一部分，第15号报告。谈话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国共关系的那一部分从略。我的备忘录只能是持续6小时（或者说接近8个小时，如果加上准备性的一般叙谈和吃饭的间断时间）的谈话摘要，由于这是我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深入、“正式”的谈话，这里谈一些背景情况是适当的。在我刚到延安不久，毛泽东说他宁可把我们的“交换意见”推迟到我有机会熟悉了共产党地区的情况之后再进行（附录一，第一部分，第2号报告）。后来的情况证明，他认为充分熟悉情况的时间是一个月。我7月22日到延安，我们的谈话在8月23日。这段时间里，正如他所知道的，我与大部分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详细的谈话，但没有涉及美国和中共关系的问题。

按照我与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进行的非社交性谈话的惯例，我在毛泽东谈话时做了大量笔记。在这一特定的场合中由于我们用了一名翻译，记笔记就很方便。毛泽东和我平时经常用中文直接交谈。这次他用翻译，我认为更加表明他对这次谈话格外重视，并希望在这个奠基性的谈话中消除任何互相误解的可能性。

由于这个问题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过（《泰丁斯记录稿》，第1279页），我可以补充说，无论这次会谈的备忘录，还是关于我与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其他报告，我都没有为了要他们审查、赞同、批准或其他任何目的给任何共产党人看过。而且，共产党和我都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谈话的，即我将报告我所见所闻和别人告诉我的所有情况。他们从未暗示过，谈话是对我个人讲的，或我应对任何事情“保密”。

然后他相当温和地评论道：美国对与中国有关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它还没有充分了解共产党。尽管美国近来在中国采取的政策仍旧是暧昧的，但他不相信这是一成不变的。美国最终将会认识到，单独支持中央政府对于对日作战、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或确保远东的战后稳定，都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几个月以前，有人对我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距离只有这么远。”（他用姆指和食指比出大约一英寸的距离）“现在我们肯定距离这么远了。”（他把姆指和食指张成一个尽可能宽的V字形。）

从这个引言开始，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其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同情、理解和相互关心的强有力联系。两国人民基本上都是民主的和尊重个人的；是热爱和平、不事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它本身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不能采取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补充，他们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它不能指望与美国在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方面进行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制造业需要出口市场，它也需要向外投资。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供应本国市场和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它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轻工产品。它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用来补偿对外贸易和外

国投资。

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决不应有也不会有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①

毫不奇怪，在4月1日我与他的告别谈话中（当时我已收到未加解释的命令，要我“尽快”离开中国，后来听说是在华盛顿的赫尔利安排的），这又一次成为讨论的重要题目。

下午4点我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朱德已经在那里了。一般性谈话大约进行了半小时。

他们对我要返回重庆的原因都很感兴趣，尤其关心这是不是为了返回美国——这可能表明要商议中国问题（我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我返回原因的指示）。

毛泽东重复了过去表示过的希望，即美国的政治观察和与延安的接触应保持下去。他表示今后几个月内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希望通过实地接触得到美国的理解。

周恩来两次有所指地谈到，我不能在延安再呆十天是很可惜的，我将发现留下来是值得的和饶有兴趣的。

（我认为这些话是暗示党的代表大会计划在这期间召开）……

接着毛泽东控制了谈话。他显得格外兴高采烈，时而离开椅子以引人注目的手势加强其谈话的语气，时而插入有趣的轶闻。周恩来偶尔解释或补充毛泽东的话。

朱德靠在椅子上，安静地微笑。

①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0号报告。这是我一次耐人寻味的长谈所作的报告的大约1/5。

毛泽东简略回顾了最近与国民党举行的毫无结果的谈判。他认为，总的来说，外国人还不理解国共争端远远不是两个普通政党之间那种常见的争吵和尔虞我诈。这个争端对中国的前途是具有首要意义和生死攸关的……

毛泽东在重申共产党的目标始终不变时，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弱小孤立的时候就为之奋斗，他们将继续为这些目标奋斗，而不管外部势力是赞成还是反对。

毛泽东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国民党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但是随着中国情况变得更加险恶和危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民意识到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更要大声疾呼。国民党的这种抱怨说明它感到了压力。然而，拖延对它是无济于事的。”

毛泽东接着表示，他要向我简述共产党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政策，从中可以看到它们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样，是始终如一的。

共产党对美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旧是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但是，不管美国怎样做，不管他们是否能得到美国的一枪一弹，共产党都将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向美国提供和实行合作。凡是他们能做到的他们都会做。比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营救飞行员，共产党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它有助于盟国作战和加速日本的失败。如果美国人登陆或进入共产党地区，他们将会发现共产党军队和人民组织严密、热心抗敌。

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战后重建所需要（关于这一论点的详细论述，请看我

第十号报告中毛3月13日的谈话）。

当然，美国是否同共产党合作完全是一件要由美国决定的事。但是，共产党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有利无害：可以尽快取得战争胜利；帮助中国的团结和民主事业；促进中国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从而使经济获得健康发展；赢得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即农民和自由主义者的永恒友谊。^①

现在我再回到1944年8月。当时我已经与共产党代表在重庆有了三年多的大量接触，并在延安刚呆了一个月。然而在我最初同毛泽东有连续接触时，有两件事仍使我感到惊讶。第一，他真诚地希望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第二，他强烈表示出这样一种信心，即他和中国共产党是不受他人约束的力量，他们将或是控制全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参与者。这在我头脑中引起了两个重要问题。这种公开表示希望获得美国合作的愿望，是一个用来反对国民党的短期政治策略呢？还是我们可以指望就是在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的情况下也将坚持不变？第二，在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打算中苏联被摆在什么位置上？此后，为了试图找到这两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做了极大的努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反复说明和详细论述。此外，在我与他们的个别谈话中，政治局其他高级成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周恩来、博古、刘少奇和朱德的谈话——都重复和支持了这些观点。^②应当承认，毛泽东的公开声明是不

①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26号报告。

② 其例可见附录一，第一部分，第34号报告。8月23日我与毛泽东谈话时这些领导人都不在场。

太具体的（鉴于美国没有表示支持，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报告时曾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①不管怎样，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在许多方面（诸如获取情报、了解气象情况、营救飞行员、获得日本出版物、审讯战俘以及得到轰炸目标的资料等方面）得到的共产党的合作都是热情的、迅速的，在他们的条件限度内是有效率的。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要求，使我们获得下列多种情报和便利：他们军队的实力、装备、训练方法和战斗力；为美国官员提供参观游击区和观察他们部队作战的机会；他们如何对待和利用日本战俘；他们对日本人和伪军的心理战方法；经济资料以及政治组织情况等等。考虑到他们根据地和军队的分散以及通讯联络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情报看来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从未遭到拒绝，也从未有人示意要我们承诺作出补偿。人们很容易说，尽管如此，他们仍希望美国回报以支持。但是，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国民党方面，他们十分明显地缺乏这种热情合作的态度。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许是美国和美国人个人表示出的坦率真诚的友好态度。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在延安或在前沿地区，在老百姓、八路军战士、政治干部中或党的领导人中，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比比皆是，不可能是经过导演做给我们看的。^②

但是无论看起来共产党怎样真心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① 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这个讲话收入194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25—135页），但在以后的版本中都被省略了。我感谢巴里·伯顿先生提醒我毛泽东的这个声明。（这里照《解放日报》原文引用。——译者）

② 江西时期的革命——包括所有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我们和美国表示的这种热烈友谊不会不带有某些讽刺意味。在1935

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正是毛泽东关于未来中苏关系的想法将不可避免地决定着他对美国的长期态度。如果他对我——并希望通过我转达给美国政府——所谈的话是认真的，那么他显然是把中苏关系设想为得与通常为的苏联卫星国那种关系大不相同。的确，他认为共产党中国认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行动自由。

看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是恰当的。一个是中国的党内历史。例如，众所周知，毛泽东只是与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并由莫斯科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们进行了长期斗争之后，才取得领导地位的。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也就是斯大林——的关系史。在这里，记住下述情况也许是有用的：当时在西方已发表的关于中共历史的论述主要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国革命的悲剧》。这本书我在很多年以前就读过，但在延安是找不到的。^① 它主要研究1925到

年以前，落到他们手里的传教士都作为“外国帝国主义的特务”受到虐待（有时处以死刑）。起码可以说，他们断定我们对中国及其现状的情况了解得很多，所以就不怎么花时间来进行辩解和掩饰（相比之下，在国民党人士中间，我们经常遇到傲慢的态度）。在我们第一批小分队的16个人中有3人（斯特尔、惠特尔和我自己）是传教士的儿子，并在中国度过了的大半生。第四个（多姆克）在中国一个教会学校当了几年教师并学过中文。我们的医生（卡斯伯格）曾在印度作过医生传教士。观察组组长包端德上校在中国住过23年，其中大部分时间为美国陆军作情报工作，中文水平相当高。卢登是外交官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任过多种职务，呆了12年。多兰在中国呆过几年，作过广泛的旅行，也能说一些中文。因此，我们并不是一点背景不了解的。

^①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萨克和沃伯格公司，1938年版。该书的“修订第二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

1927年这段时期，以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对中国造成的影响。第二本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①它包括的时代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其中包括毛泽东唯一的一份传记（实际上是一份自传）。我随身带有这本书。

通过几次没有结果的尝试，我很快发现，毛泽东是否愿意和我谈这些题目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他很乐意讨论江西时期错误的“左倾”政策（它们与延安成功的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批评陈独秀，也可以批评“李立三路线”和张国焘。但是，一般来说，他态度温和地表现出不愿意超出他1936年对斯诺所作的很少几条非常含糊、但有启发性的评论。^②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和博古，同样谨慎小心，不愿意把家丑外扬，以及不愿意谈论任何可能被解释（或报导为批评斯大林和苏联的话，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毕竟是一个外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共产党希望同这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这个国家还没有作出任何暗示表明它真正愿意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或愿意放弃它长期以来支持共产党的敌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伦敦，维克托·高兰茨公司，1937年版）。当然还有由英美作家（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森）写的著述。他们在1937年至开始对中共地区实行封锁的1939年这段时期中，曾在不同时间访问过共产党地区，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更多地放在当时情况的描述而不是对历史的考察上。

② 人们在《西行漫记》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这类话：“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庭犯了大错”（第161页）；“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了我”（第161页）；“共产国际当时反对第五点”（第163页）。但当斯诺表达诸如“……共产国际也许要对中共在其痛苦的成长中遭受的严重挫折负责”（第382页）这样的说法时，他似乎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明确地表达毛泽东直接说过的话。

入的立场。事实上，我的试探完全可能被看作是不恰当的。后来的情况证明，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有关的启发。

在到延安以前，我模糊地听说，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初就在进行着一场党的改革运动（一般都称作“整风运动”或简称“整风”）。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行的群众性的说服、劝告、批评的伟大运动，它从此作为毛泽东的政治领导的基本方法闻名于世。只是在延安，我才开始了解到这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许多和我谈过话的人都受过斗争和批判。他们似乎通过在整风中进行自我批评而感到精神振奋、清白无辜和团结一致。这使我从心理学上感到兴趣，它实际上类似于一些基督教派特有的信仰复兴运动和公开忏悔罪恶的活动。我的最初感想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作为一个使人思想转变和加强热情与信仰的手段。

我在延安最熟悉的中国人是一个比我小几岁的人，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作周恩来的秘书。在延安他仍作同样的工作，但是他还兼任与我们观察组进行联系的联络官。所以我们有许多机会增进我们不拘礼节的友谊。在我们到达后不久，我向他询问关于整风的情况，我已听到过许多有关整风的议论。他严肃的回答使我很惊讶，其大意是：“这个运动是绝对必要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和实际立场，你就必须研究和真正理解整风文件。”他不久就给我一套整风文件（中文的，因为大部分文件还未翻译），我开始读了起来。①

① 这些中文的整风文件已经由博伊德·康普顿在《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1944）》（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以下简称《毛泽东的中国》）中翻译出来了，并带有一个有益的导言。

我很快就发现的问题是，这些文件经常不指名道姓。它们是对党员讲的，象我这样的外人要想“真正理解”它，就需要对我所缺乏的党史知识有一个精确的了解。文件中出现的名字很少，王明（陈绍禹）的名字从未出现过。他住在延安，但从来见不到，他显然是靠边站了。^①同样，文件对苏联共产党（以及列宁、斯大林，包括季米特洛夫的文章）说了适当的尊敬的话，但贯穿始终的主题——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共产党员，如果在空谈马克思主义中使自己同中国情况的实际需要相分离，即使他反复读了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②我转而求助于我的朋友，他成了一个很有帮助的翻译和指导。

我阅读的文件很不完整，在我同他进行的多次谈话中，我得到的对整风文件的说明肯定也是既不全面也不系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到了很多关于党史情况的暗示，这些情况自那时以来已较为清楚地为人所知了。当然，我的朋友明白，我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所以他就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他在叙述党内历史时，在谈到已经倒台的人（象王明）时，比谈到已经与毛泽东言归于好并仍在掌权的人（例如周恩来和博古）时更直率和详细，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我所听到的关于整风的情况，都得到了我们的观察

① 当我要求会见王明时，我被告知可以安排，但他可能“不会对我谈很多”。因为对于坚持提出一个显然不受欢迎的请求会有什么收获感到没有把握，所以我不再提这件事。这样，我就未见到他。

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康普顿译，见《毛泽东的中国》。（此处照1942年6月18日《解放日报》原文引用。——译者）

和从其他来源搜集到的材料的证实。有几点结论看来是正确的。

整风运动已经成为对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入党的广大新党员进行教育、团结和加强纪律的有效手段，这些新党员有着形形色色的背景和政治经历。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表述，也是民族主义的：坚决主张党的思想必须是中国式的；反对外国（即苏联）的影响和模式。这场运动反映了毛泽东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党内对手的最终胜利。从几个理由上说这都是意义重大的。毛泽东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党的无可争辩的领导权，这一事实加强了他在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争夺（政治的或军事的）权力的斗争中的地位。这也增加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行动自由，甚至包括按常规来说不能指望一个“正统”的共产党会采取的行动，如：真心实意地希望中国独立；不愿充当依靠斯大林这个“老大哥”的角色；非常真诚地寻求同美国在战后时期的的合作。①

当我试图搞清中共对中国与苏联毗邻的地区持何政策时，就发现了有关他们对苏态度的一些其他线索。“内外蒙古都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通过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积极帮助他们改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在联邦的基础上给予他们自治权，内外蒙古将联合起来，并继续作为中国的一部

① 我在延安没有把所有这些结论汇集在我写的任何一份单独的报告中它们散见于一些报告之中，也许附录一，第一部分，第34号报告是最接近于综合所有这些结论的一个概述。

分。”①关于满洲共产党公开地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虽然他们显然认为此事不会在1946年春天以前发生），他们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的行动将采取侵入满洲的形式。他们坦率地（至少是对我）说到他们的计划：为了应付和配合这种情况，他们已经准备好从南方迅速向满洲进军。②然而：

关于俄国人在满洲要求领土和特权的可能性，共产党人的语言是断然有力的。他们坚持说，因为“俄国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将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他们相信，俄国的确需要有一个与苏联有着真诚和友好关系的中国，一个将会允许苏联为商业目的、在不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下正常使用满洲运输和港口设施的中国。中国向苏联提供的方便将意味着消除两国之间在贸易或过境运输方面存在的不合理和麻烦的障碍。共产党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将对两国都有好处。

无需指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将使中共控制满洲。共产党确信他们将获得这一控制权……这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同样也认识到——满洲作为中国主要的和唯一发达的重工业基地是非常重

①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4号报告。在我向上报告延安的这些看法时，罗斯福已经同意了斯大林在雅尔塔提出的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地位的要求。这一事件的余波见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所著《在印度支那的幻象和现实》（载于《外交季刊》第49卷第3期（1971年4月）第387—388页）：“外蒙古总理泽蒙巴尔告诉我，毛泽东一掌握政权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求斯大林归还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斯大林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加强了对这个与中国有1500英里边界线的战略地区的控制……”

②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1号报告。

要的。①

尽管可能造成重复，我还是要概括一下我对毛泽东表示的目标的印象，这也许是有益的。首先是近期的目标。由于对共产党的力量及这种力量据以为基础的民众支持充满信心，他不希望内战，也不会首先发动内战。但是，如有必要，共产党将用战斗维护他们的利益，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②他的直接目标是成立联合政府。但这个政府必须承认共产党在他们实际控制地区的地方政府，允许他们的军队存在并继续由他们控制。③既然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将涉及与国民党实行某种合作并恢复统一战线，那么获得美国的支持是必要的，而同苏联关系密切则实际上是一个不利条件。如毛泽东经常坚持的，建立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它正

①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1号报告。同样，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声明是在斯大林已在雅尔塔表明他有完全不同的意图之后作出的。然而，即使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没有做出任何暗示，表明苏联以后要去劫掠这个他的延安共产党同志如此明确地希望控制的重工业基地。

② 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未动摇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多次对我表示过这个决心。当时在延安观察组工作的官员告诉我，在日本投降时，上面曾要求观察组判断，如果有命令要求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日本军队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共产党的意图如何。观察组的回答是共产党将进行战斗。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我与董必武进行过一次谈话，他当时作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正在美国，他毫不犹疑地作出了同样的回答。

③ 尽管蒋介石拒绝让一名美国司令官指挥他自己的军队，但他（还有赫尔利，华盛顿当局有时也如此）却希望共产党军队的问题可以通过把它们置于美国的指挥之下来解决。毛泽东不为所动，他说：“我们很高兴接受美国的指挥，就像欧洲的英国一样。但是，必须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这样做。”（附录一，第二部分，第10号报告。）

好符合我们说过的我们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设想，这种联合政府可能不过是一件宽松的外衣，它仅仅维持着实际存在的两个中国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共产党往往拿中国和联邦制度相类比。^① 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可能更容易记得，实际上中国从1911年以来就没有统一过。真正的统一当然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但如果中国分裂为二，双方都不是美国的敌人，总比中国发生内战，其中一方是敌人，而美国却支持失败的一方这种情况要好些。

作为长期目标，象任何政党的领袖一样，毛泽东当然寻求统治地位。很难了解他预期（或希望）这个目标能以何种方式、多快的速度实现。^② 当然，他依靠的是大多数敢于直言的中国人对国家统一所抱有的深切而且非常普遍的愿望。他也明确认为，共产党已成为一支远比蒋介石倒行逆施领导下的国民党有生气、有力量、得人心的政治力量。在联合政府可能提供的政治活动机会下，他似乎希望在不发生一场大规模内战的情况下实现这种领导权的转移。无论如何，毛泽东使人相信，他宁愿通过非暴力手段而不是暴力手段得到“统治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极为希望美国即使不实

① 周恩来往往用这样的方式试图表达他的意思：“总之，你们在华盛顿有民主党政府，但共和党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州，象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掌权并推行他们自己的政策。”但是周没有非常认真地把这一类比推演下去。

② 然而我确曾（在某种程度上）以书面形式正式表明过我对于中共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要用多少时间的看法。可以料到，并非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同意我对中共力量的看法。1945年2月在驻华美军总部食堂的一次午餐讨论会末尾，我曾打赌说：“共产党将在今后五年之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我友好的对手——他也在华呆了许多年——同意打赌条件是请赢家在华盛顿的餐馆吃一顿饭。我的朋友承认这笔欠债，但我们从没有一起去吃饭，因为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值得欢庆的理由。

标进行合作，也要持善意的态度。而且，完全撇开中国战后的发展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这个论点（这也是在莫斯科常听到的老论题）不谈，我认为毛泽东真诚地希望避免仅仅紧密地依赖苏联的情况。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上是不现实和没有经验的。^①但是他有与苏联和斯大林打交道20年的经验。或者有人会说他在打算玩弄以夷制夷的中国老一套把戏。从根本上说，在我看来毛泽东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他是以民族主义的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考虑问题的，并认为大多数国家（包括苏联和美国）都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它们的对外政策。由于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的俄国近在咫尺，令人感到不安，所以毛泽东希望得到美国的友谊是合乎情理的。当然，毛泽东肯定也会认为，对美国来说，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愿看到由于中国被迫依靠俄国从而使亚洲大陆处于中苏团结的支配之下，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国，回答是否定的

这个冗长的故事的结局已经提到过了。我在延安提出了若干相当一般和试探性的政策建议。^②但是最具体，而且可能是发挥最详尽的建议是1945年2月28日的长电，这封电报是我同重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写的。^③

① 例如，指出共产党对战后应如何对待日本的观点也许是很有意义的（附录一，第一部分，第31号报告）。

② 例如，附录一，第一部分，第16、20及40号报告。

③ 这份电报的原文见前面第六章《不要对委员长发号施令》一节中，还可见附录一，第三部分，(f)。

回忆一下该电的背景可能是有价值的。到起草这份电报时，我们已经对中共有了7个月的密切接触和广泛观察。卢登在4个月深入前线游击区的艰苦跋涉后刚刚回到重庆，并带回了证实和加强我们在延安和山西所做的调查结果的报告。^①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情况继续恶化，尽管政府为应付美国的批评作了少量的人事变动，局势仍然基本上如我在1944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所描述的一样，^② 赫尔利想通过谈判在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努力已陷入明显的僵局。赫尔利和魏德迈即将返回美国进行磋商。我们都认为，这是进行一次总的估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的美国人对所有可供选择的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讨论。偶尔可以听到愤怒的抱怨，说中国是“如此混乱”，最好的方针是干干净净地脱身。但很少有人拿它当真。战争还没有打赢。而且，虽然当时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的军事作用不会太大了，但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关心却并没有减少。我们不能抛弃中国，因为我们在那里有着使命和特殊责任——看来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还有一些人，只是少数，认为问题可以通过向共产党施加压力而获得解决。从来没有人清楚解释过怎样有效地施加这种压力。共产党在没有任何美国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正干得很出色——事实上，他们正在非常迅速地扩大他们的军队和地盘。他们没有必要听从我们的告诫而牺牲他们认为是重大的切身利益。如我已经提到的，赫尔利认为他能动员斯大林对

① 卢登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一个控制着广阔地区，得到民众积极支持和参加的纯粹中国人的政府正在发展”；“晋察冀共产党根据地的民兵组织证实了人民是支持共产党的（《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00—204页）。

三 目录二。

共产党施加压力，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是现实的。

还有少数人走得比施加“压力”更远。他们极力主张美国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直接干涉。例如，当时陈纳德将军的副官约瑟夫·艾尔索普就建议：

如果我们认为中共并不是苏联的附庸，它真的愿意接受任何使他们不能完全控制中国的妥协和联合，或者可以使他们转而与我们的利益合作，那就太幼稚了。所以，企图在中国促成国共和解或利用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是危险的和“愚蠢的”。

因此，我们唯一正确的政策是（在比现在大得多的规模上）支持中央政府，帮助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帮助它（如果需要就用我们自己的军队）统一这个国家，消灭共产党，并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①

然而，我没有听说有人曾理智地估计过对共产党进行军事镇压所需的美国兵力，或者当真认为美国公众在一一场长期战争刚刚结束时愿意支持这种几乎肯定会无限期拖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②无论如何，我们这些见到过共产党的人都认

① 附录一，第二部分，第7号报告。这不是一段援引文，而是试图描述真艾尔索普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所讲的话的大意。艾尔索普继续说到：“为了支持中国，我们必须对俄国采取一项强硬政策……‘告诉俄国人不许插手中国’。不过，艾尔索普的下述看法是正确的，即重要的问题不是抗日战争，而是将来亚洲的力量对比。但是，对于什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为现实的方法，我们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② 作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种不高明的意见，可以举出陆军部长帕特森1945年11月的声明。“他（帕特森）认为在那里的6万名海军陆战队可以从中国的这一头进军到另一头，而不会碰到严重阻碍。在那里发生的那小规模战斗仅仅是喜剧式的战争”（《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646页）。在朝鲜的中国人是在外国作战，没有游击战争中那种他们自己的人民的支持。”

为，美国的军事干涉不会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也不会是一种能赢得一个友好而统一的中功成国的方法。

更多的人继续死死抱着这样的希望，即能够说服蒋介石为他自己的利益（即使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去改革他的政府。例如，陈纳德积极主张“重庆彻底改组，然后在重庆和延安之间实现真正的统一”。^①艾尔索普也认为“我们还没有在中国发挥过的‘真正高超的美国政治家才能’，可以说服中央政府相信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好处。”^②使用说服办法的困难在于，我们已经用了各种办法，并动员了总统及其以下的所有可能的人去规劝，但丝毫也没有触动蒋介石。总统曾设法让蒋介石同意接受美国的指挥权。高斯和国务院曾经极力劝说建立一个“战时内阁”作为统一的第一步。赫尔利认真地、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已有数月。国务院已谨慎地谈过灵活性问题——尽管是否曾冲破赫尔利的阻挠让中国人了解这一情况是值得怀疑的。在我和其他许多人看来，是采取更积极更现实的步骤的时候了。

赫尔利的特殊牌号的“现实主义”可能有问题，这在当时已为人们广泛了解。然而，美国陆军继续希望利用共产党军

① 陈纳德1944年9月21日致罗斯福电，引自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历》第486页。

② 见本书第245页注①。也许应该指出，艾尔索普是在赫尔利接管美国事务差不多6个月之后说这番话的。这样，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美国反对共产党在华的军事干涉与直接说服蒋结合起来。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这大致上还是邹谠认为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然而，看来他并没有估计美国所需要承担的军事义务的规模，也没有具体谈到对国民党必须说服到什么程度：“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如果最高级领导不变动，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56页）。

队的军事潜力和他们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这一愿望，鼓舞了我们。^① 这种兴趣也得到1945年1月29日国务院政策指导备忘录的支持，这个备忘录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同意，并通过他转达重庆。^② 然而，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计划和建议都遭到了赫尔利的阻挠而未能执行。他坚持说，如果没有蒋介石事先同意，不能与共产党进行任何军事合作，也不能提出任何这样的计划。而众所周知，蒋介石一贯拒绝同意，甚至不屑于作个样子考虑一下这些实际建议可能具有的军事价值。

卢登在共产党地区作了1200英里旅行后，于2月初回到重庆，他拜访了魏德迈（他作为史迪威的继任者，已成为卢登的司令官），亲自向他作了汇报。卢登得出了下列结论：共产党军队得到民众支持，如果美国能给予他们援助，共产党军队在反对日本的游击战中可能是有用的。美国军事政策必须实行更大的灵活性才能实现这种可能。这些结论似乎给魏德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魏德迈提到他即将返回华盛顿，将在那里全面讨论政策问题，因此，他要求卢登把口头看法写成一个书面提要。他还命令卢登速回华盛顿，以便可以与他进

① “在史迪威被召回前一个月，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看到史迪威在委员长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国民党和中共双方的军队。陆军部打算向可能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一支中国军队提供租借法案物资。召回史迪威没有改变这些观点。……魏德迈争取让麦克卢尔将军做他的参谋长，并达到了目的……麦克卢尔很快就积极参加了制定武装中共军队并使用他们抗日的计划和提出这项建议的工作……在魏德迈司令部的讨论中，最后提出了使用中共军队的三种方案”（罗曼纳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形势危急》，第72—75页），还有一个战略情报局与共产党军队大规模合作的计划，尽管它可能已经作为上面提到的二个方案中第三个的一部分被考虑过（同上，第249—254页；以及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第76—78页）。

② 本书第130页注③。

行磋商。^①

由于时间很紧，卢登提议让我与他合作。^②我们一起仓促地准备出了2月14日给魏德迈将军的备忘录。以下引文也许足以说明它的主旨：

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一种与丘吉尔首相声明支持铁托元帅之前的南斯拉夫局势极为相似的局势。丘吉尔的那个声明如下：“对我们来说，最为明智和安全的方针是检验各个党派是否愿意抵抗德国人从而减轻盟军的负担，以此来对他们进行冷静的判断。现在不是从意识形态上选择这一方或是另一方的时候。”美国总司令对中国发表一个类似的公开声明，并不意味着撤销对中央政府的承认，或停止对它的军事援助；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明智。但是它将有助于预先说明我们准备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首要目标。这将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一个至今为止一直缺乏的坚实的团结基点。这一声明在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将非常深刻，以至于委员长将被迫作出权力上的让步，并同意与其它党派联合，实现统一战线。这样，目前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个集团，就将不再处于以保护自己为第一需要的地位，他们将会被争取过来，全心全意地站到我们一边；我们将第一次

^① 我完全知道，魏德迈在以后的年代里所作的声明使人们对他在这个时期的态度获得了一种与事实不尽相同的印象（例如，他在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的证词，见《太平洋关系协会》第275—341页）。然而，就是除去我个人和其他人的回忆，官方档案对此所作的记录也是大量而充分的（见本书第247页注^④）。

^② 卢登和我都幸派在战区司令官的参谋班子子里工作。我陪同他参加了与魏德迈将军的谈话。

在中国得到一个统一的盟友。

几天之后，乔治·艾奇逊（他在赫尔利不在期间主持大使馆工作）勇敢地决定，他有责任给国务院一个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它要作得比在赫尔利领导下所能作的更加实事求是。上述情况就是乔治·艾奇逊这种作法的背景。正是这一背景以及我们对美国军队现行利益的理解，至少部分地使我和卢登2月14日的备忘录和紧接着的2月28日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电报和建议都把重点放在军事考虑之上。

大使馆2月28日电报的关键所在，是建议“总统以明确的方式通知委员长，由于军事需要，我们必须向共产党及其他能帮助抗日战争的适当的集团提供物资并与其合作。……我们正在采取达到这一目的的直接步骤。”

电报本身是一项集体创作。我记得包括艾奇逊在内的5名官员签署了电报。我们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对前后几稿的讨论、审议和修改。艾奇逊审定了稿子。他的较小的修改得到了我们中所有其他人的同意。我记得，在这封电报的基本内容及我们希望它成为政策性建议方面，大家的看法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致的。讨论的主要是措词和写法问题。我相信电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清楚的，它本身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可能，即对它的每个签署人来说，它有着虽然是细微的，然而却是不同的意思。以下就是

① 附录一，第三部分，(e)。《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一书中的原文象往常一样省略了对蒋介石的一些尖刻评论。这个备忘录获得了建议实行“扶托政策”的恶名。实际上，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独创。在重庆的讨论中，提到这种类比已有一段时间了。例如，我早在1944年10月10日就提到过(附录一，第一部分，第40号报告)。但与南斯拉夫类比也不十分恰当，因为我们特别提到不应该撤销对蒋和他的政府的承认和帮助。

我自己对我们所提建议意义的理解。

首先，我们建议要从蒋介石手里拿走美国对华政策的否决权。我们的行动将涉及到美国援助和美国军队的使用问题，这类事情正当地说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①这不象早些时候关于美国指挥权的建议，或在缅甸战役中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建议，它无需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也无需蒋介石采取行动或提供便利。因此用不着向他提出请求。

但是我们行动的意义，它在中国内部造成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这一点。它将清楚地提请所有有关集团（蒋介石和国民党、共产党、自由主义团体、中国舆论以及苏联）注意，美国的对华政策事实上是中立的，并没有对蒋介石或其他任何党派承担无条件支持的义务。换句话说，我们不过是在表明，美国的政策就是我们一贯所说的那种政策。

至于在中国对日作战，我们再也不能完全依靠那些徒劳无益的努力，即想改变和激励优柔寡断、毫无生气并有抵触情绪的国民党。如果蒋介石和国民党采取发脾气和袖手旁观的态度，情况将不会比现在的有多大变化。但我们却将获得

① 尽管我们两国是与一个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友，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外交步骤。国务院支持我们建议的论点，可参见中国科负责人3月1日的备忘录：“……用军事需要来说明我们有利用所有中国军队的特权，这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第248页）；还有1945年月7日远东司给助理国务卿邓恩的备忘录（同上，第262—264页）。下列一些事实通常被忽略了：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内战；共产党并没有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共产党正式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蒋介石的领导；中央政府已经承认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的合法地位；第18集团军的三个（极大膨胀了的）师是中央政府军正式的一部分；朱德和这支军队的其他指挥员仍然持有中央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合法委任状。所以我们没有建议与一个未被承认的、反叛的军队合作。

一个积极的盟友，它明确认识到它的力量是通过战争而获得增长的，战争使它在赢得地盘的同时，也附带地赢得了人心和人民的拥护，并得到人民更广泛的支持。

到那时为止，还不需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事实上没有人提出应该进行这样的选择。^①但是，如果美国声明将采取一项独立的、不受约束的政策，我们就将能够适应和跟上中国事态的不断发展而不会处于与这一潮流相对立的地位。毛泽东的革命是否会成功，它最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些仍是将来的事情。但起码我们不应排除这样一个机会，看一看在延安进行的预演是否有预示性，毛泽东的声明和对友好合作的再三建议是否可以认真对待。

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采纳并实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一般认为，对美国的利益和美中关系来说，事情可能不会比后来发生的情况更坏。也许很难用这种消极而不能给人以教益的结论去说服人们。设想历史可能的另一种发展是一个纯属揣测，需要小心对待的游戏。但是可能越严格地遵循我们的出发点来考虑，我们的设想就越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2月28日电报中的建议被批准，在华美军就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迅速地开始实行与共产党进行积极军事合作的计划。这些计划已经准备好了，但由于赫尔利支持蒋介石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又被搁置起来。这些计划的全面细节

① 看来不需要作太多考虑就可以断定赫尔利下列行动的动机：他一直叫嚷说，这个备忘录以及其他所有与蒋介石的意见和愿望相反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因为它将导致蒋政权的被推翻或自行崩溃。这是只有赫尔利和蒋介石周围的一伙人才持有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希望这个建议会导致蒋介石政府向着某种类型的联合政府转变，据认为这恰恰是赫尔利应该设法达到的目标。

从未发表过。但它们曾设想以几千名美国人和相当数量的装备支持游击战争。^① 从后勤工作上讲，这些手段是可以得到的。中缅公路和输油管道已修建完毕。正在越过驼峰空运数量比以往大得多的物资。欧洲的战争正接近尾声，因此已经腾出战略情报局的和其他经过训练的人员供调用。从4月底开始，美国在冲绳站住了脚，并正在建立一个大型军事基地。冲绳距苏北共产党地区只有约700英里，通过这条路线进行空运可能很快会比经过印度飞越驼峰的漫长路线进行空运要容易得多。

面对美国不愿再无休止地讨论这个问题的事实，蒋介石也许会同意组成联合政府。这可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将是蒋介石挽救威望和维持哪怕是形式上的国家领袖地位的唯一途径。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是不重要的。它可能很松散（可能不会超过高斯最初提议的含义模糊的“军事委员会”），但这个机构毕竟具有全国政府的名义，并且不仅使国民党军队也使共产党军队取得了合法地位。

到了8月，可以指望美国人（教官、情报官员、爆破专家以及无线电小组）广泛地分布到共产党各个根据地，并与共产党军队一起工作。这样，人们一定能设想出，对日本在中国的投降将会有个完全不同的处理。那时可能就没有理由也不需要命令日本人（在共产党已为之战斗和占领了八年的华北地区）只许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也可能就不会奇怪地命令日本人在国民党设法到达之前就地固守并抵抗共产党。美国也就可能没有必要派6万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作为国民党的代理人去占领华北的港口。

① 见本书第247页注①。

在美国的帮助下，共产党可能会在华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解除伪军的武装或者收编他们，并在这个过程中积蓄武器和物资。由于有了完好无损的铁路和运输设备，他们就可能迅速地把日本人运到港口遣返回国。在美国的调解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势必划分各自的地区。但任何一个公正的界线划分都应该在让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同时，让共产党继续控制华北的所有主要地区。没有美国在后勤上帮助国民党从空中和海上往这些地区以外运送军队，国民党要挑起内战可能是困难的，并且显然是自取灭亡。

从这个基点出发，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提出他自己的设想。例如，当共产党军队由美国联络官和通讯小组陪同迅速进入满洲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共产党是中国联合政府的国家武装部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可能使俄国人丧失长期占领满洲的借口。是否也会使他们改变运走满洲大部分重工业设备的意图？可以设想，俄国人可能不欢迎美国人。但是在这些情况下，中共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呢？由于许多历史的原因，俄国人对满洲从来就不得人心。从所有的报告来看，他们的军队表现得象大多数外国占领军一样恶劣——也许只能更坏。而美国联络组，一般情况下是由受过高度专业化训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在同他们与之合作的当地人民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方面，通常比拥有几个师的大部队成功得多。

无论人们如何任自己的想象自由驰骋，看来下面这点是很清楚的：实行一项独立的、不受约束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日本人投降以前的1945年春天开始与共产党合作，这可能会把我们战后初期的对华关系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有利得多的基础之上。内战可能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

可能是很短暂的，并且破坏性也会小得多。我们也不用承担因为援助和支持了失败的一方面拖延了战争这一责任——这与我们的意图相反，但很难反驳。我们就可能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和关系。一方面，我们肯定必须放弃那种按照我们的愿望来改造中国的家长式和传教士的态度；另一方面，或许我们会发现与坚决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毛泽东和平共处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世界也就远不会这样复杂。

库比克博士在结束他对美中关系历史的简单回顾时声称：“当美国在争夺控制中国本部的斗争中不知不觉地援助了错误的一方时，朝鲜和越南的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①我愿提出如下修改：“如果美国能在1945年抛弃它对中国的某些幻想，真正理解在那个国家到底发生着什么事情，并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采取一项现实主义的政策，朝鲜和越南（战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我们就不会仍然面对无法解决的台湾问题。的确，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台湾问题，因为我们不会“丢失”中国。而且毛泽东的中国由于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取得政权，并且没有被敌视它的西方推向孤立状态，可能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例如，中美乒乓球比赛就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不会成为一个震撼世界的、二十一年来史无前例的大事件。

① 《美亚文件》，第113页。

附 录 一

发自延安和重庆的报告的一览表

(此附录是作者在延安写的报告和其他一些文件的目录，以及发表和转载这些材料的书目及其页码，按照写作年代次序排列。——译者)

第一部分 1944年在延安写的报告

缩写符号：

CWP：国务院：《中国白皮书》(State Department,
China White Paper)

PJH：洛贝克：《帕特里克·J·赫尔利传》(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TYT：外交委员会：《泰丁斯记录稿》(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ydings Transcript*)

IPR：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协会》(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不完全的

(S)：提要

(E)：节录

(P)：大意

如果没有带标记就说明本文是完整的——尽管在有的情况下本文中提到的附件可能被省略了。

报告 编号	日 期	篇 名	《美英 文件》	《美国外交关 系，1944年》 (第6卷)	其他资料
			《美英外交关系，1944年》 (第6卷)		
1	1944.7.28	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正式印象。	681	517	
2	1944.7.28	共产党希望美国继续在延安派驻代表（与毛泽东的会谈）	684	522	
3	1944.7.30	共产党军政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与斯坦因、沃陶；周恩来与谢伟思；朱德与斯坦因、沃陶、爱泼斯坦；林彪与谢伟思的会谈）	690	533(S)	
4	1944.7.31	国民党和日本人对共产党军队战斗力的看法（勾连钦与冈瑟·斯坦因在重庆的会谈）	718	534	
5	1944.8.3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722	562	CWP:965(E)
6	1944.8.3	陕北的经济状况	728	625(S)	
7	1944.8.4	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游击队和共产党在河南的扩展（与叶剑英的会谈）	733	536(S)	

续表

报告 编号	日期	篇 名	《美 国 文 件》	《美 国 外 交 系 (第8卷)	《美 国 外 交 系 (1944年)	其他 资料
8	1944.8.13	解放日报		737	—	
9	1944.8.14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声明		739	—	
10	1944.8.15	华北军事形势概述(叶剑英所作的情况介绍)		750	—	
11	1944.8.16	共产党统治区的名称		756	—	
12	1944.8.16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举行的招待会		761	—	
13	1944.8.19	共产党指责陶锡山		767	—	
14	1944.8.19	延安的英语每日新闻广播开始播音		776	582(S)	
15	1944.8.27	与毛泽东的会谈		783	602	PJH, 231(E)
16	1944.8.29	美国给中共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能性		797	613	PJH, 232(E)
17	1944.8.30	共军的实力及分布(叶剑英所作的情况介绍)		800	635(S)	
18	1944.8.31	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彭德怀所作的情况介绍)		806	644(S)	
19	1944.8.31	中国东南部中共根据地可能发挥的作用(与苏联		817	527	PJH, 233(E)

续表

报告 编号	日 期	篇 名	《美亚 文件》	《美国外交关 系, 1944年》 (第6卷)	其他资料
20	1944.9.3	的会谈) 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对付由中共崛起而产生的问题的政策	823	615 PJH, 283(E)	
21	1944.9.4	对中共领导人的一般印象	832	551 PJH, 284(E)	
22	1944.9.4	新四军的成长;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民主号召力	836	646(S)	
23	1944.9.6	对中共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消息无需进行新闻检查	842	—	
24	1944.9.8	日本共产党的纲领(与野坂参三的会谈)	846	—	TYT, 2080
25	1944.9.8	中共批评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	852	—	
26	1944.9.10	共产党对游击区根据地政治控制的发展	857	622(S)	PJH, 284(E)
27	1944.9.11	英语新闻广播文稿	875	—	
28	1944.9.13	转交《解放日报》	877	—	

续表

报告 编号	日期	篇 名	《美亚 文件》	《美外交关 系, 1944年 (第6卷)》	其他资料
29	1944.9.18	中共关于在对外宣传中使用中国名称的决定 共产党评国民党谈判	878	576	
30	1944.9.21		882	—	
31	1944.9.23	共产党关于战后应如何处理日本的看法（与傅占的 会谈）	896	584	
32	1944.9.25	与朱德将军的会谈	893	588	
33	1944.9.27	匈牙利人魏里·道弗从上海去重庆途中在延安停留	903	—	
34	1944.9.28	中共对苏联和美国的方针	933	—	
35	1944.9.30	转交广播稿	948	—	
36	1944.10.1	转交《解放日报》	962	—	
37	1944.10.2	共产党成功地消灭了土匪；共产党声称实行民主政 革与经济改革的旁注	963	628(S)	
38	1944.10.9	美国官员和记者报导他们在前线得到了八路军的积 极与经济改革的旁注	1004	716(S)	

续表

报告 编号	日期	篇 名	《毛正 文件》	《美国外交关 系, 1944年 (第36卷) 文件》	其他资料
			《毛正 文件》	《美国外交关 系, 1944年 (第36卷) 文件》	
39	1944.10.9	中共目前的实力和将来的重要性 极支撑	1011	631(S)	TYT, 1979 CWP, 566(E) PJI, 328(E)
40	1944.10.10	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现实主义	1014	767	TYT, 1987 IPR, 185 CWP, 574(E) PJI, 329(E)
41	1944.10.11	共产党利用国务院的广播新闻公报	—	1917	—
42	1944.10.11	延安庆祝四十节	—	1020	—
43	1944.10.12	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中国国内形势 (注:《渔业文件》 未收录毛泽东的谈话和周恩来的部分谈话; 《外交	—	1024(1)	635

续表

报告 编 号	日 期	篇 名	《美亚	《美外交关系 系, 1944年》 (第6卷)	其他资料
			文件》		
关系, 1944年》第6卷所收是全的)					
44	1944.11.14	中共目前对国共关系的态度	1069	717	
45	1944.11.15	对美国飞行员逃出敌占区的报道所进行的新闻检查	1081	—	
		不应把中共根据地看作敌占区			
46	1944.10.16	共产党评蒋的双十节演说	1083	—	
47	1944.10.17	中共的政策和施政纲领	1109	—	
48	1944.10.18	共产党利用外国记者的言论进行宣传	1114	—	
49	—	(无记录, 大概是例行传递情况资料的报告)	—	—	
50	1944.10.21	转文《解放报》	1117	—	
51	1944.10.21	英语广播稿	1118	—	

第二部分 1945年在延安写的报告

报告 编号	日期	篇 名	《苏维埃文选》 (系, 1945年) 第7卷		其他资料
			文件	文件	
1	1945.2.14	国共谈判的失败(与周恩来会谈)	1337	—	
2	1945.2.16	俄国人对美国支持中央政府感到关切	1338	—	
3	1945.2.17	国民党希望与俄国达成妥协	1343	—	
4	1945.2.17	孙科的看法	1347	—	
5	—	中国就福摩萨问题进行的试探 建议使上海成为开放城市	—	—	
6	1945.2.23	艾尔斯普雷尉的看法	1355	52	
7	1945.2.28	共产党当前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1372	—	
8	1945.3.11	中共对参加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答复	1390	—	
9	1945.3.11	毛泽东的看法: 美国与中国	1393	—	
10	1945.3.13	共产党期待俄国人参加强东战争	1400	272	
11	1945.3.14	(无记录, 大概是例行报告)	1405	279	
12	—	共产党对新疆的看法	—	—	
13	1945.3.16	—	1403	—	

续表

报告 编号	日期	篇 名	《美亚 文件》	《美日外交关 系, 1945年》 第7卷	其他资料
14	1945.3.16	共产党对蒙古的看法	1419	234	
15	1945.3.16	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1412	—	
16	1945.3.17	共产党地区的救济复兴组织的计划	1414	285	
17	1945.3.17	美国人的直接观察证实了共产党关于他们控制区的 范围的说法	1417	287	
18	1945.3.18	共产党地区统一的工人和妇女组织	1423	290	
19	1945.3.19	国民党的陕甘宁边区“流亡”政府	1425	—	
20	1945.3.20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来往	1427	293(S)	
21	1945.3.21	蒋介石如何对待桂系集团	1433	295(I)	
22	1945.3.22	蒋所作的任命与宣布的和平意图相矛盾	1439	300(S)	
23	1945.3.22	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	1443	301	
24	—	(无记录; 大概是例行报告)	—	—	
25	—	(无记录; 大概是例行报告)	—	—	
26	1945.4.1	中共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政策; 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	1572	310	

第三部分 其他文件

• 264 •

报告 编号	日期	篇 名	《美业 文件》	《美国外交 文件》	其他资料
a)	1943.1.23	国共形势	—	(43)193	TYT, 1979 CWP, 570(E)
b)	1944.3.20	(需要实行交换条件政策)	404	(44)37	
c)	1944.4.7	新疆局势	—	(44)77(I)	TYT, 1978(I) CWP, 564(E)
d)	1944.6.20	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全文见附录二)	575(I)	—	TYT, 2035(I) IIR, 816(I) CWP, 567(E)
e)	1945.2.14	我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 (与R·P·卢量合写)	—	(45)216(I)	TYT, 1980 CWP, 575(I)
f)	1945.2.28	(中国局势)(大使馆全体人员的电报)	—	(45)242(I)	TYT, 2035 CWP, 87(P)

译注:《美国外交关系》页码前括弧内之43、44、45系该文件集1943、1944、1945年有关中国各卷。

附录二

中国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1944年6月20日

一、中国的局势正在迅速走向危急关头

(一)到目前为止，日本在中国政治和军事并重的战略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日本有两种可能的选择：

(1) 它可以在军事上使中国屈服。但这可能需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一支庞大的、长期驻华的占领军。并且还有这样的危险：这可能迫使国民党实行真正的民众动员，从而可能形成有效抵抗，并且使日本的任务变成象在华北那样旷日持久和代价昂贵。

(2) 或者，日本可以在中国保持足够的压力，慢慢地进行扼杀。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巧妙地利用傀儡，了解中国内部不断进行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包括国共冲突），并认清蒋介石指望由他的盟国在中国以外的战场为他赢得战争。这一政策的好处在于：只要国民党领导人看到有幸存的机会，就不会采取发动一场有效战争所必需的步骤。这将消除对日本侧翼的任何积极或直接的威胁，使这些目的以较小的代价得以实现。

日本采取了第二种选择，把赌注押在国民党将完全象以

往那样行事上。与日本人的许多其他赌博一样，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他们算计得很周密。中国正在慢性死亡中苟延残喘。中国现在并没有构成对日本的任何威胁。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中国也一定抵挡不住日本人夺取美军在华东的基地的坚决进攻。

（二）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比过去十年更为脆弱。

中国面临着经济崩溃。这正在引起军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解体。这是造成有增无已的政治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委员长正在失去中国的支持。这个国家在抗日战争的头两年，在暴力侵略面前团结一致，曾形成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力量。现在国内的弱点变得突出起来，统一的进程正出现倒退。

（1）士气低落，人们灰心丧气，普遍存在着绝望情绪。

（2）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和管制措施无法执行，经常不起作用。政府为庞大的军队和官僚集团征集足够的粮食的工作也开始遇到困难。

（3）空前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贪污腐化从上到下充斥并腐蚀着政府和军事机构。

（4）知识分子和拿薪水的阶层，受通货膨胀的危害最严重，几乎无法生存。学术团体不仅受到经济压力的磨难和困扰，而且多年来严厉的政治控制和镇压，使他们丧失了过去的聪明才智和领导地位。

（5）农民对于征兵、收税和随意加派其他苛捐杂税等弊端的不满已相当普遍，并正在日益增长。过去零星爆发的盗匪活动和农民骚动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行动并带上政治目的，这种危险正在与日俱增。

(6) 地方势力集团之间、这些集团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之间正在串通一气，并积极地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力量继续增长，在中央政府日益衰弱的情况下，正在迫使中央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新的政治让步。

(7) 国民党军队中的动乱正在加剧，从1943年下半年出现的“少壮派将领阴谋”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在较高的阶层中，战区司令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由此正在产生着“新军阀主义”。

(8) 国共之间的破裂不但没有任何弥合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严重：内战不可避免，现已众所公认。

(9) 由于国民党实行自私的政策并拒绝接受进步的批评，它正在失去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它似乎不能吸收新鲜血液使自己恢复生气。它的领导阶层固定不变，日益僵化，并丧失了感受现实的能力。为了同越来越尖锐化的党内分歧和派系相抗衡，它转而依靠反动的、不得人心的陈氏兄弟。

(10) 委员长同样丧失了现实主义的灵活性，并顽固坚持狭隘的保守观点。他日益增长的狂妄自大以及想既做领袖又做“圣人”的可悲的企图——表现在《中国之命运》和他论述经济问题的书中——使他丧失了许多在中国处于最有影响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尊敬。人们对他的独裁的批评越来越直言不讳。

形势恶化和内部关系紧张的征兆由于河南的败退而加剧，看来，日本人很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把中央政府赶出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如果那样，上述征兆将会进一步加剧。

面对当前的严重危机，国民党在中国社会中不再是统一和进步的力量，而国民党曾经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为近代中国做出了它最大的贡献。

(三) 国民党不仅证明他自己拿不出防止崩溃的办法。

而且相反，它的政策正在加速这一危机的到来。

中国会有某种厌战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国民党的政策只能说是破产的政策。由于国民党在最近结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未能认真对付这一局势，这一事实显得突出起来。

1. 在国内政治方面，国民党领导人把永远保持自己权力的愿望凌驾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其结果是反动力量占据了统治地位。

国民党依然无视国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巨大政治运动。从委员长的文章和党报上看出，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民主改革这个词。宪政依然是一个空洞的许诺，实现这个许诺的唯一“准备”，是不情愿地试图在集体负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得人心的、不民主的地方自治制度。由于日本人在满洲和他们控制下的其他地区利用了这种地方自治，这种制度受到人们的憎恨。

在有关民主前途的基本问题上，如宪政的形式、国会的组成和选举，国民党仍然实行专断和独裁。在给予人们言论自由和承认其他党派方面，基本情况并无任何改进。甚至连象给予现存的、软弱无能的国民参政会一些权力和民主，使之在教育上和政治上能够有所建树这样的措施都不愿采取。

相反，目前的趋势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国民党对政府人员进行强制的政治训练，强调军队的政治性质，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并积极贯彻党政合一的原则，从而加紧推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政策——尽管这样的政策在中国注定要失败。

国民党毫不放松它的现政权所依靠的独裁统治。它不但不放弃或减少警察国家的各种工具——多种多样的、无所不

在的秘密警察组织、宪兵队等等，反而还在继续加强它们，作为保持国内安全的最后手段。（不幸的是，在加强这些受德国影响而建立的、盖世太保式的组织中某些最重要的组织方面，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

尽管国民党为了应付国内外的批评，口头上也说要同共产党谈判，但由于它为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所困扰，害怕共产党会赢得国民党由于本性不可能赢得的人民支持，仍然继续坚持只能导致内战的政策和计划。这样做表现出它自己无视如下事实：国内的政治、军事状况如此糟糕，没有外来援助国民党很难在内战中获得成功；这样一场内战将加速崩溃的进程和扩大混乱；它将妨碍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这种情况目前只会有利于日本，而最终只会有利于俄国。内战的准备工作包括与现在的中国伪军建立联盟，这对中国的未来的统一和民主是不祥之兆。

2.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不愿意采取任何有效步骤制止通货膨胀，因为这将会损害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合理地改善财政状况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官吏日趋腐化，而国民党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它未做任何努力去制止大规模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所有这些都是由党内的当权人物或与其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人干的。

国民党未能有效地动员起物力财力。颁布的战时管理办法已成为一纸空文，甚至加剧了它们原来计划要解决的问题。既考虑欠周又执行不力的物价管制条例就是一个例子。

它消极地听任工业和更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衰败，当囤积原材料比把这些材料投入正常的生产更有利可图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它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定量配给，并且没有控制奢

侈品的大量生产和交易，许多这类奢侈品来自日本占领区。对于这类进口商品是用对敌人极有价值的战略物资换来的这一点它也毫不关心。

它未能对地主、商人的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征税，以开辟财源，削减预算赤字，增加收入。它听任税收机构贪污无能，以至于可能只有不到1/3的税收能够上缴政府。而它继续为无所事事、毫无用处的党的官僚机构消耗大量政府资金。

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也是消极地坐视通货膨胀加剧，连积极抛售黄金和外币这样的缓解措施也不采取。

它不肯解决中国基本的经济问题，诸如土地占有日益集中、地租过高、毁灭性的利率及通货膨胀等。

3. 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日益疏远它的盟友，表现出愚蠢自私、目光短浅。

国民党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一味讨价还价、虚张声势和进行讹诈，并且不愿采取对它本身有利的坦率相待和竭诚合作的态度，因而正在疏远中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它已经疏远了另一个潜在的主要盟友苏联，它对苏联的态度象它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样缺乏理性和目光短浅。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它不负责任地散步谣言，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一项允许日本军队撤离满洲的秘密军事协定。

国民党的生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靠外国支持，它却在这个时候奉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国民党这种鲁莽的外交政策不仅危害着它自己，而且有迹象表明，它极想在美国、英国和俄国之间制造磨擦，当迅速取得胜利——哪怕是任何一点胜利——要求尽量扩大一致和尽量缩小磨擦时，这样的伎俩就等于暗中破坏盟国的战争努力。

4. 在军事方面，国民党似乎已经决定让美国来打赢这场

战争，并且实际上已经不再积极参加作战。

它现在最重要的贡献是让我们——以我们自己大得不可思议的代价——在中国建造和使用空军基地。

它迟迟不肯让中国军队在滇西发动进攻，也许战役就因此而不能获胜，而这支军队是专门为这一任务而指派、并由我们训练和装备的。它毫不考虑缅甸北部的美中联合战役需要这些部队的支援，而这个战役的目的是打通进入中国的“生命线”，以便最后在中国沿海登陆。它在进行了好几个月的阻挠之后，才同意进行这一行动。

国民党象以前处理苏联向它提供的物资一样，未能有效地利用美国给它的装备。运到中国的装备常常没有运往前线。还多次听说这些物资已被囤积起来或转用于非军事目的。中国在处理这些物资方面表现了一种“狗占马槽”——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的态度。某些物资由于缺乏运输工具而在印度烂掉。它把囤积的物资隐瞒起来，不肯拿出来供我们的军队使用。例如汽油，据悉中国是有的，但甚至在情况非常紧急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自身利益的时候，国民党仍不肯向我们提供。

它一直拒绝对交通运输进行整顿并加强管理。过去，这在日本人侵占缅甸和滇西时造成了巨大的物资损失；现在，这一点又阻碍了军事行动所依赖的中国国内运输。

它把军事合作和毫不相干的财政要求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要求只能说是一种讹诈。尽管美国对华援助的开支（对此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对等的开支）使中国为数已经很大的外汇“储备金”继续增加，它还是提出了这些过分的要求。这些储备金目前在中国不能使用，因此实际上是一笔为战后使用而秘密囤积的“资金”。

它未能贯彻军事征用法以帮助我们在中国获得物资，却让我们听任毫无良心的投机商的摆布，有些投机商据说与官方有联系。这些投机商获准对我们索取难以想象的高价，并通过美元与法币完全脱离实际的交换比率加重这种勒索。而我们购买的某些物资本来却是通过美国贷款提供给中国的。它似乎无视这一事实，即在中国获得的物资越多，从印度运来的物资就能越多地用于其他必不可少的军事需要。

国民党对于美国搜集中国战区敌军重要情报的活动仍然不予合作，有时还制造障碍。这种态度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中国谍报组织（我们为它花费了极大的努力和开支）答应给予合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继续阻挠美国观察员参观真正的作战前线；顽固地拒绝允许与共产党地区进行任何接触。它显然仍旧看不到无论在中国或其他有关战区军事上都迫切需要这种关于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情报。对于下面这件事它也毫不在乎，即不同共产党控制区接触，可能妨碍了我们对日本进行远程轰炸，并可能会使美国人付出不必要的生命代价。

在国民党自己为战争而作出的努力中，它实行了一种恶劣腐败的征兵制度。这种制度只能使不适宜当兵的人充斥于军队，而最有能力和最强壮的人却能行贿以逃避兵役或干脆逃跑躲避。大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士兵忍饥挨饿、遭受虐待，以至于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而且服兵役在人民看来就等于判死刑。同时，国民党拒不接受这样的建议，即应该缩编军队，以保证他们获得充足的食物和武器，并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和军事训练。它之所以拒绝，是出于唯利是图的政治考虑，即必须集中力量继续进行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而且军队的数量是衡量权力大小的最重要尺度。

出于同样的原因，国民党拒绝动员它的士兵和人民进行中国能够有效地进行的唯一一种战争——人民游击战。也许，我们参加这场战争使国民党的问题简化了。由于它害怕中国内部的力量——它自己的人民——就象害怕日本人一样，它现在企图避免与日本人冲突，以集中全力维护自己的权力。

国民党听任军队日益腐败的情况最近在河南的败绩中充分表现出来。这次失败不仅是由于缺乏重型武器，还由于军队士气低落、士兵境遇悲惨、人民——他们一贯受到虐待——未给以支持、领导指挥无能，以及军官由于普遍与敌占区做生意而腐化堕落。

如果我们承认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国民党现任领导人并不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打击日本人，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它甚至可能企图避免使中国成为打击日本陆军的大规模战役的战场。这有助于解释何以国民党持续同日伪军保持来往。国民党可能希望这样就能防止日本人坚决发动进攻，使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得以维护，使几乎所有国民党官员在华东都拥有的房屋免遭破坏，并使国民党在沿海城市原有的经济—工业基地得以保护。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就暴露了国民党领导人——即委员长——对美国的生命和资源所抱的态度，即毫不在乎战争的拖延将使美国付出的额外代价。

（四）国民党这些显然是自取灭亡的政策的根源，在于这个党的成份和性质。

鉴于上述情况，就势必要提出下列有关问题：为什么国民党失去了它的领导能力？为什么它既不愿自己积极对日

作战，又不愿同在华美军竭诚合作？为什么它已不再能统一这个国家？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这个党目前的成份和性质中找到。美国人对此所作的一个权威而明确的描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政治上，国民党是由那些主要关心保住自己的权力而排斥一切异己者、并在内部不择手段地互相倾轧的保守政治集团组成的集合体。经济上，国民党依靠的是非常狭窄的基础：农村中的豪绅地主、军阀、政府中的上层官僚，以及与政府官僚有密切联系的商人—银行家。这个基础实际上已在战争期间缩小了。国民党不再象它一度有过的那样得到中国工业家的全力支持。由于日本人占领了沿海城市，这些工业家作为一个集团已经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被极大地削弱了。

对国民党的这一描述与上面提出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

国民党丧失了它的领导地位，是因为它失去了与全国人民的联系，而且不再代表他们。中国国民通过战争的实际经验变得更有政治觉悟，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自私自利。

国民党不能有效地作战，因为如果不是更加依靠人民和得到人民支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必须激励曾在战争初期出现过的那种民族热情。在当前情况下，只有改组国民党和实行更多的政治民主才能产生这种热情。这种民主采取什么方式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真诚地采取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态度。外国侵略的威胁已经不足以激励中国人民，现在，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恢复他们的热情。发展民主虽然对中国继续进行战争是最为重要的，但在国民党领

导人看来，这却会危害党的权力基础，因为它将意味着保守集团不得不放弃他们严密维护的垄断权力。与其如此，他们倒宁愿眼看战争停留在目前这种消极无为的状况之中。他们就这样为了利己的目的牺牲着中华民族的利益。

出于同样的原因，国民党不愿对美军在华的努力给以充分的合作。因为充分的合作必然要求中国作出更多的军事努力，而这是国民党根本做不到的。此外，国民党担心，美国人大规模地直接参与中国的作战，将会暴露国民党自己的怠惰无为，美国人的榜样以及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私人接触将会造成自由化的影响。

国民党不能统一这个国家，因为它所依靠的是经济上最保守的集团，这些集团希望保持中国的经济上、社会上落后的农业社会。这些集团不能促进中国工业化，尽管它们口头上也高唱要实现这个目标。它们还致力于维持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本质上是要发展各个集团自身的利益，而抵制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可以拿出诸如国民党与四川军阀和一些黩武主义者的联系等无数实例，证明国民党同各种反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集团站在一起。国民党不反对维护其内部某些集团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利益，或是保持与中国沦陷区的贸易。它这样做不是本着国家利益的原则，而是看从事这种活动是否能够获利，这就解答了何以国统区从中国沦陷区进口的货物大部分是奢侈品，面向沦陷区出口的却是粮食和战略原料。因此，国民党与汉奸政权之间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着很多联系就毫不足怪了。

（五）国民党的现行政策看来必定要失败。如果这一失败导致中国崩溃，它将给我们在远东的近期军事计划和长远利益带来重大灾难。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在现任领导人掌握之下的国民党，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实施一项能够加强抗日战争和制止内部崩溃的计划。它一意维护和巩固自己权力的做法必定适得其反，只会加速而不是延迟这种崩溃的速度。除非国民党扩大自己的基础，改变自己的性质，否则只能继续实行现行政策，它不会主动采取步骤实现这种扩大和改革。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失去了民众支持，便以加倍的努力来维持和垄断控制权。

国民党的现行政策看来必定要失败，因为它们与中国内部的强大力量背道而驰，并正使中国走向毁灭。由于这些政策既对我们不利，又无助于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它们的失败本身对美国利益来说将不会是灾难。鉴于以上提到的许多原因，如果国民党的垮台能够立即产生一个进步政府，这个政府可以统一中国并帮助我们打击日本，我们或许应该欢迎这种垮台。

但是，危险在于目前国民党政权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可能会以出现突然的崩溃而告终，结果将在中国造成真空。这种情况将使我们不可能在近期利用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因为日伪方面也许能占据这一真空，而且所花的代价要比进行一场大规模军事战役少得多。我们也许就不能再利用中国的侧翼位置、继续从中国的基地出发作战，战争因而将延长并更加困难。

这样的崩溃还将使中国进入一个内部动乱的时代，使它长期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而这样一个政府是远东的稳定与秩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现在中国对我们也许价值不大，但它将会成为我们的重大负担。

（六）然而，中国有活跃的建设性力量反对国民党领导

的倾向，如果得到机会，它们也许能防止可能发生的崩溃。

这些对政府及领导政府的国民党日益不满的集团有：爱国的青年军官、

小商人、

大部分下层政府官吏、

大多数归国留学生、

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和专门职业阶层、

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在孙科这样的人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少数派）、

小党派（它们之中象救国会这样的组织享有很高威信）、

中国共产党、

以及不善言辞但日益不安的农民。

这些集团的人数和影响加在一起可能是巨大的。一位国民党官员最近承认，对国民党现政府的不满极为广泛，如果举行自由普选，可能有80%的选票是反对它的。但是，这些集团大多数处于分散无组织状态，也许象农民一样，只是对所处状况感到盲目不满。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信仰——如果说有政治信仰的话。然而，由于觉悟到在改变现状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正趋于联合一致。当然这种觉悟和联合受到国民党各种方式的反对。

危险的是，如果情况不断恶化，某些这类集团可能会径自盲目行动。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加剧混乱。这种盲目行动也许是军事暴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可能性。结果就会出现类似1936年西安事变的情况。但是目前形势比那时微妙而且危险，更容易被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和日伪军所利用。另一可能性是发生无组织的、破坏性的农民暴动，其规

模比过去大得多。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某些小党派基于利害关系显然正企图与地方军阀结成联盟。这些地方军阀大多数属于中国政治中最反动无耻的分子，而不是争取新的民主的斗士。

乐观的迹象是，所有这些集团都同意，中国今天的基本问题是为实现民主而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需加以强调。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恢复战斗意志、统一国家、消除地方军阀主义、解决共产党问题、制定避免崩溃的经济政策、出现一个真正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民主改革是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

毫无疑问，中国实现国内和平和真正统一——当然是在不远的将来（由于战争，我们必须优先考虑这点），也可能是长远的将来——的希望，既不在于现在的国民党，也不在于共产党，而是在于中国内部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民主联合，它包括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以及共产党内愿意合作恢复统一战线的很多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话和以往的行动表明了这种愿望）。

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态度后，我们可以肯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将由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认真制定和实施。这样一个政府，也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会通过减少征兵弊端、制止虐待士兵和不再让士兵挨饿等办法，恢复全国士气，使中国振奋起来，摆脱军事上无所作为的状态。这样一个政府，也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会着手采取增加生产所必需的经济措施，有效地控制物价，动员国家资源，结束贪污腐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和非法牟取暴利的现象。当然，设想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政府能一下子成立起来，或认为它能立即解决上述广泛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

要进步，就必须通过，也只能通过政府走向民主，才能实现。

二、鉴于这一日益加剧的危机，美国应对中国采取何种态度呢？

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言，中国目前的解体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使国内形势发生惊人变化，并对抗日战争发生剧烈影响。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听任这一解体继续下去，达到灾难性的崩溃；还是想出一些我们能合法、切实地做到的事情，以制止这一解体进程，我们需要制定一项现实的对华政策。

(一) 国民党和蒋介石明确意识到他们依赖我们，而且将不得不要求我们支持。

我们必须了解，当这一解体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国民党将会转向我们，要求我们从财政、政治和军事上解救他们。意识到这种依赖性，才可以明确和正确地解释何以国民党对美国的意见和批评这样敏感。国民党——特别是蒋委员长——知道，我们是中国可以向之求助的唯一无私而又强大的盟友。

国民党向我们伸手，除了明显陈腐的却仍能打动人心的所谓感情的理由外，还可以提出许多理由。他们过去说过，将来还会说，他们很早以前就能以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同日本媾和……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他们已经宣称，而且还将再次宣称，他们抵抗日本，拒绝与之妥协，因此，拯救了俄国、英国和我们。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自己因为拒绝在不利于中国的条件下与日本妥协而引起了珍珠港事件，使我们仓促卷入战争。他们已经抱怨过，并将继续抱怨，他们得到的物资支援比其他主要盟国得到的要少，而忘了他们很少作战，并且没有使用所得的物资，也没有能力

使用他们要求得到的东西。最后，他们已试图，并将继续把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我们；他们歪曲美军在华开支所造成的影响，而忽视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开支仅仅是中国经济管理不善的整幅可悲图景中的一个次要因素。

但是不论这些要求多么牵强附会，如果我们断然加以拒绝，也许会造成若干麻烦的后果：

(1) 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国内动乱时期。我们在这个战区的军事活动将受到妨碍，远东的不安定将会延长，也许还会导致苏联进行干涉。

(2) 我们将会受到中国和美国大部分舆论的责备，说我们至少部分地应对中国的崩溃负有责任并说是我们“放弃”了中国。(我们多少有些咎由自取，因为我们曾倾向于让我们自己不仅与中国联系起来，而且与国民党及其政策联系起来。今后，如果我们的勇敢精神表现在避免与国民党过于亲密一致上，这种精神也许才更有价值。)

(3) 由于我们在中国危难时公开撤回对它的帮助，我们将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远东丧失威望。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国民党的条件拯救它，我们就是在支持——但也只能是暂时支持住——一个腐朽政权。从它目前的构成和纲领来看，这个政权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无论中国还是我们自己，都将只是在总清算之前获得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罢了。

所以，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我们只能在这两种令人不快的选择中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的局面，显然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二) 国民党对我们的依赖使我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形势在迅速发展，委员长将不得不要求我们继续提供并增加援助。他如此脆弱，决不能拒绝或轻视我们可能采取

的任何协调和积极的对华政策，而且他越脆弱就越不能这样做。每张牌都对我们有利，只要机智地运用，我们会有极大的影响力。

(三) 有三个一般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摆在我面前。

(1) 我们可以放弃毫无希望的中国，并完全不再过问那里的事情。

(2) 我们可以在委员长提出要求时继续给他以支持。

(3) 我们可以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并采取必要的步骤加以贯彻。

(四) 必须根据我们的在华目标决定我们的选择。

美国如果有这种愿望，并有一项一贯的政策，就可以在以下事情中扮演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角色。

(1) 促使中国积极参加远东战争，从而加速击败日本。

(2) 避免中国的经济崩溃，促成基本的政治、经济改革，从而使它能继续进行战争并增加它战后有秩序地进行恢复的机会。

(3) 使中国能够在战后崛起，成为东亚稳定的主要因素。

(4) 赢得一个永恒的、有用的盟友，一个进步、独立和民主的中国。

(五) 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选择，即实行一项协调一致的、积极的政策。通过考察中国当前的形势和我们对华政策的特定目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由于当前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是出于显而易见的长远考虑，第一种选择必须排除。它将使我们失去宝贵的空军基地和在日军侧翼的阵地，并将延长战争。我们不能不过问中国的事情。

第二种选择（如果说我们有一项对华政策，这就是我们一直实行并正在继续实行的政策）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给予中国的大量财政援助已被白白浪费掉；如果说它对延缓通货膨胀、阻止经济崩溃有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肯定没有用来增加中国的抗日军事力量。我们的政治支持被国民党用于自私的目的，并用来支撑它目光短浅的、灾难性的政策。

因此，第三种选择是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假如排除了第一种选择，帮助中国和为它充当顾问就是肯定的了。中国自己必然要求给予帮助和建议，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使提供的援助卓有成效呢？还是继续以现在这种零乱的、心不在焉的方式提供援助。过去有时我们的右手似乎都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如果没有一个一贯的、协调一致的政策，继续这样干下去将使我们的努力白白浪费掉，而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得不到任何明显的好处。它只能在已经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之外，继续造成新的问题。除了消极的眼前利益外，它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更重要的是，只图眼前利益漫无目的地给予支持可能并不足以挽救形势：中国即便得到这种支持，还会继续走向崩溃。

（六）这个积极的政策应该是政治性的。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象过去那样忽视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政治考虑呢，还是应该效法日本人，求助于中国现有的更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我们的军事目标和长期政治目标。

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扭转当前的崩溃趋势，并把中国从军事上消极无为的状态中唤醒起来。这些只能通过加速中国民主的政治改革来实现。我们必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起催化

剂的作用。只要我们谨慎地施加影响，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我们迄今一直未能有意识、有步骤地使用这种影响。

民主改革并非一定意味着要推翻委员长或国民党。相反——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一点的话——他们的地位将得到改善，中央政府的稳定将得以增强。中国现有的民主势力将得到加强，国民党内的反动独裁倾向将发生改变，一个多党派的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出现。几乎可以肯定，委员长和国民党在这样一个政府中将继续起主导作用。

不言而喻，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中国内部的力量来实现，并依靠它们而存在。它不能由我们或其他任何国家强加于中国。因为对我们来说，强加“民主”不仅与我们的一贯主张相反，还会使我们处于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境地，日本人和反动分子将利用这种谴责。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找到一种方法，以间接的、经常是谦逊的方式运用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的关注。

在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已很强烈。我们可以确信，随着我们的态度明朗化，以及我们认为中国本身应该是改革的主要动力这种愿望日益明确，中国的民主改革将获得稳步推进。

如果考虑到下列因素，对于这样一项劝说政策能否成功所抱的疑虑就能减轻：

国民党已经表现出它自己是脆弱的，并对外国的批评十分敏感；

中国的自由主义集团欢迎外国批评，并认为它是迫使国民党实行改革的最有力的动力之一；

中国有政治影响的集团人数不过几十万，并很容易同他

们建立联系。

三、贯彻这项政治政策虽然有某些困难，但它切实可行，并能以多种方式加以实施。

(一) 要想不触犯几乎所有中国各阶层人民都具有的真挚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它同国民党的沙文主义是有区别的）来实施这项政策，就需要外交手腕。必须敏感地注意中国的局势和政治变化，以便适当而及时地采取刚柔相济的措施。这种机敏不仅为高级决策机构所必需，也是执行这项政策和与中国有关的所有其他机构所需要的。

(二) 必须有效地协调所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美国政府机构的政策和行动。

美国政府各机构（国务院、陆军部以及某些新成立的自主行事的组织）之间目前缺乏有效的合作，这就降低了每一机构的工作效率，并在极为需要美国影响的时候削弱了这一影响。

必须认识到，如果实行此处建议的政策，就更要认识到，我们与中国的所有交往和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有政治含义。协调对于实现政策统一和步调一致是绝对必要的。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在华盛顿和重庆都有明智而强有力党的领导。

因为涉及问题广泛，在重庆协调美国各机构活动的显然应该是美国驻华大使。同样，在华盛顿进行协调的可以是国务院中国科科长，他应该为总统或一位负责中国事务的内阁成员注视整个这一领域的情况。当然，积极的行动将依赖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以及在华活动的其他机构的代表们在华盛顿和当地进行经常的密切磋商。

(三) 既然不应同时实施可供我们考虑的所有措施，就

应进行审慎的选择并把握好时机。

有些措施简便易行并能立即发生作用。其他措施则应推迟到已采取基本步骤之后再实行。还有一些措施可能更有力或更直接，但它们的实施将取决于国民党对改革的顽抗程度。我们一定要避免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导致失败。

（四）执行这项积极政策时应该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1. 消极方面的措施：

- (1) 通过下列步骤停止我们目前对中国的“娇惯”：
 - 限制租借物资，
 - 裁减训练中国军官的数目，
 - 中止训练中国军队，
 - 在财政谈判中采取比较坚定的立场，
 - 或者停止向中国运送黄金。

如果委员长和国民党在采取军事行动、使用装备和训练器材方面拿出更加合作的态度，在财政问题上表现出通情达理，或者在出于军事需要诸如与共产党地区建立联系方面允许我们自由活动，就可以部分取消或全部取消这些限制性措施。

(2) 停止在国际上和在美国树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威望。给他们这种“面子”只能有利于在中国国内支撑这个政权，并使它更坚持其现行政策。我们把中国包括在“四强”之内的作法，在战争初期以及作为对日本人种族宣传的反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没有理由这样做了。

我们对中国劳工发言人朱学范毫无意义的言论的重视，在国际劳工局大会上给中国以非常突出的地位，这些作法是在愚弄自己。我们往往对中国人赞扬过度，这被他们看

作是愚蠢或虚弱的象征。

在我们的对华态度上，放弃圆滑动听的一般原则，采取冷静的现实主义，这将很快为人们所理解，而不会使中国人对我们产生他们可能对英国抱有的那种不满情绪。我们可以明确表示，我们只给予应得的赞扬。

(3)不再作无条件和不切实际的许诺，比如答应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或以战后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等方式给予中国帮助。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让人们明白，我们准备在中国证明自己值得帮助时帮助它。这就使我们必须在宣传方面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阶段，比如主要应表明，美国给予战后经济援助不是为了建立垄断企业或支持地主一绅士阶级，而是为了民主人民的利益。

(4)结束我们目前与中国秘密警察组织进行的积极合作，这些秘密警察组织支持反动势力并代表着我们美国民主目标和理想的对立面。这一合作的结果极大地加强了一个盖世太保式的组织，并在中国广泛为人们所知晓。它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感困惑和失望，而他们曾经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合作还削弱了我们迫使国民党领导人进行民主改革的力量。

2. 积极方面的措施：

(1) 政府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或在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可以表明我们关心中国的民主和统一，不满意国民党现行的军事、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这样的意见如果由总统提出，将会很有份量。我们可以利用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和孔祥熙访美等机会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的行动可以是由国会议员就中国事务提出质询或是发表声明。

(2) 我们应接受国民党反复（但通常是虚伪地）提出

的要我们给予建议的请求。如果国民党要求提供顾问，我们就应同意，并选择优秀的人员去充任，还要给予这些顾问一切可能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国民党将不乐意接受我们可能提供的建议，但仅仅是反复不断地提出我们的建议本身就会产生某些效果。

(3) 我们应争取通过每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扩大我们对中国舆论的影响。

战时情报局的活动不应象目前这样仅限于报道美国战争新闻，它应进行宣传，比如强调民主的重要意义，阐明它是永恒的政治制度和反极权主义战争中的辅助因素。我们应努力通过无线电广播或其他直接方式进一步在中国传播美国建设性的批评。这应包括承认中国内部的自由主义分子和进步势力并给他们含蓄的鼓励。这样做时应极为审慎小心，使这种批评始终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和客观的，要避免进行可能伤害中国人敏感的民族主义感情的贬抑性攻击。为了进行这项工作，也许得扩大战时情报局的在华机构和我们直接的对华宣传。

第二方面是积极扩大中美文化交流计划。目前，我们的文化交流根据国民党的愿望转移到了技术领域，应对此作出调整，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以及美国政府行政管理这样的实用政治领域。我们应通过许多已试行过的方法加强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援助和支持，比如资助他们在中国的研究工作、翻译工作，以及为他们提供赴美学习和讲学的机会。

其他更为间接的办法是在新的地点增设美国在华代表机构（因为每个外交办事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美国影响的中心，并是美国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留美回国学生联系的中心）；认真教育美国在华军人要做出榜样并通过自己对

中国人的态度，使中国人对美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事物产生好印象。在美中军事人员已有密切接触的地方，如在缅甸，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产生了民主化的影响。

(4) 我们应帮助引导美国舆论对中国采取现实的、但是建设性的同情态度。最明显可行的方法应是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向有影响的政治评论员、作家和研究人员提供背景情报。无须我们出面，他们的著述就会为中国政界人士所知，并通过他们传到其他关心政治的集团去。然而，我们应把这一方法与上一节所述作法协调起来，促进美国的建设性批评在中国传播。

(5) 我们应该与国民党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各个小党派以及共产党维持友好关系。这不仅可以，而且为了收到最大效果也应该以一种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方式进行。这样做所暗示的对这些势力的承认将迅速为中国人所领会。

这方面可以进一步采取的步骤是向自由主义者比如杰出的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如有可能，还可以考虑授予他们特殊的荣誉和奖励，通过邀请他们参加某些国际委员会或其他国际机构承认他们的地位，并邀请他们到美国旅行或讲学。这类作法中一个最有效的行动应该是由白宫邀请孙中山夫人访美。

我们应挑选知名的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充当我们战时情报局、文化交流以及其他在华工作机构的代表。

(6) 我们应继续关注中共。这包括与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进行接触，广为报道国共两党间的斗争和局势发展，继续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他们同意我们向华北派遣观察员。同时，我们应强调华北军事上的重要性：搜集有关日本军队战斗部署的情报、日本空军实力的情报、气象报告、我方进行轰炸所需资料和对轰炸效果的估计，以及我方飞行员安全降

落和营救他们的工作的情报。我们应考虑最终将积极地把对日军事行动推进到华北，应考虑援助共产党和游击队或是与他们合作的问题。如果我们基于紧急军事原因而提出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赞同，我们就无论如何也要把军事观察员派出去。

(7) 如果中国的地方军队或其他军队能使我们满意地认为它们将同日本人作战，我们应考虑对他们加以训练和装备。

(8) 我们应继续敦促，并在必要时强硬要求国民党允许美国观察员去作战前线。我们应力促，并在可能时实际帮助改善中国士兵的状况，特别是他们的待遇、服装、伙食和医疗状况。

(9) 我们应广为宣传政府负责官员作出的声明，表明我们关心中国的统一和我们对国民党把美国租借物资用于内战这类问题的态度。副国务卿韦尔斯致白劳德的关于美国关心中国统一的信件受到国民党的极大重视，以致禁止它在中国出版发行。这一事例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这一计划远非尽善尽美。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制定政策的机构自然会想到其他措施，某些措施也会自行涌现在人们面前。

(五) 这些措施大多数能够逐步实行。

建议采取的各种消极措施，以及力图影响中国舆论的各种谈话、声明和其他方式的努力都可以逐步实行。计划采取的鼓励和关注自由主义者、小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的行动可以自然地分阶段实行。

(六) 上面建议采取的措施大部分已经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在进行，因而效果极为有限。

首先需要的是协调一致、目标明确，有计划地扩大我们已在进行的、有时也许是无意识地进行的活动。例如，我们的确试图与自由主义集团保持联系；我们确已表示希望派观察员到共产党地区；我们制定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文化交流计划；战时情报局也已经作了宣传美国民主的某些尝试。

（七）这项计划对中国事务只构成非常缓和的间接干涉。

必须承认，这里建议的某些措施将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们对另一主权国家的事务表现了超出正常程度的关心。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损害中国主权的地步。如果说我们采取的作法是以要求中国保证更好地进行战争作为我们提供租借物资的条件，那么，中国同样有拒绝按这些条件接受援助的自由。我们离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常干的行径还差得很远。比如，我们显然没有象俄国人过去援助共产党那样，建议积极支援或资助反对国民党的其它政党。

此外，中国政府将发现很难反对我们的计划。中国人通过林语堂之流的言论和著述滥用他们在美国进行宣传的自由。他们还通过持官方护照的中国政府代表林语堂从事“文化交流”。他们任意批评美国的政策和领导人，并企图通过蒋夫人、卢斯、威尔基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插手美国政治。他们已经享有，并且将继续享有这样的自由，即以我们试图在中国采取的同样方式努力影响美国的舆论。

附录三

参考文献目录（英中对照）

在本书正文和注释中，使用了大量简略或非正式的书名，通过参考下列文献的编排号码可以查出它们的正式名称。

- China White Paper* (《中国白皮书》) 见33号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太平洋关系学会》) 见31号
Investigation of Far Eastern Policy (《远东政策调查》) 见28号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远东军事形势》) 见27号
Papers (《美亚文件》) 见32号
Peabody Report (《皮博迪报告》) 见38号
Tydings Report (《泰丁斯报告》) 见30号
Tydings Transcript (《泰丁斯记录稿》) 见29号
J. Barrett, David D.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92pp.

包瑞德，戴维·D·：《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版，92页。

2. Chang, Carsun.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2, 345pp.

张君劢，《中国的第三势力》，纽约，布克曼协会，1952年版，345页。

3. Cohen, Warren I. "Who Fought the Japanese in Hunan? Some Views of China's War Effor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 1(November 1967), 111—115pp.

科恩，沃伦·I.：《谁在湖南对日作战？对中国战争努力的若干看法》，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

4. Compton, Boy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278pp.

康普顿，博伊德·：《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1944》，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278页。

5. 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445pp.

菲斯，赫伯特·：《中国的纷乱》，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445页。

6. Forman, 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Holt, 1945, 250pp.

福尔曼，哈里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年版，150页。

7. Isa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Sacker and Warburg, 1938, 501 pp.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萨克和沃伯格公司，1938年版，501页。

8. Johnson, Chalmers A.,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56pp.

约翰逊，查默斯·A·：《农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256页。

9. Kerr, George H.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514pp.

克尔，乔治·H·：《被出卖了的福摩萨》，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65年版，514页。

10. Latham, Earl, *The Communist Controversy in Washington, From the New Deal to McCart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46pp.

莱瑟姆，厄尔·：《华盛顿关于共产主义的论战：从新政到麦卡锡》，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446页。

11. Leahy, William D. *I Was The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0, 527pp.

李海，威廉·D·：《现场目击记》，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50年版，527页。

12. Liu, 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312pp.

刘，F.F.，《中国现代军事史》，普林西顿，普林西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312页。

13. Loh, Pichon P.Y. *The Kuomintang Debacle of 1949; Conquest or Collapse?* Boston, Heath, 1965. 114 pp.

陆培涌（陆晶清）：《国民党1949年的垮台：是征服还是崩溃？》，波士顿，希思公司，1965年版，114页。

14. Lohbeck, Don. *Patrick J. Hurley*. Chicago, Regnery, 1956. 513pp.

洛贝克，唐·：《帕特里克·J·赫尔利传》，芝加哥，雷格纳利公司，1956年版，513页。

15. Miles, Milton E.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629pp.

梅乐斯，米尔顿·E·，《另外一种战争》，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67年版，629页。

16. Peck, Graham.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725pp.

佩克，格雷厄姆·：《两种机会》，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年版，725页。

17. Romanus, Charles F., and Sunderland, Riley.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3. 441 pp.

罗曼纳斯，查尔斯·F·和森德兰，赖利·：《史迪威华》，华盛顿，陆军部历史编纂司，1953年版，441页。

18. Romanus, Charles F., and Sunderland, Ri-

ley,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6. 518pp.

罗曼纳斯，查尔斯·F·和森德兰，赖利·，《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陆军部历史编纂司，1956年版，518页。

19. Romanus, Charles F., and Sunderland, Riley.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9. 428pp.

罗曼纳斯，查尔斯·F·和森德兰，赖利·，《中缅印战区形势危急》，华盛顿，陆军部历史编纂司，1959年版，428页。

20. Rosinger, Lawrence K. "The White Paper in Brief." *Far Eastern Survey* 18, 18 (September 7, 1949), pp. 205—208.

罗辛格，劳伦斯·K·，《白皮书摘要》，载于《远东评论》，第18卷第18期（1949年9月7日）第205—208页。

21. Salisbury, Harrison E. "Image and Reality in Indochina." *Foreign Affairs* 49, 3 (April 1971), pp. 381—394.

索尔兹伯里，哈里森·E·，《在印度支那的幻想和现实》，载于《外交季刊》，第49卷第3期（1971年4月）第381—394页。

22. Service, John S. "Pertinent Excerpts."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October 1951, p22.

谢伟思，约翰·S·，《恰当的摘录》，载于《外交人员杂志》，1951年10月号第22页。

23.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7. 464pp.

斯诺，埃德加·：《西行漫记》，伦敦，维克托·高兰茨公司，1937年版，464页。

24. Snow, Edgar.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434pp.

斯诺，埃德加·：《复始之旅》，纽约，兰登书屋，1958年版，434页。

25.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614pp.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5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614页。

26. Tuchman, Barbara.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71. 621pp.

塔奇曼，巴巴拉·：《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1年版，621页。

27.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nd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82d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5 vols. 3691pp.

美国国会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远东军事形势》〔参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1年版，共5卷3,691页。

28.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

eign Relations. *Investigation of Far Eastern Policy*. 79th Cong., 1st sess. Mimeograph transcript, December 5, 6, 7 and 10, 1945.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政策调查》（1945年12月5、6、7、10日，第79届国会，第1次会议）（油印稿）。

29.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 Loyalty Investigation*.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Pursuant to S Res. 231. 81st Cong., 2d s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2 Vols. 2509pp.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根据参议院231号决议举行的听证会，第81届国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0年版，共两卷2,509页。

30.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 Loyalty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Pursuant to S. Res. 231. 81st Cong., 2d Sess. Report no. 2108.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347pp.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参议院231号决议所作的报告，第81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2108号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0年版，347页。

31.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arings. 82d Cong., 2d s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1952, 15 parts, 5964pp.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82届国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1年，1952年版，共15部分5,964页。

32.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Edited and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Kubek.〕
91st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2 vols, 1819pp.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美亚文件：理解中国灾难的线索》〔由安东尼·库比克编辑和撰写导言〕，第91届国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0年版，共两卷1819页。

3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1079pp. Reprinted under title *The China White Paper.* Introduction by Lyman P. Van Slyke. Index.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1,079页。196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白皮书》的书名重印，由莱曼·P·范斯莱克写了导言，并附有索引。

3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1,032pp.

美国国务院：《美国内外交关系，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5年版，1,032页。

3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908pp.

美国国务院：《美国内外交关系，1943年，中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7年版，908页。

3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Vol. 6,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1,206pp.

美国国务院：《美国内外交关系，1944年，第6卷，中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67年版，1,206页。

3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1,506pp.

美国国务院：《美国内外交关系，1945年，第7卷，远东和中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69年版，1,506页。

38. Van Slyke, Lyman P.,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74pp.

范斯莱克，莱曼·P·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陆军部1945年7月的一份报告》，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

社，1968年版，274页。

39. Wedemeyer, Ae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1958, 497pp.

魏德迈，艾伯特·C·：《魏德迈报告》，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58年版，497页。

40. White, Theodore H., and Jacoby, Annalee.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331pp.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暴风雨》，纽约，威廉·斯隆合股公司，1946年版，331页。

附录四

译名对照表

Acheson, Dean	艾奇逊，迪安·
Alsop, Joseph	艾尔索普，约瑟夫·
Anderson, Donald B.	安德森，唐纳德·B·
Atcheson, George	艾奇逊，乔治·
Atkinson, Brooks	阿特金森，布鲁克斯·
Attlee, Clement	艾德礼，克莱门特·
Barrett, David D.	包瑞德，戴维·D·
Belden, Jack	贝尔登，杰克·
Berrigan, Darre11	贝里根，达雷尔·
Bielański, Frank B.	比拉斯基，弗兰克·B·
Browder, Earl	白劳德，厄尔·
Bullitt, William B.	布利特，威廉·B·
Burton, Barry	伯顿，巴里·
Byrnes	贝尔纳斯
Carlson, Evans	卡尔森，埃文斯·
Casberg	卡斯伯格
Chang, Sidney (Hsin-hsin)	张树兴
Chennault, Claire	陈纳德，克莱尔·
Churchill, Winston	丘吉尔，温斯顿·

Clubb, O. Edmund	克拉布, O·埃德蒙·
Cohen, Warren I.	科恩, 沃伦·I·
Compton, Boyd	康普顿, 博伊德·
Currie, Lanchlin	柯里, 劳克林·
Davies, John Paton	戴维斯, 约翰·佩顿·
Dolan	多兰
Domke	多姆克
Donovan	多诺万
Drumright, E. F.	德鲁姆赖特, E·F·
Dulles	杜勒斯
Dunn	邓恩
Eastland, James O.	伊斯特兰, 詹姆斯·O·
Eisenhower	艾森豪威尔
Emerson, Rupert	埃默森, 鲁珀特·
Emmerson, John K.	埃默森, 约翰·K·
Fairbank, John K.	费正清,
Feis, Herbert	菲斯, 赫伯特·
Ferris,	费里斯
Forman, Harrison	福尔曼, 哈里森·
Fraser, Peter	弗雷泽, 彼得·
Freeman, Fulton	弗里曼, 富尔顿·
Gauss	高斯
Gayn, Mark Julius	盖恩, 马克·朱利叶斯·
Gordon, Leonard	戈登, 伦纳德·
Green	格林
Grew	格鲁
Gross	格罗斯

Hackworth, Green H.	哈克沃思，格林·H.
Hamilton, Maxwell	汉密尔顿，马克斯韦尔
Handy	汉迪
Harriman, Averell	哈里曼，艾夫里尔·
Hay, John	海约翰
Hearn	赫恩
Hersey, John	赫西，约翰·
Herter	赫脱
Hinderer, Harry	欣德拉，哈里·
Hiss, Alger	希斯，阿尔杰·
Hitchcock, Robert M.	希契科克，罗伯特·M·
Hobbs	霍布斯
Holmes	霍姆斯，
Hopkins, Harry L.	霍普金斯，哈里·L·
Hornbeck, Stanley K.	霍恩贝克，斯坦利·K·
Hull, Cordell	赫尔，科德尔·
Hurley, Patrick J.	赫尔利，帕特里克·J·
Isaacs, Harold	伊罗生
Jacoby, Annalee	贾安娜
Jaffe, Philip Jacob	贾菲，菲力普·雅各布·
Johnson, Chalmers A.	约翰逊，查默斯·A·
Johnson, Nelson	詹森，纳尔逊·
Kaneko, Jane	凯尼柯，简·
Kennan, George M.	凯南，乔治·M·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约翰·F·
Kerr, George H.	克尔，乔治·H·
Kubek, Anthony	库比克，安东尼·

Larsen, Emmanuel Sigurd	拉森, 伊曼纽尔·西格德·
Latham, Earl	莱瑟姆, 厄尔·
Lodge	洛奇
Lohbeck, Don	洛贝克, 唐·
Luce, Harry	卢斯, 亨利·
Ludden, Raymond D.	卢登, 雷蒙德·D·
Mansfield	曼斯菲尔德
Marshall	马歇尔
McCarthy, Joseph	麦卡锡, 约瑟夫·
McClure	麦克卢尔
McInerney, James	麦金纳尼, 詹姆斯·
McMahon	麦克马洪
McNally, Edward J.	麦克纳利, 爱德华·J·
Melby, John F.	梅尔比, 约翰·F·
Miles, Milton E.	梅乐斯, 米尔顿·E·
Mitchell, Kate Louise	米切尔, 凯特·路易斯·
Molotov	莫洛托夫
Morgan	摩根
Nelson	纳尔逊
Otepka, Otto	奥蒂普卡, 奥托·
Patterson	帕特森
Peabody	皮博迪
Pearson, Jo	皮尔逊, 琼·
Peck, Graham	佩克, 格雷厄姆·
Penfield	彭菲尔德
Phillips, William	菲利普斯, 威廉·

Froctor	普罗克特
Rice, Edward E.	赖斯, 爱德华·E·
Ringwalt	林沃尔特
Romanus, Charles F.	罗曼纳斯, 查尔斯·F·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富, 兰克林·D·
Rosinger, Lawrence K.	罗辛格, 劳伦斯·K·
Roth, Andrew	罗斯, 安德鲁·
Sager, E.R.	塞杰尔, E·R·
Salisbury, Harrison E.	索尔兹伯里, 哈里森·E·
Service, John Stewart	谢伟思, 约翰·斯图尔特·
Service, R.M.	谢伟思, R·M·
Smyth	史密斯
Snow, Edgar	斯诺, 埃德加·
Sprouse, Philip D.	斯普劳斯, 菲利普·D·
Stalin	斯大林
Stanton, Edwin F.	斯坦顿, 埃德温·F·
Steele, A.T.	斯蒂尔, A·T·
Stelle	斯特尔
Stettinius	斯退丁纽斯
Stevens, Georgianna	史蒂文斯, 乔治亚那·
Stevens, Harley	史蒂文斯, 哈利·
Stilwell, Joseph	史迪威, 约瑟夫·
Stimson	史汀生
Sultan	萨尔顿
Sunderland, Riley	森德兰, 赖利·

Taylor, Harry J.	泰勒，亨利·J·
Truman, Harry S.	杜鲁门，哈里·S·
Tuchman, Barbara	塔奇曼，巴巴拉·
Tydings	泰丁斯
Van Beuren, Archibald	范布伦，阿奇博尔德·
Van Slyke, Lyman Page	范斯莱克，莱曼·佩奇·
Vinacke, Harold M.	维纳克，哈罗德·M·
Vincent, John Carter	文森特，约翰·卡特·
Wallace	华莱士
Ward	沃德
Watts, Richard	瓦茨，理查德
Wedemeyer, Albert C.	魏德迈，艾伯特·C·
Welles, Sumner	韦尔斯，萨姆纳
White, Theodore H.	白修德，
Whittlesey	惠特尔西
Willkie, Wendell	威尔基，温德尔·
Wittfogel, Karl A.	威特福格尔，卡尔·A·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John S. Servi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1971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1年第1版译出

